文物参考资料

一九五七年　第九期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FAR EASTERN LIBRARY

目　录

一九五七年第九期(总第八五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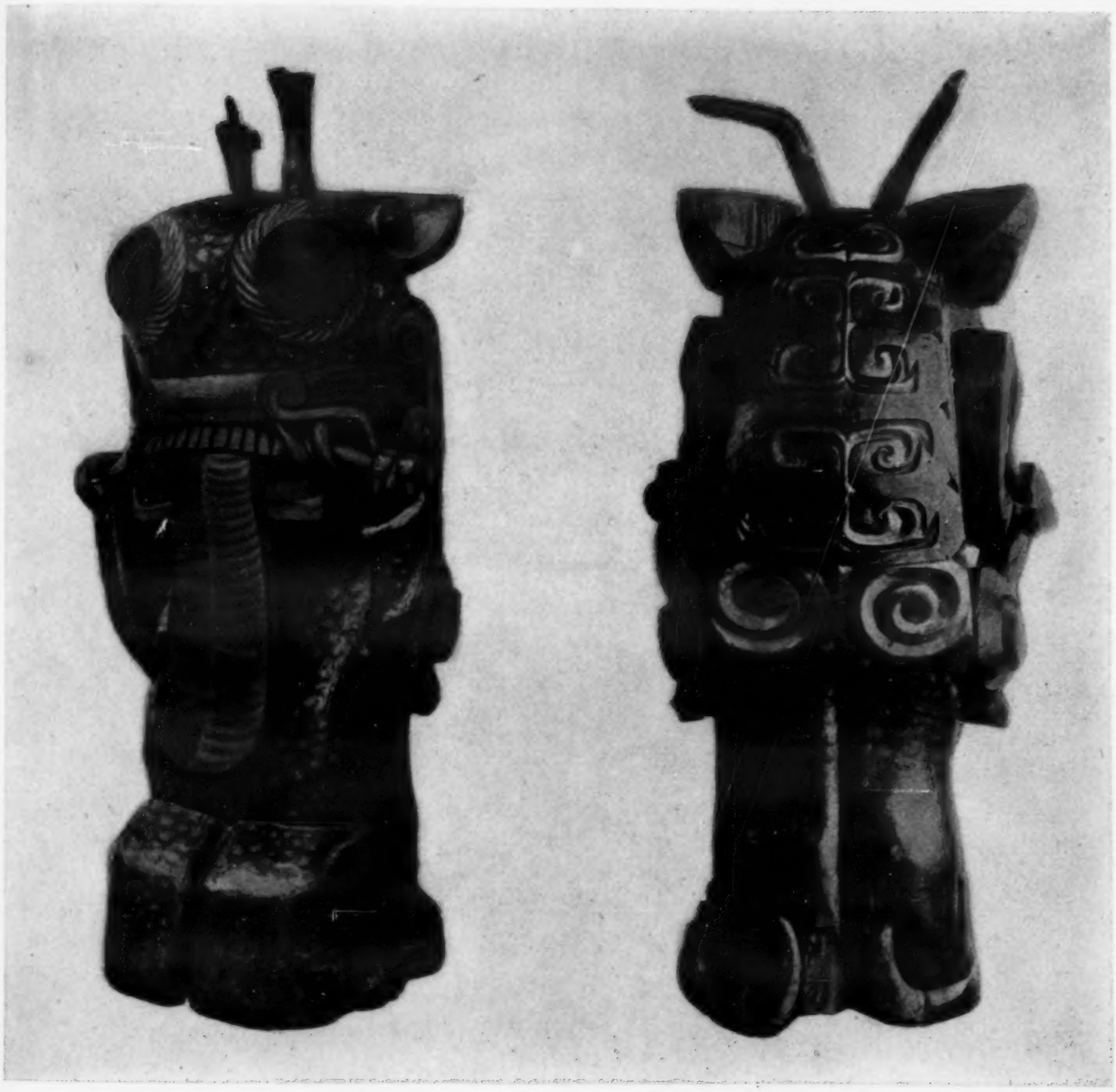
党是扼杀了文物工作还是發展了文物工作 ……閻文儒 (5)
知識分子必須下决心完全扔掉一切腐烂發臭的东西 ……唐　兰 (7)
駁斥右派分子馬非百对北京历史博物館的誣蔑
……王家琦　耿宗仁　余　庠　蔣祖安　王黎暉 (9)
控訴右派分子楊介眉对文物摧殘的罪行……張平一　赵巨川 (10)
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李开圻　李济馨 (12)
斥右派分子朱偰的謬論 ……朱　江 (13)
甘肃省政协揭露馮国瑞一貫仇視党和盜卖国家文物的罪行…… (14)
我国工艺美术的优良傳統及其發展的道路 ……郑振鐸 (15)
我国考古史上的空前發現、信陽长台关發掘一座战国大墓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 (21)
碑刻資料介紹
从两塊碑刻看历史上佃农的命运 ……吳雨蒼 (33)
訪"永禁頑佃积弊碑"小記……金　誠 (36)
几塊有关鎮压踹坊、染紙坊手工工人的碑刻資料 ……燕　石 (38)
記蝦蟆岭下的一塊压迫修路工人碑 ……洪丕熙 (39)
山东省的两塊霜麦碑記 ……陈士宗 (40)
介紹两塊有关中外交通史的碑刻 ……林　劍 (41)
揚州仙鶴寺阿剌伯人墓碑記……朱　江 (47)
新發現的汉延光四年刻石 ……孙太初 (47)
云岡新發現的一塊北魏石刻 ……云岡古迹保养所 (48)
一处值得注意的古文字石刻 ……張知寒 (49)
梁山伯祝英台墓碑出土記略 ……郑亦桥 (49)
南京最近發現的太平天国早期革命英雄墓碑 ……靳程前 (50)
三年来西安市郊出土碑志有关校补文史之資料 ……李子春 (52)
調查閩南古代窑址小記 ……陈万里 (56)
关于富陽窑瓷器的备忘录 ……蔣玄伯 (60)
燕下都遺址瑣記 ……謝錫益 (61)
博物館書画儲藏柜的新設計 ……成恩元 (65)
再論地志博物館当前的中心任务問題 ……陈　生 (70)
我对"因地、因館制宜方針"的認識 ……巨　成 (73)
我对地志博物館陈列工作中几个具体問題的意見 ……春　生 (74)
开罗回教艺术博物館 ……何修齡譯 (75)
文物工作报导(十二則)…… (77)

讀者·作者·編者
"月湖琴盒"正誤
向讀者致歉
要注意引証材料的眞实性
关于阿拉尔屬那一省的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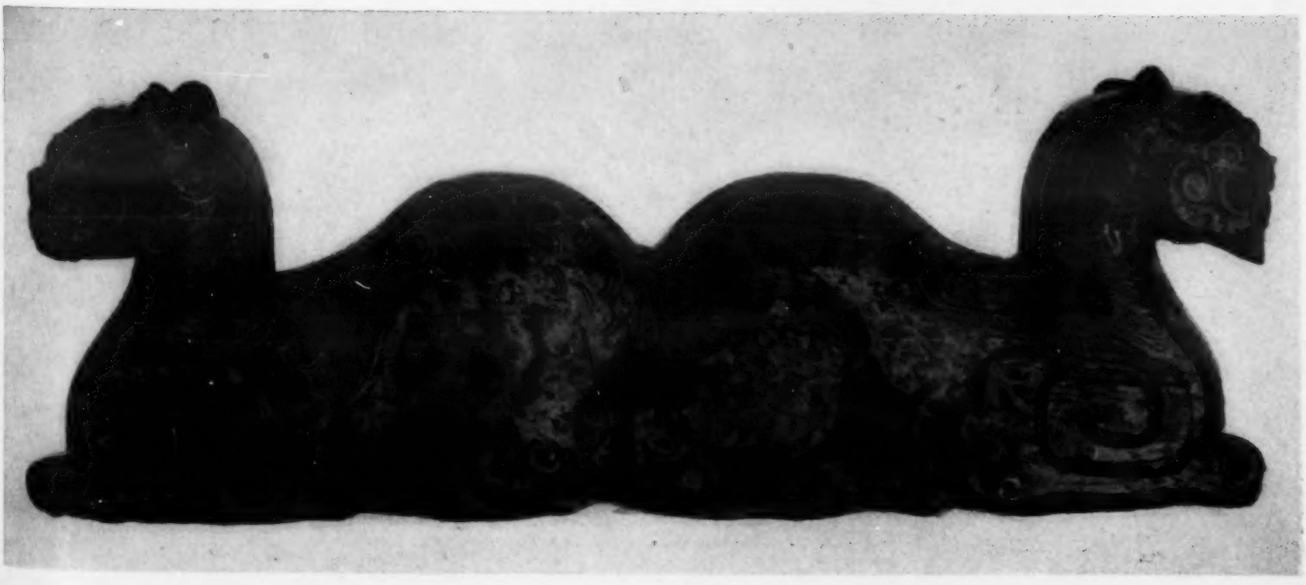
封面:河南信陽长台关战国墓出土木彫花案(罗哲文摄)

彩色插頁:河南信陽长台关战国墓出土漆彩繪鎮墓兽、木兽、残漆片(罗哲文摄)

(5)
(7)
(9)
(10)
(12)
(13)
(14)
(15)
(21)
(33)
(36)
(38)
(39)
(40)
(41)
(47)
(47)
(48)
(49)
(49)
(50)
(52)
(56)
(60)
(61)
(65)
(70)
(73)
(74)
(75)
(77)



河南信陽長台關战國墓出土漆繪彩鎮墓獸



河南信陽長台關战國墓出土漆繪彩木獸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FAR EASTERN LIBRARY

河南信陽長台關战國墓出土錦瑟殘漆片

文物界反右派斗爭座談会

特　輯

1957・北京

文化部党組召开文物界反右派斗爭座談会
辨明大是大非，駁斥右派謬論

——座談会發言特輯——

目　录

我們坚持文物事業的正确方向……郭沫若（1）

粉碎資产阶級右派在文物事業方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翦伯贊（3）

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工作……吳　晗（5）

以我亲身經历駁斥右派分子"今不如昔""老不如少"的謬論……郭宝鈞（6）

坚决拥护党的領导，駁斥右派謬論……梁思成（9）

考古工作的今昔……夏　鼐（10）

揭發以农工民主党、民盟右派分子为主的向文物界点火放毒猖狂进攻……王冶秋　陈　乔（12）

一定要把文物界的反右派斗爭进行到底……王冶秋（15）

斥文物界右派分子的讕言……裴文中（20）

右派先生們的毒舌可以息矣……唐　兰（20）

質問和声討文物界右派分子……曾昭燏（22）

用事实粉碎右派分子的讕言詭計……赵正之　莫宗江（23）

文物工作中的两条路綫……林寿晋（24）

徹底粉碎右派分子向博物館事業的进攻……王書庄（25）

文化部党組召开文物界反右派斗爭座談会

辨明大是大非，駁斥右派謬論

我們坚持文物事業的正确方向

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的發言(紀录)

中国很早就有重視古文物的風气，研究古文物也有长远的历史；大致从汉朝起，人們就对出土的文物引起重視，有时封建皇帝获得一件古銅器，就改一次年号。在封建統治的时代，人們重視古文物都把它当宝物，私藏壟断起来作为古董供个人欣賞，成为一种古董趣味。这是一种坏風气。但也有好的一方面發展，那就是有人注意了对古文物的整理，研究。如許愼說文解字序："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古代大文学家許愼很能利用古器物上的銘文作文字变迁的研究。西晋时在汲县襄王的墓里發現了大批竹簡，当时即遭散失，但古代的学者們从剩余的竹簡中，整理出来好几种战国典籍，其中就有著名的"竹書紀年"。到了北宋时代，研究金石器物，已成为系統的学問，有一段光輝的成就，如呂大临的"考古圖"和"宣和博古圖"把古青銅器仔細地繪圖、測量，考釋銘文，有时联系到历史、地理。北宋以后，这門学問沒有得到發展。直到清代，研究金石之学复盛，并有新的成就，如吳大澂、孙詒讓、王国維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好的成績。但是在旧社会里，这种研究，总是受到时代的限制。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随着帝国主义在政治、經济、文化的侵略，我国的文物也遭到他們蛮横的搶劫。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都搶走了我国大量的珍貴文物。一方面由帝国主义分子直接动手来盜取，例如敦煌的壁画，有的已被他們剝走；大同云崗、洛陽龙門等处的許多佛象，遭到断头折臂的破坏、盜运；西安著名的石刻唐代昭陵六駿被美帝偷运去一匹，还有四匹也已被打破成几段，准备偷运，被当地人民拦住，未及运走。

还有我們国內的一些唯利是圖的民族敗类，他們勾結帝国主义分子，把大批文物卖給外国。如殷周青銅器、善本古書等等，其中有不少都卖給美国。美国的文化特务竟恬不知耻地說："以后要研究中国学問的人，恐怕非到美国来不可了。"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分子和民族敗类的內外夾攻之下，祖国地上地下的珍貴文物，遭到了大規模的破坏，卖到外国的古文物，不可計量，眞是空前未有的浩劫。

历史上許多封建王朝也曾严重地破坏文物。封建統治者有时把出土的古物，視为不祥之物，大加毀損，如北周时曾将大批銅象器物毀廢；有的王朝也因为排斥佛教的关系，破坏了許多寺院和佛像、碑幢。現在各地常有大批殘破不全的佛像出土就是証明。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人民从长期被奴役的境遇中解放出来，人民把国家的事，看成自己的事，劳动热情，空前高漲，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这是一种比原子能还强大的力量。解放几年来，国家各种建設事業突飞猛进，例如长江大桥，原定一九五八年才能完工，今年就可通車了，并且还节約了經費三百万元。党在各方面的建設成績，摆在我們面前，大家有目共見。文物事業在党的領导下，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首先，党和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法令，防止了珍貴文物人为的流失和破坏；其次，随着国家基本建設的發展，地下丰富的博物館、文物倉庫陆續被打开，出土文物，为数惊人。今年六月我去錫兰，往返都在昆明停留了一短时期，我在云南博物館里，看到了大量的銅器，还有金器，有数千件之多，眞是惊人。这些文物是晋宁石寨山滇王遺址中發掘出来的。有两个印章，一个是金質，蛇紐，印文是"滇王之印"；另一个是銅印，印文是"胜西印"，按文字形式看，是汉朝时候

的遺物。还有銅鼓形状的銅器，在盖上鑄有立体人物，表現出生物的生活情景，如战爭、狩猎、祭祀等等，很像奴隶的的風俗。从这些人物的形象、衣冠装束以及器物的紋飾，还有兵器上的兽形等等看，应該屬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物。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在我国各地如长沙、西安、洛陽等都有大量文物出土。

出土的东西太多、太快，整理、研究的工作跟不上，人手太少，这是个突出的問題，也是件非常遺憾的事。但是党和政府是十分重視这件工作的，几年来，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次訓練班，大力培养考古工作人員。考古工作較之过去，已經煥然一新。就拿出版刊物来說，就有"考古学报""考古通訊""文物参考資料"等几种。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地上地下文物之富，为世界各国所少見，現在应該赶快培植新生力量，扩大研究文物的队伍。老一輩的专家們，要加重負担，培养人材，来应付燃眉之急的迫切任务。

对于古文物我們不是为重視而重視，也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們要坚持使古文物研究事業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們的方針，是要用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古人給我們遺留的丰富的物質文化成品进行發掘、整理和研究，使工作徹底科学化。我們的目的，是要通过对文物的研究、利用，来發揚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們要使人民明白，这是我們勤劳智慧的祖先，花了無数体力和脑力劳动，他們把畢生精力貫注在这上面，才創造出这些極为珍貴的文物。我們要教育人民从中去具体体会劳动創造社会，劳动創造文化的偉大意义，从而更加激發人民热爱劳动的美德，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至于那些单純賞玩文物的古董趣味，壟断文物的恶劣作風，我們要坚决反对，徹底肅清。

在文物事業上，目前也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的两条路綫的斗爭。而且这是势不两立、極为尖銳的斗爭。我們要坚持前者，反对后者。解放以来，古文物已归公有，地下發掘出来的文物，已完全屬于人民，既不容許个人壟断，也不容許个人把古董文物作为發財致富的手段，更不容許帝国主义偷窃盜运。当然走这样一条道路，会为少数靠販卖古文物来換取黃金、美鈔的奸商、民族敗类等所不滿。章乃器就是典型，他高喊用文物来換取外匯，实际上無非在給自己求發財的路子。此外，还有一些人，他們抱着严重的地方主义思想，他們反对中央对文物的科学發掘与合理調撥（如湖南陈浴新）；也有一些不了解党的文物政策的金石家、古董商，他們都对党不滿。在党整風运动大鳴大放期間，章罗联盟有見于此，認为有机可乘，章伯鈞就找到叶綽恭出来在文化界放火。一时許多右派分子都曾借文物工作为題，大肆向党进攻，他們硬說："土地改革时把民間藏書几乎燒光，等于秦始皇焚書"，"共产党对文物只有破坏，沒有保护"等等。

其实，革命的破坏是在所难免的。难道就沒有看到在革命运动中烈士們所流的鮮血嗎？經历一次像土地改革这样偉大的革命运动，古書文物那能沒有一点損失！但何尝只有破坏沒有保护呢，解放八年来，中央和地方都作了許多保护文物的工作。中国地方大、文物多，保护起来，很有困难。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墻，在中国几乎到处都有，往往一个小市鎮也有城寨。除了必須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墻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动不得的思想，是一种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应該說还有些文物是难以永久保存的。除了人为的破坏以外，大自然也会逐漸地或突然地破坏它。必須承認，解放以来个别破坏文物的事件是有的。除了革命的破坏以外，还有一种是無知的破坏，这种無知不能归罪于党和人民，更不能归罪于党。宋云彬把龙泉拆塔事件夸大起来，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产党破坏了。这样看問題是不合邏輯的。龙泉拆塔毀坏文物是一件可惜的，不幸的事。但对这件事我們应当憎恨誰呢？首先，我們应当憎恨旧时代的統治者，他們的愚民政策，使人民沒有知識；其次，我們应当憎恨自己沒有作好爱护文物的宣傳工作，很多人民还不知道去保护它們。

叶恭綽、宋云彬等右派分子，他們站在封建买办資产阶級的立場上，为了他們一小撮人的私利，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物事業。企圖把文物事業还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我們坚持文物事業的正确方向。我們必須同他們展开你死我活的斗爭。在斗爭中，我們要站穩立場，划清界限，不容許有絲毫的含糊和溫情。我們有全国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識分子的支持，少数野心分子，只不过像"蚍蜉撼大树，多見不自量"。当然，右派分子在文物界兴風作浪，仅是一个小的方面。他們四处点火的总目的，在于反对党的領导，反对国家的根本制度，企圖夺取国家的整个政权。这是我們絕不容許的，我們大家应該积極投入这場斗爭，站穩立場，接受鍛炼，爭取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大关。

粉碎資产阶級右派在文物事業方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翦伯贊 的發言

根据已經揭發出来的材料看来，文物界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情况是严重的。这些右派分子的活动是在章、罗联盟直接指揮之下进行的，是章、罗联盟整个政治陰謀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文物界的某些右派分子的謬論和活动，不能認为只是思想問題，应該說是政治問題，是章、罗联盟夺取文物事業領导权的問題，是右派分子妄圖把文物事業拉回为資本主义道路的問題，是文物事業的路綫問題，是文物事業中两条路綫斗爭的問題。

文物界的右派分子和其他部門的右派分子一样，也是否定成績，夸大缺点，他們說政府"視宝藏如廢物"，把"名画古物当作次品廢品，被打进冷宫"，又說历史博物館受到"冷淡""歧視"，"文物出版社慘稀稀的，可怜得很"，甚至說"我国文物事業倒退了"。所有这些謬論，無非是把解放后的文物事業說成漆黑一团。

解放以来，我們在文物事業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不論在考古方面或在博物館、圖書館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績，这应該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亲自参加文物工作的右派分子的却只看到缺点，不看見成績，我們在文物工作方面有沒有缺点呢？缺点是有的，但是如果把缺点和成績比較起来，則如秋毫之与輿薪，然而右派份子的眼睛則可以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

我們的缺点是不是可以批評呢？当然可以批評，而且欢迎批評。但是右派分子不是批評，而是誣蔑、誹謗，是否定一切，是政治性的攻击，是企圖从文物工作方面来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替資本主义的复辟鋪平道路。

必須揭穿，文物界的右派分子，往往装着一付抱殘守缺与世無爭的样子，好像他們只是为了酷爱古物而沒有任何政治企圖。是的，右派分子也爱古物，但他們不是爱古物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是爱古物的交換价值。当政府頒布禁止古物出口的法令以后，古物不能換取美鈔，亦即失去交換价值的时候，右派分子对于古物也就沒有什么兴趣了。現在他們只是把古物当作武器，把文物机关；特别是博物館、圖書館当作最后堡垒，等待时机向我們进攻。右派分子馬非百不是說过嗎："匈牙利事件有在博物館重演的可能"；右派分子陈浴新不是說过嗎："老子要白刀子进，紅刀子出"，"老子要杀人"。請同志們注意，只要右派分子認为有机可乘，石器、銅器和其他古物都会从博物館里飞出来，变成进攻我們的武器。宋云彬不是已經把古書和古塔当作炮彈来进攻我們嗎？宋云彬說"土地改革时把民間藏書几乎燒光，等于秦始皇焚書"，又說"龙泉拆塔事件是"曠古未有的荒唐事情"。很明显，宋云彬不是爱什么民間藏書，而是借口保护民間藏書反对土改；也不是爱什么龙泉塔，而是借口保护龙泉塔反对地方政府。宋云彬的毒箭，不仅射向共产党，并且射向苏联。当温州市修建了李时珍和叶水心墓的时候，宋云彬又从另一方面进攻，他說这"并不是由于地方政府懂得保护文物，而是因为苏联百科全書上提到李时珍和叶水心，党員盲目崇拜苏联之故"。很明显，宋云彬不是反对修建李时珍、叶水心的墓，而是反对学習苏联。总之，不管共产党怎么样，他都要反对。拆也拆不得，修也修不得；拆了是破坏，修了又是盲目崇拜苏联。

告訴右派分子：共产党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尊重古物的党，但是共产党并不是单靠祖先的文化遺产过日子，他要在祖先的文化遺产的基础上創造更高級的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化。因此保护古物，只是它的任务之一，而不是它的唯一任务。

文物界的右派分子，把古物当作武器，把博物館当作堡垒，他們还把文物工作的技术性当作盾牌来抗拒馬克思列宁主义，企圖从根本上来改变我們的文物事業的方向和路綫。他們异口同声强調文物工作的技术性，好像文物工作是一种純技术性的工作，只要懂得技术就行了，用不着学習馬克思主义；換言之，他們要坚持文物工作的資本主义道路。因此，文物界的右派分子都反对思想改造，反对政治学習。

右派分子陈梦家把馬克思主义說成是教条主义。他諷刺地說："我在学習方面是不勤悬的，教条背得很少，同时也很討厭教条，文章里面也很少引用馬克思主义的辞句"，又說"人民日报的社論都有教条味，广播电台广播出来的話都是八股腔"。总之，在

陈梦家看来，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八股，所以他自己不学，也劝青年不学，他認为学了馬克思主义就会妨碍了他的独立思考。陈梦家不仅反对馬克思主义，也反对听大报告，他說大报告"长而無味""我們是讀書人，不習慣光听报告"，好像讀書人就不需要思想改造似的。

右派分子宋云彬并且搬出菩薩来反对馬克思。他說："研究石窟也要馬克思主义指导，那是要馬克思坐在菩薩的头上去了。"显然，在宋云彬看来，研究石窟艺术是不要馬克思主义指导的。但是我們以为石窟艺术也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可以用資产阶級的方法研究，也可以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这里不存在什么坐在菩薩头上的問題。而且我們知道，石窟艺术过去有人用資产阶級的方法研究过，既然可以用資产阶級的方法研究，宋云彬并沒有說資本家坐在菩薩的头上，为什么一旦用馬克思主义来研究，宋云彬就說馬克思坐在菩薩的头上去了呢？告訴宋云彬：石窟艺术是可以用馬克思主义研究的，而且只有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才能使石窟艺术得到正确的說明。

我还要提到向达的謬論，向达也說了一句自己認为是最巧妙的話，他的話大概是这样說的："比如考古發掘，同样一鋤头挖下去，难道解放前就是資本主义的，解放以后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在向达看来，考古發掘者学不学馬克思主义都是一样。換言之，就是用不着学，只要用鋤头挖就行了。我們要告訴向达，同样一把鋤头，同样一鋤头挖下去，有了馬克思主义和沒有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解放以前一鋤头挖下去，其目的是找宝；解放以后也是一鋤头挖下去，其目的則是为替历史研究搜集物質文化的史料。整理文献上的史料要用馬克思主义，整理物質文化史料为什么就不要馬克思主义呢？

我还要提到陈梦家在这一方面的謬論。他說："解放后文华殿的阶級对比陈列是錯誤路綫。故宫应該是告訴人民中国艺术傳統偉大的成就，陈列內容当然不能要求来参观的人都看得懂。"在这里，陈梦家提出了博物館的路綫問題。从他們的謬論可以看出陈梦家所反对的是什么路綫，主張的又是什么路綫。很明白，他反对的是阶級对比陈列的路綫，也就是馬克思主义的路綫；他主張的是把历史文物当作一种純艺术品来陈列，只供少数人欣賞，也就是資本主义博物館的路綫。陈梦家就这样公开地反对博物館走馬克思主义的道路，主張資本主义在博物館复辟。因此他一旦看到历史博物館走了馬克思主义的道路，就諷刺地說："一到历史博物館就聞到教条主义的气味。"他說历史博物館的"自卑感""貧农感"太濃厚。显然，陈梦家是用反对教条主义作幌子来反对馬克思主义，而且認为如果博物館走了馬克思主义的道路就是自卑感的表現。更恶毒的是他把自卑感和貧农感联系起来，好像貧农就是卑賤的人。当然，在陈梦家看来只有走資本主义的路綫才沒有教条主义气味，才有高貴感，才是正确的路綫。告訴陈梦家：文华殿的阶級对比的陈列路綫并不錯誤。我們的博物館并不是古董鋪，籠而統之堆上一大堆，供少数有閑阶級欣賞，而是通过历史文物向人民群众进行阶級斗爭教育的机关。它必須要替人民服务，必須要讓群众看得懂，必須要尽可能强調阶級对比和阶級斗爭。历史博物館按照历史發展順序的陈列方法是正确的，沒有錯。如果說也还有些缺点，那不是馬克思主义太多，而是馬克思主义太少。我們的博物館和其他的文物机关，要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决不允許右派分子在这个部門里搞什么資本主义的复辟。

文物界的右派分子，就拿着古物作武器，拿着技术性作盾牌，以博物館和其他文物机关作堡垒，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瘋狂的进攻，妄圖在文物事業的領域內占領陣地，替資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准备条件。他們集中攻击人事制度来反党的領导。他們把人事制度說成宗派主义。陈梦家就不喜欢"小口袋"，也不喜欢小皮包，更不喜欢旧帽子。他說小口袋"不知里面給我装些什么？"他說"天天有夹小皮包的找人事干部不知干些什么？"他也反对把他过去的新月派詩人的招牌老挂在他的头上。总之，他不喜欢查他的历史。

为了証明共产党的領导是宗派主义，文物界的右派分子誣蔑党不重視文物专家。陈梦家就經常叫囂党对于老金石学家还不如三个月訓練出来的考古人員能受到尊重。另一个右派分子傅振倫說得更恶毒，他說政府对待文物工作者是"老不如少，生不如死，今不如古，本国不如外国"。实际上，如果說党不重視文物界的老专家，不如說党对文物界的老专家过分重視了，以致讓許多資产阶級右派分子长期隐藏在文物机关而沒有發覚。

为了要从文物事業中反掉对党的領导，他們就强調外行不能領导內行，他們說党員不懂技术，不懂業务，都是外行。当然不能領导文物事業。有一个右派分子程桐增說："美工室要作品領导"。照这个右派分子說来，考古所豈不要由古物領导，圖書館豈不要由書刊領导？当然，他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他所謂作品，不是指的作品本身，而是指的創作这个作品的专家、內行，指的是他自己。一句話說，

右派分子認为是外行都得滚出去；明白些說，党要退出文物机关。

誰来領导呢？陈梦家說得很清楚，他說"領导和行政負責人是党員还是非党員沒有关系"，又說："非党員担任行政領导，貫徹党的政策，也可以說体現了党的領导。事实上像考古所这样技术性很强的部門，如果沒有党員专家，讓非党員专家来領导也是可以的"。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風，能够对党員領导同志作一次調整"。这里所謂"調整"是客气話，說得不客气，就是要党員領导同志离开考古所。

不但考古所的党的領导应該撤退，文化部能不能領导文物事業也成了問題。自然博物館有一个右派分子高光明說："我們館由文化部来領导是否正确，值得怀疑。請专家做領导是可以考虑的，过去文化部領导自然博物館是大胆了一些。"

为了配合章伯鈞的两院制、罗隆基的平反委員会，右派分子張伯駒也制定了一个資产阶級的文物机构的方案。他說：为了讓內行来領导文物事業，"可以設一文物檢查机构，其中人位，包括考古家、收藏家与艺术家，業务包括中央及各地博物館保管文物情况，討論規定中央与地方博物館保管文物的原則，对于博物館人員的考績与培植，重新鑒定保管人材及重要文物登記事項。"張伯駒这个理想的文物檢查机构如果成立起来，那我們的文化部就要把文物事業的領导权全部交給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了。

这些右派分子不仅反对党对文物事業的領导，并且对科学院的党的領导进行瘋狂的进攻。陈梦家就把科学院說成是一个衙門，把科学院所屬的各級領导同志，說成是"大大小小的官"，是一些"不学無术的官老爷"。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夏鼐脫离業务，尹达脫离实际，都是一些"官老爷"。科学院的学部委員，也是一些不学無术之徒，不是他选的，他不承認。所有科学院的領导同志在他看来都是"白拿公家錢，占据領导地位"，"应該到做官的地方去，别在科学机关"。从这些昏話看来，陈梦家夺取权力的野心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最后，我要警告右派分子，你們赶快放下你們的武器和盾牌，从堡垒里走出来向人民投降。不要妄想篡夺文物事業的領导权，改变文物事業的路綫。我們的文物事業是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一个有机組成部分，它必須走社会主义的路，替社会主义服务。因为它在組織上就必須要有共产党的領导，在思想上必須要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領导，而且要加强共产党的領导，加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任何企圖使文物工作脫离共产党的領导，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的陰謀都是要被粉碎的。

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工作

北京市副市长 **吳 晗** 的發言

右派分子說党不重視文物保护工作，說文物工作是"今不如昔"，說党不重視文物专家，說党不能領导这个，領导那个。这全是胡說。我現在只講两件事情，駁斥他們的無耻讕言：

（一）党对文物工作不但重視，而且十分重視；党对文物事業不但关心，而且十分关心。几年来文物工作的成績很大。我先講一件生动的事实，1949年北京解放后，我遇到梁思成先生，他首先对我說："北京圍城时，軍管会特别派人来清华园找我，肯定說北京一定要解放，解放的方式，一个是和平解放，一个是用武装力量解放。如不能和平解放，大炮响了会損坏古代文物。为了保护这座古代文物集中的名城，要我把北京城內必需保存的古代文物建筑的方位标在地圖上，以便保护，免遭炮火的攻击。在战爭时間，在兵临城下的时候，共产党这样爱护文物的行动，使我非常感动。試問在我国历史上，有过那一支軍队能在打仗的时候还想到保护文物古迹哩！"我听了思成的話，也十分感动，深深認識到共产党的偉大。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前政务院和国务院曾經多次發布过保护古代文物的指示。在前政务院的会議上曾經专門討論过北京市保护文物建筑的方針，同时也批判了凡是古建筑都动不得的保守思想。以后总理曾当面指示，北京市的具有历史、艺术价值必需保存的古代重要建筑，要坚决保护，重点的修繕。我們执行了这个指示，做了不少工作。

北京市的党政領导，对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視的。例如团城与金鰲玉蝀桥的关系問題，彭眞同志亲自主持討論，拟了好几个方案，做模型比較。最后保存了团城，并按原有形式加寬了大桥。为了解决城市發展，交通流动量的拥挤，拆除了东四牌楼、西四牌楼、羊市大街的景德坊，以及长安

街的几座牌楼。在拆除前，都經过了慎重的研究討論，征詢了专家的意見。彭眞同志与我曾几次到东四、西四看过，才决定拆除。拆除以后，所有材料都分别妥善保存。另外在修理国子监、孔庙以前，在拆除大高殿牌楼和習礼亭以前，彭眞同志都十分关怀，在百忙中亲自看过，才作出决定。

最近明十三陵的长陵棱恩殿殿柱遭雷击，稍受損伤，已經修理。周总理知道后，亲自指示我們：凡是必需保护的較高的古代建筑物都要安上避雷針。現在全市的著名古建筑物都正在安装，同时也通知了全国各地。

这些事实十分有力的說明了党和政府对文物工作是十分重視的，是十分关心的。过去任何时代，都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二）北京市几年来的文物工作：

1. 發掘了四处古文化遺址，四百多座古墓葬。

2. 收集古文物六万多件，其中出土文物占49%。这些出土文物展覽出一部份，举行了三次展覽会，对群众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并供科学研究之用。

3. 古文物建筑的修繕：（一）移建的有云繪楼，清音閣，从中南海迁移到陶然亭公园。还有长安街的两座牌楼也迁建到陶然亭公园里了。（二）修繕了十三陵中的长陵、永陵、景陵和雍和宫、广济寺、碧云寺、臥佛寺、清眞寺、国子监、孔庙、皇史宬、庆霄楼、法海寺壁画等。正在修繕中的有智化寺和白云观。

（三）保护的有：模式口冰川擦痕、万松老人塔、文天祥祠、于謙祠、楊椒山祠、袁崇煥墓、顧亭林故居等。

从这些事实中，誰都可以作出結論，党对古代文物是重視呢，不重視呢？是破坏呢，还是保护呢？右派分子在这样鉄的事实面前，閉着眼睛說瞎話，說是"今不如昔"，試問这个"昔"是指的是那个朝代？那个統治阶級对北京的文物建筑曾經如此重視过，保护过？要有，請指出来，是什么时候？什么人？相反，只有在今天共产党的領导下才有这样的事，这样的成就。

就北京市的文物工作来講，是从無到有，从小到大，逐步發展的。几年来建立了文物調查研究組，首都历史与建設博物館筹备处。

我們不但重視专家，延聘专家，遇事征求专家的意見，还通过工作、实踐培养专門人才。北京市文物調查組的右派分子侯堮、周耿之流，是什么专家呢？他們根本不是专家。几年来党在教育培养他們，希望他們用心学習。逐漸成为一个文物工作者。但是他們并沒有这样做，一方面尽管工作了多年，还沒有成为內行；一方面又老着臉皮，自封专家，叫囂什么党是外行，不能領导內行等等。这眞是無耻到了極点。

这里我要說，党不但正确地領导了文物工作，通过政治学習、理論学習，提高了原来內行的文物工作者；还在工作中、实踐中，培养了大批的外行，成为內行。党不但能够領导，而且是善于領导；党不但能够領导內行，党还能通过領导，把外行变成內行。

我們坚决要在共产党的領导下，击敗右派分子的进攻，进一步作好社会主义的文物工作。

以我亲身的經历駁斥右派分子"今不如昔""老不如少"的謬論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郭宝鈞　的發言

右派分子乘党整風大鳴大放的机会，到处点火，目的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篡夺党的領导权，以恢复他們資产阶級的道路。这些謊言謬論，已由王冶秋同志及前面几位同志徹底揭露和批判，我今天仅就右派分子的"今不如昔"及"老不如少"两論点，以我亲身的經历再予以駁斥。

第一先批判考古事業"今不如昔"。我自1928年参加殷墟考古工作以来，将近三十年，从沒有离开过考古崗位，1949年是我今昔工作的分水岭，以前为"昔"，以后为"今"。关于今天考古工作的成績，現在从我自己亲身經历中，在經費、人才、發掘范圍、工作成績、出版刊物、工作态度、工地秩序、党政領导諸方面来对比一下考古工作到底是今不如昔，还是昔不如今。

就經費說，第一次殷墟發掘，只用經費三百余元，得了四百多片甲骨文。因怕地方反对，其它人骨等物，多从新埋起来。那不是全面的考古。后来經分出一个河南古迹研究会考古队，每季只有两千元發掘費，經費不够时，發掘就要半途終止。可是解放后1950年殷墟發掘，繼續解放前的輝县發掘，

情形就大不同了。在固關村發掘时曾向中央請示三个大墓是否一齐开掘，政府复示說：以完成工作为主，只要不浪費，經費多少不計。結果用了二十四万斤小米。这一季的考古开支，可以当以前十年的經費。

就人才說，从事考古的，以前不过几人，后来發展到十几人，非常可怜。那时想办一个考古学系培养人才，就办不到，一来考古是冷門，二来是当时的当权者怕人多了对自己不利。解放后，中央連續举办了四次考古訓練班，地方上如河南自己办过两次，現在云南、新疆都还在办。培养专才方面北京大学考古专業已畢業四班。考古机构如考古研究所，开始接收时工作人員只十三人，八年来已發展到三百人。現在全国考古队伍，連同大学、博物館等計算，至少应在六、七百人以上，相当壯大。这能說"今不如昔"么？

就發掘范圍說，前中央研究院工作，以河南、山东为目标；北平研究院是以西安、宝鷄为目标，地質研究所是以仰韶村秦王寨、甘肅为目标，發掘的范圍很小，且互不联系，工作效率自然不高。今天在党和政府領导下，考古工作已成全国性工作，西安、洛陽、郑州、兰州、山西南部、安徽、江苏、湖北、湖南、云南等处全都有發掘队，可以通盘計划，文物普查也可以全国动員。从前計划順着黄河流域作一系統發掘来研究仰韶文化东向、西向問題，苦办不到，今天这計划有可能，且不久即可实現。如果不是在党的領导下，計划仍然是空想。

就工作成績說，以前領导人有把持材料的恶風，不肯公开研究，甚至願在国外發表，国內人看也不得看，这种成績只是他个人的。現在資料公开，不分彼此，中央和地方可以互相調配，共同研究，一年左右，报告就可發表。而發掘数量之多，尤为惊人。几年来發掘墓葬即达二万七千多座，遺址达一百六十多处，文物收集达三十六万多件。这是从前所梦想得到的么？

就工作方法說，以前偏重"物"的研究，形式的研究，不注意物是怎样来的，物与人的关系如何。現在是全面整体的研究，着重看社会經济的背景，如西安半坡的居住遺址、汉城、唐城的發掘，洛陽王城的發掘，都是全面的整体的研究。日本考古訪华团参观时說："这是考古正宗呀！"他們却办不到。因为他們的經費是从募捐来的，要發掘出宝貝，才能向出款者交代。这是我們党領导科学納入正当学术研究的实例。

就出版刊物說，种类有考古学报、文物参考資料、考古通訊多种。考古学报在过去十几年才出四本，現在一年即出四本；以前印数只几百份，今天印数千份，如文参印数且近万份。考古書一出来，不久即可脫銷。这种現象，能說是文物、考古事業不如以前發达么？

就工作态度說，以前中央团体到地方發掘，有些像帝国主义者到殖民地工作的态度一样，地方人也以封建把头的态度对待中央。如从前殷墟發掘，这边是中央發掘团，那边是河南博物館，两边对立，态度恶劣。今天在政府統一領导下，全国各地，無論中央地方分工合作，目的都是为了人民事業。这种融洽現象，是从前人所梦想不到的，而以前那种丑恶情况也是今天青年們所想像不到的。

就工地秩序說，以前工作極为艰苦，記得在殷墟發掘时，有一次遇土匪包圍，工作人員都上房子对打，后来抓住盜匪，原来就是专員公署保护我們的大队长。还有一次在安陽后崗發掘，石友三軍队正打靶，靶子方向在北面，他們却轉个180度的轉角向我們打来，我們就不得不停工，跑回北京。汲县發掘时，資料出土后，在当地公开展覽三天，因此在晚上遭致几十个人的蓄意結队搶劫。幸因牧童报信，在紧張中将古物运出。因为豪紳同盜墓賊們非常恨我們，我們發掘要打破他們的黃金窩，使他們不能盜卖，所以如此。那时候的工作就是这样的艰难、冒險，作出一点滴的成績，工作人員的精力十分之七、八要用在应付地痞、土匪、盜賊上，只能以十分之二、三精力用在研究上。解放后，地方很安全，政府保护周到。1950年我在殷墟發掘，半夜聞槍声，安陽市、县派了几十名軍队，連夜从四、五十里外奔馳来保护我們。实际無事，只是一个誤会。但我們因此可以看出政府对今天的考古工作者何等的重視。

就以上各方面情形，作一今昔对比，那个好，那个坏，显然可見。这些發展原因，是与党的正确領导分不开的，是与馬列主义的考古方向分不开的。有人說考古工作在資产阶級社会是挖古物，今天仍是挖古物，有何区别？实际以前的發掘古物是由个人名誉地位出發，一般壟断材料，霸为己有，甚至二十年不發表报告，或者先在国外發表，爭得外国人的奖誉。研究方法是为古物而古物，不与人和社会經济發生联系。現在考古是由人民整体出發，研究方法注意到古人整个生活，目标在闡明历史發展規律，所以今昔同是挖掘古物，但态度、認識、情緒上却大有不同，而右派分子硬說考古事業今不如昔，不是别有用心，就是閉着眼睛說鬼話。

第二，再批判待遇評級"老不如少"。以我經历来看，这也是胡說。我現在六十多岁，照右派分子說

法，早应打到垃圾堆中。去年又得了肺結核及糖尿病，成为一个病員。二十年前我的前妻得了肺結核，不到一年死去。所以初得病时，我的情緒非常低落，認为沒有希望了，可是党对我的照顧非常周到，在温泉疗养院，一住十个月，今天不但沒有死，还能在这里和老朋友、新朋友見面。是党把我从死亡綫上又拉回来，我怎能不感謝党呢？我亡妻当时年紀尚輕，但因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得了病沒有錢治疗，就不得不死。我今天生在党領导的新的社会里，六十殘年，得病不但不死，反能恢复工作能力，这是新旧社会显然的对比。我怎能不感謝党及党所領导的公費医疗制度呢！今后我願把我的夕陽殘年的一切力量貢献給党，貢献給社会主义的建設。右派分子要反对社会主义，我坚决不答应，要竭力与之斗爭。

但是右派分子說話了："你受党的好处，你感謝党，你是从私利出發。我們的权力地位被党打垮，土地制度改革了，古董生意也作不成了，所以我們从我們的私利出發，就要反党"。我說，右派分子你听着："我們看問題，应当从六万万人民着想，不应只从自己利益着想。我之感謝共产党，决不是为我的私利，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私言。請你問問那全国各公費治疗医院成千上万抱病而入，病愈而出的病員們，他們对共产党是如何看法？請你問問那全国百分之八十从前無地可耕，現在飽食暖衣的貧农們，他們对共产党是如何的看法？从前市面上到处可以看見乞丐、野鷄，現在各归正業，各得温飽。請問問这些从前的不幸者，他們今天是如何看法？我去年在邢台工作，适遇台風过境，河水泛濫，人民流离失所。中央及邢台专署，以飞机、橡皮艇輸送衣物粮食，昼夜不停；高級干部，亲自冒雨踏泥前往拯救，救活無算。請問这些死里重生的灾民們及今年在哈尔濱洪峰威胁下，前年在汉口洪峰下死里重生的灾民們他們对共产党是如何看法？我在南京住时，伪法幣泛濫成灾，逼得全国人民朝不保夕的掙扎在飢餓綫上。但是解放后八年来，物价稳定，人人如得空气的滋养一样，有人却身在幸福之中而不自覚。更重要的，如长远計划的国家建設飞躍进展；中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从前中国人不得坐外輪的头等艙，中国人与狗不得进的租界公园，这些奇耻大辱，尤其是像我这样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从前認为今生不能再看見中国人翻身了，常感嘆虽死也难瞑目。現在在共产党領导下，中国人站起来了，我們得重新做人了，在世界人面前以能当一个中国人为荣，我們可以揚眉吐气了。这是烈士們以热血換来的呵！只这一条，我們願以不可以任何物質比拟的代价与劳力来答謝共产党！

以上这些事实，这些重登裀席的人們，他們都怀着感激的心情，都願走社会主义道路。难道这是我个人的私利，是我一人的私言么？我今天正告右派分子，共产党建設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你們从私利出發，偏說沒有成績，夸大缺点，是胡說八道，是你們阶級本能的讕言。至于我們拥护共产党，歌頌共产党，是出于肺腑眞誠，是从大众利益出發，决不計个人薪級的高低。右派分子反以薪級地位来离間我們新老同志，說甚么"老不如少"，这完全是胡說。按我亲身的体会，党对老年、青年只要誠心誠意肯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是同样重視的。所以第二点老不如少的說法，也不駁自破。但右派份子"老不如少"的說法，若就另一面看，也有一部份正确性。那就是青年脑子是一張白紙，接受新事物容易；老年体力不如青年，老年前途不如青年，老年的思想复杂，不易接受新事物，在这些方面不如青年。老年人过去处在黑暗社会，学点知識是靠自己奋斗得来，往往披沙拣金，所得甚微。今天青年的学習环境好，在好环境中学習三年五年比得上从前十年二十年的成就。这样，青年青出于藍是应該的，也是必然的。一代超过一代，正合乎历史發展規律。我們欢迎这样的青出于藍，老不如少。当老年人的也要努力学習，向他們看齐。而有些右派份子反倚老卖老，辽豕自矜，稍有一知半解，动輒自高自大，以为奇貨。国家如有需要，还得三顧三聘，討价还价。試問你們那一点雕虫小技比之农工大众的生产貢献何如？比之武裝同志捍衛国家的貢献何如？比之毛主席的已飢已溺，博施济众，統籌兼顧，千年大計的建国大業規划又何如？若自加衡量，渺小得豈不羞死？还有什么可以自高自大之理。就是眞有才学，眞有抱負，也是受社会培养、人民哺育得来的。只要社会需要，能于人民有利，正宜和盘端出，引为光荣，引为快慰，哪还能怀宝迷邦，袖手旁观？須知国家是我們大家的国家，并不只是一千二百万共产党員的国家，我們大家一齐努力，使社会主义早日完成，是我們大家之福，是我們子子孙孙之福；推迟一天，彼此交受其害，我們忍心看着台灣同胞长期受难么？我們忍心看着美国鬼子在我們大門前耀武揚威么？右派分子們，稍有知識技能的右派分子們，是你們改过自新，放下屠刀的时候了，是你們立功贖罪的时候了！我呼吁你們幡然归来，我們共同踏上社会主义的建設大道，共同迈步前进！

最后再对青年同志說几句話。剛才我所說的"老不如少"的别解，那只是一个别解，不是全面說法。

按国家对待青年的政策，对下一代新生力量有所偏爱，那是正确的。但你們自己却不要以青年自豪，說我可以压倒老生，我是了不起的。須知你那了不起，只有可能性，可能性并不等于現实性。若眞个好好的干，努力的学，向老一輩的老科学家虛心請教，你們一定有青出于藍的希望，你們对国家貢献将更大。若只憑仗年青力强，坐以等待美好光景的来临，恐不多时，你們也要和我們这老大無成的老头子們走同一道路。你們要警惕啊！有希望的青年們，我現在摘抄毛主席的一段話轉贈你們："我們的国家現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間內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間內，团結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創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給我們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現还要靠我們的辛勤劳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23頁）。"这一段話，我願你們把它恭恭敬敬的写出来，貼在你們的工作室的座右，一日三省，直到建国工作完成时再摘下来。

坚决拥护党的領导，駁斥右派謬論

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梁思成　的發言

各位同志：右派分子說，解放以来的文物古迹，只有破坏，沒有保护。我听了很憤怒。我們回忆一下，先不說帝国主义者对我国文物的掠夺，在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如隋煬帝、梁元帝蕭繹号称喜爱文物，带了名貴的繪画，跑来跑去，最后燒毁了。宋徽宗也很喜爱文物，但是他們愈喜爱，愈破坏得凶。我国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帝国主义分子大規模的掠夺我国文物。我在外国看到資本主义国家的博物館里陈列着一件件的祖国文物，使我很是生气、痛心。这一切都說明在过去解放以前文物不被重視。偶尔封建統治者、地主、官僚对文物也很喜爱，这不过是像过去的封建統治者，如唐明皇喜爱楊貴妃一样，供个人享受。文物像旧时代的妇女，受他們玩弄。

記不清1932年还是1933年，我的兄弟梁思永去赤峰調查石器时代遺址。回到北京后，我問他热河的古建筑怎样？他回答說：热河行宮糟透了，奉系軍閥湯玉麟，将行宮的避暑山庄的建筑，大的木料卖了，小的木料被燒掉。热河外八庙的門窗都是拆的拆，燒的燒。梁思永就亲眼看到軍队里有人用十几匹馬，拖着一条系在建筑物的柱子上的繩子，把一座建筑物拉倒。这与唐朝武宗时毁佛教庙宇的办法完全一样。这一切都說明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文物从来沒有受到过眞正的爱护。

1948年12月解放軍圍着北京，要解放的时候，那时清华大学已解放，駐在清华园的解放軍干部来找我，告訴我假使城內国民党軍队不投降，攻城时，解放軍不願意毁坏文物、博物館、高等学校，要我把北京城內重要的古建筑物在地圖上标出。当时感动的心情，現在在我的心里仍然还能感覚到。中国历史上，从来沒有一支軍队是这样的。从我十几岁以来的記忆中，我只看到軍队（当然指的是反动軍閥的軍队）把庙里的門窗燒掉等等的破坏行为。但是只有共产党領导的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清华园的第三天就派人来找我。这不是說明党和政府对文物关怀得無微不至嗎？不久我就接受华北文管会的另一任务，当时由王冶秋同志来联系的，叫我准备全国古建筑目录，以便發給部队，南下时避免破坏文物建筑。

解放以来，考古、圖書館、博物館的成就非常巨大。这虽然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所关心的考古方面，只要看看故宮里面陈列出了这么多的文物，再看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各地文物单位所积累的發掘資料，就会感到多么动人。特别令人感动的是1954年午門楼上的基建出土的文物展覽。在我們党和政府的領导下，在基本建設中还注意到文物。基本建設是如此紧迫繁忙，無以复加；任务下来，設計、施工，排得非常严密，一小时都要好好計算。但是党沒有忘記文物的保护、發掘，而且这項工作获得巨大的成績，大大小小的出土文物达几十万件。

古建筑是我自己熟悉的，如五台山佛光寺大殿，1937年發現以后，反动政府沒有保护它；解放后不久，党和政府即組織了雁北文物考察团，对山西北部的文物建筑进行全面了解。不久修理了佛光寺大殿。还有文殊殿在1937年时已破烂不堪，現在也已煥然一新。赵州桥——中国人民最喜爱的文物，小放牛里和元曲里都提到赵州桥——这么一座人民喜爱的，也是工程历史上最偉大的創作，一千三百多年以来經过多少次毁坏，一部份坍塌，在明朝燒过一次，1935年时，我去調查时看到的是破破烂烂的，沒

有人理它。1955年起已动工修理，还發掘到了旧有的雕刻生动的栏版，很快按原来形式用新的結构方法原状修复，横跨在赵州洨河上。这能說是只有破坏，沒有保护嗎？

我所关心的故宫，多少年来在反动統治之下的故宫，門票每人一元，沒有多少人去逛，所收入的門票还要支付工作人員薪水。故宫絕大部份工作人員，是勉勉强强的維持生活。故宫一天比一天毁坏。但解放以来，逐漸修繕，已煥然一新，自来水管消防設备已建立起来，并且已安上了避雷針，現在已成为很好的博物館。难道过去反动政府做得到嗎？

例子很多，如要一一举出来，再說一整天也举不完。現在再說一說就在最近所發生的一件事：7月31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我正在一个地方开会，忽然北京市人民委員会秘書长柴澤民同志告訴我說："有一个不好的消息，特别是对你是不好消息"。当时我很惊訝，不知道出了甚么事，非常着急。他告訴我十三陵棱恩殿被雷击起火了。这天晚上正是准备紀念"八一"建軍节，在中山公园我見到了总理，我把这件事情向他做了彙报。总理馬上把北京市三个付市长找来，并且指示所有古建筑都要立刻安裝避雷針。第二天我到文化部开会遇到沈部长、錢部长提起此事，馬上就讓我和郑振鐸付部长前往十三陵現場。我們去时，火已基本扑灭。雷是从两根柱子打下来的，殿里当时有农民避雨，結果有一个人死了，几个人受了伤。当时北京园林局的干部馬上把农民送昌平县医院救治，同时一面动員人积極的救火，一面电告北京市。海淀、北京市內的救火車都出动了。現場的井水都被吸干，結果是出动了北京很多洒水車往来运水，紧張工作直到通夜，結果把火扑灭。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事！如果在反动統治时代遇見这种情况，大殿早已不存在了。只有党的領导，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右派份子企圖否定党的領导，我們是絕对不允許的。

当然，文物工作中也并不是万事如意的，也是有一些缺点的，就是我个人也有些意見。正是因为有缺点，所以党才要整風，要我們帮助党提意見克服缺点。但是不是像右派分子說的那样一团漆黑呢？不是的。我們說成績是非常巨大的，缺点和成績比起来缺点是太小了，右派分子借此想否定党的領导，取消党的領导，我們决不同意。

作文物工作的很多是高級知識分子，过去公孙龙談："白馬非馬"，胡說八道，用北京話說就是"绕脖子"。資本主义的訟棍在法庭上把一个罪大恶極的人美化成沒有罪的人，也常常把一个善良的人說成有罪，使之受刑。一些有知識的右派分子，他們还有这样一种本事，即是坚定資产阶級立場，滿嘴的馬列主义，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大是大非說成小是小非。我們和他們斗爭，不要上他們的当。我們主要是摆事实。一些学术問題現在不談，将来可以慢慢討論。現在要爭的是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資本主义的道路問題。右派分子从章、罗联盟說起，他們总的願望就是想取消我們的火車头，但是我們就是要火車头。因为沒有党，我們就会被拉回到过去美帝吉普車在馬路上横冲直闖的时代，我們决不允許这样，我們需要党的領导。过去在党的領导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我們相信在反右派斗爭以后，我們文物工作必然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一方面进行自己的工作，一方面配合第二个五年計划培养出更多的新生力量，很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对未来的光輝远景，我是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的。我們要用事实摆在面前，讓右派分子看究竟走那一条路好。我要正告右派分子，你們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回到党的領导下好好工作重新作人，一条是自絕于人民。我們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所謂全胜，即是或者你們改变立場，低头認罪，重新做人；或者你們自絕于人民。社会主义关是要过的，你們如果不肯过，关外是沙漠，沒有水，也沒有草。这种滋味希望右派分子能好好考虑一下。

考古工作的今昔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夏 鼐 的發言**

右派分子在各方面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到处点火，無孔不入。他們的魔爪也伸入到文物界里来。他們的許多謬論，已經有好几位同志严厉地加以駁斥。

右派分子說外行不能領导內行，要党放弃对文物界的領导。他們的办法是否定成績，夸大缺点。他們把解放以来的文物工作說成一团糟，把新中国的文物事業說成今不如昔。他們要把文物事業的發展道路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改到走資产阶級的道路。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願意用解放前后我

国考古工作情况的两条道路的对比，来揭穿右派分子的謊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偉大成績，便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的鉄証。

我們从旧石器时代說起，从前是半殖民地的做法。周口店的發掘，是由美国壟断資本家罗氏基金会出錢的，指定只能在周口店工作，所以掘了十几年，只是圍繞着周口店龙骨山打圈子。解放以来，才扩大了調查的范圍，并且結合人民群众和工程部門的报告。于是，在山西省境內便發現了襄汾的丁村遺址，曲沃的里村遺址和交城的范家庄等遺址。广西的洞穴調查，除了發現新旧石器之外，还發現了巨猿化石。今天的人民日报，还發表了河套薩拉烏苏河滴哨沟灣發現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消息。

再举一个例子。解放以前的殷代遺址，差不多限于安陽小屯的殷墟。在安陽發掘了十五季，目标只是想挖甲骨和銅器。每次由南京去安陽都經过郑州，却沒有發現郑州这个重要的殷代遺址。解放以后，不仅在郑州的發掘中有許多重要的發現，并且还發現了河北邢台、河南洛陽和黄河三門峽水庫区的許多殷代遺址。

至于新石器时代的遺存，从前發現了一个遺址，便好像是了不起的事情。解放后，展开了調查工作，像黄河水庫調查队和山西普查队，一發現便是好几十处。解放以来所發現的新石器遺址已是好几百处之多。同时我們又做比較深入的工作，例如西安半坡遺址。我們的工作不仅是挖石器和陶片，而是了解当时人民生活的各方面，从住宅到粮食都要弄清楚。現在已盖了博物館，保存下来供給大家参观和研究。三門峽水庫考古队也正在几个新石器遺址做比較深入的研究。南京博物院最近也在江苏南部选擇几处（如丹徒大港、南京市北陰陽营、鎖金村和安怀村），从事發掘，以求进一步了解华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面貌。

两周时代出銅器的墓葬，从前一出土便入古董商人手中，大部分还經过古董商流散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去。解放以后，西周的銅器群，重要的有西安斗門鎮、丹徒烟墩山、旧热河凌源，和最近的陕西鄜县李村和山西洪赵县永凝东堡。东周时代的墓葬，發掘得更多，收获更丰富。重要的有輝县、长沙、洛陽、长治、寿县、西安等地。最近連天津和宁波，也都有战国墓葬發現。今年河南陕县虢国貴族墓地和信陽长台关的战国木槨墓，都有非常重要的出土物。前者以銅器为主，大件的有几百件，有些还有銘文。后者有大批精美的木器、漆器、銅器和竹簡。这些古物如果是解放以前被發現，一定分散出卖，大部分流落国外。現在是整个保存在人民的手中，提供大家欣賞和研究。

考古工作不是挖宝，而是用馬列主义的观点来做發掘和研究，以求了解我們祖先的生活情况和社会經济制度。所以关于两周时代的發掘，我們也选擇当时的居住遺址来做。西安半鎮村附近的張家坡不仅掘到西周时代的車馬坑，还清理出当时的屋址和陶窑。在洛陽西郊和河北石家庄也都發掘到战国遺址。在洛陽的西郊还有一片两周时代的遺址正在清理發掘中。

汉墓是几乎到处都有發現。在洛陽、长沙、鞍山市等处，一發掘便是几百座的汉墓。对于汉代墓葬的演化过程已有初步的認識。最近又注意到汉代居住遺址的發掘。辽陽三道壕的西汉村落遺址和洛陽汉河南城的城址，反映当时城乡的人民生活。今年又开始發掘汉代长安城。虽仅只掘了三座城門，但已可使我們了解当时城門的結构，并且还看到两千年前王莽时兵乱火焚所遺留下来的紅燒土。西安郊区發掘出来的汉代建筑物，可能是辟雍和离宫，也是研究汉代建筑的重要資料。云南晋宁的石寨山，出土大批銅器和金器，包括一顆黄金鑄的"滇王之印"。虽然是墓葬或是窖藏还沒有弄清楚，但确是汉代边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大發現。

再往下講，西安的隋唐墓葬，出土了大批古物，包括墓志石、三彩陶俑、瓷器、銅鏡、金飾等。最近又开始發掘大明宫的遺址。洛陽也調查了唐城和發掘了一些唐墓。

我想不必再往下举列。新的發現是多得無法在今天下午三小时內說完的。去年又开始了文物普查工作，这是从前走单帮式的調查工作所無法比拟的。我們可以預料到，今后的發現将会更丰富。我們从前曾梦想有这么的一天能展开我国的考古工作。現在这些梦想都实現了，怎不令人兴奋！

如果我們将解放前后的情况作一对比，便可知道这是两条路綫的不同。今日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績是由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前的考古工作是自由散漫的無政府状态。个人只要有錢便可自由去干，誰也不能干涉。帝国主义者在我国到处掠夺文物，明搶暗偷。我国的不肖的古董商人，也以买卖古物来發横財。現今在党的領导下，考古工作走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們的工作要配合基本建設，分别緩急，有重点和有步驟地布置工作。当然，我們还只踏上这道路朝向这方向走，还沒有完全通过这道路达到目的地。换句話說，我們現下的考古工作的領导还不够强，組織还不够密。今后应該加强党和政府的領导和組織工作。但是右派分子的意見，恰巧相反。他們用各种方法反对党和政府的領

导：有的嚷"外行不能領导內行"，自封为专家，要爭独立，挂帅印，叫党員領导同志下台；有的抱着地方割据的封建思想，想独霸一方；有的还結合成小集团，想夺取領导权。

右派分子的論調是可恨的。他們在文物界中也有市場，这是可怕的現象。像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論所指出的，目前的知識界中，左派还是比較的少数，多数还是可左可右的中間派。在这方面；文物界的弱点更为显著。文物界的許多人是由旧社会中过来的，像一般知識分子一样，是还殘留許多的旧思想，不易洗清。并且文物界所接触的有許多是古旧的东西，所以更容易对于旧事物發生留恋。不習慣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生活和新工作方法，因之，更容易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幸得这次右派分子的陰謀在各单位都被揭露，引起大家的憤怒，因之，在各单位都展开了轟轟烈烈的反右派的斗爭。今天在这里可以說是文物界反右派斗爭的大会师。我們要求文物界的右派分子低头認罪，徹底交代，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同时，我們要在这斗爭中自我教育，鍛炼自己，提高覚悟，以便能通过社会主义的关。我們要在党的領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揭發以农工民主党、民盟、右派分子为主的向文物界的点火放毒猖狂进攻

文物管理局局长 王治秋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陈 乔 联合發言

（一）右派向文物界猖狂进攻是他們政治陰謀策划的一个方面

在整風鳴放期間，农工民主党和民盟的右派分子，利用我党整風，征求向党提意見的时机，进行陰謀策划，展开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攻。在他們的进攻目标中，首当其冲的是文教界。

他們在北京召开的文教、科学等六个方面的点火会，一共开了二十一次，参加的人数共五百多人，其中文化艺术界点火会开了四次，参加的有六十五人，其中文物界或与文物界有密切关系的就有十一人，而且都是研究人員高級知識分子。負責在文化艺术界点火的是右派分子叶恭綽、齐念衡所搞起来的。座談会是由叶恭綽主持。叶和章伯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叶于今年三、四月間参加农工民主党，据章的私人秘書右派分子洪范交代："章伯鈞常請叶恭綽到他家吃飯，或是鑒定章收藏的字画，請叶鑒定眞伪好坏后再决定去留。章伯鈞和他的老婆李健生也时常去叶处拜訪。"又交代說："反右派斗爭开始后，6月17日晚七时章派汽車接叶来家密談两小时多，談話时只章伯鈞、李健生和叶三人。"这就可以証明，他們的关系不只是吃飯鑒别字画的关系，而是一种政治陰謀活动的关系。据李伯球談話也承認："章伯鈞与叶关系一向很好，叶好像是章的軍师，关系很深。"叶恭綽在主持5月26日文化艺术界座談会上講話說："……鳴放的高潮已来，希望大家大胆鳴放，深入細致的提意見，"最后开完会还說："这个会开的很好，还要再开一次，下次还要請你們代約同事，多来几个。"据傅振倫写的材料說："从开会情况看，叶虽是主席，但李伯球似操縱一切，……每人發言时，叶恭綽时时点头表示同意，而李伯球則时而表示惊訝，时而表示欣賞称贊。"这眞叫唱和一致，臭味相投。最后結束会时李伯球还向叶恭綽說："我們今天組織这个会是十分必要的，听到許多重要的問題。"更可怀疑的是叶恭綽在一次拉来有不少收藏家和古董商等人参加的所謂文艺界座談会上，在荣宝斋东西两院开会时，他躲藏在一間小房子里不露面在幕后計謀划策指揮正像章自己交代說："在我这样大力鼓动和指使下，座談会一次比一次开得烏烟瘴气，在政治上造成了極恶劣的影响，其中最严重的是我利用叶恭綽老先生的名义和关系所召开的文艺座談会，从国画、摄影、圖書館、博物館和文史館各方面向文化部党的領导进攻。"

而齐念衡呢，这个农工党右派分子，是对座談会积極拉人跑腿进行組織活动的人，为章伯鈞的座談会極力效劳，坐了章伯鈞的小汽車，到处拉人，煽动点火。他亲自到处劝說："叶誉老請你务必出席"，或打电話催請人："快来呀，多多准备提意見呀！"他煽动大胆鳴放："不要怕，有叶老和农工民主党支持"。故宫博物院与历史博物館是他拉人、点火的重点，因为他認为这里他的老朋友很多。历史

博物館的右派分子傅振倫就是齐念衡的老朋友，也去参加了座談会，做了农工党向文物界点火进攻的主力，傅在座談会上放出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傅振倫除了在农工民主党所召开的座談会积極發言放火外，并应齐念衡之請，留下了下次能参加这种会的名单，他替座談会积極的在历史博物館拉人。历史博物館另一右派分子馬非百在文化部文物座談会上也發表了非常恶毒的向党进攻的意見。傅对馬的發言非常贊賞說："意見提的好，打中了要害。"

此外与文物界有密切关系的右派分子啓功和民盟中央联絡委員会的委員張伯駒，也曾在整風鳴放期間向文物界点火进攻，啓功并做为叶恭綽的亲信，替他主持召集的座談会出謀划策，做叶的帮凶和小軍师。

农工民主党和民盟不仅在北京中央所在地点火，农工党与民盟的很多省市地方組織，也很快的分头从各地与北京互相呼应配合，展开了向党进攻。例如：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調查研究組和首都历史与建設博物館筹备处右派小集团民盟成員侯堮，到处宣揚："这几天报紙上所發表的言論都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語言，党和群众之間的墻和沟是共产党造成的，三个坏主义是跟着共产党来的"。浙江省民盟副主任委員宋云彬，以龙泉拆塔事件借題發揮，到处誣蔑說："这是共产党破坏文物的延續"。叫囂非要把有关人員拖出来法办不可。其实我們浙江省党政机关对龙泉拆塔事件已作了严肅認眞的調查和处理，中央监察部、文化部也曾派人下去檢查，宋云彬則仍要故意哄鬧，借題發揮向党攻击。洛陽市文管会副主任郭文軒是民盟盟員，在整風鳴放期間也是到处奔走，煽动别人向党进攻，他曾煽动文物工作队的一个受机关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李候卿說："机会到了，你怎么不說話呢？"并說："旧社会有自由，現在沒有自由"。湖南省文管会主任、民革成員、陈浴新的表現更是突出瘋狂，勾結其他右派分子，發动各方面的火力，集中进攻省文化局，并串連省市文艺界、高等学校及中学教师，还与北京、广州等地联絡，以扩大影响，爭取外援，要攻开省文化局的大門，陈浴新在报上对儲安平、葛佩琦等反动言論进行駁斥后，还公然叫囂："儲安平、葛佩琦發言有力量，代表了大家的意見，也就是老子的意見！""康德的發言，打中了共产党的七寸"，"几年以来我嘔气太多了，我的气由气体已变成了液体，由液体变成了固体，現在該爆炸了！"，"老子要白刀子进，紅刀子出！"，"老子要杀人！"。

我們从以上这些以农工党、民盟为主的右派分子向文物界点火进攻的罪恶言行来看，就可以完全看出他們是如何的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仇恨社会主义。他們的政治野心和陰謀活动是無孔不入的，他們是要在各方面占領陣地，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搞資产阶級复辟。

（二）右派分子向文物界猖狂进攻的策略和手段

农工党和民盟等的右派集团，为了实現他們的政治陰謀目的，就不能不講究策略手段，他們向文物界的进攻，也不能例外。

1. 首先是在文物界發展組織，占領陣地，以便篡夺領导权。

章伯鈞說："組織成員越多，力量越大，就越能卖錢。"李伯球也曾說："中国知識分子有500万，农工党大有可为，过去發展組織是釣魚法，今后要用撒网法，發展前途大得很。"李健生还說："座談会是發展組織的好机会，要像滾雪球一样的發展。"他們为了貫徹这种大發展的方針，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恶劣手段，向文物界也伸进罪恶的魔手，曾利用齐念衡的旧关系、老朋友，在上層知識分子和旧政客中發展組織，于今年三、四月間，齐首先把叶恭綽拉进了农工民主党，齐自認为"这是对章伯鈞的最大貢献"，他說："叶是知名人物，影响很大，因为叶又拉进来不少文艺界人士。"整風前后，齐念衡又在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館积極奔走拉人，他曾一再动員故宫李鴻庆、历史博物館傅振倫加入农工民主党。他还曾选擇了不少想拉攏的对象。他們为了大發展，除了采用"抓名牌"、"撒大网"、向落后开門"等办法以外，更恶劣的是用"封官許願""請客吃飯"等手段拉人；例如拉叶恭綽入农工民主党时，章伯鈞先許願給叶，将来可作中央委員。齐念衡拉李鴻庆入党时，也是使用請客吃飯等办法。他們發展組織，多是物色那些对共产党不滿的人，甚至是被劳改和管制过的人，如齐念衡拉李鴻庆时說："三反运动受打击的人，都可以参加农工民主党，爭取三反受打击的人最合适。"齐念衡承認上級曾指示他："凡过去受过委曲的人，都是我們發展的对象。"洛陽市文管会副主任（民盟盟員）右派分子郭文軒就是在鳴放期間把文物工作队的一个受机关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李候卿拉入民盟的。

右派集团，除了極力發展他的基本組織"党"和"盟"以外，一面还使用各种办法建立和發展外圍組織，一面还企圖直接占領一些陣地。例如民盟右派分子張伯駒組織了"書法研究会"，不搞学术研究活动，而热衷于搞組織活动。从100多人很快發展到

300多人，在其他方面張还搞过許多“会”、“社”組織。張又在故宫博物院的鳴放座談会上提出，要建立“中央文物檢查委員会”的机构，領导与檢查全国的文物保管工作，其目的在于篡夺党和政府对文物事業的領导权。此外他自己还曾几次活动要当故宫博物院院长。

2. 利用合法的組織形式与合法的地位身份，利用輿論向党进攻。

右派集团除了利用我党召集的鳴放座談会，向党展开攻势以外，他們自己为了抓取領导权，也組織了一系列的座談会，約請社会名流与高級知識分子向我党提意見。名义是帮助党整風，实际是采取卑鄙的两面派手法，蒙蔽一部分人，向党攻击。湖南省右派分子陈浴新也曾利用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員的合法身份，不断的向我党放射毒箭的。右派集团还利用光明日报、文匯报，积極制造輿論，向党进攻，鳴放以来也放了很多毒。如文化部召开文物座談会，文匯报就用大字标題：“专家受打击，文物遭輕視”，公开点火。

3. 广泛联系，組織小集团。

这个右派集团章伯鈞、李伯球、李健生等与叶恭綽經常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叶恭綽周圍，他也勾結着、利用着一批在文物界活动的人物，为他筹謀策划，奔走跑腿，到处拉攏关系。章伯鈞和江苏省文化局付局长、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員会委員右派分子朱偰，就有很密切的联系。安徽省民盟付主任委員、省文化局付局长兼博物館館长李則綱，早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垮台时，他同章伯鈞在政治上就勾結起来，搞上安徽民盟付主任的位子。李則綱还曾来北京与章接洽过，并以公款購买了章的三幅緞画，而李則綱明明知道是假画，只是作为向章的献礼。而浙江的宋云彬对龙泉拆塔事件則四处串連，除了写信給文匯报社长兼总編輯徐鑄成串連外，他还专題写了一份詳細报告，告訴給盟中央。为了准备向党进行更大規模的攻击。

最毒狠的是右派分子还在文物界組織核心，搞反动小集团。例如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和首都历史与建設博物館筹备处以赵迅为首的右派小集团，他們有策略的阻撓、破坏、搞乱工作的开展，制造是非矛盾，挑撥离間，污蔑組織，煽动落后群众，經常在文物組和博物館兴風作浪，企圖矗走党和行政領导，夺取領导权。侯堮这个右派分子在整風开始后，曾尽了一切努力，进行陰謀的煽动。他对右派小集团說：“你們的办法都好，我都同意，办着看吧。办法都有了，但缺乏更适当的运动領导者。”于是赵其昌就推选他說：“侯先生是民主人士，很恰当，应拿出‘主人翁’的态度来。”这时侯堮就真的拿出所謂“主人翁”的态度，在会上得意忘形的呼口号“坚决矗朱欣陶下台！”“坚决肅清三害！”他更狂妄露骨的說：“如果文化局不讓朱欣陶走，就讓他作总务，文物組、博物館由我們集体領导。”这就充分說明了这个右派小集团的性質是个有組織、有目的的反动小集团，企圖夺取領导权。

湖南省文管会以陈浴新为首的陰謀反党小集团，在反右派斗爭中也被揭發出来了。陈浴新在文管会勾結少数右派分子，結成反党集团，他們把文管会变成了独立王国，不接受党的領导，对上欺騙蒙蔽，对下压制打击，排斥异己，打击进步，挑撥制造同志之間的矛盾，甚至还派亲信爪牙，偵察他們所不滿意的委員和干部的行动，檢查来往文件。对于檢举他們的同志，千方百計的刁难、歧視、讓制打击。另一方面，又勾結湖南民盟的右派康德反党小集团（长沙市文化局长）开始了反党的集体活动，找缺口，拉攏人，挑撥是非，經常秘密集会，进行有計划有步驟的反党活动，以陈浴新、康德为核心，具体分工，大肆串連，發展力量，計划要把省文联从党的領导下脫离出来，还發动各方面的火力，集中攻击省文化局，說：“要把省文化局徹底搞垮。”决定搞垮后由陈、康二人分任正付局长。在整風鳴放以来，他們更是猖狂，分头到处点火串联，还訂出进攻的策略是：“拉住外圍，攻垮核心”，口号是：“攻一下，再攻一下！”“要攻开省文化局的大門！”

这些右派小集团，对社会主义的文物事業，以及对其他各項事業，都是直接或間接的进行着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在这次反右派斗爭中，必須要徹底的把它們打垮、粉碎。

（三）右派分子对文物界放了些什么毒？

右派分子对文物界放毒很多，这里只擇其重要的言論向大家介紹揭發出来，希望大家起来駁斥批判。

1. 右派分子否定成績、夸大缺点，把文物事業說成“今不如昔”。

首先，誣蔑党不重視文物工作，說：“专家受打击，文物遭輕視”，說“經費年年遞减，政府对文物工作不起帮助作用而起破坏作用。”宋云彬說：“土改时把民間藏書几乎燒光，等于秦始皇焚書”，又說“共产党是农民意識，是反对文化、反对科学。”又煽惑說“龙泉拆塔事件眞是曠古未有的荒唐事情。”陈浴新夸張的說：“我們今天要搶救文物，眞如同救火一样的緊急”，“人为的破坏有如燎原之大，救不胜救”。历史博物館右派分子李仁溥执笔写了呼吁

書，發动数十人签名，其中說："历史博物館这門新兴事業，迄至現在还沒有受到文化部的重視，像一个后娘孤兒被冷淡"、"在历史博物館后面还隐藏着严重的危机"。但是馬非百看了以后說："能更尖銳些，打中要害就更好了。"

其次，攻击人事制度，污蔑党不重視文物专家。这方面傅振倫的言論最为恶毒，他說："人事上宗派主义毒害最大，党团員升迁很快，还有老不如少、生不如死、今不如古、本国不如外国等偏差，德、才、資，資是指革命历史的长短，过去我們在学术方面的資格就不算了嗎？"、"党員有特权，是特权人物，对历史清楚，要求进步的知識分子抱定关門主义。"又污蔑說："对干部活着不重視，死了倒重視起来。"叶恭綽誣蔑故宫說："故宫有不少老干部，有一半养病，占位置，影响工作，所以虽有千余人不能完成任务。"馬非百說："再不照顧知識分子，匈牙利事件有在历史博物館重演的可能。""給我打印'管子輕重篇'就是匈牙利事件的結果。""解放以来馬列主义并未掌握中国知識分子的規律，知識分子要臉、知耻，肃反、鎮反把中国士大夫高貴的东西都摧毀了。"陈梦家說："不大尊重老金石家。重考古，輕金石，对三个月訓練出来的考古人員看得比一些老金石家还重。"

2. 反对党对文物事業的領导，反对馬列主义对文物事業的指导，反对学習苏联先进經驗等方面的言論：

首先，反对党对文物事業的領导方面：

北京市历史与建設博物館右派分子于杰說："非業务人員不能領导業务""党員怎能領导業务。"自然博物館右派分子高光明說："过去文化部領导自然博物館是大胆了一些"。考古所陈梦家說："像考古所这样技术性較强的部門，如果沒有党員专家，讓非党員专家来領导也是可以的。"洛陽市文管会付主任郭文軒說："我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但不知道党組織究竟干些啥事。"而安徽省博物館館长李則綱，把党的領导看作是工作中的障碍，对人說："現在不是我一个領导了，以后館內的工作不好作了。"

文物参考資料的編輯郑昌政說："文参的領导太多，干涉文参的人太多，文参要有一定的独立性，不然就成为局的尾巴，局的文参編委比重大……外界人士多些，可以摆脫局的保守作風。历史博物館有人表示：文参屬局就不写文章。文物出版社一点独立自主的权利都沒有，慘稀稀的，这样搞工作可怜的很。"

再有在反对馬列主义对文物事業的指导，反对学習苏联先进經驗方面也放出不少恶毒言論。宋云彬說："研究石窟也要馬列主义指导，那是要馬克思坐到菩薩头上去了。"还說："学習苏联就是教条主义。"陈梦家也說："我以为过去的学習成績不大，其根源就在于官僚主义的布置，行政命令的办法和教条主义的內容。"温州市为了保护文物，修繕了李时珍和叶水心的墓，宋云彬却說："并不是由于地方政府懂得保护文物，是因为苏联百科全書上提到李、叶，党員盲目崇拜苏联之故。"

此外，文物界的右派分子还积極販卖章伯鈞、罗隆基、章乃器、葛佩琦、儲安平等右派头目的反动言論，替他們吶喊助威，虛張声势，作他們忠順的走卒，梦想"复辟"成功，可以分得一杯羹。

我必須說明，我和陈乔同志的联合發言仅是为了揭發以农工民主党、民盟为主的右派分子在文物界点火放毒猖狂进攻的一些材料和情况，作为大家进行深刻的說理批判的参考。　　1957.9.16日

一定要把文物界的反右派斗爭进行到底

文物管理局局长　**王冶秋**　的發言

(一)

中国共产党領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爭，終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重重压迫，把一个"民穷財尽"，破破烂烂的中国从危亡的境地里挽救出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短短的八年时間，在这样广闊的土地上，在这样众多的人口中进行了历史上空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是稍具爱国心腸的人士，沒有不为之欢欣鼓舞的。

文物界絕大多数人士亲身經历了，亲眼看到了在过去的反动統治时期，帝国主义者勾結了軍閥、地主、买办資产阶級，古玩奸商在中国横行霸道、为所欲为，除了在政治上、經济上、軍事上、文化上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以外，对中国几千年来無数劳动人民所創造所遺留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遺产，破坏、搶劫，無所不用其極。这种文物遭受破坏的

浩劫，文物界的人士应該知道得最清楚，感受也最深切——沒有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沒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种浩劫是無法停止的——祖国的文物，正是这样得到根本上的保护的。右派分子說什么共产党对于文物只有破坏，沒有保护，这是顛倒黑白，别有用心的無耻的讕言。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沒有新中国，就沒有文物保护工作。这是鉄一般的事实，不容否認的。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給予文物保护工作創造了最基本的条件，才有可能从国家拟定文物保护政策、法令到拟定具体办法，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文物管理机构、考古机构、博物館机构；才有可能大規模的培养干部；才有可能配合基本建設进行了規模巨大的田野發掘工作；才有可能改造旧的博物館，建立了新型博物館。八年来在文物方面所进行的工作，是史無前例的，是获得巨大的成績的。这些成績的获得，最根本而最主要的是党的領导，政府的規划，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人士的支持、爱护，全体（右派除外）工作人員的辛勤劳动的結果。

我們絕不諱言，我們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錯誤和缺点。在整風中許多同志从爱护这一事業出發，提出了許多改进工作的意見，提出了对工作中的錯誤、缺点的严厉的尖鋭的批評。我們十分欢迎这样的批評，并决心在工作中改正。

根据大家的意見，以及几年来，尤其是整風以来的意見和我們的体会和認識，我們認为主要的錯誤缺点如下：

一、党的領导問題

右派分子企圖推翻党的領导，搞資产阶級复辟，搞"輪流执政"，罵我們是"党天下"；文物界的右派分子則說："党員怎能領导業务？""如果沒有党員专家，讓非党专家領导也是可以的，""文参"要有一定的独立性，不然就要成为局（指文物局）的尾巴"……种种讕言，并不惜造謠誣蔑，如历史博物館一些右派分子的"孤兒論"，無中生有的說文物局分配文物"三十元以下归历史博物館"。这些無非是要党退出文物界的領导，無非是認为党干涉了他們的"自由""独立"。恰恰相反，我們認为党对文物事業的領导，不是太多了，而是很不够；不是要"退出"，而是要大大的加强。因为一項事業若果沒有党的領导，就会在思想上、方針政策上迷失方向，就会把这項事業引导到錯誤的路上去，那里沒有党和無产阶級的思想領导，那里就会給資本主义思想占領陣地，扩大市場。馬非百这个右派分子不是說过"进而作大官，退而作学問"，退到历史博物館作他反共反人民的"学問"嗎？另一个右派分子李仁溥到处找"自由主义溫床"，不是最后找到了历史博物館这个"溫床"嗎？由此可以証明：那里党的領导薄弱，那里馬列主义、政治思想空气稀薄，就正是右派分子所寻找的"溫床"，他們就在那里生根落戶，販卖資产阶級思想，腐蝕群众，最后就是要把这个机关烂掉。在这次整風反右派斗爭中，給我們極为深刻的教訓。——文物局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針方面，貫徹党的思想領导、組織領导方面，都是很不够的，甚至明明看到这項事業，或者那个机关有着問題不能解决；有了正确的方針任务而不能貫徹执行，往往就事論事的来处理，或者听之任之，就証明了原則性不强，思想性不强，不能提高到从党的領导，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这些根本性的問題上来解决，而是枝枝节节的解决。——这是我們經常犯錯誤的根源，今后我們必須下最大决心，加强党的領导，加强政治思想的領导，来使我們少犯錯誤。

二、走社会主义道路問題

离开社会主义社会，文物事業、考古事業、博物館事業是不能得到發展的。苏联四十年經驗，中国八年的經驗都証明了这一条。

文物事業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呢，还是为資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呢；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呢；为眞正的科学研究服务呢，还是为个人的名利服务呢？

从業务技术方面来說，从科学研究方面来說，是以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呢，还是以封建主义、資本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呢；以学外国經驗来說，是以学習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經驗为主呢，还是学習資本主义国家的經驗为主呢？

从服从国家需要来說：拟定文物事業的政策方針任务的时候，是把这一事業服从于社会主义的需要，还是要求社会主义服从我們的需要呢；是要求小利益服从大利益，局部服从全体，还是要求大利益服从小利益，全体服从局部呢；采取重点保护，重点發掘的方針呢，还是有古皆保的保守主义，或者是凡古皆不保的虛無主义呢？

所有以上种种，就是文物事業方面的两条路綫的斗爭。是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資本主义、个人主义、無政府主义的道路呢？

我們在这个問題上，虽然几年来坚持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可是同具有走資本主义道路思想的人

們，尤其是同頑固的、反动的、坚持走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右派分子作不懈的坚决的斗爭是極为不够的，有时是和平共处的，沒有認識到这是政治战綫上、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場严重的阶級斗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这是在整風反右派斗爭中才逐漸明确起来的，我們一定坚持社会主义路綫，坚持把文物事業納入社会主义的軌道！

三、群众路綫問題

"中国是世界文明發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見毛选），因此我們地上地下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遺存，虽經近百年来的帝国主义者瘋狂破坏，但是地上地下还有不少的遺存。可是由于在全国范圍內到处掀起了社会主义的建設高潮，几万万人在动土，几万万人在建設，虽然我們采取了"重点保护，重点發掘"的方針，虽然我們訓練了大批的考古工作干部和各省市設立了文物管理机构，但是远远不能与建設的規模和速度相比拟，因而就难免使一些应該保护的文物遭受破坏与損失。解决这一个矛盾，是采取無限制的扩大文物队伍来保护呢？还是坚决采取我們党的基本路綫——群众路綫来与文物队伍相結合的办法来进行保护呢？当然应該采取群众路綫的保护办法。几年来已經有許多事实說明群众当他們明白保护文物的意义时候，沒有不热爱乡土文物，加以妥善保护的，例如：

（1）安陽小屯一带的殷墟遺址，現在由当地农業合作社来保护，作了全面的規划和安排，把燒窑取土的范圍划在遺址以外，大家相約不挖宝，就保护的非常完整。文物局有位干部去訪問这个乡的乡长，他說："过去是帝国主义、奸商把我們弄坏了，我們把老祖宗的历史都卖掉了，今后我們再不干这种事了。"

（2）易县燕下都范圍的两个乡29村的农民經过省、县文化部門的干部深入到群众中进行保护文物的宣傳以后，大家極为热情的自动組織了"文物保护小組"把遺址作了妥善的保护。

（3）山东省結合文物普查进行了宣傳工作，据本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材料，在91个县，群众自动組織起来的"文物保护小組"已达3,642个。

此外过去几年来的一些重要發現，其中大部分是經工人、农民首先發現而馬上反映到有关部門，再加以發掘清理的，如：

1. 陝西长安普渡村农民李复兴、楊誠意同志挖白薯窖發現銅器立即进省告知了文管会、博物館，然后加以發掘清理的。

2. 前热河省凌源县海島营子村农民唐永兴、張怀仁等同志在种地时發現銅器，后来上报到省文化局，清理出十余件重要周代銅器，其中六件有銘文，是研究周代文化的重要資料。

3. 黑龙江依兰县倭肯哈达的新石器时代洞穴文化的遺址的發現，是采石工人最初發現的，他們馬上报告了县委会，又轉报省委和东北局然后派人清理的。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很多的，說明了文物保护工作必須坚决的通过广大群众自己来保护，是最为有效的办法。那些認为群众無知，沒有文化，只有破坏，沒有保护的說法，若是出于一般人之口，是輕視群众，缺乏群众观点的思想認識作祟；至于右派分子的借此攻击，則是他們过去根本是騎在人民头上的，把群众看成奴僕，看成下等人，看成是什么也不懂的只知破坏文物的人，只能供他們鞭打役使，只配作工、种地来养活这一群吃飯作坏事的家伙。他們壟断知識，壟断文化，一面又在叫囂群众無知，沒有文化，破坏文物，这眞是荒謬絕倫的說法。

正如郭老所說："什么人使他們沒有文化的？"正是反动的旧社会；什么人使他們一部分人曾經以盜掘古物为生？正是帝国主义分子勾結奸商、恶霸地主来利誘威胁，指使他們干的。——当他們眞正作了主人，了解到文物保护工作的意义以后，那是全心全意来进行保护的。我們在安陽、西安、易县等地都看到群众紛紛把过去的宝藏，捐献給国家，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他們是爱国主义者，是無私的純潔的人民。

反过来看右派头目章乃器，大肆收罗文物，反对国家禁止出口法令，要把文物出卖到外国；傅振倫把假的成化杯子，打算卖給国家；甘肅省馮国瑞以恶劣手段，騙取别人的敦煌画，以偷梁換柱办法把这張国宝性文物窃为己有，今年并以高价卖給上海文管会；陈夢家則成了古玩商与帝国主义分子之間的掮客；他們有什么資格輕視人民，辱罵人民呢？

保护文物，必需坚决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綫，这是坚定不移的路綫。过去几年我們認識到这一条，也进行了一些工作，但是極为不够，尤其是宣傳教育方面进行得很差，今后必須大力的进行，把文物保护工作置于广泛的群众的基础上，而同专家、文物工作者，两方面密切結合起来，才能在这样辽闊的土地上，这种丰富的文物宝藏的中国，眞正的进行有效的文物保护工作。

四、与专家、高級知識分子、技术人員的团結問題

我們几年来对于专家高級知識分子是尊重的，文物界的专家、高級修复技术人員我們总是尽量爭取回本行来工作，因为我們不仅保护文物，也必須保护有眞才实学具有丰富的文物知識和經驗、技术的专家，我們希望一面以他們的知識經驗来为今天的工作服务；一方面我們还極为希望把他們的知識傳授給青年一代。自去年党中央召开关于知識分子的会議以后，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軍以后，在全国博物館工作会議上，确定了博物館的基本性質之一是科学研究机关；两大任务之一，是为科学研究服务。我們也尽可能的改善了工作条件，配备了研究生、助手；改善了生活条件，比照了科学院的研究人員标准，制定了我們博物館的工資标准；我們想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能把文物、博物館的各項工作，置于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使我們的事業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有些地方已經这样作了，有些专家也認眞的学習了馬列主义結合本館本单位的業务进行了科学研究，訓練了青年干部；尤其是一些老年专家，他們亲身經历了两个时代，是截然不同的时代。昨天郭宝鈞先生的發言，就代表一部分具有爱国主义、爱护共产党、爱护社会主义的老专家的肺腑之言。他們願意把所有的力量，貢献給人民、給社会；把所有的学識、技术傳授給后一代。但是一些右派分子就完全不同了。他們可以打着科学研究的招牌，不搞本館本单位的工作，而搞他私人的謀取名利的工作，把青年当成他个人的奴僕，甚至在那用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腐朽透頂的思想，在腐蝕青年。陈梦家到处在宣傳他的"一本書主义"；馬非百在傳授"房中术"；傅振倫在那傳授"文抄公"的絕技。馬非百經常說："我在这里，主要的是整理自己的稿子，工作嗎，都是你們青年的事。至于說我为什么拿那么多錢呢？那我就需要那么多錢嘛！"

馬非百說："解放以来馬列主义并未掌握知識分子的規律，中国知識分子爱面子，要臉，知耻。"又說："肅反鎮反把中国士大夫高貴的东西都摧毀了。"

馬列主义是要結合中国的情况的，而且已經結合了，还在結合。但与右派分子所說毫無相同之处。右派分子要求馬列主义符合封建的"士大夫"的規律，要求符合資产阶級腐朽的个人主义的規律，这位自称"教授馬列主义三十年"的"专家"就是这样污蔑馬列主义的"专家"。

因此我們过去在团結高級知識分子、专家方面，在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的团結，不是根本的团結，我們一定要在政治思想上、馬列主义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眞正的团結，經常不断的互相帮助，改造思想。——只有在政治上有了一致的趋向，才能达到眞正的团結。过去我們对于中央关于知識分子的政策方針——团結，教育，改造，以及"必須从团結的願望出發，經过批評或者斗爭，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这些方針的精神、实質，理解的不深不透，往往是偏重于工作上生活上的团結，而忽略了最根本的东西——政治上的团結，因此总是南轅北轍，对不上口徑。文物局在这一方面是存在着錯誤和缺点的。

至于右派分子在政治上向我們进攻，根本企圖推翻党的領导，反对社会主义，那已經不再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必需加以徹底的粉碎和击潰的。——文物局在反右派斗爭中，是有右傾思想的，是有溫情主义的，沒有認識到这場斗爭若不徹底进行，文物事業就会遭受損失与破坏！甚至会被右派分子占領了陣地，而使文物事業脫离了社会主义的軌道。

以上所說的四个問題，文物局都是有着錯誤和缺点的；但是必須講清楚，这与右派分子对我們的攻击，毫無相同之处：

我們說：党的領导要加强，他們是根本反对党的領导；

我們說：要更加坚决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們是要走資本主义的道路；

我們說：要坚决的走群众路綫，他們是根本仇視群众，侮辱群众的；

我們說：要在政治思想上，馬列主义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与专家高級知識份子、技术人員，加强团結，他們則是根本反对正确的政治思想上的团結，而是在挑撥离間，制造分裂，搞反动的政治陰謀活动。

(三)

最后，我要講一講思想改造，过社会主义关的問題。

文物界是可以包括着下列几个方面的：文物工作者、考古工作者、博物館工作者、社会上文物的爱好者、收藏家、修复文物的技师和技工，和販卖古物的商人等。

这一界的情况是比較复杂的：它既有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眞才实学又有丰富經驗的专家，和掌握了中国优秀的傳統的修复技术的技师和技工，也有大批的新参加工作而政治热情很

高，要把工作作好，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青年同志。

也有少問政治或不問政治，埋头于"業务""学問"和"技术"的人。也有照例上班下班"奉公守法"的人。也有願意終身保持"中間状态"的人。

也有一类人具有一般的封建主义、資产阶級的思想和情感。他們对于新社会有着距离，留恋过去，看不見将来，对現在不習慣，格格不入。他們总想把今天的新兴事業，照着他們所設想的老一套的作法来作，不願改革，不願变动，不願学習苏联，热心于个人的名利，对他脾胃的就作一作，不对他脾胃的就不作。他們喜欢分散經营，单打独干。总覺得个人沒有过去"自由""享受"，开会不習慣，"排队"不習慣——总之这一类人是与今天的社会有着距离，他們認为共产党、社会主义，把他們一張原来附着很好的皮揭掉了，他們实在有"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梁上君子"的感覚。我們文物界里这样人并不少。他們往往把文物界作为他們的防空洞。認为搞文物，就可以不需思想改造；

还有一种，我們称他为資产阶級右派的人，他們有極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对于共产党、社会主义有極大的仇恨。在文物界来說，主要的是把他們过去所依附的帝国主义、官僚資产阶級、封建阶級的后台搞掉了，同时今天的一些法令政策堵塞了他們的盜卖文物、發洋財的道路；或者在过去騙詐的社会，可以吃得开的一些假学者假专家，如陈夢家、傅振倫之流，今天吃不开了，騙不了人了，他們怀恨在心；还有根本不学無术，与文物也毫無关系的一些軍閥、恶霸、流氓、特务、学閥、党棍也混进文物界（陈浴新、馬非百之流）；还有一些老政客，遺老遺少（如張伯駒）；还有一些本来就专靠搗卖祖国文物給帝国主义者的奸商，其中有的在解放以后，轉变很好，認識到过去的錯誤；有些还是依然故我，公私合营以后更打上"公"的招牌，收購出土文物，并轉关系走私出口。——以上这些右派分子，他們不仅具有資产阶級的腐朽的自私自利、反共反人民思想，并且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这是文物界右派分子的特点。

以上就是文物界的政治情况。

我們要不要改造思想，过社会主义的关呢？我看是需要的，不仅中間的人，就是左派和右派也是需要的。

就以左派来說，今天的社会，是中国有史以来翻天复地的大变化时代，我們左派的人士（包括共产党人）也并不是沒有旧社会的影响的，也并不是沒有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問題在于我們随时發現它，就克服它，整風就是帮助我們克服錯誤缺点的最好机会，我們一定認眞的經常的挖掘殘留在脑子里的坏思想、坏作風，加强馬列主义的学習，鑽研業务，使我們眞正成为社会主义的前进战士。尤其是在反右斗爭中，提高覚悟，受到鍛炼。

对于中間人士，我們生活在这个偉大的时代里，别人都在前进，几万万人都在前进，而我們滿足于"中間状态"，而且还願意終身保持它，我看这种想法，是極为錯誤的。共产党員中不也出了右派分子嗎？他們就是从左派下降为中間，又由中間堕落为右派的。严格的說起来，中間状态是沒有的。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論上說："右派之所以敢于进攻，就是由于中間派的存在。因此，不解决这一部份人的政治立場問題，反右派斗爭就不能获得徹底的胜利"。又說："無产阶級、广大的劳动人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的任务，就是要团結一切还处于中間状态的人們，帮助他們尽量縮短动摇时間。为了团結中間派，就要坚决反对右派，并且批評中間派的动摇性，使他們变成眞正的社会主义的知識分子。"又說，中間派必須"在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自己在資本主义立場和社会主义立場中間动摇不定的两面性，要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改造，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有一部分中間派归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

对于右派，社論中也說得很明确："我們国家的情况不需要对右派采取極端的政策。我們要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我們也要使一切願意眞誠悔改的右派分子得到改造的机会。"

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極端腐朽的思想是很可怕的，往往在很短时間就把一个有用的人腐蝕成为反动的人；一个革命机关，也往往可以腐蝕的整个变質。文物界的右派分子，有些人还是有一技之长的，我們希望他們赶快回头，眞誠悔改，把这一技之长用于社会主义的建設上，老老实实的为人民作些有益的工作。

最后我想以三狠作为結束：

要狠狠的反击右派，不胜利，决不收兵；

要狠狠的改正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和缺点；

要狠狠的进行自我的思想改造，过社会主义的大关！

1957年9月21日

斥文物界右派分子的讕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員　裴文中

（發　言　摘　要）

我們知道，几年来在党的領导下，文物界已經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但是右派分子偏偏要顛倒黑白。只要我們把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的旧中国和共产党領导下新中国的考古事業来比較一下，我們立刻就清楚地看出来，右派分子所說共产党不重視文物工作完全是無耻的誣蔑。其实右派分子对于文物工作的今昔变迁情况是完全了解的。他們說党不能領导科学考古事業，完全是别有用心地顛倒黑白，抹杀事实。

我以自己的工作为例，在国民党时代，發掘中国猿人（北京人）的工作，反动政府不給發掘經費，因而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鑽了空子，以"捐助"为名支付了發掘的經費，劫取了壟断材料和研究的主权。到解放前夕，美国不給錢了，国民党反动主管的人說沒有錢，不給發掘的經費。我們在这种情况下，發掘工作不得不停下来。但是在北京解放以后，一九四九年夏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之前，还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时期，政府就撥了經費使我們繼續进行發掘工作。后来更将这个山区特别划出来保护范圍，并且建立了陈列館和招待室，以便招待参观。一九五四年更修建了一条由北京直达周口店的柏油路的公路。这个事例很清楚地說明了党和政府对于科学考古事業的重視。右派分子难道不曉得嗎？不是的。他們都曉得。但是为甚么右派分子，利用文物的問題向党进攻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右派分子現在已經不能进行無耻的偷盜、欺騙和剝削的行为，已經不能滿足个人的私利了。像陈梦家等在过去曾为盜运文物出国充当了掮客，介紹买卖；張伯駒則买卖字画，投机倒把，从中漁利。現在当然不可能了。所以章乃器提出不同意禁止文物出口法令，因为他手中存的銅鼎不能換取美鈔了。陈梦家再也得不到美金的佣金了。所以右派分子才反对党和政府。

党的整風运动要克服缺点，改正錯誤。我們認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品質，也是領导中国人民走上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的保証。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当对于中国共产党这种偉大精神，表示欢迎和贊助。

但是右派分子却利用了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机会，大肆胡鳴乱放，制造許多狂言讕語，猖狂地向党进攻，我們应当对于这一群無耻的右派分子，加以有力的反击，使他們低头認罪。

右派先生們的毒舌可以息矣

故宫博物院研究員　唐　兰

（發　言　摘　要）

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文物界也有"山雨欲来風滿楼"的景象。右派分子硬說党不重視文物、不重視業务、外行不能領导內行，企圖达到其向党爭夺領导权的陰謀。在这种陰謀里，故宫博物院也是他們的重要对象。

右派分子憑空撒謊是迷惑不了别人的。我在廿多年前就是故宫博物院的特約专門委員，近五、六年来在院內負責陈列和科学研究工作，解放以来在党的領导下，我亲身經历着故宫博物院从未有过的大轉变和發展。过去观众在这里能看到的是些什么呢？我們还有太和殿的旧照片，除了不倫不类的佛像和宝塔外，还有什么呢？承乾宫的文玩陈列室是名符其实的文玩鋪，乾清宫里立了一座插屏歌頌反动头子蔣介石恩賜給故宫几百塊錢，文华殿陈列着美国特务福开森勾結奸商盜卖文物所剩下来的一些东西，尤其可耻的是宋子文为了討好納粹，把应扣留的納粹奸商楊宁史盜买的銅器用几千美金买下来，竟要为他辟陈列室。显然，那时的故宫博物院是为资产阶級反动統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服务的。

解放以后，在党的領导下，明确了博物館的性質、方針和任务，学習了苏联先进經驗，故宫博物院已成为国內有数的，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地位的中国文化艺术博物館了。1949年陈列面积只有8,533平方米，而1957年發展为15,034平方米，并且改变为

注重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新型的陈列。1952年建立了陶瓷館，1953年建立了繪画館，1954年建立了国际友誼館，今年完成了以工艺美术品为主的历代艺术館，并在进行雕塑館、青銅器館、銘刻墨迹館等筹备工作。解放前，每年观众最多二十多万人，而1956年达到185万人，成为世界上博物館参观人数最多者之一。本年日本考古代表团来时，曾对我說："你們陈列室地下潔净得像鏡子一样，可以在这里睡覚，这是过去时代里所看不到的。"

这些新气象，难道右派分子看不見嗎？能說博物館事業今不如昔嗎？沒有党和政府的領导，能获得这样巨大的成績嗎？陈梦家說我們引証苏联专家的說話是教条主义，还說文华殿展出的阶級对比陈列是錯誤的路綫。观道不学習苏联，能有这样快的發展嗎？当然，从資产阶級的反动立場来說，是最不願意我們作阶級对比的。

故宫这座古建筑群，部分房屋百年来沒有修葺过，垃圾从明朝以来沒拉出去过。解放后，每年用在修繕上的經費有六、七十万元，比解放前十年的修繕費还多。此外，并建立了指导修复工作的建筑研究室，六、七百人的工程队。解放初，院內清除的草有三千吨，1952年来运出的垃圾有二十万立方米，如果筑一立方米的土道，可以鋪四百华里，从北京到張家口还鋪不完。故宫从沒有疏浚过的下水道，現已整理了十七公里。另外建立了消防栓网，在宫殿上安裝了避雷針，接办了琉璃磚瓦窑，供应了修繕古建筑的需要。

解放后，大力进行了文物清理工作，八年来共清理了文物及非文物183万件，其中文物分别入庫的約128万件，非文物55万件。全部文物基本上有底有数，一般都作过初步鑒定工作。这部分工作是十分繁重的，只有在党的領导下，我們才能下决心摸清，才能保証文物得到眞正保护。此外，并逐步的改善了庫房条件，加强設备，进行正常的保管工作。对文物的修复工作也十分重視。

通过各种方式的征集，包括人民捐献及收購，历年来总計征集到文物94,977件，其中很多都是極珍貴的重要文物。

我們对于古文物的保护、清理、修复、征集等工作花了很大的力量，有了很大的成績。右派分子千方百計想在这里找借口、鑽空子，他們想用以进攻是徒劳的。陈梦家挑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說陝西省博物館武伯綸害怕我去談征集雕塑品問題，其实并無此事。傅振倫硬說文物局分配文物30元以上給故宫，30元以下交历史博物館。試問像秦陽陵虎符这一类不能估价的珍貴文物只值30元嗎？傅振倫甚至丧心病狂的說文物出口規定太机械、太死了。我們要正告这班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你們还妄想壟断文物，妄想把祖国文物盜运出国，在今天的社会里是做不到的。

右派分子認为文化部不能領导博物館的科学工作。必須指出，在过去时代里，故宫博物院根本就沒有科学研究工作。只是在解放后，在党的領导下，学習了苏联，才提出科学研究工作是博物館工作的基础这样一个原則。故宫博物院的領导十分重視这个工作，建立了陶瓷研究室及繪画、銅器等等研究組。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我們尽量协助兄弟博物館，由1953年起撥交各館文物計5,876件。几年来經常帮助各館裝裱、复制和搜集圖片資料等。同时并配合科学院、美术学院等部門供应了資料。我們的圖片上印有"不許翻印"字样，是博物館的正常規定，啓功借此吹毛求疵，說什么"要到外国書上找材料，希望多进口一些"。这种話出于我院的繪画专門委員之口，能說不是别有用心嗎？

故宫博物院在解放前二十多年里經历的是一个漫长的黑夜，那些昏暗悲慘的日子，很多旧职員是不会忘記的。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故宫博物院十分关怀和重視，1952年由于三反的偉大成績，肅清了官僚主义和貪污盜窃的病根，調来了大批轉業干部，加强了党的領导，才基本上改变了我院的面貌。对于新的博物館事業来說，我們大家都是外行，只是一面学習一面工作，但由于党、团員的骨干作用，我們的工作任务总是很好的完成的。有些人歪曲和夸大，硬說"党員領导干部不重視業务"，說"轉業党員干部不能作事，摆党員老資格"。叶恭綽更捏造說"老干部一半养病，占位置，影响工作"，"有一千多人，不能完成任务"。右派先生們，不妨来查对一下，有这样的事嗎？

我們知識分子在旧社会里，沒有作科学研究的物質条件。今天，我們有了一些成績，那只是在党的領导下給予了我們大力支持，才有可能。我們坚决接受党的教育，改造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我們的心境是宏闊的、愉快的，感情是奔放的、洋溢的，那种成天为个人的名位打算，斤斤計較，甚至要妄想和党一較胜負，因此到現在还在向往于暗無天日的旧社会，要拼命倒退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們能懂得嗎！

我們的工作还有缺点，要不断改进，我們决不滿足目前的一些成就。对来自各方面的善意批評建議，我們是十分欢迎的，但对恶意的攻击，想推翻党的領导，我們一定要給以坚强有力的致命的打

击。事实胜于雄辯，故宫博物院解放后的大轉变和發展就是鉄的事实，我們認为这个轉变是質变，也是量变，我們还要重复的說，"成績是主要的"，右派先生們的毒舌可以息矣！

質問和声討文物界右派分子

南京博物院院长　曾昭燏

（發　言　摘　要）

我現在以憤怒的心情来質問和声討文物界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和行为。

文物界右派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領导，而其表現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他們对党怀着刻骨的仇恨，幸灾乐禍地希望鬧事。例如傅振倫故意歪曲事实地說："目前人民內部的主要矛盾是党群关系，……双方若不拆墻填沟，遇到暴風雨是很危險的。"傅振倫心目中所謂"暴風雨"是什么呢？是不是希望"鬧大民主"呢？馬非百更露骨了，他說："再不照顧知識分子，匈牙利事件有在历史博物館重演的可能。"請問馬非百，你在解放以前做的是什么事呢？难道自己不知道么？解放以后又对人民有什么貢献呢？陈梦家在整風中还对夏鼐所长說："我以前劝你入党，我現在向你道歉。"这是甚么意思？是不是認为共产党馬上要垮台了，是你陈梦家的天下了？更令人惊訝的是，自称"革命十八年"忠心耿耿热爱共产党的李則綱，竟把国民党反动头子李品仙交給他保管的武器和国民党党旗藏起来，解放八年了还不肯交出来。这到底是甚么居心？

右派分子反党的办法之一，就是千方百計排挤自己所在的单位里的党員，甚至想推翻上級党的領导。李則綱对于上級派到安徽博物館的党員付秘書，党員付处长，都不讓他們做他們所应担任的工作。上級派了党員付館长来，他看成是障碍，在工作人員中挑撥离間。最近我們才知道，李則綱要把一些历史上有严重問題的人，以至自封"政务院总理"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想尽办法安置到他的博物館来，作为自己的亲信。我同李則綱見过好几次，他口口声声"省委怎样"，我常常覚得奇怪，我認为安徽省委不会这样的。当时就想是李則綱借省委的名义在外面招謠。現在看起来，李則綱眞是恶毒到極点，心中对党恨入骨髓，而自己說些無理的話，做些無理的事，又推給党，想讓人对党不滿。陈梦家是比較巧妙的。我到过考古所許多次，也参加过有关考古的会議，我的印象是陈梦家对党員領导干部是相当接近的。却不料整風开始便原形畢露了，說科学院考古所"讓非党专家来領导也是可以的"。其目的是不是要尹达所长讓位給你自己？我在这里要質問一下陈梦家，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陈梦家到南京忽然把那时还沒有走的美国大使館文化参贊夫妇两个带到我們南京博館院来，我們院里的人都覚得奇怪。陈梦家在解放战爭中一直在北京，認識北京的美国人并不奇怪，但为甚么解放后来南京，还要到美国大使館去，带着美国人出外乱跑呢？

在我們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任何学术工作是必須有統一領导，必須通盘筹划的，文物工作和博物館工作也不例外。所以在我国科学院沒有考古所，文化部設有文物管理局来領导这两項工作。文物界右派分子却反对这种統一領导。他們有的怀有严重的"封建割据"的思想，把自己所在的那个地方的文物看做自己或者自己那个小集团的私有財产。他們看到文物毁坏并不痛心，但别的科学研究机构来做点調查、發掘工作，則多方为难。最典型的是陈浴新、李則綱两个右派分子。我們南京博物院在安徽治淮工程中做文物工作，李則綱和我們百般为难，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平常对我們在漫天風雪中或在盛夏炎日中艰苦地工作并不理会，文物有毁坏也不痛心，等到有了新的發現，便来爭夺，甚至歪曲事实，誣蔑我們的工作人員。

中国历史上有許多問題沒有解决。例如古代史分期問題，近代史分期問題，資本主义萌芽問題等等，都已引起全世界史学界的注意。这些問題主要靠地下文物以及流散的实物和文献資料来解决。同时，对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和招待国际友人起重要作用的設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里的几个規模較大的博物館，亟需到各地去發掘或收集文物作为陈列品的主要来源。令人憤恨的是：像陈浴新、李則綱这类的右派分子，企圖用"封建割据"的办法把持着地方的文物工作，抗拒党的領导。他們制造出許多磨擦，使文物工作者力量互相抵消，造成了文物的損失，妨碍了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延迟了历史問題的解决，甚至于因为重要历史資料的損毁而使有些問題終于無法解决，使国家許多大博物館的陈列长期陷

于貧乏的状态。这种个人主义的、本位主义的、妨碍社会前进的資产阶級思想与行为，是必須严厉批判的。

我以前一直想，为什么文物界老是存在这許多問題？工作这样多，人这样少，为什么不能在党的領导之下，組織起来，团結起来，好好工作？現在才知道，文物界有这么多的右派分子根本对党三心二意，甚至怀着深刻的仇恨。他們有的把持着文物工作，有的在文物界挑撥离間，使得工作很不容易进行。我們必須徹底打垮文物界所有的右派分子，使他們再不敢兴風作浪，我們文物工作才能同祖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其他事業一样，順利地迅速地开展起来。

用事实粉碎右派分子的讕言詭計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赵正之
莫宗江

（联合發言摘要）

文物界的右派分子，与章、罗联盟相呼应，异口同音的否定党和政府八年来領导各項事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他們說"党是外行根本不懂文物，不能領导文物事業"，把文物事業領导得"今不如昔"。这使我們不能緘默下来，我們的工作和文物建筑有联系，我們来自旧社会，看到今天，也能回想过去。我們要用亲眼看到的事实举出几件駁斥右派分子"今不如昔"的謬論：

1. 敦煌千佛洞——众所周知，在旧时代，它曾經不止一次地被盜卖破坏——美帝文化特务华尔納盜取壁画，殘迹还在；法帝文化間諜伯希和窃走大批絕世的經卷和档案；其中英帝也曾染指。国內軍閥曾在千佛洞的下層駐扎軍队，任意毀伤——在里面燎烟举火，致使一些洞內壁画熏得漆黑發亮；有一些洞子的壁画上面留下刀伤、釘眼、塗抹痕、擦蹭痕。有些洞中有影作菩薩的絕大部分被盜失踪。自然損坏方面：窟頂崩穿，流沙墜落；有的半壁崩落，窟檐坍塌，佛像散碎为数更多。这种慘状，反动政府从来沒有过問过。虽然那时已經成立了敦煌研究所，但不給修繕經費，連研究人員的生活待遇也悲慘不堪。解放以后，党和政府立即进行解决千佛洞的保养問題，撥出大批款子开始修繕：填塞了窟頂漏洞，翻修殘破窟檐，加砌了露天洞壁，裝門窗以及修整了很长的参观棧道等等。工作人員的办公室和宿舍也有增修。他們的工作、生活条件改善很多；此外，建設了招待所。从此，千佛洞面目一新，結束了往日的悲慘局面。这一修建大事我是亲自参与的。最近正在計划进一步研究解决自然的毀損。

2. 大同云崗——解放次年，党和政府为了关怀雁北文物，曾組織了勘查团，当时我們所見云崗的荒凉景象是：許多洞子里糞便狼借，布滿泥浆、野草、垃圾，还有窩尸，臭气熏騰，無法进入！各洞的雕刻也有破坏。可是时至今日，大同云崗不但秽垢尽除，干干凈凈，同时在那里已設有保管所专責保护，并且也設立了招待所。

3. 五台山佛光寺——在同一雁北文物勘查团勘查时，佛光寺滿院柴草、到处炊烟；屋頂上部还生长着茂盛的青草、野花，寺內屋頂滲漏，梁柱糟朽；另一文殊殿，大木垂折，殿身搖搖欲坠。而今这座古寺，却已整整齐齐煥然一新了。

4. 龙門石窟——正如上次会上有人提出的那样，解放前的破坏已到了惊人的程度。而現在已加整頓，有些地方还加設了防护栏杆，并且也設立了招待所、管理所，有专人負責。

5. 北京故宫——現在几乎全面一新了，只剩極少部分正在加紧修繕中。这是有目共見，不必多談。我記得修繕中，在东五所屋頂上拔下一棵榆树，树干直徑七寸多。建筑物上拔下小树不計其数，生长在瓦下的杂草有三十二种之多。在天安門城台海墁的修繕中曾挖出大树根，其中大的計重一六〇斤！这是旧时代的修繕，只顧砍伐树冠，敷衍了事，从来不进行徹底根除所造成的結果。

6. 其他古建筑——反动时代，不关心文物的保护，反而大肆破坏的事实，說到明天也說不完。由于这样大規模破坏，給我們研究工作很大的困难，如北京智化寺天花藻井被盜卖到美国，就使我們对該殿內的裝飾問題徒嘆奈何。但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各种著名的古建次第加以修繕，如河北赵县大石桥、正定隆兴寺、山西大同上下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应县木塔、朔县崇福寺、晋祠聖母殿、献殿、魚沼飞梁、广州光孝寺大殿，苏州拙政园、獅子林、滄浪亭、怡园、留园、西园，昆明西山太华寺等。至于北京及近郊古建筑的修繕，更多了，不必詳談。

以上这些事实摆在面前，而右派分子却說："党是外行，不懂文物，不能領导"，把文物事業認为"今

不如昔"。这不是信口雌黄，可耻的誣蔑嗎？当然右派的讕言中，隐藏着狂妄的企圖，他們破坏党和政府的威信，夺取領导权，最后必然是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們絕对不允許的。最后，我們要警告右派分子，你們必須抛弃你們的反动立場，好好地把問題交待清楚，徹底改造，否則你們将被时代所遺弃。

文物工作中的两条路綫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林寿晋

（發　言　摘　要）

右派分子陈梦家在文物工作上所提倡的是反社会主义的路綫。它和社会主义的文物工作路綫的基本分歧是：文物工作应当接受党的領导呢，还是反对党的領导？文物工作者应当学習馬列主义呢？还是反对学習馬列主义？文物工作者应当为社会主义事業和科学服务呢，还是为个人名利欲望服务？

陈梦家說："事实上像考古这样技术性較强的部門，如果沒有党員专家，讓非党員专家来領导也是可以的"。党到底应不应当和能不能領导文物工作呢？解放后，在党的領导下，結束了盜掘和盜运文物的情况，文物从商品和古董变成科学資料和教育資料，文物服务的对象从国內外的統治阶級轉为人民群众和科学界。从此，文物工作也从装飾品一变而为国家一項重要的任务，考古工作机构从解放前的几个發展为几十个，田野考古人員从一、二十人發展为几百人。几年来發掘了一百多处遺址和二万多座墓葬，远远超过几十年工作的总和。解放前根本說不上文物管理，現在全国有二十几个文管会（或文物組）和三十三个保管所。已批准公布的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有六千多处，博物館从二十一所發展为七十三所。文物工作上这种变化，不正說明党必須和能够領导文物工作嗎？

陈梦家說："我在学習方面可以說是不勤恳的，教条背得很少，同时也討厭背教条，文章里也很少引用馬列主义的詞句。"显然，他是将馬列主义丑化为教条，然后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来反对馬列主义。

文物工作有两項最基本的任务，一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一是为历史科学服务。文物工作者要做好这两項工作，就必須学好馬列主义。

我們文物工作者大多出身于非劳动阶級。这几年来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进步，但除了一部分人已經开始建立了新的世界观外，大多数人还保留着濃厚的旧的意識和世界观，不大願意接近工农群众。少数人甚至对党和社会主义采取敌視的态度。工作和我們本身的政治思想水平相比，其間的矛盾和距离显得多么大。要克服这个矛盾，就必須認眞的改造自己，認眞地学習馬列主义。陈梦家認为社会科学家不学習馬列主义也可以写出合乎科学，合乎馬列主义的著作。这是騙人的鬼話。大家知道社会科学最基本的規律就是社会發展規律，也就是社会的眞正面目。如果只罗列了各种各样的材料（縱使这些材料是眞实的），不进一步去分析社会的本質，不等于掩盖了社会的眞正面目嗎？如果不根据社会發展規律，也就是在社会的眞正面目的基础上来解釋这些表面現象，又怎能說是眞实？文物工作者要使他的工作能眞正为历史科学服务，就必須認眞地学習馬列主义。

文物工作是为社会主义事業和科学服务的。陈梦家却将它作为猎取个人名利的手段。他利用科学院这一全国学术中心的地位，到处搶夺壟断和搶先發表材料。要各地将甲骨和銅器的材料寄到考古所，以供他私人研究，对所外同行，他却拒絕为别人提供材料。当一本重要的發掘报告已經准备付印出版时，他却利用副主編的职位，将这本报告中的重要材料和照片作为他自己所謂論文的內容，搶先發表，以至使别人的报告几乎沒有出版的价值（如寿县銅器）。

为着获取加倍的名利，陈梦家利用副主編的职位，将他的著作先分章在"考古学报"上發表，然后再彙集出专刊。在第六期到第十四期的"考古学报"上，期期都刊載自己的論文。这九期学报共1290頁，他的文章竟占400頁。另一方面，他却拒絕發表所外同行的論文。他将"考古学报"作为获取个人名利的工具。

陈梦家本人的著作更是到处剽窃，粗制濫造。他常常将别人的成果，改头換面，不注出处，作为自己的成績和發明。他的最得意的七十万言的著作"殷墟卜辞綜述"，大多剽窃自罗振玉、王国維、郭沫若、唐兰、胡厚宣、張政烺、于省吾、丁山等先生的著作。胡厚宣先生在考古研究所举行的設理批

判会上，就曾当面逐頁指出他那一点剽窃于那一本書。至于書中所引卜辭，漏字、增字、錯字、綴合錯誤、注錯出处、卜辭重出、断章取义之处，則比比皆是。

文物工作者，要坚持文物工作为社会主义事業服务的路綫，要坚持接受党的領导。

徹底粉碎右派分子向博物館事業的进攻

文物管理局副局长 王書庄

（發 言 摘 要）

博物館界的右派分子們在"鳴""放"期間，借帮助党整風为名，向党进行了恶毒的进攻。右派分子們一笔抹煞新中国几年来在共产党領导下，博物館事業的根本性的改革和巨大的發展，說什么"今不如昔""博物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甚至說在博物館里"可能演出匈牙利事件"。他們又归結起来說："外行不能領导內行"。

不难看出，这些右派分子們是想在博物館事業中推翻共产党的領导，而由他們来領导，妄圖把新兴的博物館事業拖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境地。章伯鈞把文物界当作了他向党进攻的一个方面，对博物館当然也不会放过。他們組織了傅振倫、李則綱、候堮、朱偰等人，又与馬非百、赵迅、高光明等人互相呼应，向社会主义的博物館事業进攻。为了徹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为了徹底駁倒右派分子的种种謬論，有必要摆一摆事实，說一說道理来同右派分子們辯論。

一

右派分子們說，博物館工作是"今不如昔"。右派分子所謂的"今"就是解放后的新中国，所謂的"昔"就是解放以前的旧中国——北洋軍閥統治时代和蔣介石統治时代。

好，現在我們就談一談博物館工作中的"今"和"昔"的情况是怎样的。解放以前的博物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由于反动統治根本上不重視这項事業，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点綴品，所以只能是为数很少的人守着原来保存下来的一些旧东西。工作人員的生活朝不保夕，更不能談到开展業务工作。既不注意搜集工作，更沒有群众工作。所搞出来的陣列，也不过是"古董摊子"，只能滿足个别人的爱好和賞玩而已。另外一种博物館是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中国，为了搜集中国的自然資源的資料而設立的自然性質的博物館。这是一种經济、文化侵略机构，它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这种类型的博物館只重視搜集工作，不注意陈列工作，有时开放一些陈列室，它的目的是为了宣揚西方文化和丑化中国的。对群众的教育是增加自卑感，崇拜西洋。这就是右派分子們所恋恋不舍的解放前博物館的眞实情况。当时的个别科学家热心于博物館事業是有的，但是在那样的社会，在那样的反动統治下，有什么办法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部接收了二十一个博物館，首先对这些館进行了一系列的带根本性的改革，逐步地确定其性質、方針、任务，把为少数人服务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机构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机构。几年来清理了原有藏品二百多万件，逐步建立科学保管制度。大力开展了征集工作，逐年均有大量的文物、資料、标本入藏，丰富了博物館的物質基础。配合着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改善了原有的陈列，并举办了許多新的陈列和展覽，提出了以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为衡量陈列、展覽質量水平的标准。各館都建立起来了群众工作，爭取了大量的观众。各館的工作人員和經費都逐年有所增加。

除对旧館加以改造并使之發展以外，几年来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許多新型的博物館。地志博物館是我們学習了苏联博物館的先进經驗，結合着中国具体情况建立起来的。这种博物館的陈列包括自然、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設三个部分，它可以全面反映本地区的自然环境和資源、历史發展过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年来的建設成就和發展，对观众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作用是很大的。在山东省博物館里，陈列已經成功地摆了出来，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現在正在推广它的經驗。另外还結合着历史人物或事件建立起来了紀念性的博物館。如南昌、瑞金、延安等地的革命性的紀念館，四川成都的杜甫草堂和紹兴、上海、北京等地的魯迅博物館，都是这一种博物館。它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是非常深刻的。

根据1956年的統計，只是文化部門所領导的博物館已經發展到73所。其中专門性的19所，地志性的31所，紀念性的23所。今后还要根据人民和国家的需要按計划的發展。全国博物館藏品已达到三百五十多万号，全国博物館工作人員有二千五百多人，每年的观众在一千万人次以上。

在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时期和党提出向科学进軍的号召之下，中央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博物館工作会議。在会議上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的博物館的性質应該具备"文化教育机关"、"科学研究机关"和"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遺存以及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室"的三重性質，它的任务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今年四月召开了全国紀念性博物館座談会，明确了紀念性博物館的方

針、任务和具体作法。对各专門性博物館的性質方針、任务也都及时地进行了研究而得到解决。为了协助各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于1956年成立了博物館科学工作研究所籌备处。

事实摆在面前，博物館工作"今"和"昔"的情况按性質說是有本質的不同的，根本不能相比。如果只就規模和数量来比比的話，那是"今"比"昔"的工作發展了几倍、几十倍的問題。右派分子們抓住旧社会不放手，瞪着眼睛說瞎話，这除了說明他們是别有用心以外，还能說明别的嗎？

当然，我們承認博物館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問題。例如博物館事業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博物館工作中如何展开科学研究还在摸索，对干部培养工作作得不够，对交流經驗还作得不够系統化等等，这都是我們今后要努力解决的問題，也是工作發展中所不能完全避免的問題。难道就可以借此說博物館是沒有功績的嗎？难道可以說党不能領导博物館工作嗎？我們的回答是博物館工作是有成績的，党能領导博物館事業。博物館事業也只有在党的領导下才能胜利前进。

二

右派分子們說在博物館事業中，"外行"不能領导"內行"。右派分子們的这个謬論，周总理在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經給予了严肃而有力的批判。我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报告，这个报告对我們有很大的指示作用。

博物館是学术机关，它一方面需要学术領导，同时更需要党和政府对政治思想、方針、政策、計划等方面的領导，这是周总理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同时博物館还是文化教育机关，要通过博物館的活动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党的原則向广大的劳动人民，进行辯証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博物館对科学文化知識不能只作簡单的傳授或普及，必須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組織陈列、展覽，以啓發群众树立唯物的世界观、革命的人生观，激發群众的爱国主义情緒，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覚悟和建設社会主义热情。所以，博物館本身就是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

那么，对博物館工作中的"內行"就需要有更全面的理解，科学知識水平当然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还有政治思想水平的一方面。許多博物館工作者都在这方面努力，爭取能够比較快地成为更全面的"內行"。但是右派分子們所說的"內行"，实际上也就是他們自己，并不是上边所說的那样眞正的"內行"。他們所說的"外行"实际上是指的党的領导。当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口头上說"外行不能領导內行"的这些話的时候，他們心里想的就是"你下台，由我来領导"。

三

右派分子馬非百說北京历史博物館的問題"主要是方針任务不明确……"。我認为有必要对这个謬論作进一步的駁斥。

在新中国的各項事業中，有許多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来沒有过的，有的在旧中国虽然有了这类的机构，但是它的目的和新中国对它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博物館事業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机构。在机构未建立以前或者剛剛建立不久，对于它的目的、方針、任务只能有一个总的方向和概括性的任务。如在博物館事業中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这是从一解放就明确的。至于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任务，也是在党提出向科学进軍的号召以后不久就提出来的。象这样的情况，我認为領导上是抓得紧的，提出来的也是及时的，是正确的。至于对某一类或某一个具体館的方針任务，就应該在博物館总的方針、任务之下，結合本館具体性質和特点、在工作实踐中逐步地明确起来。一个单位的方針任务并不是由領导部門主观規定的，而是全館同志們根据实际工作的体会逐步提出，然后会同領导部門反复研究确定下来的。一个博物館的方針任务能够及时地明确，这对一个館和全体工作人員来說是有重要作用的。

北京历史博物館的方針任务在专門性博物館中是明确得比較早的。远在1951年，历史博物館的方針任务就已經在全館明确了的。去年又根据博物館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新任务作了补充，曾在館內和文物局內反复討論并經文化部正式批准。而馬非百硬說历史博物館的主要問題是"方針任务不明确"。我看只有两种人才会說出这样的話，一种是不用心体会文件的精神实質，也不深入鑽研業务的人；另一种就是从根本上反对博物館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認为博物館应該为資本主义服务的人。我看馬非百肯定是屬于后者这一类人的。

四

根据上边說的这些事实，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右派分子們是用夸大个别缺点，全盘否定，捏造事实，顛倒黑白，無中生有，混淆是非的伎俩，妄想推翻共产党对博物館事業的領导而进行資产阶級复辟的勾当。揭穿了右派分子的鬼把戏，我們就毫不奇怪为什么右派分子硬把今日之輝煌成就說成是"坏"，而把昔日之糟不可言說成是"好"呢。这主要是立場問題。右派分子們站在資产阶級頑固派的立場上，他們最喜欢的是有人为資产阶級服务，而他們最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是共产党的領导。

我現在正告这些右派分子們，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走向富裕、幸福、快乐的惟一的康庄大道。你們要把美好的新中国拖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全国人民不答应你們。你們要推翻共产党的領导，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識分子会把你們打得粉碎。你們的出路只有一条，向人民低头認罪，徹底交代，痛改前非，重新作人。

党是扼杀了文物工作还是發展了文物工作

——以我十七年来作文物工作的經驗来粉碎右派份子的讕言——

閻　文　儒

在全国整風运动中，文化部曾两次找我参加文物工作座談会，当时因为我对文物工作只有加强保护的一些零碎意見，又因为忙着要带学生出外实習，所以沒能参加。八月中回来以后，我看到了、听到了一些右派的言論，他們誣蔑了我們党八年来所領导的文物工作，使我万分的气愤，忍無可忍。現在把我十七年来在新旧社会里作文物工作亲身經历的具体事实来算一算这笔賬，究竟党是扼杀了文物工作，还是發展了文物工作。至于对文物整体工作的估价，請看文参今年七期"对于八年来文物工作和博物館工作的估价"一文和郑副部长"党和政府是怎样保护文物的"發言。

（一）新旧文物工作人員的对比——在旧社会里，一般的工作人員，不懂得什么是作文物工作的，作文物工作的人，等于是受罪。一九四二年我到西安为研究唐两京城坊，在西安城自己测量过城墻，人家說我是發精神病。一九四三年我要去洛陽調查隋、唐东都城遺址和龙門石窟，可是沒人給我这笔調查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石璋如回家，路过洛陽，便中到龙門調查，把我带到洛陽去，匆匆的作了一次調查工作。一九四四年向达、夏鼐两先生和我到敦煌考古，在酒泉候車多日，托了許多人好容易找到一輛軍車，但行李放上以后，又被扔下来，几經周折方才到了敦煌。敦煌县长看到我們这几个穷酸以后，根本沒有放在他的眼里，又听說要發掘古坟，与他更沒有关系，因而許多事情都不帮忙，甚至不給我們發掘队放下应給我們喝的"党河"水。所有这些事件的經过，都說明旧社会里沒人重視这一項工作，因而有时灰心甚至不願作这文物工作。

解放以后怎么样呢？自一九五〇年起，無論我参加雁北文物考察团或东北考古發掘队，从沒見到过有交通上的困难。一九五四年参加考古所的汉、魏、隋、唐洛陽城遺址的調查，在那样行脚式的工作中，也沒有發生过沒水吃或是沒地方住的情况。过去認为我犯精神病的工作，今天西安、洛陽文物机关都派了专职干部测量鑽探唐两京城坊的遺址。龙門石窟解放后我前后就去了四次之多。近几年来，带学生出外实習，更备受各地方行政机关的帮忙和招待，深刻感到党給我的荣誉超过了我的工作能力。因而解放以后，不仅願意作这文物工作，而且是带着極兴奋的心情来作这工作。我一点也不覺得党在歧視着我，更沒覺得什么参加革命时間的长短和扔掉了学术上的資格。

过去反动的学閥傅斯年常說："全国考古工作人員不到一打"，这样可怜的几个人应当視为至宝吧！但抗战时期在四川彭山發掘汉墓的时候，以吳金鼎先生为首的工作人員，下班以后还要亲自磨面、舂谷子，有的工作人員，因为受不了而跑掉了。解放以后，几年中考古訓練班培养了三四一人，一九五二年以后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办了考古专業，培养了四十多个畢業生，去年考古研究所又开訓練班培养了一百左右人。这样大的考古队伍，是过去所不能想像的，但从沒听到那一个考古队还要在工作之余去磨面和舂谷子。这样，对文物事業不难認識到，是大量發展呢还是漆黑一团呢？是倒退呢还是前进呢？

右派份子不是大叫党不重視金石学家嗎？这个我也可以用亲身經历来說明一下。一九四一年我到西安調查唐长安城的时候，亲身拜謁关中的历史、考古、金石学家張鵬一先生，当我見到这位老人的时候，很惊心地覺得这一关中大儒竟住在这样一个低湿的小房子里而且竟很少有人来照顧他，后来不久，这位老人就因穷困而死了。今天大家都知道的郭沫若院长，可以称作金石学家了吧！在反动的国民党时代，不是被逼流亡在国外嗎？解放以后自封为金石学家的右派份子，請問你又懂得多少金石学？但你又怎样为党所重視！各省的文物机关，請了許多本省的金石学家到文管会或博物館中工作，山东省的王献唐先生，不是作文物領导工作嗎？这样閉着眼睛說瞎話，請問你究竟是何居心？

（二）新旧文物保管机关的对比——解放以前，

全国只有一个古物保管委員会，在反动政府的領导下，可以說沒作多少工作。地方上保管文物机关，以我所知道的西安碑林保管委員会和敦煌的研究所来說吧！一九四一年我住在碑林里，当时只有一个主任、一个保管員，主任不常来办公（因为要在外面兼职以維持生活），保管員兼作工友、厨师。那么多的碑石，一个保管員，又能保管个啥呢？敦煌研究所是研究佛教艺术的，但最重要的一部参考資料——大藏經都沒有，还談到研究嗎？全国有名的佛教艺术宝庫——龙門，一九四三年我去調查时，沒有人来保管，各石窟都是秽污到万分，任憑勾結帝国主义的份子来破坏盜卖。各省博物館也在半生半死的情况下存在着，当然談不到有責任保管当地的文物了。各地文物，任憑它自然的損坏和帝国主义份子丧尽良心来有意的破坏与盜卖，从沒听到反动政府或是大人先生們談到文物保管的問題！

共产党来了，全国解放了，中央文化部設置了文物局，各省市都設立了文物保管委員会或文物科，博物館也有明令作文物保管和文物調查工作。政府并制定了文物法令向人民宣傳保护文物。考古队的成立更不用說了。我們翻开中国历史，那一时代曾設立过这样多的文物机构向人民宣傳过保护文物工作？以我所接触到的，西安碑林改設了西北重点的博物館，再不是一个保管員兼职作工友、厨师了。敦煌研究所，不仅有了大藏經，而且增加了多少圖書，同时安装了电灯，撥給了交通汽車，供大批艺术家、考古学家到那里去研究。龙門石窟不只設了保管所，而且撥了大批經費用在保养上，最近正研究如何保护奉先寺的造像。这样不可磨灭的偉大成就，是千古所未有的。抗战期間，为了保护赵城金代刻經，甚至牺牲了几位人民优秀的兒子解放軍战士，过去能有这样事件嗎？这不全是共产党和党員在領导着作的事嗎？为什么右派份子必定要說："只有破坏，沒有保护，破坏文物，都是共产党員干的"。試問你們为什么要这样来誣蔑？为什么看不見許許多多党的成績？难道你們連一点良心和爱国心都沒有了嗎？

右派份子对收集文物政策上，也恶毒的攻击，說故宫博物院收購东西，"收購文物不能在市面上形成了故宫要了，别人連看都不能看的气派"，这是站在什么立場上發出的言論？以我所知道的，过去故宫，始終是个古董鋪、杂乱摊子，究竟包括那一方面古代艺术遺产是無从知道的。解放以后不同的，文化部确定为全国第一个文化艺术博物館，設立了历代艺术館、陶瓷館、繪画館，正在筹备的有雕塑館、青銅器館等。以陶瓷、繪画两館来說，几年来的陈列，是把历代的珍藏有系統的展覽出来，供全国人的鑒賞和研究。这样为人民大众来服务，也是历代所未有的盛举，所以文化部把搜集到的重要古代艺术品，都撥到故宫博物院，博物院本身也向各方面征集和收購，以供全国人的欣賞和研究。前年新西兰博物館館长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講演的时候，他激动的說，在中国看到古物归公家所有，感到非常羡慕！难道說文物归公家保管，叫全国人能看到是不对的嗎？为什么要說"别人連看都不能看了"呢？

以上这些鉄的事实，是我亲身的經历，这样鮮明的对比，是極为清楚的。是解放前破坏文物呢，还是解放后破坏文物呢？是共产党員破坏文物呢，还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破坏文物呢？当然中国之大，有的地方干部，水平还比較低，因而造成文物工作上某些个别缺点，右派分子就乘机鑽空子，誣蔑党八年来在文物工作上的总成就，这样只看树木不見林的說法，是一切正直人所不能忍受的。

（三）最后我要重点来說，在文物工作上是否要党的領导。因为有的人說："某文物机关可以先斬后奏我們离得近就沒有那么自由"、"故宫外行人多，內行人少，很多是老党員在养病"、"某文物机关中"党員对人态度，不是全部肯定，就是全部否定，人沒死就下了結論，未盖棺而論定"、"某某代表团赴苏訪問的团員，都是党員"等等的不正确言論，这些都牵涉到党的領导問題，我們想作重点的来談一談：

"先斬后奏"这句話，就意味着不服从党的領导，尽管党有她的計划，但我有我的自由，党不要来干涉。在社会主义的建設中，文化上要有文化的火車头，要根据規划进行各項工作。如果各自为政，不按着計划向前發展，自由的竞爭，这正是資本主义的特点。右派分子的發展科学綱領，不是大叫取消文化火車头嗎？以为"先斬后奏"是自由，那正是右派分子取消党領导的濫調，不难理会是要走向資本主义的自由道路。

"外行人多，內行人少"，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初期过程中，是有这样現象的，因为在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根本沒有好好的培养人，当然內行人少了。但如果說由于老党員在养病占了編制，以致內行人少，这話就值得討論了。試問我們政府除掉了疗养院外，那一个机构是作了老党員的疗养院？故宫博物院，我也在那工作将近三年了，我只看見許多老党員在勤勤恳恳的作工作，沒看見一个老党員在那养病。我眞奇怪莫非我的眼睛是瞎的，

看不見这样的事实？或者特别把这批养病的党員掩藏在深宫中使人看不見？不然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来歪曲事实呢？

故宫由于內行人少，才想尽办法請院外专家到院內兼职；为了向科学进軍，号召各研究組，注意培养新生力量，有的研究組就作了陈列、研究、培养結合起来的七年規划。党处心积虑追求这一行工作上的發展，从沒排斥过內行人，把故宫作成老党員的疗养院。我願意以党外人的身份为这些眞实情况作証。

有人說："党員对人态度，不是全部肯定，就是全部否定"。我反过来問一句，如果党員把党外人士"全部否定"，今天从旧社会来的人，不是都要取消了嗎？但恰恰相反，党不仅留用了原有人員，而且尽量把失業的人員安排到适当工作崗位上，参加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党始終是用团結——批評——团結的办法来改造旧知識分子，达到为無产阶級服务的目的，从沒有否定任何一个工作干部。又說："人沒死就下了結論，未盖棺而論定"。我再反問一句，党是否早給你下了結論，早給你盖了棺？恐怕你沒法答复我这句話，因为党是决不会这样作的，是你自己为自己来盖棺，这与党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說訪苏代表团員，無党外人士，今年文化部組織的代表团，不是有党外人士佟柱臣参加了嗎？

总結这些說法，都是有取消党領导的意圖。右派分子們为什么不回想一下，旧社会里那些領导文物工作的人，領到什么路上去了？不是領到把祖国的宝貴文化遺产为帝国主义者所盜取了嗎？不是中国人看不到的文物外国人看到了嗎？不是正象右派分子感慨中所說的："使我們得不到参考資料的人也只好从外国書去找材料或翻照"嗎？这些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領导文物工作所走的道路。你們是向后看，站在資产阶級立場上，当然憎恨这个無产阶級領导的社会制度。可是千百万的工农，受够了旧社会的剝削，不願再走那非人生活的道路，絕大多数改造过的知識分子和文物工作者，不願再受外国鬼子和洋奴的欺侮，热爱自己的祖国，你們想把社会倒拉回去是不可能的。我們坚决拥护共产党領导文物工作，衷心地拥护人民所爱戴的共产党。

我們正告文物工作中的右派分子，在新旧社会的比較中，人民肯定了党的偉大，大家坚决的拥护党的領导。你們受到了党的照顧，反而昧着良心抹杀在党的領导下全国文物工作上所获得的总成績。在我們今天举出鉄的事实下，你們荒謬的、無耻的讕言是不能不被粉碎的！

知識分子必須下决心完全扔掉一切腐烂發臭的东西

唐　兰

在中国共产党提出整風以后，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經过人民大众的反击，已經全面潰退，我們正在乘胜追击，决不讓一个右派分子漏网。

經过这次大風浪，給知識分子十分深刻的教訓，給我們上了一課，使我們更加明确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錯誤的，使我們学会了鑒别是非，判明敌我，能够分辨出香花和毒草，即使是十分隱蔽的右派言行也能够嗅出它們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气息。

党提出整風的原則，本来是用团結——批評——团結的公式，和風細雨地进行的。党邀請非党人士帮助整風，为的是揭發人民內部的矛盾，以便更深入的改进工作，更加巩固党的領导。右派分子錯誤地估計了形势，認为共产党要垮台了，妄想利用机会抓一把，妄想拆墻脚，整垮共产党。他們不要和風細雨，要狂風暴雨，这陣歪風就吹娃全国各个角落，頓时塵靄大起，把千千万万善良的人們的眼睛都眯了。

就是在文化部門里一塊博物館的园地上，那时候也放出了很多毒草。五月中旬，在文化部文物工作的座談会上，就嗅得到一般腐烂到發臭的气息，像馬非百先生那样把共产党和共青团称为集团，說："历史博物館有党、团、青年积極分子，工友和知識分子等五个集团"；說："党員說誰对，就是誰对"；說："現在积極不会杀头"等等，难道这是有利于党的領导，有利于党群之間的团結嗎？王世襄先生把三反

中問題作为攻击題目，作了一个多小时的發言，把自己跟美国人的关系掩盖起来，好像是無罪的羔羊，把錯誤全推到組織上，甚至于到处宣揚"三反把我教坏了，我过去不自私，現在就是要自私"，难道是在帮助党整風嗎？在故宫博物院座談会上保管部李鴻庆副主任强調有职有責有权，强調党員有特殊待遇；在农工民主党座談会上，李副主任說，他有职無权，只做了两个党員主任的大秘書；强調党員領导干部不重視業务，甚至把一个瘋子在御花园打坏了东西的事件，也来归罪于共产党的領导；这些言論，难道还不是毒草嗎？

右派分子的进攻，像水銀泻地一样，無孔不入，在已經揭發出来的事实里，陈梦家屢次挑撥文化部和博物館之間的关系；挑撥在文物調配問題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故意把考古学和金石学分开，制造矛盾；反对学習馬列主义；反对接受苏联經驗；并且妄想利用我的地位、待遇問題进行挑撥。啓功丑化故宫博物院的收購工作，說什么"乾隆以后第一人"，說"与古玩店的关系，形成神秘鬼祟"，他在文化部座談会后，十分欣賞王世襄先生的發言，說："好極了，很婉轉，可是問題全摆出来了。"他又十分惋惜地說："葛佩琦太不聪明了"。

文化部第二次座談会我沒有参加，所以不知道傅振倫的右派言論。在半个月前，文化部召集一个座談会，傳达周总理报告，会后見到他，我和他寒暄，說"这几天怎样"，他說"关于我的大字报，还沒有貼出来。"我很奇怪，后来找到文物参考資料第六期的記录，才知道右派分子是有自知之明的。

傅振倫所說，都是大是大非使我們十分憤怒。他說什么"上級是高高在上不下来，就只听彙报，而彙报又庸俗化了"。好像文化部領导从来不到博物館，彙报又完全庸俗化的，这不是故意丑化領导嗎？他說"党群之間有高墻"，說"党員对人的态度，不是全部肯定，就是全部否定，人沒死就下結論，未盖棺而論定，絕对服从，百依百順的人，倒視为好干部。"根据这种邏輯，积極分子应該是坏干部，只有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倒是好干部了。他說："对党外同志只通知，不商量，使非党領导有职有責而無权，不敢大胆負責，畏首畏尾，縮手縮脚。"事实上党既信任你，讓你領导，你怎么会沒有权呢？当然右派分子梦想大权独攬，是永远做不到的。

傅振倫对評薪評級对人事部門都不滿，說"評一个干部的資，只指参加革命历史，过去在学术上的資格就全不算了"，又說："人事部門好像是特殊系統"；說："博物館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訪問，团員都是党員。考試留苏学生沒有通知历史博物館，据說因为党、团員中沒有合适的人选"；說"工作人員中出差有了亏空，党員可以补助，群众就沒有。党內照顧多，党外照顧少，还特别照顧党員的家屬"；說"选劳动模范，工会或人事部門主观提出名单，未經討論就派定了人"等等，主要在离間党群之間的血肉关系硬說党員有特别待遇，这和儲安平"党天下"的謬論有什么不同呢？傅振倫是历史博物館的研究員，难道就算参加革命的历史不管学术資格嗎？1956年我和李文信先生訪問北欧，我們倆都不是党員呀！至于傅振倫說三年內三次爭取入党，而連党支書是誰都不敢問，这种假积極，有誰能相信呢？

解放前，文物保护工作和博物館事業是微不足道的。今天，共产党領导六亿人民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化事業蓬勃發展一日千里。我們政府有管理博物館和文物工作的专設机构，發布了保护文物的一切規定，这都是历史上所沒有的。八年来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很多文物，文物机关也征集了大量流散文物，在过去，这些珍貴文物，大都将流散国外，而今天有了文物保护政策完全掌握在人民手里了，傅振倫却認为規定太机械，認为是主观主义，他竟是这样一个文物工作者，竟連祖国文化遺产都不願爱护嗎？

党領导的社会主义建設正在迅速發展，我仅仅从故宫博物院的参观群众来說，解放前每年最多十几万人，1956年就有了185万人。我在二十多年前就是故宫博物院的特約专門委員，那时想編青銅器圖录，只有两百件，今天有两千多件，一本十分巨大的藏品目录将近編成了。我們有专門研究青銅器的机构，并将建成中国第一个青銅器館。我們能不为这些成績而自豪嗎？我从1952年院系調整后，专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党給我教育和帮助，十分信任我，給我重要职务，我感覚党像春風时雨一样，使我逐漸成长起来。我只有兢兢業業，唯恐不称职，辜負党的信任，还有什么不滿呢？我亲眼看到在美丽的陽光下百花齐放，我亲身参与了暢所欲言的百家爭鳴，我覚得自己还十分年青，还可以在党領导下，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

但我究竟是旧社会成长的一个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具有两面性，有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尤其接受这一次大風浪的教訓，使我深自警惕，必須更好的改造自己，加强鍛炼，坚定立場，必須下定决心把过去社会里一切腐烂發臭的东西完全扔掉，才能过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个大关。我回想到旧社会里一片黑暗，領下薪水已經买不到米面的悲慘景象犹在眼前，現在是大放光明，可以安心地为社会主义事業而奋斗了。但使我不寒而慄的是我們

每个知識分子不可避免的还有旧社会里遺留下来或多或少的余毒，假使不加清除，讓它在不知不覚里滋长起来，就有可能跟新的社会、新的秩序有所抵触，就会落后于时代。我們必須伐毛濯骨，三熏三浴，才能神清气爽来迎接遍照大地的春陽。知識分子应該接受这一次斗爭的深刻教訓，自我改造，有了社会主义的皮，才能附上学术上的和事業上的一切成就的毛。

补記：

讀了文物參考資料第八期后，不得不再說几句。我認为对党应該"知無不言，言無不尽"，不应該要两面手法，所以我对过去在文化部的發言有無失于偏激，正在自己作檢查，但对反映东北博物館意見，現在回想起来，沒有什么可以"遺憾"之处。事实总是事实，只有一个人听見，也抹杀不了。何况在1956年博物館会議时，东北博物館同志就曾在小組会的休息时間，大發牢騷，听到的不止一人。此次，大鳴大放期間，胡文效先生在文物局座談会上的發言，听到的也不只一人，大家总还沒有忘記。据曾參加这次会的同志回来說，胡文效先生十分激动地指摘"文物局要手腕"。既然"文物局要手腕"，东北博物館对它还能放心嗎？

我認为四張画問題，文物局手續迂緩，可以提意見，但东北博物館有些人对文化部領导的严重不滿情緒，請恕我說老实話，应該考慮。这是原則問題，为了团結，我們决不能放弃批評。

对党应当忠誠，如果我反映失实，我应負責，領导可以核对。如果是有的放矢，李文信等八位先生（想必包括胡文效先生在內）表示"深为遺憾"，就很难解釋。难道应該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嗎？难道应該掩盖矛盾嗎？难道应該粉飾事实嗎？我認为不应該，并且也不可能。

最后，我对八位先生在"全国文物工作者团結起来，在党的旗帜下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这样一个題目下提出这个問題感覚到很奇怪，請問这是是非問題呢？还是已經轉化为敌我問題？我認为反右派斗爭是一場激烈的阶級斗爭，是敌我之間的生死斗爭，态度必須严肅。因此，我正式声明，我对李文信等八人选擇这种方式，除表示"深为遺憾"外，并希望他們加以冷靜考慮。

駁斥右派分子馬非百对北京历史博物館的誣蔑

王家琦　耿宗仁　余　庠　蔣祖安　王黎暉

本年文物參考資料第六期刊載有文化部約請在京文物专家举行座談会的情况报导，我們看到其中历史博物館研究員馬非百的發言，非常憤慨！我們都是文物工作者，根据所知道的实际情况，認为馬非百的發言是歪曲事实，顛倒黑白；是誣蔑和造謠。他說："南京博物院有些事可以先斬后奏，我們离得近就沒有那么自由，連房子摆几个座也受到干涉，有时态度很粗暴。"蔣祖安同志在南京博物院工作很久，从来沒有見过"先斬后奏"这种現象。因为南京博物院是受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和江苏省文化局双重領导，日常一些事务都是就近向江苏省文化局請示和联系的；北京历史博物館則是直接受文化部文物局的領导的，所以在办事程序上有些不同，这是合理的。馬非百曾經担任过历史博物館办公室代理主任的职务，他对公文程序和办事手續是清楚的，他那样講，不仅是胡說乱道，而是别有用心，陰險地把文物局对下級机关的領导說成無原則和混乱。他說："我剛到館工作时，为了給博物館要房子，給局里写了个报告，文物局批評說写的是'陈腔濫調'，以后再也不敢写了。那时我和韓館长怕到局里来，来也准备碰釘子，常常一說話就給頂回去"。按馬非百是1950年初到历史博物館的，要房子写报告則是1951年5月他代理办公室主任时的事，不是"剛到館"。因为他在这件报告里大作其"文章"，浮詞濫語，所以文物局才在批准通知的尾部附带批評了他一下，原文是："公文中'之乎者也'一套烂調，以后应避免使用。"这本是平常的事，他也断章取义引来作为进攻文物局的借口。是否他以后就再也不敢写报告了呢？历史博物館管理公文档案的武遙宜同志揭穿說他以后还写了不少的报告。至于說韓寿萱同志（历史博物館副館长）怕到局問題，那是造謠；而馬非百那样怀有鬼胎的人怕去，則是他自己的問題。他

說："干部比例不当，全館一百多人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勤杂人員，而且搞業务的沒有几个人可以独立处理問題。"这是歪曲，实际上历史博物館一百多人，其中勤杂人員仅占6.85%。在業务上能独立处理問題的，也不是"沒有几个人"，由于党的培养干部政策的正确，历年都有增加，現在能独立处理問題的人很多，例如仅以陈列部来說，就有十四个人具备这种能力。馬非百是任意歪曲历史博物館的眞实情况，这正是他的陰險手段。

关于科学研究，在历史博物館是根据条件，逐漸开展，去年冬和本年春更热烈地响应党的向科学进軍的号召，制訂了十二年远景規划，調配和充实了人力，并在老年和中年的研究人員下面配备了青年助手。对于正确的研究工作，几年来領导上一直是重視的。例如，博物館研究人員沈从文、史树青，美术人員潘絜茲等人常在刊物上發表文章，有的人并出有专書，历史博物館还集体編刊了文物圖录，均是証明，（个人發表文章仅是研究成果的一种表現，历史博物館的通史陈列和专題陈列均是集体研究的成果）。以馬非百而論，領导上特别照顧他，給他时間，以便他整理著作。館中只一位打字人員，依照領导指示，也在百忙中挤出时間、并加班給馬非百的"著作"打字。就是他作为攻击"文参"的資本的那篇"大著"（关于張士誠、吳三桂炮的問題），在他写作时，館中曾提供很多的資料給他。現在他竟忘恩背德，信口雌黃，用"最突出的是干涉科学研究"的毒箭向历史博物館进攻了。他發言中特别提出的孙作云研究圖騰的問題，实际情况是：孙个人研究圖騰問題是一回事，历史陈列中不列入圖騰是另一件事。在研究原始社会陈列計划的专家（館外历史、考古学家）会上，認为不宜陈列圖騰的意見，一直到現在，我們認为还是适宜的，这只要看一下历史博物館的陈列室便可了然，这絲毫談不到"干涉科学研究"。

更恶毒的是馬非百对历史博物館党群关系的誣蔑，他說："历史博物館有党、团、青年、工友、少数知識分子五个集团"。历史博物館的一百多工作人員，大家在党的領导下，八年来一直团結的很好，这是有目共見的事，無論在学習上，在陈列、保管、群众工作、考古和办公室工作上，以及日常的生活上，大家都是在一起，从来沒有什么"集团"，更不必說什么"五个集团"了。"集团"是什么呢？我們知道除了反革命分子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有集团，馬非百丧尽天良的用这种恶毒的話对历史博物館进行誣蔑，是企圖分裂历史博物館的团結，把历史博物館描繪成"一团糟"，陰險已極。至于他說："平时有个風气，两个人对問題爭論不休，便找党員，党員說誰对，就是誰对"也是誣蔑。馬非百是意圖把历史博物館的党員同志描画成为"专断"的人，而把群众描画成为"盲从"的人，以达到他从多方面丑化历史博物館的陰謀。事实上，历史博物館根本沒那种現象。例如，在1953年，一些同志爭論通史在陈列上的問題（馬非百本人是参加了的），历史博物館党支負責同志是給予了充分时間，从未加以阻拦、下論断，这一爭論前后繼續了三个月，大家一直是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至于同志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找党員同志帮助解决和党員同志主动地帮助同志解决問題，是常有的事，这正反映了党群关系的密切。此外，馬非百还狂妄地"建議对于接收，党团員入党入团时，要辯証的看，不能只看一时积極表現"；說什么"現在积極不会杀头，如果只看运动中积極就不够了。"这些鬼話，明眼人一看即知，根本就不是建議，实际是誣蔑党，是他向党进攻陰謀的一部分。

总起来看，馬非百并不是帮助党整風提意見，他是利用党整風机会点火、放毒箭，丑化誣蔑文物局和历史博物館，挑撥党群关系，居心叵測，陰謀达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馬非百是一个右派分子，他还有其他很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本文是仅就他在文化部座談会上的發言予以駁斥。

控訴右派分子楊介眉对文物摧殘的罪行

張平一　赵巨川

在博物館工作領域中的右派分子（河北省博物館副館长，民盟河北省筹委会秘書处副主任楊介眉），和全国其他单位的右派分子一样，利用党整風的机会，施其两面三刀的伎俩，点火澆油，夸大缺点，捏造事实，破坏党的威信，以便篡夺党的領导。其最毒辣的陰謀，使每个人痛心疾首的，莫过于他們对

文物的摧殘，企圖通过这种手段达到阻撓博物館事業的成长与建設，达到毁灭祖国文化遺产的恶毒目的。

楊介眉是地主兼資本家出身，伪滿曾經作过政府中的高級官員，并获得伪滿洲国的"勋八位"封誥。东北解放后，党不究既往，加以留用，使其担任东北文化部文物处秘書、热河省博物館籌备組长、承德市政协委員、河北省博物館副館长、省政协列席代表。然而楊介眉坚持其反动立場，与人民为敌，一貫仇視党，甚至揚言要杀共产党員。在工作中他进行挑撥离間，組織小集团，树立党羽，打击党的領导和向党靠攏的积極分子，并且通过他的党羽企圖搞垮博物館，以期达到他破坏文物事業的目的。楊介眉就是这样一个滿怀强烈的阶級仇恨混进文物界中的一个敗类。

楊介眉一向恬不知耻的以"文物专家""学者"自居，以这几塊金字招牌来欺騙群众。鳴放期間，他恶意的給文物工作中的党員領导干部臉上抹了一把黑，加以"外行"的称号，用意在于把博物館工作、文物工作誣蔑为"一团糟"，从而攻击党的領导，要党讓賢退位，由他这个"內行"来領导。

的确，楊介眉是文物界的"內行""老手"，不过这个"內行"干的尽不是些內行的事。这个"老手"却是打着"內行""专家"的招牌，作着破坏文物勾当的"老手"。

当楊介眉在河北省博物館担任副館长时，党曾給了他極大信任，交給他保管文物的工作，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成績。然而他却利用职权，拉攏党羽，使博物館的文物遭受了一場浩劫。

一、以眞作伪，以假作眞，故做幻虛，使文物險遭厄运。

我館为了对文物处理愼重起見，对文物的鑒定采取了三級鑒定的措施，即每一件文物要經过館內、省文化局和专家的鑒别后再作处理。这是早有明文規定并列入館的文物清查計划中的。楊介眉利用职权，故意違犯制度，在处理書画类文物时，未經三級鑒定就作了处理，把懿輔先哲祠的画抽出一部当作非文物和次品。在处理文具类文物时，也用同样手法把三塊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端硯提出作为非文物。

最使人痛心的是，乘館內銅器尚未鑒定、分类的时候，楊介眉私自把周、汉时代的銅器打入非文物。这样一来，使館內所藏銅器就寥若晨星。打入非文物的一批銅器是从邯鄲銅厂搶救出来的，經过科学院裘文中先生和北京故宫王执中先生、北京历史博物館姚鑒先生的鑒定，認为是有价值的文物。

楊介眉不但把文物以眞作伪，并且以假作眞。他把清版書說成元版，把宋版元印的說成宋版，企圖在和他的党羽离开博物館之后，給文物保管工作造成混乱。当别人提出意見时，他仍旧把文物打入次品庫中，一任珍貴文物遭受損坏。

二、如此文物保管"专家"

河北兴隆出土的鉄范是中外享名的文物，有的博物館甚至把复制品都当作重要藏品，1955 年中央文化部曾把鉄范复制品当作中苏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之一。这样重要的文物是博物館的驕傲。楊介眉到处自吹是文物专家、行中老手，是十分清楚"妥善保管"的重要性的，可是这批鉄范在他們的手中成了一堆廢物，廢鉄似的被堆在地上，上面还压上几塊每塊重 35 斤的汉代銅餅。这批珍貴文物由 1956 年 10 月起就常年受着重压和風塵的摧殘。难道他不知道鉄范重要嗎？他还亲自对外国一些专家講过若干次鉄范在中国学术界的重要性。为了鉄范保管問題，同志們多次在会上提出意見，領导上也几次对楊介眉进行督促。楊介眉不但不听，反說这是要他"有职無权"，使他有"不可留"之感，并且袒护負責这一具体工作的党羽，宣称："我应当辞职，保管工作不好，这說明我这付館长不称职"，借以使大家箝口不敢再提意見。直到反右派开始，領导上派人到保管組才把鉄范妥善的保管起来。

另外，在保管工作上，楊介眉狂妄的認为北京历史博物館的分类法不能用。他标新立异、自作聰明地"創造"了一套新的文物分类法，并無中生有地說文化部打算把他的經驗在"文參"上加按語推广全国。而这种分类法使用結果，不仅行不通，反而給工作造成很大損失。

三、是整理圖書，还是毁灭圖書？

館內原有六万多册書，已經整理完整的約有四、五万册，后因移动一次，有些紊乱；1956 年夏季由楊介眉負責整理。事先館內拟定了一个挑选原則：每一种書中复本多的，要挑出一部完整的、版本好的。对每个有特殊意义的历史名著要选出几部代表品。經楊介眉挑了一次，只剩下了一万四千余册。是不是博物館藏書复本太多了呢？不是，一方面是因楊介眉不肯亲自下手，单听临时工一报；一方面是楊介眉心怀叵測，只挑出一部分所謂"正史"，把一些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書当作"野史"丢弃在一边了。有些孤本的，像"十国春秋"也都給丢在陰山背后，讓这些古圖書遭受到虫蛀、潮湿。到現在，还可以經常在書堆中撿出一些明版的古書和研究近代史重要資料。

楊介眉这种摧殘文物并不是偶然的。早在原热

河省博物館筹备組任組长时，在其主使下，借口陈列重要，漆器無法保存，縱使某些人把辽駙馬墓出土的嵌銀平脫漆盒干成齑粉；把两个代有彩繪的瓷瓶冻成遍体鱗伤。这两件文物在全国来說都是罕見的。提意見的人反而遭受了打击。

楊介眉不仅对文物是如此的摧殘、糟蹋，同时对河北省博物館的工作成績也采取一棍子打死的伎俩。河北省博物館在党和政府領导下，虽然是干部少、条件差、基础弱，但始終坚持不懈的遵循博物館工作方針，征集和整理文物資料，組織各种展覽，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尽可能的为科学研究提供資料。在这些工作中获得了一定成績。可是楊介眉却蒙上眼睛，抓住个别缺点，否定一切，抹杀全盘，把博物館工作說成一团糟。1956年我館举办的历史文物巡迴展覽，走了七个城市，观众达二十五万余人次。得到領导的重視和群众的欢迎。楊介眉不但不为这种成就高兴，反而奚落巡迴展覽是"貨郎挑子"。

在全国博物館工作会議之后，我館不論在各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逐步走上了正軌。在1957年春筹备河北省农業建設展覽就呈現了这种新气象，一切都从不正規到正規，从沒有陈列計划、圖式，到有了陈列計划、圖式。在陈列水平上較过去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三十二天的展覽期間、观众有十一万多。可是楊介眉不但在整个筹备过程中抱着一种冷淡的不屑一顧的态度，而且糾合他的党羽到处渲染說："这个农業展覽沒有把河北农業建設全貌表現出来"，"赶不上北京水平"等等。鳴放期間楊介眉看到又在調整革命文物陈列，便赶快跑到領导面前，用他慣有腔調，恶意的指問領导："这回調整能赶上北京嗎？"意思是說如果赶不上北京水平就别搞了。楊介眉就这样用冷話、打悶棍、抹杀成績的方法来瓦解同志們的工作热情，来孤立党的領导！

通过楊介眉的丑恶事实，这不难看出是誰在庄严的工作，是誰卑鄙的摧殘文物。右派分子的居心何在，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李开圻　李济馨

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打着帮助党整風的旗帜，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企圖推翻党的領导，要使反动統治在中国复辟。这种要使历史車輪倒轉，要使几千万人头落地的反动勾当，我們是絕对不能容許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無孔不入，就是对博物館事業也是不肯放过，右派分子把党所領导的博物館罵成一团漆黑，認为党不能領导博物館，这完全是誣蔑和誹謗。

右派分子这种猖狂的进攻，决不是偶然發生而是蓄謀已久。如青島市文化局右派分子王桂渾，他是青島市右派骨干分子參謀的总头目，在鳴放中明目張胆的指揮青島右派分子向党猖狂的进攻，在过去他一貫在青島海产博物館挑撥干部与領导間的团結关系，在他主使下，使个别干部对待科学研究不結合博物館的業务而从个人的兴趣和利益出發。他并利用領导职权阻止青島海产博物館的进行扩建。在全国博物館工作会議上对博物館事業加以嘲笑和攻击，企圖阻止博物館事業的發展。这种向党和人民事業的进攻，正如文物參考資料第七期"对于八年来文物工作和博物館工作的估价"一文所指出的，与其他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是同出一轍的。

为了粉碎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事業的猖狂进攻，我們現以青島海产博物館的發展事实加以駁斥。

解放前，我館分为两个館，一个是青島水族館，一个是山东产業館。水族館是1930年秋季中国科学社在青島举行年会时，在科学家們倡議下筹办的。虽然建館所需費用很少，但由于反动政府不重視科学工作，毫不支持，建館的款項是由科学家們向一些研究单位以及个人募捐凑集起来的。1932年館正式开放，当时仅有为数很少的标本及二十个魚池。山东产業館是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机关办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来搜集我国地下資源的資料，盜取我国財产，以及利用陈列麻醉、奴化我国人民的一个工具。抗战胜利后，两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接收，但是陈列內容并未加改变。当时到館參观的，除了少数具有好奇心的一般观众外，主要是蔣匪軍政人員及其家屬，还有美帝国主义的駐軍。館的經費窘窘無几，工作人員朝不保夕，常被蔣匪士兵汚辱和打罵，有一次蔣匪軍官殿打了館的一位工作人

員，还說，“你哭我就再打你”。工作人員只有忍气吞声的工作和生活着。更严重的是整日抓兵，工作人員日夜不安，到处躲藏。

解放后，党保証了我們的工作条件，在党的領导下，我們对原来的陈列进行一系列的修改。首先，我們取消了日本奴化我国人民思想的陈列，并組織一些临时的展覽，如青島水产展覽、恐龙化石展覽、日蝕展覽、气象展覽和微山湖水产展覽等。特别是在1954年，中央文化部根据我館的实际情况和青島客观条件，指示我館向海产博物館方面發展，这就使我們館的發展有無限远大的前途。

改館后，1955年7月我們展出了“祖国的海洋环境与水产資源”，反映了我們祖国天然的宝庫——祖国的海洋，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很多观众都异口同声的反映：“看到了我們祖国丰富的海洋生物及其工業制品，愈加使我們感到祖国的富饒，而热爱祖国的海洋。通过参观我們增加了許多海洋科学知識，我們相信海产博物館将成为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及增进人民海洋科学知識的有力場所”。在水族館也取消了热带魚和金魚的飼养，全部都飼养海洋动物。过去每到冬天只有标本陈列部份能开放，而活动物飼养部份因受温度过低的影响就不得不閉館，但观众总是因不能看到活生生的动物而感到遺憾。现在我們的水族館安裝了暖气，以后每年冬天都可以开放，滿足观众的願望。在改館后短短的两年中，到我們館参观的观众就有五十多万人。

1956年全国博物館工作会議召开后，更加使我們明确了博物館的方針和任务，使我們原来比較薄弱的科学研究一环有了新的發展。虽然水族館成立到解放前已有二十多年，留給我們只是一座空房子和几个魚池，有关水族飼养的資料一点也沒有，更談不到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設备。而全国博物館工作会議后，我們館則購买了显微鏡、解剖鏡和切片机等仪器以及进行科学研究的圖書，初步創造了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現在我們館不仅是向广大人民进行文化教育的学校，而且也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好地方，尤其水族館是进行海洋动物生理生态研究的很好場所。

海产博物館在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視以及全館同志的努力与广大人民的爱护，是在大踏步的前进着，它絕不是解放前的博物館所能与之相比的，它已在广大人民心中生根，它的成績絕非右派分子的流言蜚語所能歪曲抹煞的。当然，我們不能否認在工作中还存在着缺点，但这些缺点是在工作前进中产生的，我們有着充分的决心和信心，随着工作的进展解决这些在前进中的問題和缺点，把工作向前推进。

斥右派分子朱偰的謬論

朱　江

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朱偰，是很受章伯鈞賞識的“才子”，自己也頗有怀才不遇之感。在江苏省文化局召开的一次座談会上，他不顧客观事实，偏說“江苏省的文化事業倒退了”。在座的同志听了这番話，無不憤慨。現就我所知的文物工作，来回答他的謬論。

江苏的文物和考古事業，是“倒退”了呢？还是“前进”了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是大大的进步了。事实俱在，不容抹煞。

朱偰是大家所共知的研究名胜古迹的专家，又是分工負責江苏文物工作的文化局的副局长，为什么对江苏近几年十分巨大而又受人贊賞的文物工作成績，那样的“充耳不聞”呢？江苏省文管会三年半的工作，就征集了一万二千零八十六件文物，清理出包括“宜侯矢殷”和“赤烏十四年銘青瓷虎子”等珍貴文物在內的地下文物七千四百三十七件之多。仅前苏南区文物管理委員会三、四年的工作，单圖書一項，就征集、搶救出六十万余册。这是何等龐大的数字！超过了江苏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解放前，江苏省除了一所私人創办的“南通博物苑”外，就沒有第二所博物館。解放后，除了中央划归江苏省領导的南京博物院外，还在苏州建立了江苏省博物館，在揚州建立了揚州博物館。加上南京太平天国紀念館，江苏現有全国性的历史博物館一所、地志性博物館三所、专門性的紀念館一所，比解放前增加了五倍。仅江苏省博物館的藏品，从無到有，历史、革命文物和美术工艺品，約有十万件之多。难道这个巨大的業績，朱偰沒有看到嗎？

再者，朱偰是从研究南京等地的六朝陵墓石刻

艺术起"家"的。过去，南京、句容、丹陽三地二十八处六朝陵墓石刻，大都傾倒和損坏，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三、四十年中，任其遭受天灾人禍的毁損。解放后，政府不但把这批弥足珍貴的六朝石刻用法令形式保护起来，还連年修理了急待修整的十二处，有的連环境也綠化了，許多埋在地下的石刻，也被清理出来。朱偰副局长不但亲自主持了这个修整工程，且在"文物参考資料"与"文化新聞"上，写过不少洋洋洒洒的大篇文章，連江苏省文管会的干部将有关六朝陵墓石刻仅写成报导时，都要受到朱局长的指責。为什么朱偰对新的成績这样的健忘呢？这就不能不使人要問，朱副局长的居心何在呢？

朱偰的"才华"我們是曉得的，可是朱偰盜名窃誉的本領也是人所共知的。江苏省文管会編"江苏之塔"稿本，送給省文化局审查时，朱偰以局长的身份，重新做序、撰文，以朱偰的名义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待至校对时，被省文管会發覚，方才得以糾正。据江苏省文化局何人俊同志談：有一次，朱偰接到一封信，看了非常之生气，原来是写信的人，把朱偰的"偰"字，写成了"喫"字了。原因是这位同志写了篇論文，連同有关材料，寄給朱偰請教，誰知被他看中了，把材料留下，寄去十元做"稿費"，企圖以低廉代价吞沒别人的研究成果。这位同志給他写了这样一封信来，意义何在，不言而喻。

在解放以来短短的七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但把文化事業引向高潮，而且培养了大批文化干部。单以江苏省文管会来說，原来旧有業务知識的人員只一、二人。在旧社会里，他們不但学而优不仕，也沒有研究的机遇，白白地虚度年华，一無成就。今天，他們学以致用了，参加了专業的文物与考古工作，有了研究的材料和党的支持，許多人的著作首次問世了；原来是文物与考古工作的外行人，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不但熟悉了業务，而且胜任的完成人民所交給的考古任务。其中，許多共产党員、共青团員和許多青年干部，不但懂得了这門科学，而且稳健地領导着这項事業在前进。我想，只要是稍为肯承認事实的人，稍为睜开眼睛看看，是不会說这种瞎話的。奉劝朱偰先生，赶快割下右派的尾巴，站在人民的行列中来，不要自絕于人民。

甘肃省政协揭露馮国瑞一貫仇視党和盜卖国家文物的罪行

政协甘肃省委員会在反右派斗爭中，揭露出右派分子、"考古学家"馮国瑞原来是一个一貫仇視党、盜卖国家文物的販子。

馮国瑞对党不滿和仇視党由来已久。1952年，他在西北人民圖書館工作时，就拉攏温玉卿、王敏正等人組成小集团，反对館长陆泰安，煽动大家选举館长，企圖把自己选上。他还誣蔑共产党員是"特务"。1954年，他恶毒地誣蔑粮食統購政策是："竭澤而漁"的政策。大鳴大放期間，他公然說他同意儲安平"党天下"的謬論。

馮国瑞自吹自擂地說他是一个"考古学家"，但是据揭露，他原来是一个屡次盜卖国家文物的盜窃犯。馮国瑞几年来詐騙和盜窃了大批魏、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書帖字画和詩稿等文物，其中有的被他攫为己有，有的已被他出售給陕西、山东、河南、上海等地。1952年，馮国瑞在圖書館特藏室工作时，曾借圖書展覽的名义騙取了楊紀良收藏的一幅名画"报父母恩重"。这幅画是傳世的第一幅敦煌画，专家誉为"国宝"。馮国瑞把这幅画弄到手后，就把自己的一張普通的画捐贈給中央文化部，結果把这个"捐贈"的收条交給了楊紀良，假称是把楊紀良的名画展覽后代捐給中央文化部的。到1957年初，馮国瑞偷偷地把这張名画用五千元的高价卖給了上海文物管理委員会。有一次，馮国瑞随甘肃省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張掖参观时，以参观团的名义，把張掖赵某收藏的一尊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六朝佛和两卷經帶到兰州，結果也变成他的私有物。兰州徐家灣单子清老先生，把自己珍存的臉譜二十片、木刻鏡一对，通过馮国瑞捐給了圖書館，但馮国瑞却把木刻鏡攫为己有，并将二十片臉譜以六十元代价卖給了甘肃省文化局美工室。1956年8月，馮国瑞随省政协視察組到張家川时，又把这个县文化館所存的一个罕有的魚化石，以交給省博物館展覽为名，騙到自己手中。

現在馮国瑞正在繳積交待中。（1957年8月20日新华社新聞稿）

我国工艺美术的优良傳統及其發展的道路

——在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議上的講話——

郑振鐸

我国的工艺美术，至少是有五千年以上的优良傳統。在甘肃，在河南，在陕西以及其他地区所發現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是具有高超的技术的。特别是"彩陶"，不仅器形，象陶罐、陶盘等都具有很好的型式，泥胎純潔，火候很高，質地坚硬，而且它們上面所繪画的圖案多种多样。前两个月，我在甘肃兰州博物館和文管会里所見到許許多多的彩陶，实在是丰富之極，单是"圖案"，就可以出版好几本書。这样的制造陶器的艺术，一直是繼承不衰的。今天福建、广东还在大量制造并使用着的"印文陶器"，有雷紋的，有廻文的等等，还不是古代"印文陶"的嫡系子孙么？宜兴陶器是很著名的，从明代的"供春"直到清代的"曼壺"，是一代一代的在进步和發展着的。解放后所制造的又改进了不少。制造陶器的艺人們是在优厚的古代傳統的基础上，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有新的創造的。

雕塑艺术在工艺美术上占着極重要的地位，那也是有其極古老的优良傳統的。凡見到三千四百年前的殷代雕塑的人，都会为其古朴的綫条、大胆的設計、抓住人物形象的特点的圖案所感动。他們所雕刻的青銅器的陶模(或陶范)技术很高。听人說，安陽侯家庄殷代大墓里出土过千把件玉器，件件是精品。有一件翠玉雕刻的象，簡直是形象逼眞，迟笨可爱。还有石刻的人形，猫头鷹形的建筑物的装飾，日常应用的骨制的笄和縫針等等，都是很精致的。泥塑的俑，也在这时期出現了。我們的玉、石、骨、竹、木以及象牙的雕工，一直是很有声誉的，还形成了各个专門的行業。汉代的各种雕刻，也都有其特色。汉代的玉器尤为有名，以后各代無不有艺人們从事于这些技术。他們繼承了并發展了这些优良的工艺美术的創作。今天玉器行的艺人們，能够制造極薄的近乎透明的容器，簡直是巧夺天工。雕刻象牙的艺人們發展得更快，能够把今天人民的欢欣鼓舞的情緒，表現在以整个北海为背景的大塊牙雕上。显然地，这比雕刻惊人的九層象牙球要有意义得多了。青田的石刻，嘉定的竹雕，福建和其他各地的木雕，也都有了新的方向，制造了不少能够表現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解放軍的战士們、工人們、农民們以及充滿了翻身的喜悅的妇女們和城乡的老百姓們，但其技术却仍是以古老的优良傳統为基础，并沒有失去老成人的典型。

泥塑或木雕的俑，在古代是有其特殊意义，是用了代替活人殉葬的，长沙楚墓出土的木女俑，长身立玉，細腰纖纖，大是秀丽。宋、元的木象也是雕刻里的杰作。曾見一元代宰官俑，寥寥几刀，便把衣冠的綫紋全都刻画出来了，簡捷有力之至。陶俑从汉代起就有了很大的进步，創作出在中国雕塑史上称得起是光芒万丈的數之不尽的好作品。像汉代的少女俑，有的只留下头部，而髮髻上插戴飾物的小孔，双耳上穿的带耳环的痕子，細細的双眉，还点着朱紅色脂膏的櫻桃小口，秀小而微高的鼻梁，带着甜蜜的微笑的两頰，几乎是無懈可击的十分完美的作品。又輝县出土的汉代犬俑，張嘴搖尾，如在奔跑，神气活潑極了。六朝的，特别是北朝的清秀瘦削的陶俑，具有其时代的特征。唐代的俑，成为世界上最美好的艺术品的一种。三彩的美女，不論是坐像或立像，粉彩加金的力士像，那样的嫻靜，又是那样的勇猛，特别是唐馬俑，那是每一个艺术爱好者都想占有一件乃至數十件的，那馬是那样的气概英駿，或仰天长嘯，或低头望地，或举腿欲跑，或站立待命，沒有一匹不是可喜的，令人想起了昭陵六駿和大画家韓幹的"照夜白"来。在动物塑像上，汉代的犬和唐代的馬乃是两大类型的杰作，后代簡直追不上。宋代和元代的馬（石馬和陶馬）脚短而粗，馬身臃肿，一点"駿"气也沒有。近来的泥塑，又有复兴的气象，从無錫的泥人到广州

的石灣陶器，都有新的發展。在这方面，工艺美术的創作者們是有無限广闊的光明的前程的，像陶制像、泥塑象和瓷制象，可作为精雅的陈設品，也可作为兒童的玩具。将怎样把傳統的技术和雕塑家的創作結合在一起呢？只有很好地結合起来，才能有更高的成就。单是“仿古”是远远地不够完成任务的。

講起了瓷器，又是具有說不尽的光荣的历史。我們是發明瓷器的祖国，我們有責任也有信心要制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瓷器来。現在，古代的窑址發現了不少，差不多可以說，中国的“瓷史”要整个改写过。举一个例，在福建泉州的古窑遺址里發現了类似定窑的白瓷，类似龙泉窑的青瓷等等的瓷器殘片。这就說明了在南洋，在印度，發現的中国宋代的白瓷、青瓷，原来乃是福建本地自己燒制的。我国瓷器史，可上溯到三国，也許还更早。过去，認为唐代的瓷器不易有，今天是連三国、六朝的瓷器也都出現了。在器形上，在釉色上，在圖案上，他們具有时代的特点，也具有地方的特点，但也不是不互相交流、拟仿的。这将近二千年的瓷史，內容实在是丰富極了。直到了清代的雍正、乾隆乃至嘉、道时代，也不断的有新的發明，新的創造。像釉色，直到乾隆时代方才無所不有，無施不宜。乾隆仿古銅器、漆器、木器、竹器等等的瓷制器皿，乃是惊心动魄的作品，誰見了都会喜爱的。今天，在瓷都景德鎮和其他各地，瓷窑都相繼恢复了且表現着日益繁荣的气象。怎样地更好地繼承那丰富的优良傳統，結合着新的有創造性的改进，又結合着广大人民的需要和其他国家人民的需要，乃是每个从事瓷業的艺人們都要好好地研究的。

染織工艺，是仅次于陶瓷的应用面广闊，而且关系着全国人民的需要的一門行業。用机器制造的染織工業，我不談，这里談手工的染織工艺。絲麻的織品，殷代已有之。絲織品的圖紋，今天还可追寻到若干种。战国和汉代的織物还有遺存。保存于西域的汉織物，其圖案是很精致活潑的。唐代的染織物，尤为变幻异常，花色众多，染織物里，有所謂“蜡纈”的，到今天还繼承未絕。宋代的織錦和其他織物，見之往往令人心折。在其中，有所謂“緙絲”的，乃是宋代的創作，以五色經緯絲綫，織織出山水、花鳥、人物等等，宛然是最上乘的画幅。朱克柔之所作，当得起是“銘心絕品”。这技艺到今天还保存着，特别在苏州，已有了新的發展。元、明、清三个时代的染織工艺，也各有特长。清代在江南有織造府，专門督造皇宫內应用的染織衣料，不时有新鮮的作品出来。大幅的长闊均达一丈以上的緙絲，作为屏風，作为壁飾，至今尚有留存，山川秀丽，人仙往来，極尽意匠經营的能事。地毯等物，也有不同时代的最好的成就。

漆器乃是中国所特有的工艺美术的絕品之一。它在战国已經有多量的生产了。长沙楚墓里，曾出現有漆器。最近在信陽的一个楚墓里，漆器出土达二百余件之多。各地汉墓里，漆器出土的也很多，且有脫胎的漆器出現。松江任氏墓，曾出土很精美的元代的漆器。至明代永乐以下的漆器傳世的也还有，那些漆器，繪画的圖紋都是很精工秀丽的，且以五色的漆笔，縱横揮写，大有豪态之态；那色彩又是那么紅翠欲滴，鮮艳异常。描金、脫胎、雕漆的技术至今都还存在着。雕漆有五色的，尤为精絕，那是必須用超等的手眼与超等的煩劳才能完成一件两件的。乾隆时，漆器的式样和色彩已大有發展。今天在福建、四川等处，更有了新的收获。

刺綉作品也是我国的一种大杰作。随着絲織品的产生，刺綉也就出現了，汉、唐的刺綉作物，不仅古雅，而且的确有功夫。敦煌千佛洞出来的唐代刺綉的佛画、佛幡等，都是上乘的工艺美术品。宋代的刺綉尤为精丽异常，差不多任何复杂的画面都可以在針巧之下綉成，絲毫不逊于原作，有时，簡直看不出是綉的。明代的顧綉尤聞名于世，已达到了無施不可的地步；那綫痕和画面已經吻合無間，看不出凸起的痕迹来。今天苏州的苏綉、湖南的湘綉、广东的广綉，都各有特色，都能够繼承古老的优良傳統，而且不断地有新的进展，創造性的改进。

木刻画乃是广大人民享受美术作品的陶熔的源泉。很早的时候，也就是在一千年之前有了木刻書籍之时，木刻画也就随着产生了。它不仅作为書籍的插圖，而且也单独地存在着。敦煌千佛洞出現的五代和宋初的佛、菩薩象的雕板画，乃是作为供养之資的。后来黑水城出土的“四美人圖”，却純然是观賞的画幅了。明、清二代，彩色板画的創作，更丰富了木板画的質量。它們作为“年画”，（包含着城乡景色、人物圖象、戏曲故事、吉祥圖案等等）而大量的深入民間，为城市，也为农村的人們所喜爱。这个木刻画艺术，今天还存在于石家庄和苏州的桃花坞等地，而北京荣宝斋所生产的彩色木刻画尤有日新月异之感。

以上只是簡略地举出比較重要的几项工艺美术品来作为例子，說明我国的工艺美术乃是如此地源远流长，如此地有創造性，而且不断地發展着。

的确，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們的工艺美术家們，多数是为了皇室和官僚地主阶級的侈奢的享

竹雕笔筒　　明　吳之璠制

用而存在着的。但也不尽然，有很多工艺美术家們是甘心为广大人民服务而不肯屈膝侯門的，有不少这样的好故事流傳着。几乎每一种工艺美术，都有它的一部光輝的历史。这些历史在今天是可以写出来了。在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工艺美术家們有一部分是为了帝国主义的顧客們服务，曾經走向到投合于那些人的口味的方面去。今天，我們应該尽量恢复那些在解放前，因战爭和因反动派的榨取、压迫而中断了的一切好的工艺美术的优良傳統，同时还应該在这个优良傳統的基础之上，不断的有新的改进，新的創作。

說起中断了的优良傳統，应該为我們的老一輩子的艺人們掉"一把酸辛泪"。他們，誰沒有要向旧社会，旧日的統治阶級控訴的呢？过的是什么样的酸辛、苦痛的日子！有的是乾脆改行了，但有的还苦苦地半挨餓的工作着。全国解放使他們翻了身，生活逐漸地好轉。国內外市場的需要，使每一个行業都欣欣向荣起来，再也不怕"后繼無人"了，是有那么多的年輕一輩人在忙着繼承他們的优良的工艺美术的傳統。

还有些問題存在着。这些問題多少年来是存在着，老是沒有被提出来，也老是沒法子解决。現在是可以提出来，而且，也是可以解决的了。

第一是向优良傳統学習問題。古人只是师徒相傳，以秘密为要着，沒有机会看到古来流傳下来的好东西，甚至連他們上一代或他們自己所創作的作品也保存不下来。这怎么能向优良傳統学習呢？所以，世世代代相承襲的就是那末一套东西，非奇才异能之士是絕难有新的創作的。現在，我們說向优良傳統学習，是可以在各地博物館里实現这个願望的。但还不够。各行各業应該自己有陈列室或小規模的博物館，把古代的前輩的好作品陈列在那里，以供观摩和学習，至少，应該把历年来他們自己所制作的样品陈列在那里。景德鎮有个瓷器博物館，已經做到陈列古代的和他們自己的出品。但也还不够。应該更广泛地搜罗历代的景德鎮出品和国內各地的瓷器、国外各地作品，使这个博物館成为瓷器陈列的中心。其他各行業也应該作如此的准备。象在苏州，就应有那末一个規模較大的陈列絲織品、刺綉和緙絲的博物館。不"取精用弘"是不能"推陈出新"，不能提高質量的。

第二是創作資料問題。工艺美术家們所一致感到苦恼的是"資料"不够，換一句話，就是說"圖案""花紋"的供应，大大地不够。他們所根据的資料一向是很貧乏的，多半是"父以是傳之子，师以是傳之弟"的陈陈相因的花式，象苏州的刺綉工場，得到名人的一幅画稿，便珍如拱璧，一笔不苟的把它描模到綉架上去。有时"人民画报"上的彩色版便是他們最好的制作的来源。每一个行業（或联合若干合作工場）都应該成立有相当規模的資料室，搜集尽可能多的印刷的或繪写的圖案、花紋，以至历代

唐　三彩陶馬

名画等資料給他們作为参考、研究的根据。象苏州的刺綉工場，“纂組英华”一类的書，总应該有吧，如此才能有新的創作，不断地涌現出来。单靠复制的小画片作为資料来源是完全不够的。美术出版社应該尽可能多地出版这一类資料書。但运用資料也还要費一番斟酌功夫，且要十分愼重，如把剪紙圖样或綉花飄帶的圖案搬用到瓷器上去是很不妥当的。什么器型应該用什么式样的圖样是要多多地思索的。例如把敦煌千佛洞的佛的“背光”圖式，搬到景泰藍的大盘上来，也是很不合式的。

第三是，工艺美术的原料問題。这問題曾經紧張过一个时期，現在大都解决了，存在的是原料的質量問題。像刺綉，必須要有上好的緞子做底子，并用上好的彩色絲綫来綉，才好使綉幅鮮艳夺目。那彩色絲綫的顏色必須是經久不褪色的。否則过了几年，偶然經过日晒，便褪色了，經过水湿或雨淋，便紅綠披散，四处沾染开去，整幅刺綉就算完了。举此一例，其他亦然。使用的原料往往不会很多，但必須特制，必須另行供应。这一点，主持的負責同志，必須大力加以注意，联系各有关部門予以解决。又工艺美术色彩問題，也值得注意。再以刺綉为例，古代的刺綉大都使用深色底的素緞做底子，像黑色，墨綠色，深紫色，深藍色等等，很少用淺色緞的。那些深色底子使刺綉的画面益發显得突出，显得鮮艳。这优良傳統大大值得繼承。我們現在，不論苏、广、湘綉，都好以白色的緞或淺灰色或嫩綠色或妃色的做底子，大見减色。可否考虑改用傳統的深色底子？又像景泰藍、瓷器等色彩，也有再加仔細研究的必要。如果有訓練班，我想，色彩学乃是一門必修的課程。

德化窑姿达廬　何朝宗製

总的說来，解放后的工艺美术界是更生了，是复兴了，是繁荣了。你們不仅为国內的工农兵的需要服务，也为国际市場的需要服务，从而为国家积累了不少社会主义建設的資金。你們对国家的貢献是大的，你們的工作和事業是有重要意义的。你們不仅学習并繼承了古老的优良傳統，而且也創作了不少新的东西。虽然还存在些問題和困难，但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都不难逐漸加以克服和解决。在优良傳統的基础上，把老艺人們的經驗和美术家們的創作力量更好地組織起来，結合起来，乃是我們工艺美术的發展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来更多、更好的工艺美术品，来滿足国內外的广大群众的需要。

墨西哥發掘出印第安人的石人头

据苏联“青年技术”杂志报道：华盛頓史密斯大学美洲人种研究室主任莫·斯契尔林博士，自一九三八年起就从事發掘印第安人的文物工作；到目前为止，他在墨西哥一共發掘到二十一个巨大的石人头，其中有十个較小，它們的圓周都差不多有六公尺长，虽然它們的大小不等，但是最小的也有二十吨重。

这些石人头是在墨西哥特列斯·扎波捷斯附近的丛林里發掘到的。据說，有一支印第安人——拉·汶特人或者是奥尔麦克人——曾居住在这里，但是在公元六百年的时候，不知什么緣故他們突然絕种了。

这些石人头充分表現了它的艺术性：炯炯發光的眼睛，大而微扁的鼻子，富有表現的嘴唇和被帽子掩盖住的耳朵。这些玄武岩雕成的人头，証明了当时的印第安人不仅有很高的文化，而且手工業也很發达。

这些石人头都沒有軀干，显然，本来就是这样的。有一个石人头曾和一塊石碑埋在一起，石碑上刻的是印第安人的点綫的象形文字，而且注明了日期——紀元前二百九十一年十一月四日，这日期和印第安人所用的历書完全符合。这就証明了这里文化的發展早在罗馬之前，当罗馬与迦太基之战才开始的时候，他們已經有了雕刻的艺术。（杭玉編譯自苏联“青年技术”杂志1956年第10期）

十竹斎画譜　　訪菊　　吳彬

上：十竹斎箋譜　　南陽廬

右：虎丘塔發現的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綉樸殘片
(作深栗壳色，上有金黃蓮花)

朱克柔緙絲牡丹

明　韓希孟繡花鳥册
　　罌粟

我国考古史上的空前發現
信陽长台关發掘一座战国大墓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

长台关是河南省信陽县的一个小鎮，位于淮河的北岸，京汉鉄路在此設有車站。在鎮的西北約四公里有一条小土崗，由西南延向东北，到十字港入淮河处为止。崗上散布着六个大的土冢，傳說的楚王城和太子城就在这条崗的东北部。

一九五六年三月間，張崗"五一"农業社在第四座土冢（由东北端数起）的西北边挖井，据說在打到近两丈深处，曾發現一只草帽，帽呈灰色，触手即毀，草帽下有一个倒置着的陶罐。再下去三尺許發現有黄色的蓆席，蓆席下为排列整齐的长方木条。打井的社員們将木条掀开，这里位置正在墓的前室与主室之間，由于农民不断的下去，先扰乱前室，接着劈开后室，并且把棺木毀坏，将左室也掏了一个小孔（但沒有进去），将其中大部分銅器、玉器、少数漆器等取出，其他器物絕大部分被搬动甚至被毀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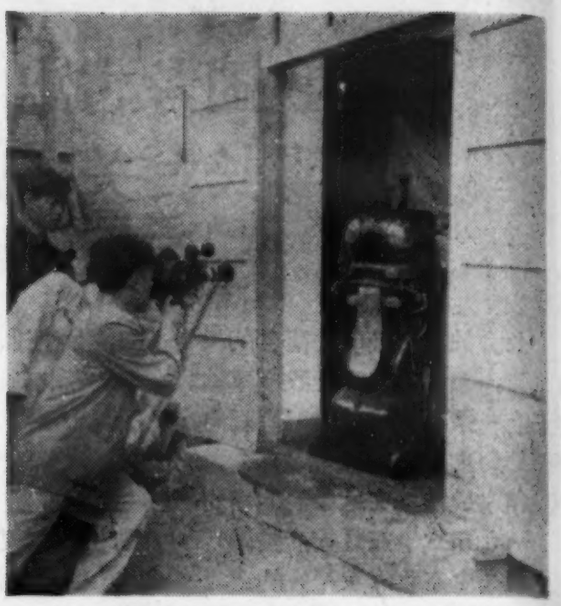
自从这个消息傳出之后，附近来看的群众絡繹不断。"五一"农業社报告县人民委員会，县人民委員会立即前往調查，并令将井口封閉，派文化館干部到該乡宣傳保护、收集流散文物。河南省文化局于一九五七年三月下旬派文物工作队前往，与信陽专署、信陽县人民委員会合組發掘委員会进行發掘，至五月下旬工作完畢。

墓在土崗的頂部，与东南边的土冢相距仅二十余米。墓向南偏东82度，墓坑为长方形竪穴，墓口长14.5、寬12.3米，上部墓壁成四層台阶，在第三層台阶上發見有很密的圓形小夯窩，第四層台阶側壁插有許多成排的小木桩痕迹，有的木桩还保存着，木桩附近的填土中有腐朽的繩子。墓总深10.1米，墓底长10、寬8.35米。墓主室底下有一腰坑，坑里埋有一付殉葬的小鹿骨架，头向墓道。墓坑內填土，自墓口起至2.4米处填的是一般的黄土，以下一直到槨室的頂部及四周，全是填青灰色粘土，与长沙战国墓的填土有相似之处。

槨室东西长8.44米，南北寬7.58米，高2.50米，共分隔成七个室。前面为一与槨等寬的前室；第二排分隔成三个室，中間为主室，两旁为左室和右室；第三排中为后中室，两旁为左右后室。整个槨室为三百七十多条长方形的木材所构成，結构非常复杂。在主室內另有內槨两層，外層亦为长方木条构成，惟每两塊拼成一条，用細腰連住。內層木材較薄，已破坏成碎片。我們进行發掘时，前室和主室已被破坏得非常严重，器物除了取出的之外，大部分已被搬动或毀坏。前室东南端有編鐘七个，發現时还順着大小次序連在倒着的鐘架上，架旁有小木錘二个。这一套鐘連农民取出的共大小十三个，数目与竹簡上的記載相符，所以是很完整的一套。最大的一个上有銘文十二字。紧靠鐘旁是一張木瑟，瑟柱和弦痕尚在。鐘的北面有銅鼎及銅壺等。西南角有木雕一件，是尾部相連的两只伏虎。虎側有木鼓的殘塊，从大小和彩繪的不同，約略可以辨出共是两个。室北端有竹簡一批，但已被破坏，仅存殘片四十余段，內容可能是与墓主有关的記載。在室內还四散着許多彩繪歌舞、狩猎……的殘漆片，經整理后，發現又是一張瑟，比前一張瑟略小，周身彩繪，精美絕倫，可惜殘存的已不足三分之一了。此外还有許多陶器，大部分已被打破。

主室破坏得最严重。棺分內外两重，外棺甚厚大，两端大小相等，盖及左右墻表面成弧形，前后墻及底板平。棺表面髹較薄的生漆，呈紫紅色，里面髹朱紅漆。据說未破坏前在两端用很粗的繩子捆縛。內棺較小，四面平直，外髹黑漆，并有朱紅等色的彩繪云紋，非常精美，惜被破坏殆尽，現仅收集到殘板两塊。据当时参加挖掘中室的农民說：在打开棺的时候，見到棺內骨架用紅色絹裹住，骨架相当完整，身上及身旁有許多飾物，現在所收集到的玉器及帶鈎等，就是从这里拿出来的。棺底是鋪有竹織的席子。除前室和主室外，其他五个室沒有遭到破坏。左室中部放有长方形車盖一套，四周有金花木質馬銜两付，当顱二件，銅車馬器数十件；西端有帶戈鞘的銅戈二件，北側有木俑两个。右室东端有木俑一，木案一，漆耳杯、漆豆、漆杯豆（有細柄圈足的耳杯，竹簡上称杯豆）共十件，有的里面还留有果核。西端为漆俎、漆耳杯、陶方鼎、陶鍾、陶刀、陶勺等。

复制木兽模型



长台关战国墓出土文物拍摄电影情况

后中室中部有一只木雕鎮墓兽，周身彩繪鱗紋，兽作跪状，全高1.4米。头頂插着两只鹿角，两耳后竪，眼圓而大，口寬，舌伸垂及腹部，前肢持蛇作吞食状。兽的西面前后各站一男俑，高0.56米，头披黑髮，到脑后結成辮子。面塗朱紅色，眉目清秀，双手前伸，足穿黑靴。兽东面前后各站一女俑，姿态与男俑同。后左室东端有木几一張，雕刻的花紋很精致。西端有彩繪大漆案一張，下为四銅足，两边有四銅鋪首，四角有銅角飾，周身有極美丽彩繪，精美無比。还有木俑二，小木箱一，箱內貯有銅刮刀、削、小鑽、鋸、毛笔及笔筒等，可能是制作竹簡的全套工具。此外中部有漆木床一，长2.12米，周身有雕刻彩繪。竹席六条，銅提梁爐一件，爐內装有木炭。竹簡二十八支，每支上有三、四十字不等，內容大約是記載随葬物的清单。后右室中部有小木漆案三張，旁有彩繪木豆九件，作跪坐状木俑一个，竹类編織物五件。

中央文化部对这次發現非常重視，除派員协助外，并調派湖南文管会对保管漆器有經驗的人員和北京历史博物館摹繪人員大力支援工作。

这一个墓，从墓的所在地、墓的构造、出土器物……来看，初步估計是屬于战国后期楚国的。墓主的身份，可能是諸侯或地位仅次于諸侯的統治阶級人物。虽然前室和主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从中还發現了不少精美的珍貴文物，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有不少是考古史上从未發現过的。其次如發現的竹簡上古文字之多，亦为空前所未見，对楚国的历史、文化、艺术以至文字、方言……等，一定能有重要的补充。

参加發掘人：裴明相　張建中　米士誠
賈　峨　涂　梅　李光义
王兆文　白相聚
执笔人：裴明相　張建中　賈　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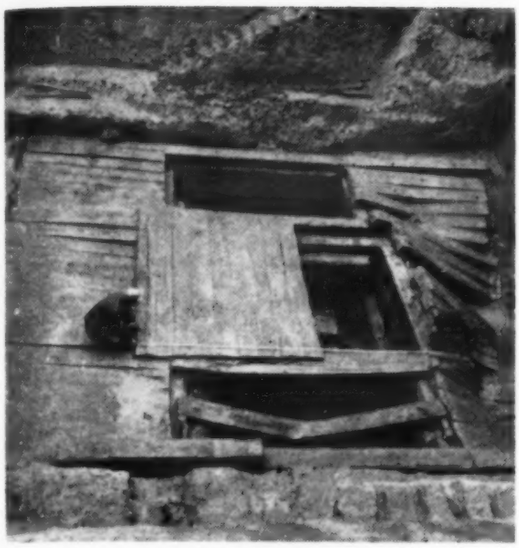
更　正

本刊1957年2期勘誤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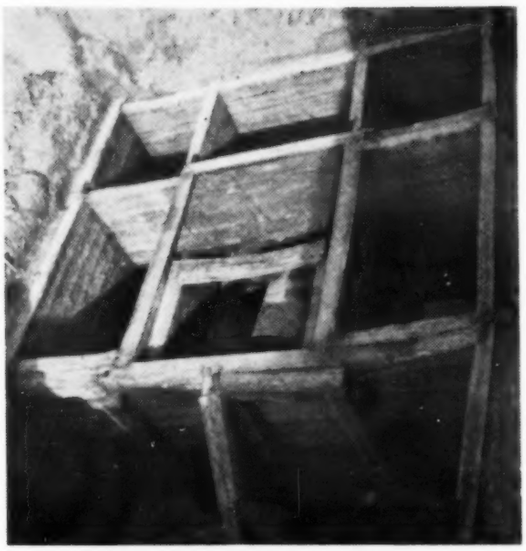
1. 第77頁右栏十三行“时期”后面加“„”号，十四行“一千三百多年”应为“一千二百多年”；78頁左栏十行“(圖四)”应刪去，二十五行的“四”字应为“⑪”；右栏十行句号前面应加“和太平天国(圖29”)。
2. 第79頁左栏7行“天命之錢”应为“天命汗之錢”、二十二行“下天”应为“天下”；右栏一行“(圖22)”应为“(圖37、38)”、十行“元宝”后加“„”号。
3. 第80頁左栏注④三行“始五鑄銖”应为“始鑄五銖”；右栏注⑮“見注⑭”应为“見注⑫”。

本刊1957年5期勘誤如下：

1. 第48頁左栏倒五行“填墓”应为“填基”；右栏七行“仰置陶碗”应为“仰置一陶碗”。
2. 第49頁右栏十行“毁鑄”应为“鼓鑄”。
3. 第50頁左栏倒十七行“天城体7”句中”7”字应为“⑦”；右栏十三行“大随永陀”的“永”字应为“求”。
4. 第70頁注⑦“Brahmr”应为“Brahmi”；“Sonskeit”应为“Sanskr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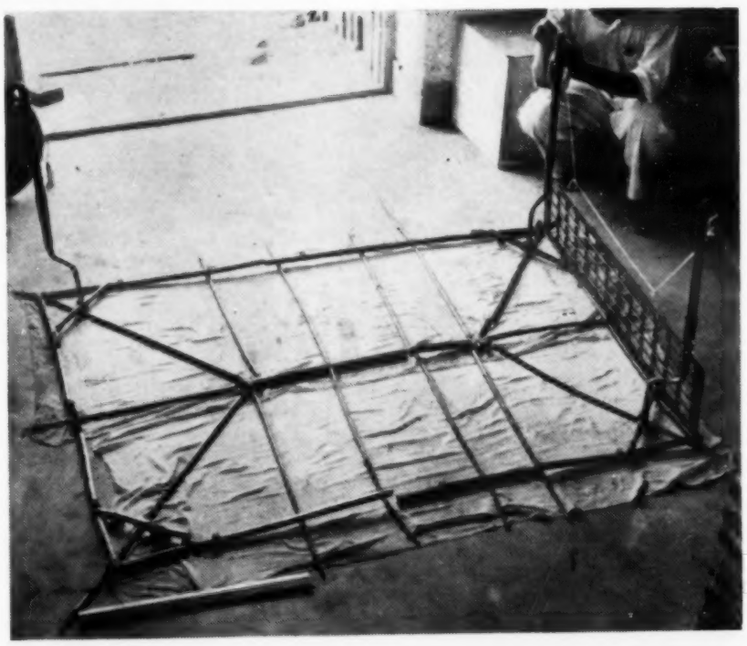
圖一　木槨頂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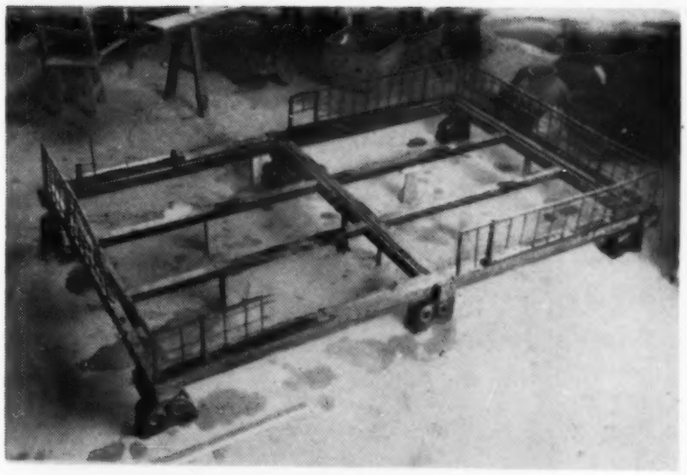
圖二　木槨頂揭开后的情形

圖三　木槨部分結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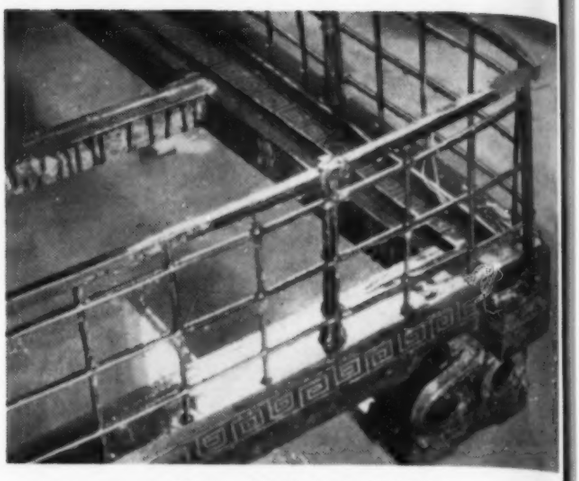
圖四　墓室木板細腰結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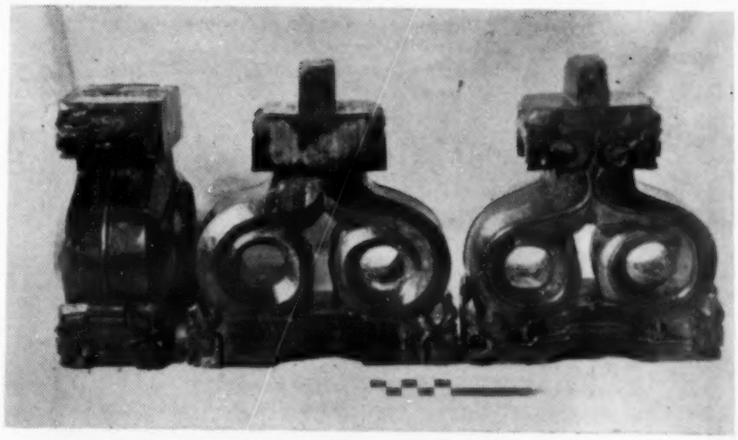
圖五　車棚



圖六　漆繪彩木床



圖七　漆繪彩木床部分



圖八　漆繪彩木床床足

圖九　玉飾之二

圖十　玉飾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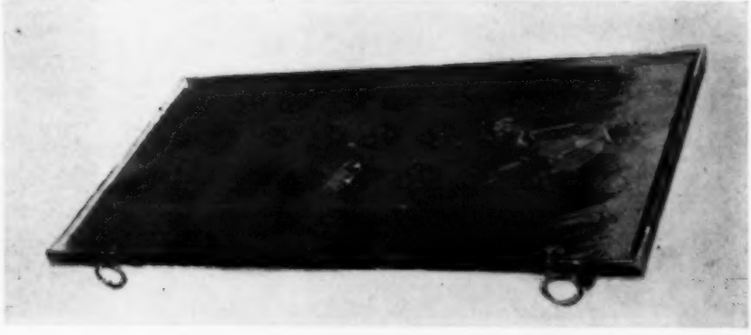
圖一一　玉飾之三

圖一二　木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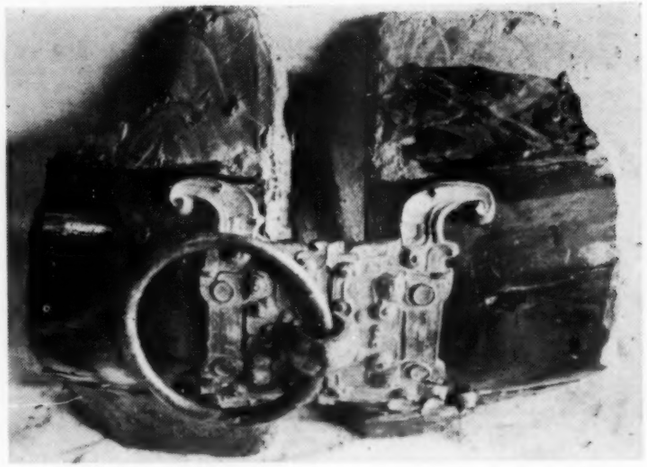
圖一三　漆双鳥豆

圖一五　木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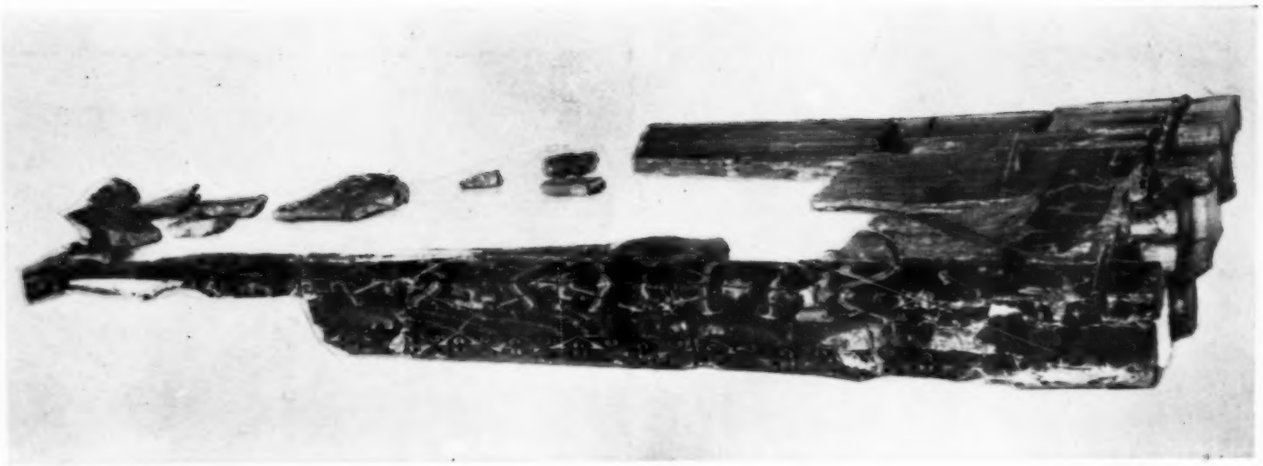
圖一四　漆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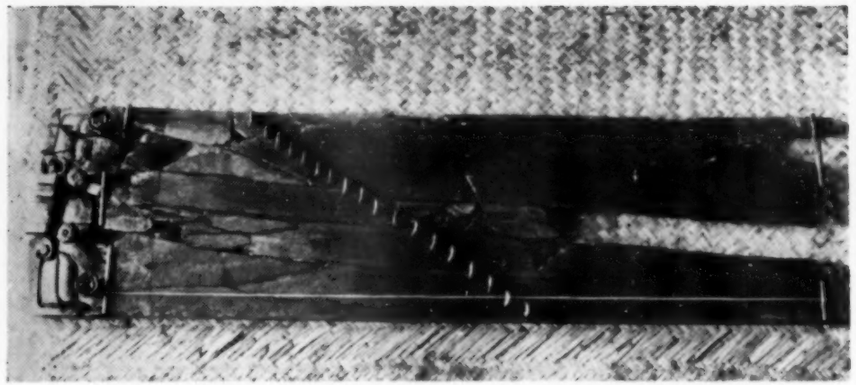
圖一六　漆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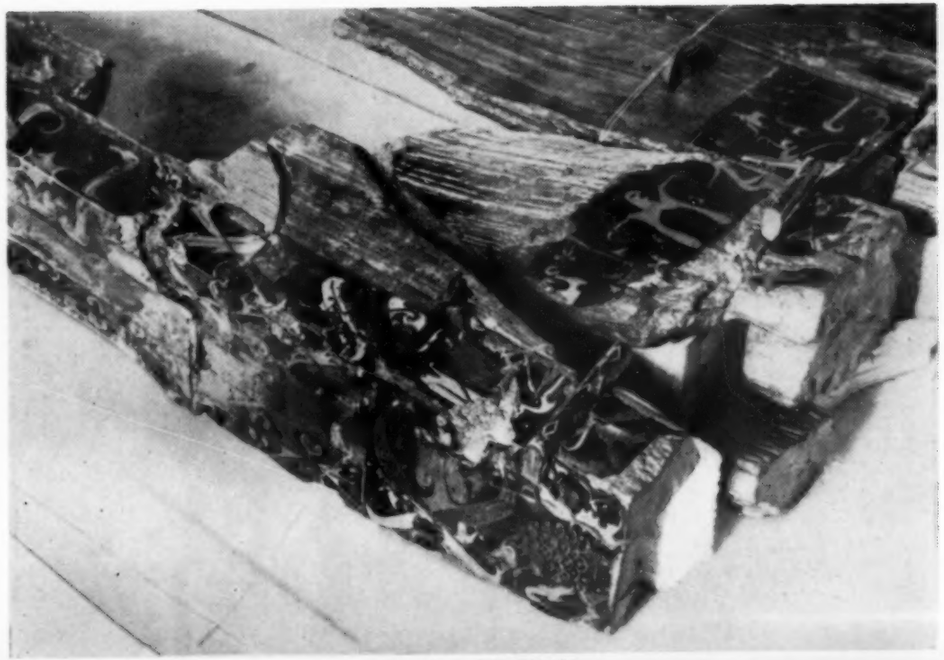
圖一七　鼓（殘）



圖一八　錦瑟（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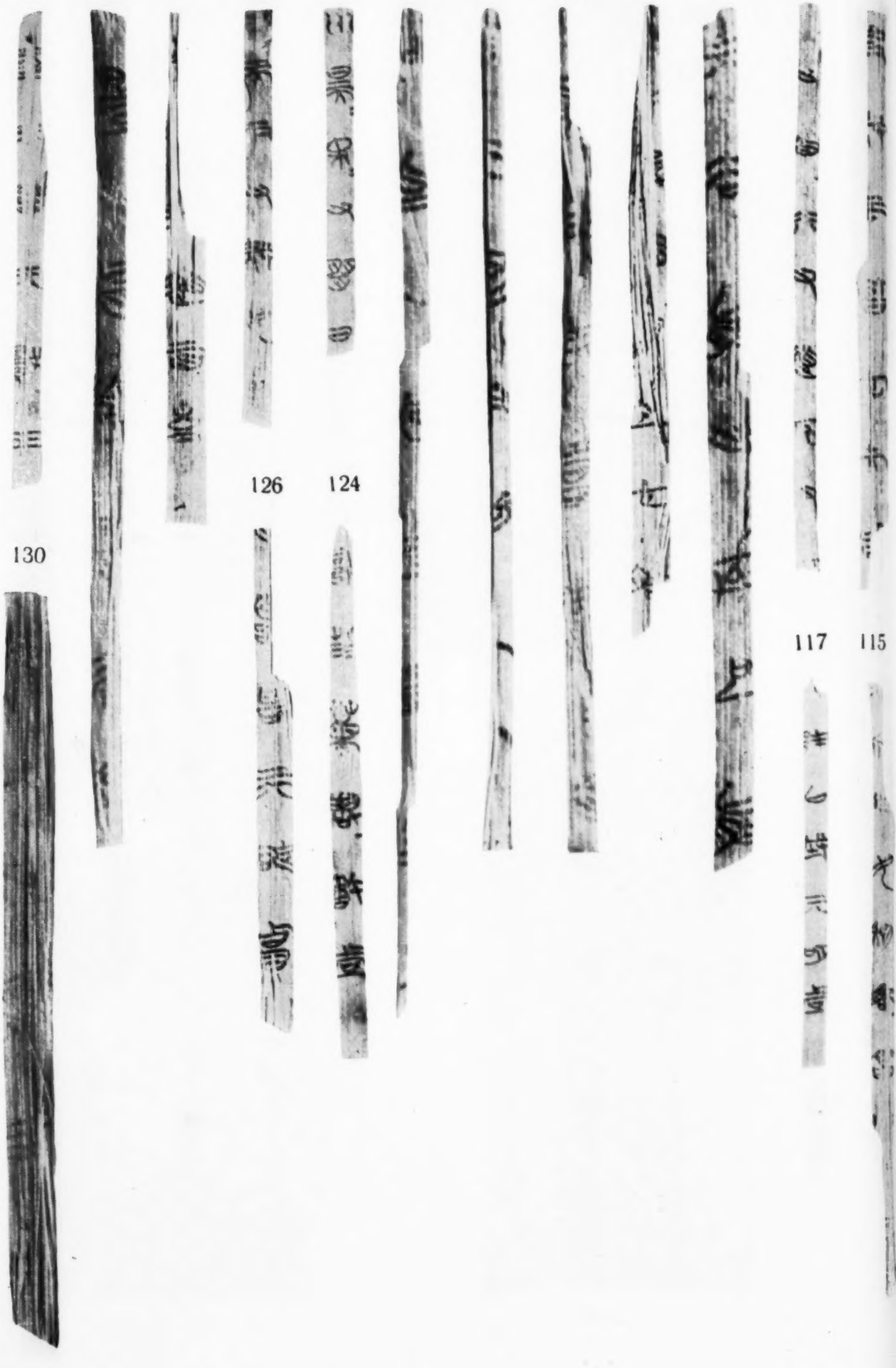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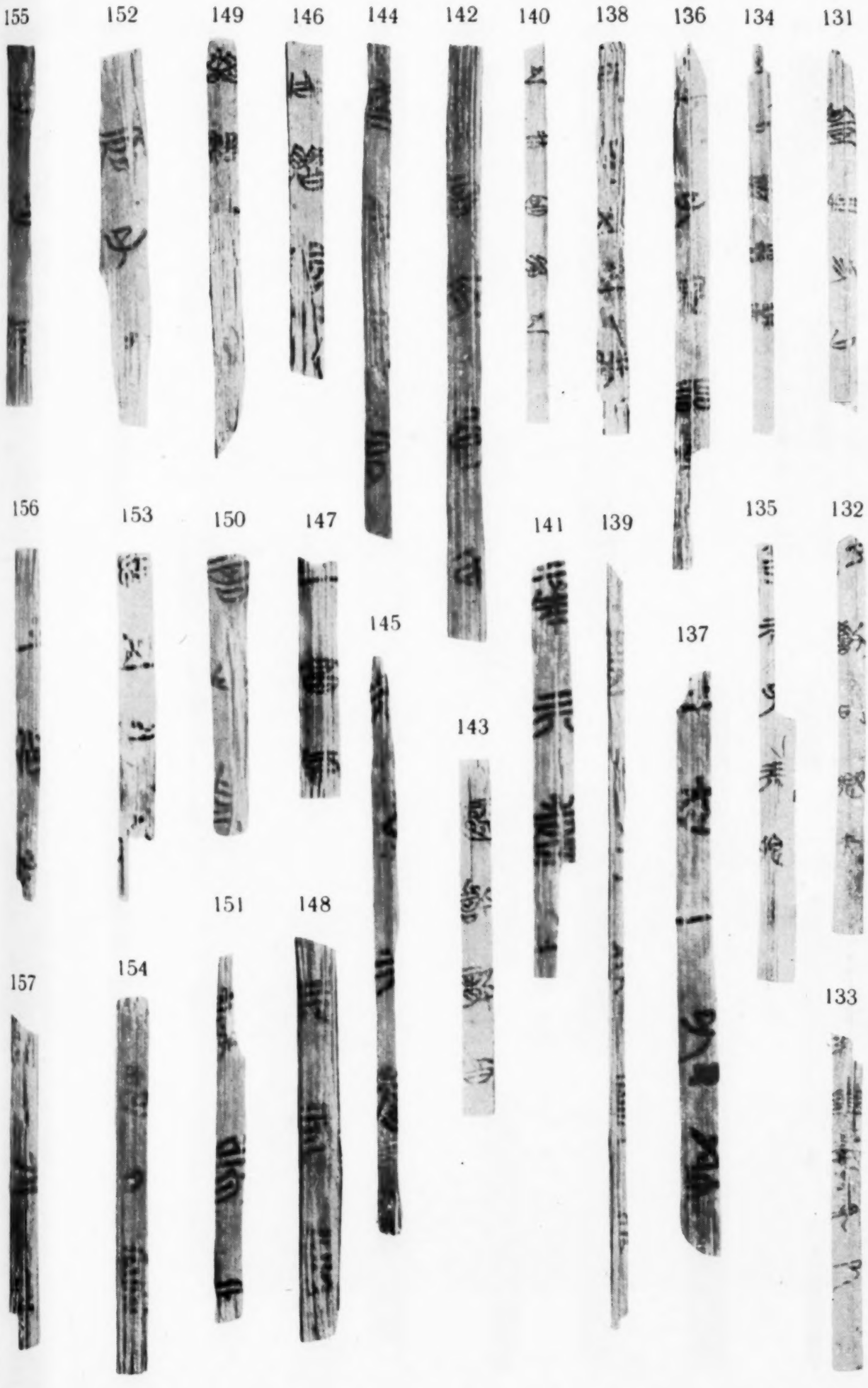
圖一九　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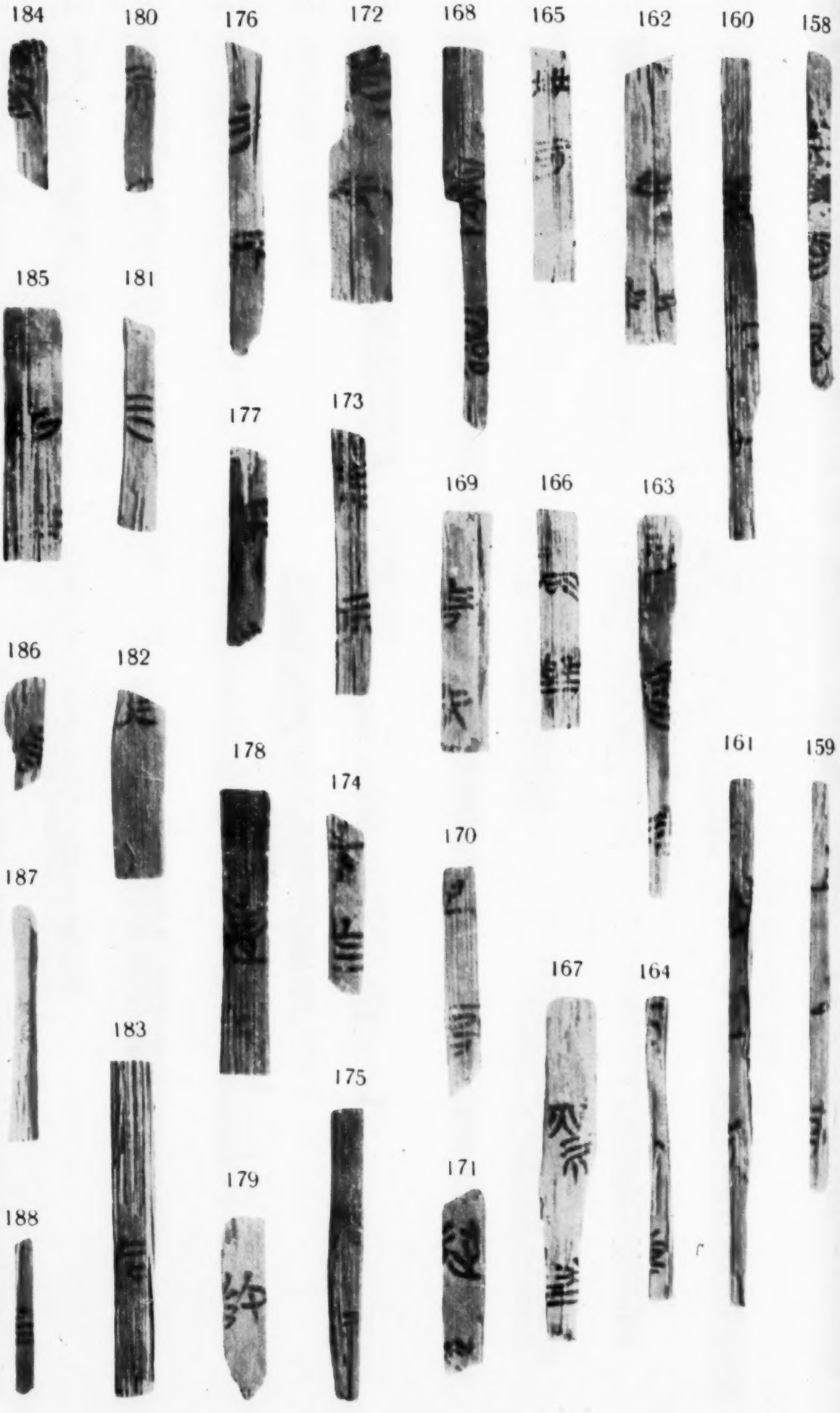


圖二〇　錦瑟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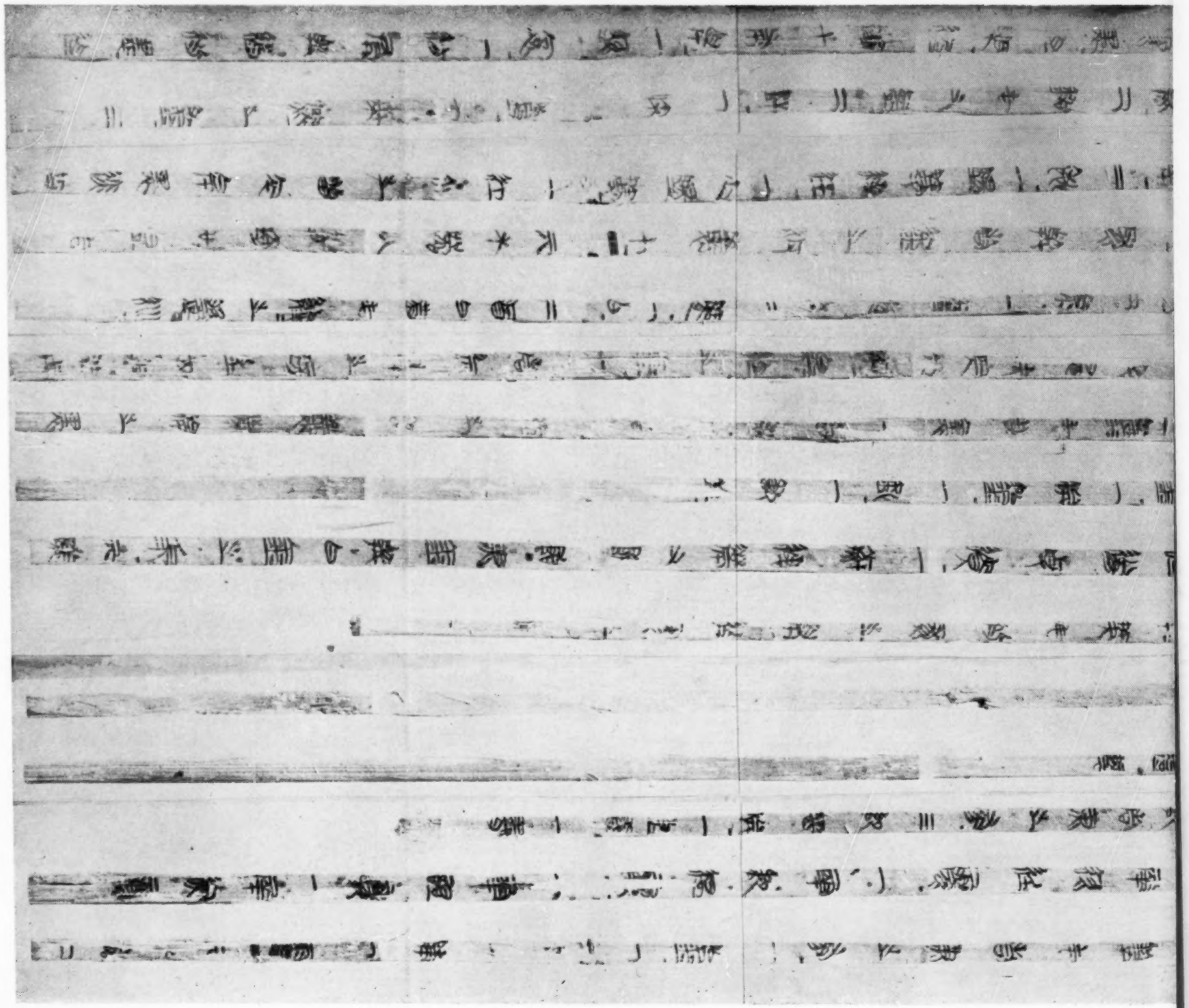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29
128
127
125
123
122
121
120
119
118
116
114
126
124
130
117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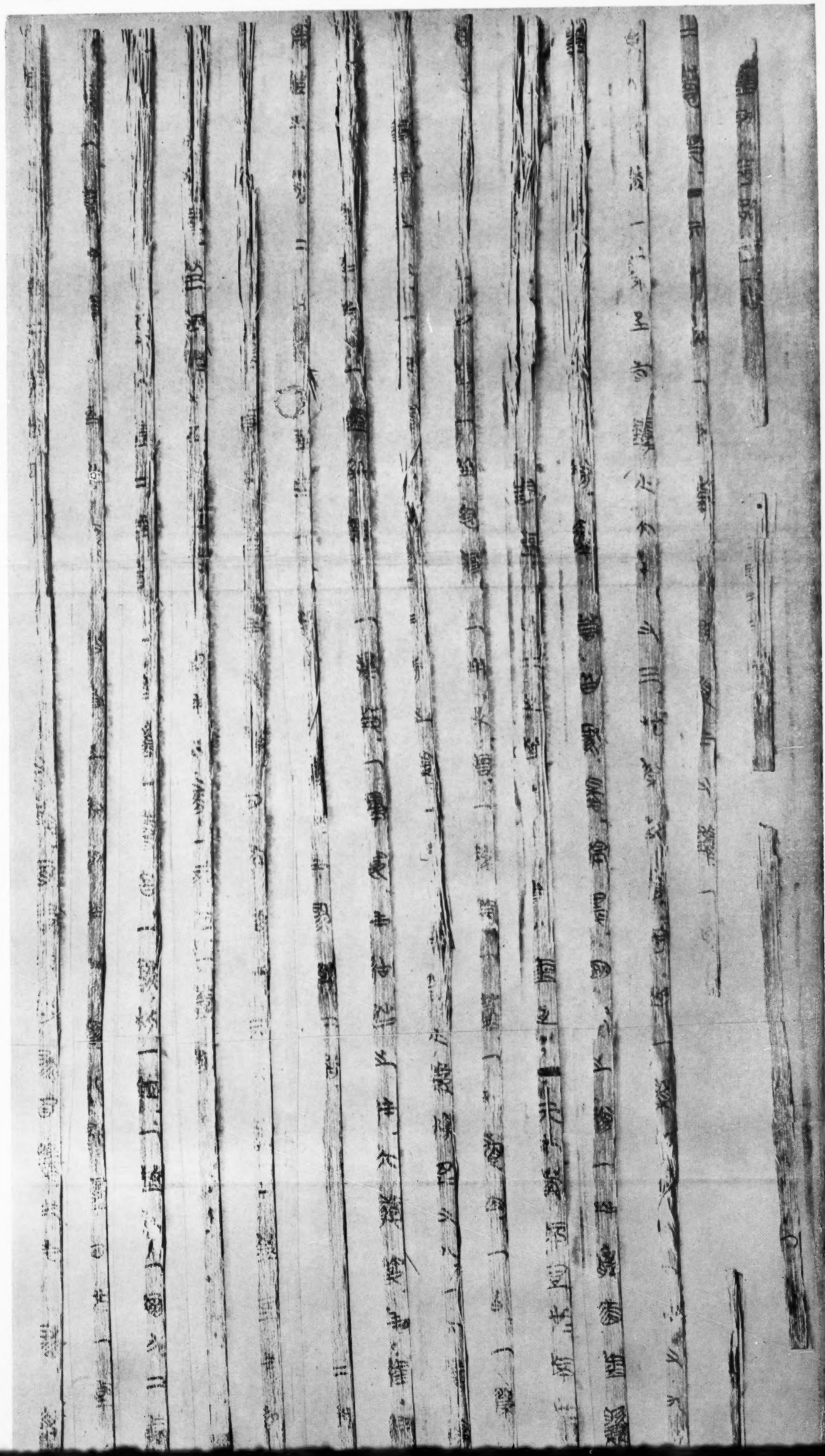

155
152
149
146
144
142
140
138
136
134
131
156
153
150
147
145
141
139
137
135
132
143
151
148
154
157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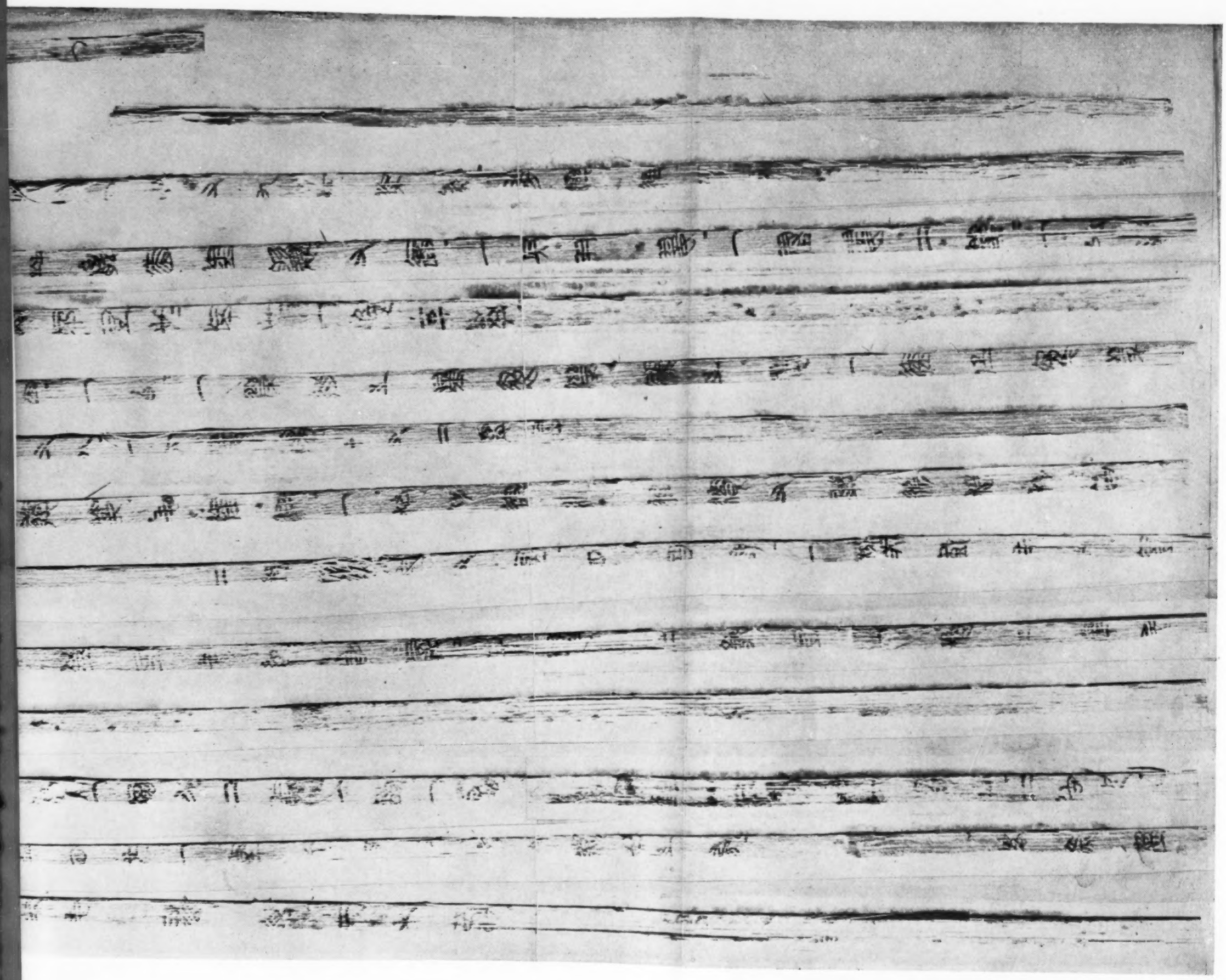

184
180
176
172
168
165
162
160
158
185
181
177
173
169
166
163
186
182
178
174
170
161
159
187
183
179
175
171
167
164
188

215 214 213 212 211 210 209 208 207 206 205 204 203 202 201



229 228 227 226 225 224 223 222 221 220 219 218 217 216





碑刻資料介紹

从两塊碑刻看历史上佃农的命运

吳 雨 著

一九五六年十月，我到昆山县調查文物，在一次县政协召集的各界座談会上，医师周适反映該县陈墓鎮淀西乡尚明甸一座石桥洞里有一塊記載农民和地主斗爭的石碑。我根据这个綫索，同县文化科戴兴發同志和陈墓鎮文化站卢玉霞同志到尚明甸进行調查，在一座叫"聚福桥"的南堍墻壁上，發現了一塊清代"道光十四年八月，署江南苏州府昆山县正堂加十級記录十次孙为　奉宪永禁頑佃积弊碑"，这是过去从来沒有發現的忠实記录农民斗爭的碑刻。为了保护这件历史文物，就运回江苏省博物館保存，并曾展出，受到观众們的注意。这塊碑据拓碑的工人說：石面字迹很新，可能过去还从沒拓过。

一九五一年無錫举行"土地改革展覽会"时，也陈列过一張"道光十四年八月調署江南苏州府新陽县正堂加十級記录十次沈为　严禁頑佃結党抗租的石刻告示"，我当时不知道这塊碑的原物所在，后来查見"巴溪志"杂記項下記載这塊碑立在巴溪（又名巴城）鎮崇宁寺前，巴溪志并照录了原文，內容和聚福桥發現的一塊碑完全相同，同样是加十級記录十次的县官，一个姓"孙"，一个姓"沈"，只是新陽县和昆山县的不同。其次新陽县联名呈請勒石永禁的举职生监民人姓名，除了为首的陈竺生相同外，其余是：杜讌、陆宏声、曹永發、龍誦清、陆湘霖、何树德、孙凝远等。巴溪鎮崇宁寺前这塊石碑是否尚存，現在还不得而知。按"新陽县"在清代原是旧昆山县境划分出来的，巴溪鎮現已改屬昆山县。关于这类封建地主和統治政权互相勾結、压迫农民抗租斗爭的告示碑石，在当时原是極普遍的，各地的地主都曾有勒石威吓农民的事件，因为过去不被人注意，保存下来的实物很少，可能連拓片都不存在。

因此，使我想起了另一塊石碑，是一九五三年在淮安發現，內容是"道光七年五月江苏淮安府山陽县正堂加十級記录十次譚为　严禁恶佃架命抗租"，也是地主依靠官府压迫农民抗租斗爭的石碑，由前揚州博物館保存，現在也收藏在江苏省博物館，北京历史博物館近代史陈列室陈列了它的拓片。这碑訂立惩办农民抗租斗爭的規条五款，更具体地說明封建地主和統治政权相互勾結殘酷剝削农民的事实。原碑石面积比昆山县"永禁頑佃积弊碑"要大得多。由于以上两塊碑的發現，使我們进一步認識到：除了过去那些汉、魏、六朝古碑和九成宫、兰亭序石刻以及墓志、造象之类以外，为了今后很好地發掘我国劳动人民斗爭的光荣历史，应該更加重視和注意散在各地的这类石碑。只有反映人民生产和斗爭的碑刻，才是人民眞实历史的記录。这类碑刻应該还留存有不少，过去可能只是被大家忽略了，今后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

附：1　"奉宪永禁頑佃积弊碑"抄文

署江南苏州府昆山县正堂加十級紀录十次孙为：

严禁頑佃結党抗租、佃屬藉命詐扰，以除积習，而儆刁徒事，案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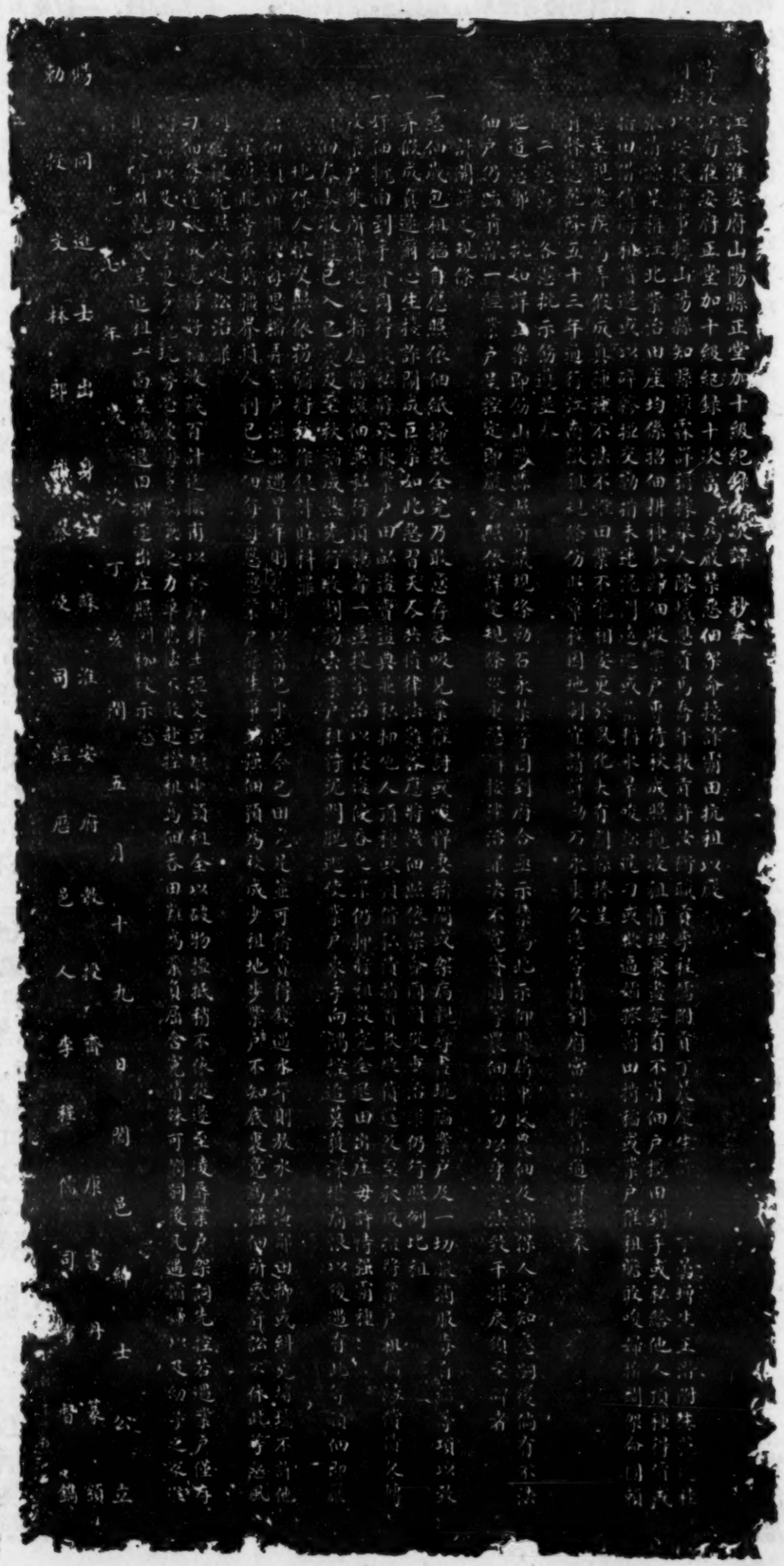
前署按察司李　札發示开：照得粮从租出，租自佃交，正宜業佃相依，自可永無嫌隙；况江南粮賦之重，人所共知，若以刁抗而开串詐之風，更屬不成事体。本署司虽視事未久，而于农家之利病，人情之詐伪，皆已日有訪聞。既尝手輯一書，劝栽旱稻，又出示查禁乡間之茶館、賭場、花鼓戏，以除害农之源。乃日見城厢內外之以抗租枷示者，相望于途，未尝不惻然在念。及至細查原案，訪察緣

由，始知頑佃积慣吞租，几成痼習。誘其蕩耗者，有秤谷当谷，逞其兇横者，或殴業殴差，甘受拘押者，恃索飯錢，曾退田者、仍然霸种，伎俩百出，刁益生刁。而最为可恶者，每于到案后担病釋放，輒賂臥業家撒頼，偶有物故及病危之人，即更藉此生波。架以人命重情，通信值日县差及总保等，多方恐吓詐索，不遂所欲，混控到官，追至驗明無事，而無辜之累已極。又或一面糾众尋殴業主，搶毀房物，百端吵扰，中人之产，頓至蕩然，縱使控官究追，已屬無及。是以刁頑佃屬之效尤者，往往永不还租。本署司嫉惡如仇，聞之殊为憤懣。案查苏屬抗租旧案，乾隆年間曾經紳民陆夢弼等呈請詳办，嘉庆年間，先經

前署宪費　出示严禁，又經　前臬司百示禁、頑佃病故誣陷勒詐之弊。道光八年，江震两县曾以佃棍金大年等霸吞、刁抗、殴毀、搶詐等情，明定整頓章程会詳；并奉

陞任撫宪陶　札飭拏訪著名佃棍，据实严办等因各在案。似此屢經懲創，民間豈無見聞。本署司到任以来，檢查

近年案牘，如元和县佃民陈贵廷、欠租交保病故，尸亲陈万等吵毁詐財一案；又無錫县佃民盛万全父子明退暗霸，揑告人民一案，均經办以流徒。近日又有仪征县佃民朱起樞等，藉命打搶業主陈元泰家房物一案，即照棍徒生事扰害例，發極边充軍。又华亭县佃民王桂金，将伊病父扛抛詐賴，藉命毁殿一案，亦奉　两院宪批飭勒拿究办。可見此風总未尽革，以致因此犯法者日見其多。与其事后严惩，莫若事前告誡。查例載：刁徒借命打搶者，照白昼搶夺例拟罪，仍追搶毁財物給还原主；又毁損人房屋計合用修造雇工錢坐贓，各令修立；又圖賴詐財及弃毁器物，俱准窃盜論；又兇恶棍徒，出事行凶扰害，發極边足四千里充軍？各等語。本署司思欲挽回积習，不忍不教而誅；除札飭苏州府通飭各县抄示曉諭立石永禁外，合亟申明例案，严行禁約。为此示仰各都圖农佃及佃屬保总人等知悉：尔等当知佃田納租，理所应办；抗欠受比，法所难寬。务当自發天良，各安本分，果能早完租籽，業主更复何言？豈宜玩抗拖延，致干比追枷責。如有押比后患病及保辭后病故，該佃屬不得平空纍蚌，糾众兇扰，毁搶棚詐。自示之后，仍有前項情事，該地方官明查暗訪，立行严拿訊究，按其案情輕重，分別治罪，以遏刁風。書差、地总、地保、庄書从中串詐分肥，誘人犯法，仍各从重加等惩办，俾知炯戒，并严究教唆扰詐之頑棍，亦即治以应得之罪。惩一儆百，庶



可刑期無刑。該佃等务将此示互相告述，触目惊心，切勿复轍相寻，自罹法网，凛之慎之，各宜凛遵等因。遵經抄录曉諭并本县节經示禁各在案。茲据举职生监民人陈竺生、徐玥、吳玉書、王佩衡、湯德、庄国泰、許鶴廷、庄家基、馮大維、鍾濬、鍾瀾、梅俊、陶德溥、陆崟、夏洪元等联名呈請勒石严禁前来，除移会　新邑一体遵办外，合行立石永禁。为此碑仰地保并农佃人等知悉：尔等遵照

宪示，务須各安本分，将租早为还業，如有前項不法之徒，仍敢結党抗租，以及藉命扰詐情事，許該業戶指名稟县，以憑严拏照例究办。地保敢于徇庇串詐，一經察出或被告發，定提加等治罪，决不寬貸。各宜凛遵毋違，須至碑者。

道光拾肆年捌月　　日

陈景陶刻

2 "淮安府山陽县严禁恶佃架命抗租"碑抄文

江苏淮安府山陽县正堂加十級紀录十次譚抄奉

特授江南淮安府正堂加十級紀录十次富　　为严禁恶佃架命攪詐霸田抗租，以严国法，以安民業事。据山陽县知县譚霖詳称：据举人陈爓、恩貢馬乔年、拔貢許汝衡、职貢李程儒、附貢丁晨、廩生許联甲丁壘、增生王潜、附生范廷桂張清源呈称：江北業治田产，均系招佃耕种，麦归佃收，業戶专待秋成照攬收租，情理兼尽；每有不肖佃戶攬田到手，或私給他人頂种得价，或指田借債将租偿还，或以碎糝掯交勒措未遂泥門远逃，或借称水旱唆訟逞刁，或欺逼孀孤霸田揹稻，或業戶催租胆敢唆妇拚鬧架命圖賴，甚至亲老疾篤，弄假成眞，种种不法，不惟田業不能相安，更于風化大有关系。捧呈

前督宪乾隆五十三年通行江南征租規条，仿照章程，因地制宜，請詳勒石，永垂久远等情到府；当經据情通詳，茲奉

督撫二宪暨　各宪批示飭道　并奉

巡道宪鄒　批如詳立案，即飭山陽县　照所議規条勒石永禁，等因到府，合亟示禁。为此示仰县屬軍民农佃及乡保人等知悉：嗣后倘有不法佃戶，仍蹈前轍，一經業戶呈控，定即严拿，照依詳定規条，从重惩办，按律治罪，决不寬貸。尔等农佃，慎勿以身試法，致干罪戾！須至碑者。

計开詳定規条：

一、恶佃岁包租稻，自应照依佃紙扫数全完，乃敢意存吞吸，見業催討，或唆悍妻拚鬧，或架病亲寻尽坑陷業戶，及一切服卤服毒自縊等項，以致弄假成眞、遂尔心生抬詐，鬧成巨案，如此恶習，天人共憤，律法难容，应将該佃照依架命圖賴，从重治罪，仍行照例比租。

一、奸佃攬田到手，貪圖得錢，私将承种業戶田亩盜卖盜典，并私押他人頂种，或預借私債指实秋收偿还，及至秋成，擅将業戶租稻归偿債欠，轉致業戶失所，实堪髮指！应将該佃并私行頂种者，一并提案，治以侵盜侵吞之罪，仍押将租数完全退田出庄，毋許恃强霸种。

一、頑佃春麦收获，已入己囊，及至秋稻成熟，先行收割，拐去業戶租籽，泥門脫逃，使業戶束手向隅，控追莫获，深堪痛恨，以后遇有此等頑佃，即严飭乡地保人根交，照依拐騙将稻作銀計贓科罪。

一、强佃領田耕种，每思播弄業戶滋訟，遇旱年則筑壩以蓄己水，既令己田充足，并可偷卖得錢，遇水年則放水以淹邻田，抑或糾兇堵壩，不許他人宣泄，此等不循疆界損人利己之佃，每每慫恿業戶滋生事端，强佃預为秋成少租地步，業戶不知底里，竟为强佃所惑，訐訟不休，此等恶風，例应根究，照依唆訟治罪。

一、刁佃每逢秋成，先将好稻收藏，百計延挨，甫以糝癟拌土掯交，或短少額租，全以破物掯抵，稍不依从，遂至凌辱業戶架詞先控，若遇業戶仅存孀妇以及幼子，更多藐玩，势必受侮多端，兼之力单胆怯不敢赴控，租为佃吞，田难为業，負屈含冤，情殊可憫。嗣后凡遇孀妇以及幼子之家，准其敦請周亲代呈追租，一面差协退田，押逐出庄，照例枷杖示惩。

道光七年岁次丁亥閏五月十九日闔邑紳士公立

賜同进士出身江苏淮安府教授齐康書丹篆額

勅授文林郎按察使司經历邑人李程儒習事督鐫

訪"永禁頑佃积弊碑"小記

金　　誠

江苏省博物館到昆山县陈墓鎮来搜集有关文物資料，發現尚明甸乡有塊清朝的石碑，是記載鎮压江南各地农民抗租的情况。我知道这消息后，抽了星期天的时間，去寻訪了那塊石碑。此碑立于尚明甸乡聚福桥畔，碑高1.4米，闊0.7米，碑名"永禁頑佃积弊碑"，为道光十四年八月鐫刻。碑石文字，除在石碑中間約有四、五字已有損迹，無法辨識外，基本上都能看得清楚。

"永禁頑佃积弊碑"是当时官府所立，目的是企圖用法令来禁止农民結党抗租，以挽回农民經常的自發的反抗趋势。同时我們还可以看出当时农民抗租的地区遍及昆山、江（吳江）、震（震澤）、元和（吳县）、無錫、仪征、华亭（松江）等县。从而說明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前，全国各地阶級矛盾尖銳化的普遍性，和当时江南地区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其尖銳程度有一触即發之势。

此碑是道光十四年（1834）刻立，时在鴉片战爭前夕。我們曉得嘉庆时期民变已到处發生，清朝政权早已接近崩潰的局面。至道光时代的政局已至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整个統治阶級不仅全部腐化，而且几乎大部毒化（吸鴉片），因此爆發了破坏中国数千年旧社会的鴉片战爭，又因此爆發了咸丰元年（1851）的太平天国革命，所以道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轉变时代①。

碑文中提到"頑佃習慣，吞租几成□習"，"其凶横者或毆業（地主）毆差（公差），甘受拘押者"，"糾众寻毆業主（地主），搶毀房物，百端吵扰。"当时江南各地农民为什么"甘受拘押"、"百端吵扰"呢?!就以江南农民負担来看，道光、咸丰統治期間，有监察御史王家相，据他那时亲眼看到的农民生活情况来說，魚米之乡的江南苏、松地区农民完粮以后，所剩只有数斗，仅够供几个月的食用。而当时的物价呢？以米为例，江南（苏、松、常、鎮四府）米价，康熙时代通常每升七文，康熙四十六年大旱，每升漲至二十四文，雍正及乾隆初年，每升十多文，乾隆二十年虫灾，每升漲至三十五六文，穷民餓死無数，后来米价落至十四五文，五十年代以后至嘉道时代常价在二十七八文至三十四五文之間②。米价的上漲加上苛重的田賦与丁稅，农民完納地丁銀一两，历年遞增須卖米一石，再加漕米折銀，每亩又需米数斗。平常年景，一亩产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完納地丁漕米，已經剩余無几，暫时拖欠就遭血肉狼籍的慘刑，破产更不可免③。因此当时江南許多地方农民的生活是："壯丁及岁，不能婚娶；产生女嬰，率多溺毙。很多村庄一村之中向有百人業耕者，今只五六十人。"④因此道光以后，清代史料中关于农民暴动事件的記載便一天天的多起来，而尤以反抗重賦的暴动——抗粮的暴动为最多⑤。

而当时統治阶級对农民进行鎮压的手段是怎样的呢？从碑文中可找出这样一个規律：对抗租的佃戶捉官法办，并加以酷刑，正如范文瀾同志所說的"暫时拖欠就遭血肉狼籍的慘刑"⑥。因此，很多佃戶在獄中因身受严重摧殘而得重病，出獄不久即死去了！故而引起了佃屬的極度仇恨。其碑文中提到很多事实如："病危之人即更借此生波架以人命"、"頑佃病故，誣陷勒詐"、"元和县佃民陈茂廷欠租交保病故，尸亲陈万等吵毀詐財一案"、"仪征县佃民朱起橚等借命打搶業主陈元泰家房物一案"。其中被迫忍無可忍而进行反抗的不单是男子，而且还有妇女，如"华亭县佃民王桂金将伊病父杠抱詐賴借命毀一案"。由此可見統治阶級迫害农民之深。

农民由于身受繁重的剝削与殘酷的迫害，故抗租与暴动之風在江南各县蜂起，所以当时江南各地"此風总未尽革，以致因此犯法者日見其多"。当时統治阶級用了最殘酷的法律"發極边四千里充軍"来鎮压各地的农民抗租运动。在滿清法律中对佃戶抗租的鎮压向来是十分殘酷的，如"用强占种屯田五十亩以上不納籽粒者照数追納完日照强占官民山場律流三千里"。但当时仅仅"'圖积詐財及弃毀器物'俱准'窃盜'論"、"凶恶棍徒生事行凶扰害者"就按"發極边四千里充軍"定罪。可見当时統治阶級鎮压农民暴动的殘酷性。

同时統治者又企圖以伪善的面目来告劝佃戶"与其事后严惩，莫若事前告誡"、"务当自發天良，各安本分"、"本署思欲挽回积習，不忍不教而誅"。他們劝告的目的是要佃戶："能早完租籽，業主更复何言"。但他們也知道这种伪善的告劝其效果并不会好，因此最后仍用威胁、恐吓的手段，"务将此示互相告述，触目惊心，切勿复輒相寻，自罹法网，凛之！慎之！"

在另一方面，从碑文中还可以看出当时有少数的公差与地保是同情农民遭遇的。碑文云"書差地总，地保庄書，从中串詐分肥，誘人犯法，仍各从重加等惩办"、"地保敢于狗庇串詐，一經察出或被告發，定提加等治罪，决不寬貸"！由此可見，江南各地农民的"抗租"、"借命詐扰"、"平空肇衅、糾众凶扰"，是正义的，是被迫的，而且当时是得到一小部份公差与地保的同情与支持。

总的說来，这塊碑文很清楚地告訴了我們，当时江南地区农民抗租运动的范圍、暴动的原因以及当时农民所受到的遭遇，它提供了研究太平天国革命以前江南各地农民暴动的重要資料，同时也說明了滿清統治阶級是用什么毒辣的手段来鎮压农民抗

① 范文瀾：中国通史簡編657頁。
② 同上694頁。
③ 范文瀾：中国近代史84頁。
④ 王家相奏章載"皇朝道咸同光奏議"。
⑤ 历史教学：1953、9、刘孟况——清朝田賦問題的一些参考資料。
⑥ 同③。
⑦ 大清現行刑律（卷六）田宅条。

租运动的。

最后，我感到"永禁頑佃积弊碑"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資料，特别是提供了有关研究太平天国以前，鴉片战爭前夕，江南各地农民抗租运动的官方报道。因此我建議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員会应将此碑文作出拓本，以供研究参考。同时还应当設法教育当地群众，来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我去訪問时知道，过去有几塊青石碑被当地群众击碎后卖到窑上去燒石灰了！而有些地方在土改时把一些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的石碑全部毀掉（当时認为这些碑文的內容是反动的），因此文物保护工作对农村来說更有其重大意义。

几塊有关鎮压踹坊、染紙坊手工工人的碑刻資料

燕　石

江苏省博物館筹备处在去年十二月下旬对苏州市区內有关手工業历史的碑刻，进行普查，已發現清代碑刻八十多塊。特别在閶門外广济桥堍上津桥居民委員会房屋內外（为接官厅原址），發現清康熙、乾隆年間有关鎮压踹坊、染紙坊手工工人斗爭的碑刻多塊，引起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們很大兴趣。因碑文剝落甚多，茲把主要內容摘載如下：

最早的一塊碑为康熙九年"奉督撫各大宪核定踹匠工价給銀永遵碑記"，在这一碑中有：

"……所用踹布之人，俱从江宁屬县远来……（每匹工价）一分一厘。今岁一月間突有寶桂甫倡言年荒米貴，傳单約会众匠，停踹索添工銀……因王明浩不肯附会，輒罰令唱戏酬神，以致余人皆停工观望，凶横如此。……至于徐胜之与店主程美小□（事）相爭，亦挾寶桂甫之势，勒美唱戏講和，乘机恣肆。……工人等应听作头稽查，作头应听商家約束，……一分一厘，两不相尅。店家無容短少，工匠不許多撈……"。

在康熙三十二年碑中有：

"……罗貴、張尔惠等冒名踹匠，聚众齐行威胁罢市，科敛□詐……故擇有身家之人，踹坊領布轉發，則踹匠之来历，貨物之失錯，悉与布商無与，責有攸归。……又緣踹匠孑身赤汉，一無携带，保头租賃房屋，备置（踹石、家伙、踹匠月貼包头）銀三錢六分，是亦有本……罗貴、張尔惠等俱枷示一个月，滿日重責三十板，遞發原籍……罗……等不遵發落，俱各潛逃，……工价永遵成例，……至于踹匠如有拐窃盜逃，为非作歹，責成保头，与字号染坊店主無涉……"。

康熙四十年"遵奉督撫各宪定例永禁碑記"中有：

"……苏郡出产布貨所用踹匠盈万成千……不意去年四月流棍之禍复起，流棍之令一出，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結队，抄打竟無虛日，以致包头畏避，各坊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比起昔年尤甚。……盖匠之数万人，奸良万一，……每匠应出錢五文十文不等，……积少成多，已盈千万，財誠易敛，众更可□……割肉餧虎，苦不自知，此所以蚌日益生，禍日益重也。……嗣后如有容隐流棍在家，事發者窩頓之家与犯人同罪，……請将包头編甲，責其互相稽察，擇一（老練能干者）盘盘来历，一家有事九家連坐，則彼此俱有責成。再設循环簿着令登填何处籍貫、何人保引、何日进坊、何日出坊，分例旧管、新收、开除三项，……盖踹匠夥而强，包头寡而弱，若尽責包头，……不許踹匠夜行，不許包头侵尅。所委文武弁員亦不得借巡需索，以啓小人口实。……向来流棍煽惑，多在西山庙、半塘寺、西园禪院、菩隄場、乡山庙……立循环……每逢朔望交与坊长具結倒換。

康熙五十四年碑中有：

"……又布商程同言等告王德等煽惑踹匠，加价敛銀，欲助普济院、育嬰堂，結党創立会館，……倡言欲作踹匠会館，思欲借众霸占，包攬告状，肆行科敛。……倘会館一成，則無藉之徒，結党群聚，害将叵測。……創立踹匠会館，謀害商民，不法已極。……創立踹匠会館，唱戏有据，敛銀有憑，何得竟置不究……"。

康熙五十九年碑，由布商、坊总、甲长同具名立，有：

"……議定工价一分一厘三毫，米价貴至一两五錢，每踹布千匹，加銀二錢四分。米价一两二錢則□商店給發工价，每两外加五厘，名曰捐助。……包头約有三百余戶，或有二作，或有三作，不能分身稽察。每作用管賬一人，崙責稽查，名曰坊长。凡有踹匠投坊佣趁，必須坊长識認来历，方許容留。然坊长之責，必

自包头，即将包头立于居民之外，每十二家編为一甲，每月輪值甲长，每岁周而复始，各給循环印簿，开明某月甲长某人，查填踹匠姓名。仍于众包头中擇一老誠練达者举充坊总，頒給□牌，管押各甲。踹匠五人連环互保，取結册报，一人犯事，四人同罪，日則做工，夜則关閉在坊。如有拐布盜逃、賭博、行奸、斗殴、聚众插盟、依工科斂、閑闖花鼓、糾众不法者，坊长报明包头，会同甲长填簿交坊总申明拿究，如有循隐，發覚，互結保人，本坊坊长，一体同罪。簿列管收，除在四柱开填，每月朔日甲长彙交坊总稽查，循环倒換。倘甲內擅留匪类，坊总协同甲长，立刻驅逐，仍将窩頓之坊长按以窩盜之例，連同徇庇一体治罪。查簿內無名，即系流棍，如此則来历彰明，奸良易辨。……一、枫汛把总各坊巡察……一、嗣后每坊坊长昼夜巡查，不許一匠出作……一、踹匠进作，必須四匠互保……一、把总調撥值坊巡役，分地巡察，昼夜無忽。一、不法踹匠不务本業，游蕩为匪，酗酒賭博，謀为不法，或經坊总、包头察出，情虚畏罪，或有投河、自刎、自縊，报官驗明，即着本匠保人亲屬領归乡里，不得妄累無干。……"。

关于染紙作坊材料，有乾隆二十一年"奉各宪严禁紙作坊工匠把持勒增工价永遵碑"，为长元吳三十四戶坊主立。內容有：

"……作坊尅扣，各匠停工，分別治罪。……把持行市以賤为貴，律杖八十；如糾众停工，請予照律問拟之外，加枷号两个月……小甲徇隐包庇，一并严行究处。"

后面規定二十三种工价，每日工作定額，超过定額另加伙食工銀数目。因碑文剝落很多，只举一例說明。如：

"一、每日刷砂綠七刀为一工，每工銀二分四厘，多刷七刀，另加伙食工銀五分；一、每日梅京放鳳边紅十刀为一工，工銀二分一厘，多梅十刀，另加伙食工銀五分"。

同时調查的公所有如下十几处：

七襄公所（紗緞業）	云錦公所(絲織業)
霞章公所（絲織工人）	錦文公所(顧綉業)
錦漳公所（漳絨業）	文絢公所(染坊業)
倘始公所（布業）	踹踴公所(踹工)
梓义公所（木工）	性善公所(漆業)
玉業公所	丽澤公所(金業)
安怀公所（銀楼業）	錢業公所
两宜公所（紙業）	等。

此外，滸墅关文昌閣有不少有关苏州織造碑刻，尚待調查。这个工作，現将由有关单位联合成立一个調查組去进行。

記蝦蟆岭下的一塊压迫修路工人碑

洪丕熙

今年初我在洞庭东山休养的时候，一天由前山經蝦蟆岭去后山訪寻眠佛古寺，走到岭下忽然下起雪珠来，沒带伞，只好在前面凉亭躲避。風雪一时不停，为了消磨时間，見亭壁上嵌有几塊石碑便細細閱讀，讀完后覚得它是研究清代工人运动史的絕妙文献，其价值堪与苏州最近發現的"机匠"、"踹匠"两碑鼎立。

从这篇碑文中我們知道当时当地鋪路石工的工資是"每工給錢一百四十文"，而这个工資数額工人是不乐意接受的；因此即使是"修路便民实屬义举"，亦"惟恐有人高抬工价遇事生波"，不得不环叩官府，"恩賜傳諭地保督匠兴修并賜給示曉諭"了。修路原本是一件好事，尤其在过去时代皇上家只管收粮，不管修路。現在有人肯掏腰包来办公益，按情理說，应該获得"輿情"的贊助，而工匠們亦当不致例外。可是却要官府来"曉諭"，地保来监督，豈非怪事！难道工匠們不贊成修路便民嗎？我想不会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地保来"督"来"压"呢？这原因还在"每工給錢一百四十文"上是显而易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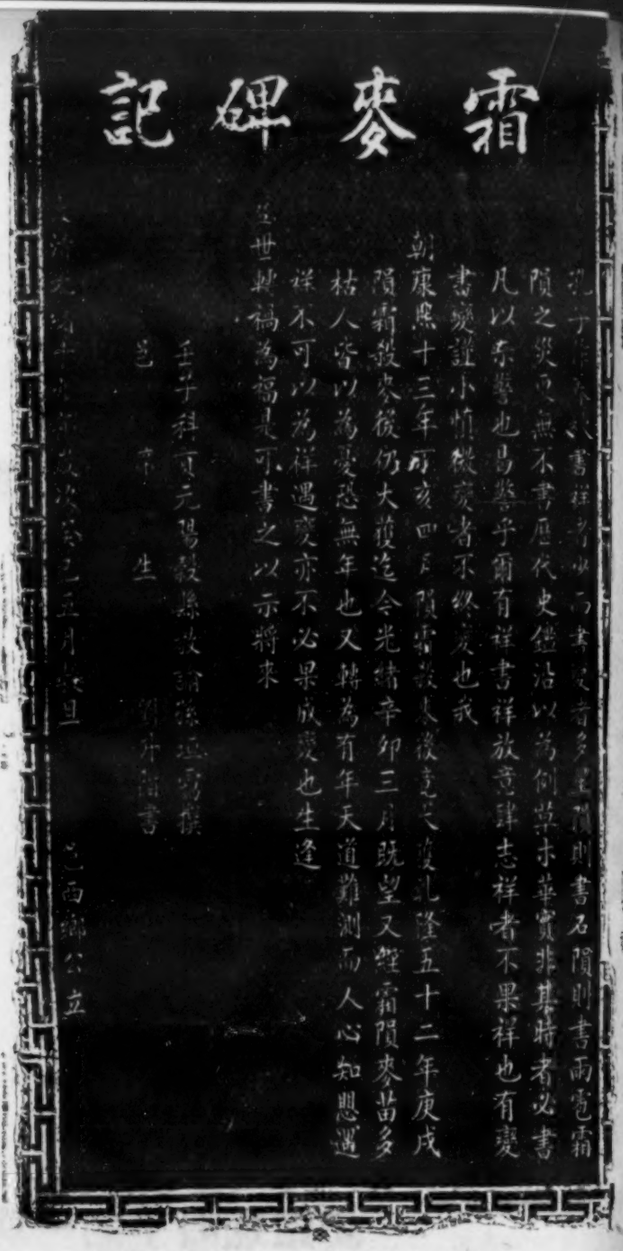
碑文又告訴我們，官府对工人的态度是称要求合理工資的工人为"高抬工价"的"不法匪徒"，而对付他們的手段是"傳諭地保彈压"。在碑文末了一段"該处地保早晚彈压，亦不得借端多事"，也道出了地保欺压工人的眞相。

如果把这篇碑文拿来与"机匠"、"踹匠"两碑相互印証来讀，我們可以認为有清一代康、雍、乾、嘉四朝的工人运动沒有停止过。它不仅發生在通都大邑工商繁盛的金閶，亦發生在偏僻山乡悬峙太湖中的山島；它更不仅仅發生在当时先进的机織業中，亦發生在落后的石匠路工中間。而前两碑是立在罢工已發生之后，后一碑是立在罢工未發生之前，更給我們一深刻的印象，使我們覚得乾、嘉时代的、(下接55頁)

山东省的两塊霜麦碑記

陈士宗

“文物参考資料”一九五六年第四期，譚彼岸同志所写的“在考古工作中应重視反映古代生产和生产关系的碑刻資料”一文，我看了深有同感。如果不重視这些东西的話，不独在考古工作上缺少一部分有用的資料，就是对整理祖国科学遺产也要失去很重要的資料。但这文提到的：“乾隆五五年(公元1790年)山东嘉祥县濉县有小麦春冬碑，叙述小麦冻死，春天發青复活事。”覚得这几句的叙述与碑文頗有出入，茲把我在山东搜集到的两篇碑文抄录出来，以供大家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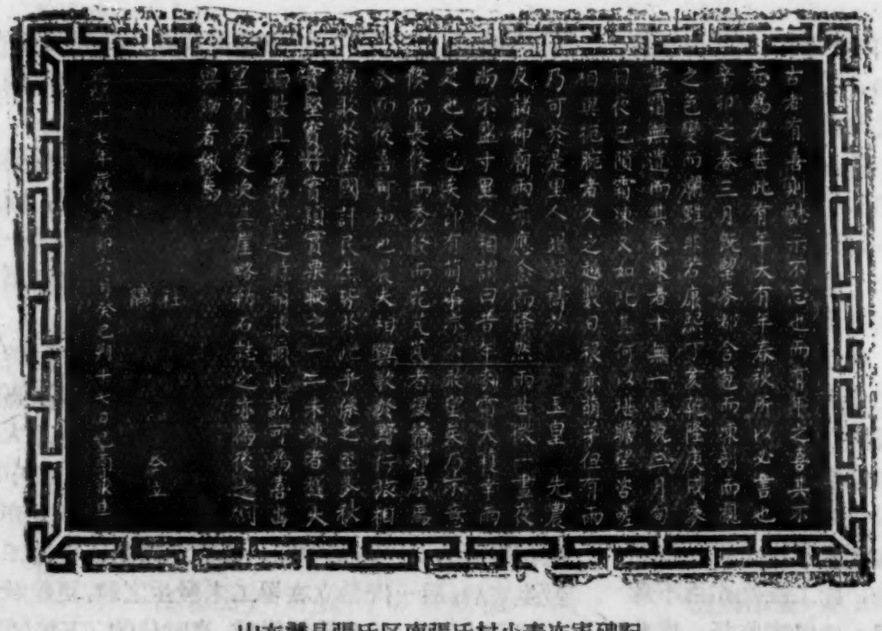

霜麥碑記

山东昌乐县十一区东台官莊霜麦碑記

（一）濉县南張市村小麦冻害碑抄文

古者有喜則志，示不忘也，而有年之喜其不忘为尤甚，此有年大有年春秋所以必書也。辛卯之春，三月既望，麦都含苞而冻，剖而視之，色变而烂，虽非若康熙丁亥、乾隆庚戌麦尽霜無遺，而其未冻者十無一焉。况三月旬日夜已隕霜，冻又如此，其何以堪。瞻望咨嗟！相与扼腕者久之。越数日，根亦萌芽，但有雨乃可。於是里人竭誠禱于玉皇　先农諸神庙，雨亦应念而降，然雨甚微，一昼夜尚不盈寸。里人相謂曰：“昔年麦霜大获，幸雨足也，今已矣！即有萌芽亦不敢望矣！”乃不意倏而长，倏而秀，倏而花，芃芃者复遍郊原焉，今而后喜可知也。农夫相与歌于野，行旅相与歌于途，国計民生皆于此乎系之。至麦秋实坚、实好、实頴、实粟，較之一二未冻者，硕大而数且多，第熟之时稍后尔，此誠可謂喜出望外者。爰次其崖略，勒石志之，以为后之割与鋤者儆焉！

光緒十七年岁次辛卯六月癸巳朔十七日己酉谷旦。


山东濉县張氏区南張氏村小麦冻害碑記

（二）山东昌乐县东台官庄霜麦碑記抄文

孔子作春秋，書祥者少，而書变者多，星隕則書，石隕則書。雨雹霜隕之灾更無不書，历代史鑒沿以为例，草木华实非其时者必書，凡以示警也。曷警乎尔？有祥書祥，放意肆志，祥者不果祥也。有变書变，謹小慎微，变者不

終变也。我朝康熙十三年丁亥四月隕霜杀麦，后竟大获。乾隆五十二年庚戌隕霜杀麦，后仍大获。迄今光緒辛卯三月既望又經霜隕，麦苗多枯，人皆以为憂，恐無年也，又轉为有年。天道难測而人心知愿，遇祥不可以为祥，遇变亦不必果成变也。生逢盛世，轉禍为福，是可書之以示将来。

大清光緒十九年岁次癸巳五月谷旦　邑西乡公立

（在山东寿光县和其他地方也有关于霜麦碑刻，內容大致相同。——編者）

介紹两塊有关中外交通史的碑刻

林　剑

一　长乐天妃宮石碑

碑在福建省长乐县城关天妃宮內，高161.5厘米（包括座在內），寬67厘米，厚16厘米，正面碑文，两側及碑陰無題刻，額篆字"天妃灵济之記"。文系楷書，共三十行，行多者六十八字，碑額两旁陰刻海水波浪紋，正中涌出一月，碑的边框刻着如蔓枝番蓮的花紋。全文还清晰，但有九个字磨灭。文录于下：

天妃之神灵应記

（第一行）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軼汉唐。际天極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計。若海外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贄，重譯来朝。

（第二行）皇上嘉其忠誠，命和等統率官校旗軍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齎帑往賚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

（第三行）罗国，直喻南天竺、錫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魯謨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東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滄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濤接天，巨浪如山，視諸夷域，迥隔

（第四行）于烟霞縹緲之間。而我之云帆高張，昼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衢者，誠荷

（第五行）朝廷威福之致，尤賴

（第六行）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神之灵固嘗著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間，或遇風濤，即有神灯烛于帆檣，灵光一临，則变險为夷，虽在顚連，亦保無虞。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

（第七行）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賴者，皆神之賜也。神之感应，未易殫举。昔嘗奏請于

（第八行）朝紀宮，太常建宮于南京龙江之上，永傳祀典。欽蒙

（第九行）御制記文，以彰灵貺，褒美至矣。忒神之灵無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宮，余由舟师累駐于斯，伺風开洋，乃于永乐十年

（第十行）奏建，以为官軍祈报之所，既严且整。右有南山塔寺，历岁久深，荒凉頽圮，每就修葺，数載之間，殿堂禪室，弘胜旧規。今年春仍往諸番，蟻舟茲港，复修佛宇神宮，益加华美。而又

（第十一行）發心施財，鼎建

（第十二行）三清宝殿一所于宮之左，雕装聖像，粲然一新，鐘鼓供仪，靡不具备。僉謂如是庶足以尽恭事

（第十三行）天地神明之心，众願如斯，咸乐趋事。殿廡宏丽，不日成之，画栋連云，如翬如翼，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悅，誠胜境也，斯土斯民，豈不咸臻福利哉！人能竭忠以事君，則事

（第十四行）無不立；尽誠以事神，則禱無不应。和等上荷

（第十五行）聖君寵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統舟师之众，掌錢帛之多，夙夜拳拳，惟恐弗逮，敢不竭忠以国事，尽誠于神明乎！师旅之安宁，往迴之康济者，烏可不知所自乎？是用著神之

（第十六行）德于石，并記諸番往迴之岁月，以貽永久焉。

（第十七行）一、永乐三年統率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陰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迴。

（第十八行）一、永乐五年統領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王各以珍宝珍禽异兽貢献，至七年迴归。

（第十九行）一、永乐七年統領舟师往前各国，道經錫兰山国，其王亚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师，賴神显应知覺，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

（第二十行）恩宥，俾归本国。

（第二十一行）一、永乐十一年統領舟师往忽魯謨斯等国，其苏□□剌国，有伪王苏幹剌寇侵本国□□□□里阿比丁遣使赴

（第二十二行）闕陈訴，就率官兵剿捕，賴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滿剌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貢。

（第二十三行）一、永乐十五年統領舟师往西域，其忽魯謨斯国进獅子金錢豹大西馬，阿丹国进獻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馬哈兽，木骨都東国进花福祿□獅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駱

（第二十四行）駝并駝鷄，爪哇古里国进粟里羔兽。若乃藏山隱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偉宝，莫不爭先呈献。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齎捧金叶，

（第二十五行）表文朝貢。

（第二十六行）一、永乐十九年，統領舟师，

天妃宮石碑拓本

遣忽魯謨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貢，視前有加。

（第二十七行）一、宣德六年仍統舟师往諸番国，

（第二十八行）开讀賞賜，駐泊茲港，等候朔風开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祐之功，如是勒記于石。

（第二十九行）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

（第三十行）正使太监郑和　王景弘　副使太监李兴　朱良　周滿　洪保　楊眞　張达　吳忠　都指揮朱眞　王衡　等立　正一住持楊一初　稽首請立石。

此碑記述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簡况，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一項重要实物史料。"中国历史綱要"提及郑和每次出国从江苏太倉下海，这是不确实的。从此碑記載看，郑和下西洋之前多停泊长乐南山，伺風出洋。此地面临台灣海峽，附近山峰环抱，是一良好的避風塢。

泉州东門外灵山回教墓旁有一碑刻，高1.05米，寬0.42米，厚0.09米，正面書"欽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魯謨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聖庇佑，鎮撫蒲和日記立"。說明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是路过泉州，从泉州港出洋的。聖墓望灵，說明郑和确是回教信徒。史書所載郑和系賜姓，其先是云南馬氏，此处亦可得到証明該說之确实。

二　莆田祥应庙記

碑原在莆田城北西天尾祥应庙，不知什么时候庙廢，該碑被当地人抬至莆田城內玄妙观近旁，嵌在壁上，全文如下：

（第一行）有宋兴化軍祥应庙記

（第二行）左朝清大夫主管台州崇道　观方撰

（第三行）左朝散大夫行尚書駕部員郎方昭書并題額

（第四行）郡北十里有神祠，故号大官庙。大观元年　徽宗皇帝有事于南郊，裒百神而肆祀之，于是詔天下名山大川及諸神之有功于民而未在祀典者，許以事聞，部使

（第五行）者始列神之功状于朝，从民請也。次年賜庙号曰祥应。其后九年，观祀明堂复修百神之祀，而吾乡之人又相与状神之功迹，乞爵命于朝之太常，上其

（第六行）議曰显应侯。天子曰，嘻！惟神威灵，惠我一方，宜有以寵异之。廼宸笔刊定显惠侯时，則宣和之四年也。謹按侯当五季时已有祠宇，血食于吾民。古者

（第七行）相傳云旧祠在澤路之北，一夕風雨晦冥，雷电交作，若起于祠中者，数杯香爐，忽失所在，聖且父老迹其所止之地，而得于龟潮山古榕木之下，因就而館之，即今□

（第八行）庙止是也。其地前直壺公，后拥陳巖，寿溪之水，經絡其間，蓋山川之秀，虽地理者莫之能得。当时識者咸曰：神依人而行，今神据有溪山之胜，此方之人其有□

（第九行）乎？今大姓甲族多在乎神祠之左右，而踐殊科，列膺仕者时不乏人。皆知識者之說曰：大官庙者，相傳云乡人仕有至于大官者，退而归老于其乡，师其子弟与

（第十行）之耆旧。若少而有才德者，每岁于社之日相与祈谷于神，既而徹籩豆，陈醆舉，揖逊而开堂，序长幼而敦孝弟，如古所謂乡飲酒者，乡人乐而慕之，遂以名其庙。□

（第十一行）識神之錫福于吾人者如此。夫七閩諸郡，莆田最为瀕海，地多咸卤，而可耕之地又皆高仰，無川瀆沟洫之利，旬日不雨則民有粒食之憂。每岁以旱而禱于神

（第十二行）者，未尝不应期而雨，故田虽高而無旱。春夏之交，云霧蒸郁，盲風怪雨，發作不常，寒暄之气，为厉为瘧，民或苦之。岁于是时，民多祈福于神，或相与迎神出次，以

（第十三行）浮屠老子之法而祝祀之，故民用無灾。政咊七年，諸郡多蝗，既食竹木之叶，牛羊之毛且尽，民惧而禱之，故环庙数十里蝗不敢入。宣和二年，睦之妖賊劫庫，

（第十四行）兵杀长吏，聚徒十万，殘害江浙数州之民而盜有其地，朝廷提禁旅百万以夷之，而賊徒始相与聚謀，欲掠舟于定海，据七閩为巢穴。部使者飞檄以告，且

（第十五行）使民虛其室以避之，謂風帆信宿可至，居民惶怖，扶老攜幼奔竄于山谷，攀援揉踐至有踣者，群不逞之徒又相与睥睨之，于是有丧其家資，失其子女，憂愁惊悸，自

（第十六行）殞其身者。而吾民先禱于神，神賜之吉，卜曰其毋害，遂安其居，無一人迁徙者，既而賊果就擒。今天子嗣位之三年，建州狂卒叶儂聚其众数千人，杀官吏以

（第十七行）叛，夺溪船順流而下，一夕至南台，入福州外郛，焚居民廬舍，其势甚熾，遂謀渡大义而南。諸州守捉之兵未集，郡邑震駭，莫知为計，而賊徒忽一夕相惊曰：官軍陳矣！

（第十八行）其旗帜皆有显惠侯字何也，人人

恐怖，始有悔禍之意。漕使張公穆乘賊憂疑，始得以断桥沉舟，絕其南渡之謀。又其后一年，楊勍領西兵叛入于閩，由漳泉而来，

（第十九行）所在焚剽，民罹其害，賊压我郡境，守險之卒，視众寡不敌，莫有斗志。軍士方廸等忽聞空中有声曰：汝速进，显惠侯兵来矣！于是我师賈勇，賊望風畏遁，闔境晏

（第二十行）然。往时游商海賈，冒風濤，历險阻，以牟利于他郡外番者，未尝至祠下，往往不幸有复舟于風波、遇盜于蒲葦者。其后郡民周尾，商于两浙，告神以行，舟次鬼子

（第二十一行）門，風濤作恶，頃刻万变，舟人失色，涕泣相視。尾曰：吾仗神之灵，不应有此，遂号呼以求助，虚空之中，若有应声，俄頃風恬浪息，舟卒無虞。又泉州綱首朱紡，舟往三

（第二十二行）佛齐国，亦請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無有艰阻，往返曾不朞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賈于外番者，未尝有是，咸皆归德于神，自是商人远行，莫不来禱。窃聞

（第二十三行）古者聖明，在御百神效职，無有怨恫。若兴云雨，御灾殃，呵斥妖厉，扫除不祥，降福于善人而罰其無良，皆神之职也。今侯血食此土，显其威灵以取爵命于前，又能

（第二十四行）效职协忠順以报恩寵于后。我天子建中兴之業，治人事神，皆有次第，将見褒德賞功，而侯之爵号有加而未已也！然則恢崇庙宇，以严奉祀之誠，上以彰

（第二十五行）君之寵命，幽以答神之灵昵，不亦宜乎！旧庙数間，历年既久，上雨旁風，無所庇障。元丰六年，太常少卿方公嶠始增地而广之。政和六年，太子詹事方公会又牵乡

（第二十六行）人裒金而新之，命神巍然南面，秩視諸侯，其冕服之制，荐献之礼，皆有品数，視前时为不同也。祈貤跪拜，卜史荐辞，瞻望威容，进退惟俱，亦視前时为不同也。春秋

（第二十七行）祈报，长幼率从，酒洌殽馨，神具醉止，退就宾位，执鼗揚觯，有劝有罰，莫不順命，又不知往时人物若是否？远近奔走气乞灵祠下，时新必荐，出入必告，疾病必禱，凡

（第二十八行）有作为，必卜而后从事，又不知往时人物能若是否？以至天子郊祀之后，郡侯視事之初，又当来享来告，以荐嘉誠，此亦前时之所無也。是数者，皆曰前时不同，

（第二十九行）宜其視旧宫为犹狭，寖以侈大，亦其时哉！信士方舍始倡其仪，众皆悦从，敛不劳而財用足，工不懈而功用成，治其厅堂，作东西两序，燕息有所，斋庖有房，其合而

（第三十行）为屋八十有二楹，其費而为錢一万緡，經于紹兴四年之春，而成于六年之夏也。新庙既成，民大和会，又相与大享于神以落之，众因請紀其事略　之。先廬去

（第三十一行）神祠为近，如兒童时尝侍先生长者瞻拜于庭，其后塵忝奔走仕路，三十余年，两叨郡使，皆在南方，过家上冢，未尝不謁于祠下，至則徘徊廊廡間，因思古人仕口

（第三十二行）以不去其乡为戒。自罢官瀛洲，挈家还里，顧惟潦倒，掾閑有日，荐乞宫祠，庶几岁时得与乡之耆旧杖履相从，白布长衫，祀飲于侯之堂，亦若古所謂乡飲酒者，以

（第三十三行）償素願，此志未央也。余摭侯之事迹，章章可傳永久者，濮硯提笔而志之。

（第三十四行）紹兴八年岁次戊午孟夏丙辰朔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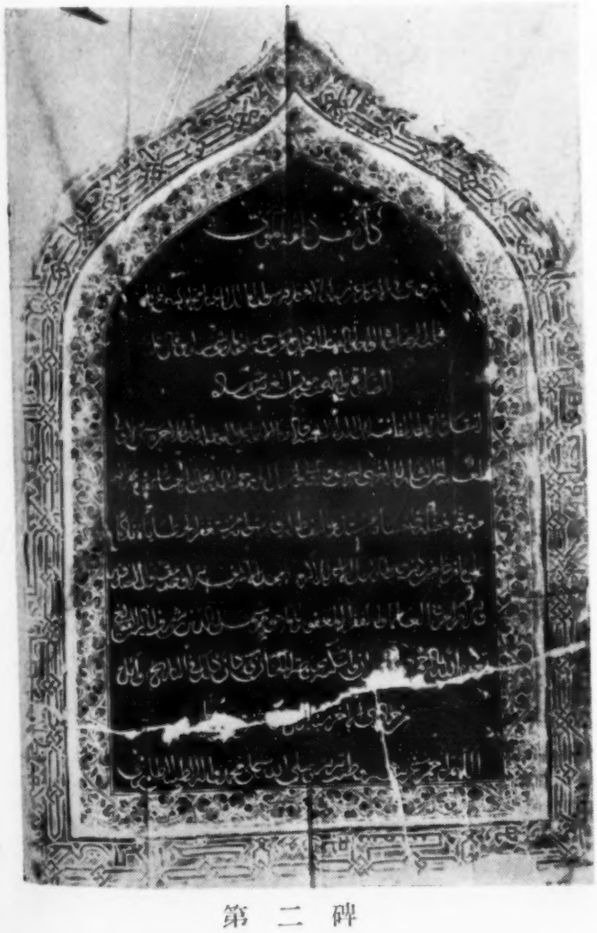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五行）　　刻字人福唐蔡清

此碑高1.5米，寬0.96米，全文磨灭四字，大部文字清晰可辨。碑文中所提商人至远洋外番做生意的，經常至祠下祈禱，以及泉州綱首朱紡往三佛齐国經营祈求的情况，說明北宋或以前福建沿海貿易已發达，南宋泉州所以設立市舶司并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它长远的历史。三佛齐国即今之南洋群島、印度尼西亚一带，可見早在郑和之前的十一世紀，我国商人已經远渡重洋，与东南亚各国發生了密切的經济关系，創航行远洋的業迹，更可証明我国造船業的發达。这些文字記述，为研究中西交通增加一笔新史料。

徽州路達魯花赤
揑古伯通議之墓

第一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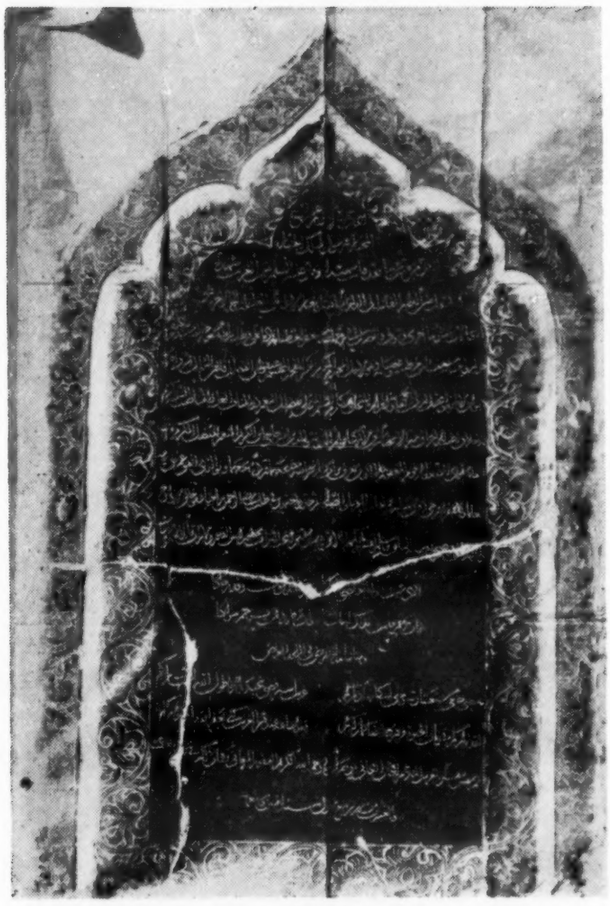
同　左



第二碑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قل هو الله احد الله الصمد
لم يلد ولم يولد ولم يكن
له كفوا احد

同　左



第三碑

同　左

第四碑

同　左

揚州仙鶴寺阿拉伯人墓碑記

朱　江

揚州南門街仙鶴寺（現名礼拜寺）里有阿拉伯人墓碑四通（八面），是民国十三、四年間从南門外档軍楼基础中拆出的。墓碑原在何地，已無可考，大概是档軍楼址附近的东西。这四通墓碑發現后，移置仙鶴寺保存，現嵌砌在大殿前左旁一排短墻上。

这四通碑用中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刻成，碑文以阿拉伯文为主体，間夾有波斯文的地名。只有一塊碑的正面系用中文楷書刻字。

第一通墓碑长0.75、寬0.49米，正面楷書两行，文为："徽州路达魯花赤""捏古伯通議之墓"。

"徽州路"即今安徽省歙县。宋代为"州"，元改为"路"，明改为"府"。

"达魯花赤"是蒙古語官长的意思。清代譯作"达嚕噶齐"。元于各行省路、府、州、县，各提举司、各总管府、万戶府、千戶所、元帥和宣撫、安撫及招討之司，皆置达魯花赤（系掌印官和断事官），以蒙古人担任。蒙古人干不了的，由阿拉伯等色目人充任。

"捏古伯"系阿拉伯語譯音。"通議"是阿拉伯人捏古伯的官阶。

第一通墓碑碑陰刻文，据揚州市回民协会主席刘彬如老先生翻譯（下同），全系阿拉伯文。死者名"撒穆逊丁"，卒于回历707年12月。碑文主要刻"古兰經"中一些章节，并刻有祈禱文。

回历707年，即公元1307年，当元成宗鉄木耳大德十一年，距今已有六百五十一年。

第二通墓碑长0.97、寬0.67米。碑文以阿拉伯文为主，夾有波斯文的地名，碑陰全系阿拉伯文。死者名"撒穆邦乃基"，卒于回历707年12月2日。碑的正面刻"古兰經"中的一些章节和穆罕默德言行录中的一段。

第二通墓碑碑陰刻"古兰經"第一一二章名叶眞。

第三通墓碑长0.97、寬0.64米。全系阿拉伯文，刻"古兰經"中的两个章节和其它。

第四通墓碑长0.97、寬0.64米。碑刻阿拉伯文。死者是一个妇女，名"尔依賽哈同"，她的父亲名"勒尊丁"，是一个官員。卒于回历724年。

回历724年，即公元1324年，当元泰定帝也孙鉄木耳泰定元年，距今六百三十三年。

揚州远自隋唐以来，是我国古代对外通商的一大口岸城市，許多阿拉伯的商人和傳教士經常来往并居住于此，因此关于不同时代的阿拉伯人的碑刻，可能还会發現，对研究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文化关系甚有价值，希望妥善收集保存。（圖見55、56頁）

新發現的汉延光四年刻石

孙太初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因为昆明市国营蔬菜农場在本市南郊塔密村附近兴建农場，工地范圍內有两座巨大的土塚，需要清理發掘，我和市文化处的馬竹禪同志一道下去調查了一次，無意間在塔密村东面的小路上，發現一件东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的刻石。

农場是在塔密村东面公路以西的斜坡高地上，地面布滿了近代墓葬，我們所要清理的那座古墓也在其中。这件刻石發現时候的位置，是在距两座古墓东面的二百公尺的小路上，平臥在路的中央。人和牛車經常从它上面經过，所以有些字迹已被輾得模糊了。据村子里边的老年人对我們說：在几十年以前，这里有一座小石桥，这件刻石就是砌在桥上的，后来桥垮了，刻石仍旧扔在路上，一直沒有人注意或搬动过。从老人的談話当中，我們可以推測这塊刻石的原始位置已經移动过，可能即是在造桥的时候自它处移来的；但它本身的份量很重，也不会是从太远的地方运来。这样，使我連想到它和那两座古墓之間可能發生关系。

刻石的料子是黃砂石，形状略作不規則的长方形，上窄下寬，厚薄亦不一致，刻字的一面也是凸凹不平。原石通高115厘米，最寬57厘米，厚約13厘米。文字共計六行，每行字数不等，随着石头的高低而有歪斜，字亦大小不一，石头左边沿上有几道弧形的凹痕，好像是长期在上面磨东西形成的；右边沿也被踐踏得很光滑，因而損及第一行字的右

汉延光四年刻石

半。文字是汉代通行的八分書，間夾篆体，写得很古朴渾厚。有若干字結体稍异，加以剝蝕不清晰，目前还不能全識。現在将一部分試釋于下：

延光四年
□□□□昆□
封□□□
葬□□□
与相壬子江直
□牛五头
□自少宰
田北疜而西大道古氏
□□路□□□時知
□□□□□

第二行相字下一字，为壬字或王字，未可遽定，因中間一横稍长，茲暫釋作壬字；第三行末一字，疑为宰字之别体；第四行疜字，疑为巨字，或与距字通用，而字即大字之篆体；第五行時字，当即時字。

从已釋出的片断的字句里研究，我認为这是一件当时人买地的分界刻石。东汉时代，已有这种立石分界的習慣，如現存的会稽跳山摩岩，莒县宋伯盟刻石就是屬于这类性質的东西。我們發現的这一件刻石，有"牛五头"等字样，可能是交換土地的代价；又有"自少宰田北"及"西大道"等字，当是土地的四至。从它的形制、文字、書体各方面看，跟宋伯盟分界刻石都很相似；而它發現的地点，恰巧又是在距离两座古墓不远的地方（这种古墓的时代，經过几次發掘，証明是汉至六朝时期的），因此我推断它是一件买地的分界刻石，很可能就是屬于那座古墓地界上的。

云南發現的汉代碑刻極少，过去仅在昭通县發現过一塊孟孝琚断碑和一件建初九年的搖錢树石座，前者年月已闕；后者不过寥寥数字。現在在昆明又發現这一件分界刻石，对于研究云南汉代的历史和風俗習慣，無疑是很有用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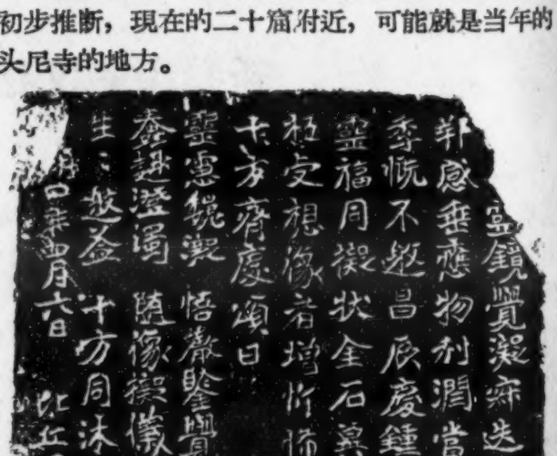
云岡新發現的一塊北魏石刻

云岡古迹保养所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間，我所整修第二十窟（俗称露天大佛）前过去崩塌的窟石工程中，發現一塊砂岩石刻銘記，高30公分，寬29公分，北魏書体共十行。以石刻輪廓推断，全文应为一百一十二个字。除第一行与末行（年号）各缺二字外，余均字跡清晰。我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資料試作如下推断。

一、末行年号第一字全缺，第二字仅存右旁"月"字，疑似明字殘缺。考北魏至唐各代帝王年号末字为明字者，有：北魏孝文帝承明、宣武帝景明、东海王建明，北齐廢帝乾明，李唐僖宗广明。上列五个帝王，除了景明紀年为四年外，余仅在位六、七个月，至多二年。据此推断，該石刻当为北魏宣武帝景明四年四月六日造立的。

二、考水經注卷一三濕水条："……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并諸石窟，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轉，逕灵岩南……。"又广弘明集卷二："……谷深三十里，东为僧舍，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鑿石为龕容千人。"至今研究云岡石窟的学者，对于西头的尼寺的位置，限于資料，沒法作出比較正确的推断。从現在云岡石窟分布情况来看，二十窟正在石窟群的西端，并由二十窟往西不远，即傍武州川水，由东南而轉向东流，經过石窟群前。以二十窟的地形、規模，結合当前發現的材料，可以初步推断，現在的二十窟附近，可能就是当年的西头尼寺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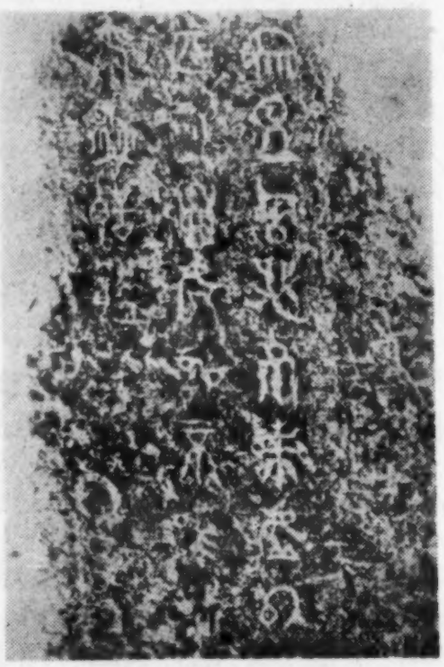
北魏石刻

一处值得注意的古文字石刻

張知寒

1956年暑假回家，途中經过济南时，曾去我們乡里的老前輩刘子衡先生那里拜訪；刘先生知道我很热爱考古工作，便給我介紹了很多关于鲁南一带的遺址、遺迹，以及一些遺址遺迹的綫索，其中談到他在几十年前曾于鄒县嶧山上、一个人迹罕到的洞穴里，發現过一塊刻有古文字的天然巨石。鼓励我前去看看，并希望我能把它拓下来带給老师們研究研究。我根据刘先生所指示的綫索，于1956年8月底去嶧山作一天的調查。結果在山前面的半腰間發現了那个洞。洞門口有万历十四年刻的"盘龙洞口"四个大字，在附近的天然石头上，还刻有嘉靖和万历年間的題辞，可惜都已剝蝕的無法辨認了。从这个洞口向里走十多步，接連就有好几个小洞口，山上的泉水从这些小洞口里潺潺地流出。再想前行，就必須脫光衣服爬过这些流着水的小洞口。如果爬过这几个小洞口，也就好像陶淵明所写的桃花园样"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三塊無法形容的天然巨石中間夾有一塊像悬鐘似的石头。就在这塊鐘形巨石的东南面，高約三公尺的地方，刻有二十个非常工整的古文字。附近还有一些疏疏落落的不同字体的題字（眞、草、隶都有），其中平湖姚某人的題字尚可辨認。这些題字刻的都很潦草（像是用刀子划的）。不管从文字上或者是刻的痕迹上，都和上边的古文字截然不同，很明显地看出这些題字是晚于上边的古文字的。这个發現使我非常高兴。可惜，去时未带工具，临时只好把我的背心脫下做了一个"拓扑"，向山下的农業合作社借了一个硯台，买了一張杭連紙把那几个"古文字"凑凑付付地拓下来了。附近石头上以及洞口的題字，由于天色将暮就未来得及拓。

这二十个古文字，在我們学校里曾請高亨教授、韓連琪副教授以及刘敦愿、徐連城等先生鑒定过，他們对这几个字的时代虽都沒下結論，但都認为很奇异，值得研究。在济南我也曾拿給刘子衡、王献唐等先生看过，献唐先生对此很感兴趣，認为不像是后人伪造的，可能是战国时代的文字。刘子衡先生認为这几个字的时代恐怕要早于战国。地方志書我們也查过，查不到什么著录。这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时代的？是古人直接刻上的，还是好事者为之？目前我們还弄不清楚。根据我个人的学力条件来講，更是無力把它弄清楚的。为此特請专家們鑒定，并請文化部門对这塊刻石給予注意。



古文字石刻拓本

梁山伯祝英台墓碑出土記略

郑亦桥

膾炙人口的梁山伯、祝英台这一优美的悲剧性的民間故事，过去有許多文学家和艺术家都作过考証和研究。因为宁波西門外九龙墟有梁祝的墓，并有大观年間建立的庙宇，一般人都認为梁祝故事就發生在浙江。一九五二年山东鄆山县第六区修浚白馬河工程中，挖出梁祝墓碑一塊，由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在当地保存，茲将全文抄录于下，以供参考：

梁山伯祝英台墓記

丁酉貢士前知都□县事古邾赵廷麟撰文

文林郎知都鄒县事古衛楊环書

亚聖五十七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篆額

外紀二氏出处弗詳，邇来訪諸故老，傳聞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巨富，乡人呼为員外，見世之有子讀書者，往往致貴，显耀門閭，独予無子。不貴其貴，而貴里胥之繁科，其如富何！膝下一女名英台者，聰慧殊常，聞父咨嗟不已，卒然变弁易服，冒为子弟，出試家人不認識，出試乡里不認識，上白于亲，畢竟讀書丕振門風，以謝亲憂。

时值暮春，景物鮮明，从者負笈过吳桥数十里，柳陰暫駐，不約而会鄒邑西居梁太公之子名山伯，动問契合，同詣嶧山先生授業，昼則同窗，夜則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謂篤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曠定省，言告归宁，倏經一載，山伯□□英台之請，往拜其門，英台肅整女仪出見，有类木兰将軍者。山伯別来不一載，疾終于家，葬于吳桥迤东。西庄富□馬郎迎亲至期，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吾尝心許为婚，第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更适他姓，是异初心也。与其忘初而愛二，孰若舍生而取义，悲伤而死。少間愁烟滿室，飞鳥哀鳴，聞者惊駭。馬郎旋車空归。乡党士夫謂其全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願，天理人情之正也。越茲岁久，松楸华表为之寂然，俾一时之节义，为万世之湮沒，仁人君子所不堪矧。惟我。

朝

□祖宗以来，端本源以正人心，崇节义以励天下，又得家相以之佐理，斯世斯民，何其幸歟？时

南京工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总督粮儲，新泰崔公諱文奎，道經顧茲廢塚，其心拳拳施于不报之地，乃托陰陽訓术鮑恭干，昔有功于張秋隄以□录，近有功于闕里書以奏名授命，茲□豈無用其心哉！載度載謀，四界竪以石，周圍繚以垣，阜其塚，妥神有祠，出入有扉，守祠有人。昔之不治者，今皆治之，昔之無有者今皆有之。始于上年乙亥冬，終于今岁丙子春。恭干将复公命，請廷麟具其事迹本末、岁月先后文諸石，不得已而言曰：土帝降衷，不啻于人，惟□昏淫，丧厥貞□。独英台得天地之正气，萃扶与之清淑，眞情隐于方寸，群居不移所守，生則名乎道义，沒則吁天而逝，其心皎若日星，其节凛若秋霜。推之可以为忠，可以为孝，可以表俗，有关世教之大，不可泯也。噫！垂节义于千載之上，挽节义于千載之下，伊誰力歟？忠臣力也。忠臣誰歟？崔公謂也。不然太史尝以忠臣烈女同傳，并皆記之。

正德十一年丙子秋八月吉旦立

卷里社□□□考

石匠梁珪

梁山伯祝英台墓志拓本

南京最近發現的太平天国早期革命英雄墓碑

靳程前

南京發現一塊太平天国革命英雄墓碑。这塊墓碑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軍韓群堂同志發現的，他在参观过太平天国史料展覽以后，就随时关心太平天国文物；1956年十月他在工作地点附近看見这塊墓碑，他即刻写信告知文管会。碑在兴中門外綏远路一号与三号之間小巷口的路边上，碑身平陷土中，碑面向上，上半段完整無損，下半段似被人打断已不存在。碑高57厘米，寬33厘米，厚11厘米。碑文清楚，右側为："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三月十六日"，中为："殿右陆拾指揮功勛段潘懋墓"，下款："孝子基滔基富立"，最后刻有死者籍貫："湖南省衡州府来陽县大河边人"。文中"来"字恐系"耒"字之誤。这塊墓碑已于十一月二日运到紀念館陈列。

南京兴中門在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原名仪鳳門，（宣統皇帝傅仪为了避諱曾改名威武門，至国民党时代才改为今名），太平軍在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三月攻克江宁，就是先破仪鳳門入城的。这里北屏獅子山，西扼下关浦口咽喉，形势險要，向为南京重要門戶。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下关即在太平軍掌握之中，給予长江下游和駐屯在孝陵衛、沙子崗一帶清江南大营和揚州的清江北大营以很大威胁。因向荣处于进退两难困境，为了取得长江上游地主武裝湘軍的支援，故常派师船进扰七里洲、九袱洲、下关一帶江面，企圖冲过封鎖綫，以"迎合九江楚师，下扫沿江，合圍金陵巢穴"。因而从1853年起，下关經常發生战事。据向荣奏稿卷九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三月十三日"奏为师船斬練攻出上游亟应調兵由陆接应"和三月十九托明阿等"奏浦口水陆各营大获胜仗"两摺来

看，尤以这一战役最为激烈。案段潘懋死于乙荣五年三月十六日，正是清咸丰五年三月初七日，向荣奏稿是三月十三日正是太平天国三月二十二日，托明阿奏稿是三月十九日，正是太平天国三月二十八日；向、托两奏稿正是段潘懋死后的六日至十二日，日期是如此接近，从而推考段潘懋之死很可能与此次战役有关。当时兴中門外紧靠城墙两边本是荒地，太平天国英雄死后安葬此处是有可能的，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淪陷后，創子手曾国藩、曾国荃将那片荒地改作湖南会館义塚地，从房地局的地契和訪問世居下关李文勛、李庆宝、魏老太太等老人的口碑中，以及現存路中的一塊"民国五年七月初三日，先公宋青云之墓，湖南武陽县武成鎮后冒庄人"墓碑来看，都可証明这一点。再从墓碑断处裂痕、碑文清楚、剝蝕程度不甚严重等情况联系起来考察，这塊革命英雄墓碑很可能是被子創手打断以后曾經长期被埋于土中。以后在民国四年，部分地皮有李春亭建有房屋，租与英商祥太洋行，名曰祥太里。抗日战爭时期，原房屋被焚后，日寇又在原地搭盖营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接管改为兴中門营——日侨集中营。恐因兴建关系，致使該碑流散路边，惜历經滄桑，坟墓已难追寻了。

这个"殿右陆拾指揮功勛段潘懋"，至目前为止，尚未發現有关記載。但按照太平天国官制，大别分为朝內、軍中、守土乡官三类。朝內官职丞相最高，检点次之，指揮位列第三。按太平天国官职分表計：丞相二十四人，检点三十六人，指揮自殿前左一指揮至殿左七十一指揮，殿前右二指揮至殿右七十二指揮共七十二人。太平天国封职指揮就前期来說，多在壬子二年（公元1852年）攻克永安、岳州、武汉，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攻克江宁前后。如太平天国著名将領林鳳祥、李开芳、罗大綱等人，都在壬子二年攻克永安、岳州、武汉之后封为指揮；吉文元、曾添养、林啓容等人，在癸好三年攻克江宁前后封为指揮；太平天国后期优秀的将領陈玉成在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才封为指揮；李秀成在癸好三年八月駐防仪鳳門外高桥的时候，其官职还是后四监軍，低于指揮三級，至甲寅四年春才升任指揮；至于后期侍王李侍賢、輔王楊輔清、遵王賴文光等人，当时还不著名。而"殿右陆拾指揮功勛段潘懋"死于乙荣五年三月，虽其事迹不詳，但他官职当在乙荣五年初或甲寅四年底以前加封。据此推考，他的地位在甲寅四年或許与陈玉成，李秀成等人不相上下，較之李侍賢、賴文光等人或許还要高一点。

太平天国革命英雄墓碑拓本

就其勛阶而論，也是价得紀念的一位革命英雄。按照太平天国勛阶陟降規定，癸好三年四月在南京叙永安突圍功，不論官职大小，悉加"功勛"二字。段潘懋死后碑上刻有"功勛"字样，不仅証明他是早期参加革命者之一，而且可以判定他是为革命捐軀，有功于国家和人民的英雄。

就其刻碑时間来說，"天朝元勛曾水沅之墓"系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公元1859年）重修，而段潘懋碑是立于乙荣五年（公元1855年），比曾水沅墓碑还要早四年。在南京地区發現这样确有年月查考的太平天国早期文物，这还是第一次。

最后，我体会到这塊革命英雄墓碑的發現，对太平天国紀念館和具体担任文物工作者来說，也是带有啓發性的教育意义。它生动地証明了在南京不仅可以發現太平天国晚期的文物，也能發現早期的文物；不仅在荒山僻野可以發現太平天国文物，即在街头巷尾也能發現太平天国文物。这种新的鼓舞，将使我們滿怀信心进一步地依靠人民，广泛地深入做好太平天国文物資料調查征集工作。

三年来西安市郊出土碑志有关校补文史之資料

李子春

一 校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1. 唐丘夫人刘氏墓志銘　补"彭城刘氏表"：刘德威下第六行与审礼平行之一格，为其子崇業，崇業下一格，为其子胐，胐下一格空白，应补填曰："鉉，将作监主簿"六字，以鉉为胐子也。

茲补正本表一部分如表一。

2. 唐立隋郭荣碑、唐郭敬善墓志銘　补"华陰郭氏表"：第一格应作第二格，以下当挨次遞降，新增之第一格应填曰："文智，魏中山太守"七字。徽与进皆文智之子，应列入第二格。又据郭荣碑，荣长子敬善，次子福善，弘道长子广敬，次子履球，原表有誤；現又掘出郭敬善墓志銘，敬善长子思簡，次子思約，季子貴賢；是以敬善下又应加三行。

茲补正本表一部分如表二。

3. 唐陆振墓志銘　补"乐安陆氏表"：陆象先子澭，表誤列低一格，似为象先孙。据石，澭与該应同提高一格，与泛成平等格，以示泛、澭、該同为象先子。澭下一格（即原来澭所占之格）应填曰："振，右金吾衛兵曹参軍"九字，以振为澭子也（澭在石上曰众，一曰令众）。

茲补正本表一部分如表三。

4. 唐王大礼方两墓志銘　补"京兆王氏表"：述下一格原为空白，应填曰："直，唐驃騎将軍农圃少監"十字，以直为述子也。原表之無畏一格，应改填曰："大礼，曲沃令"五字，儼之一格，应改填曰："大方，处士"四字。

茲补正本表一部分如表四。

5. 唐于尚范墓志銘　补"长安于氏表"："宣道字元明隋上仪同威安献公"，"威"字据石应改为"城"。

茲补正本表一部分如下：

又字慈恭隋潼州总管建平剛公	宣道字元明隋上仪同城安献公	永宁商州刺史	遂古陽州刺史

6. 唐崔愼思墓志銘　补"博陵崔氏表"："諱戶

表一

德威字尚重刑部尚書	审礼工部尚書彭城公	侄寿太常丞			
		侍庶			
		易从汉州刺史	升中書舍人		
			最給事中	顗	
				顗殿中侍御史	識
	崇業	胐汴州刺史司农卿	鉉朝議郎将作監主簿		

表二

魏文智太中山守	徽	隋大蒲軍城公	敬善散騎侍郎上洛侯	思簡			
				思約			
				貴賢			
			福善兵部侍郎				
		弘道同州刺史郜国公	广敬左威衛大将軍				
		履球金州司倉参軍	利隋涼州法曹	通奚原尉	敬之字敬渭吉寿綏五州刺史	子秀	曄
	进						

表三

象先本名景初相玄宗	乏秘書少監襲充国公	冀城門郎桥陵令	
	澭刑部郎中	振右金吾兵曹参軍	
	該溧水令	縉	

表四

述字长安隋柱国龙門庄公	直唐驃騎将軍农圃少監	大礼曲沃令
		大方处士

部郎中"下一格与下二格，原表皆为空白，应在下一格填写"密，广都县尉"五字；下第二空白格应填"慎思，乡荐不第"六字；以密为諡子，慎思为密子也。

兹补正本表一部分如下：

泌刑部员外郎	諡戶部郎中	密广都县尉	慎思乡荐不第

二　校补新唐書公主傳

1. 唐豆卢建墓志銘

（1）高祖十九女"长沙公主傳"曰："长沙公主，始封万春，下嫁豆卢寬子怀讓。"应补其官爵曰："下嫁豆卢寬子太府卿芮国公怀讓"。

（2）玄宗二十九女"衛国公主傳"曰："衛国公主，始封建平，下嫁豆卢建，又嫁楊說，薨貞元时。"应补写曰："衛国公主，始封建平，下嫁于丹延坊三州刺史光祚子太僕卿襲中山公建；其母万泉县主薛氏，太平公主女也。建于天宝三載三月卒，主又嫁楊說，薨貞元时"。

2. 唐郑国公主墓志銘　肅宗七女"郑国公主傳曰："郑国公主，始封大宁，下嫁張清，薨貞元时。"应补写曰："郑国公主，始封大宁，下嫁于范陽張去逸子清。清先主卒。貞元二年十月主薨，年五十八。"本傳中将郑国公主排列为第四女，但近来由西安市郊出土之張怙墓志銘，則云："父清，尚肅宗皇帝第五女郑国公主。"其子述母，必無違謬，是新唐書之于郑国公主之长幼倫序，尚有誤也。

3. 唐柳昱墓志銘

（1）代宗十八女"义清公主傳"曰："义清公主，下嫁秘書少监柳杲。"应补写曰："义清公主，下嫁駙馬都尉河东柳潭次子秘書少监杲"。

（2）德宗十一女"宜都公主傳"曰："宜都公主，下嫁殿中少监柳昱，薨貞元时。"应补写曰："宜都公主，下嫁駙馬都尉河东柳潭第四子殿中丞舒王府司馬銀青光祿大夫昱，貞元十九年三月薨，年三十二。"据石，其人本德宗第五女，傳則列于第十，应改。

5. 唐張怙墓志銘　代宗十八女傳外，应續一女，曰"乐安公主，下嫁駙馬都尉范陽張清子少府少监怙，有子八人，造、遥、愔、遵、超、蘧、述、达"。

三　校补新唐書地理志

1. 京兆府条下，注曰："有府百三十一，曰：貞化、匡道、水衡、仲山、新城、寶泉、善信、風神、安業、平香、太清；余皆逸。"据多种新出土唐墓志銘，应增："周城、通乐、丰潤、神鼎、廉平、天齐、居义、咸陽、布政、唐谷、王保、頻陽、怀信、长丰、欢乐、潘水"十二个府名，最后仍曰："余皆逸"，以所不知者尚有百零四之多也。

2. 陈州陽夏郡条下，应加注曰："有府一，崇乐"。

3. 朔州馬郡条下，应加注曰："有一府，尚德"。

4. 同州馮翊郡条下，有府二十六，应改为二十七，加宣化一府。

四　校补两唐書宗室諸王傳

1. 唐宁王墓志銘　"新唐書""宁王宪傳"附子"嗣庄傳"曰："嗣庄幼有令名，为太子左諭德，封济陰郡王，薨，贈幽州大都督。"据石，应潤色之曰："嗣庄字延敬，幼有令名，性嗜礼乐，好剑术，开元五年十月封济陰郡王，食邑三千戶，又制贈紫金魚袋，授太子左諭德；九年，薨于胜業里，年十七，詔贈幽州大都督"。

2. 唐郑王墓志銘　"旧唐書""順宗諸子傳"曰：郑王經，本名渙，順宗次子。始封建康郡王，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八年薨。"据石則应补写曰："郑王經，本名渙，順宗次子，母太妃張氏。王幼即好学慎行，始封建康王，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八年七月薨，年五十有七"。又"旧唐書"称經为王昭仪生，誤。惟"新唐書"謂其母姓張氏，与志合。

五　校补明史宗室世表

1. 明兴平王樑墓志銘　"秦王檢表"：兴平王傳其第二代庄惠王志壎，則載曰："天順元年薨，無子，除。"据石，应先去其"無子除"三字，再于第三格內填"安僖王公鑅，庄惠王长子，天順二年襲封，成化十二年薨"。薨字下仍不能冒然写"無子除"三字，誠恐将来再有第四代之兴平王墓志出土，故不能决定至此而国除也。

六　校勘文集

1. "庾子山集"中載有所撰之譙国夫人步六孤氏墓志銘，此志原石已于一九五三年在咸陽底張灣北原出土，石与集所載之文，小有异同，兹将集文与石文对照，互相校勘如下：

集　文	石　文
夫人諱某字某	夫人字須蜜多
大夫拓境	大夫出境
文安公	文安郡公
參謀撝讓	參謀挹讓
言容礼兴	高容礼則
作銘秋菊	乍銘秋菊
或頌春椒	或頌春書
愈恭节儉之心	愈恭节义之心
以若华分照	以各华分照

途艰黄牛之坂	途难黄馬之坂
沾裳無已	沾衣無已
是以天厉之疾	是以天厉之疾
建德元年七月九日	建德元年岁次壬辰
薨于成都私第	七月辛丑朔九日
	乙酉薨于成都
十一月二十二日	十一月十一日

叙文"礼也"以下，"殿下"以上，石上多："夫人奉上尽忠，事亲竭孝，进賢有序，逮下有恩。及乎将掩玄泉，言从深夜，內外姻亲，俱深节女之悲，三五小星，实有中饋之恋。"等語。

先逢金闕	先逢金灶
芠陵返旆	艾陵返旆
震維徙族	震維从族
应圖淑令	膺圖淑令
明月照鏡	珠为桂鏡
园陵永植	貞陵永植

合而核之、"礼則"、"乍銘"、"天厉"、"金灶"、"艾陵"、"膺圖"皆石之优于集者。"拓境"、"捍讓"（參謀捍讓是謂魏周禪代之际，曾参与密謀也）、"春椒"、"若华"、"途艰黄牛"、"徙族"皆集之优如石者。石之有誤，可能是書丹者的疏忽；集之有誤，可能是在未有雕板以前傳抄者的錯誤。例如："芠陵返旆"，倪注則曰："未詳"，豈知原为"艾陵"。石上多出的一段，文本不佳，或者是子山于事后在原稿上刪去，也未可知。至于亡人之名字及死与葬之年月日，在各家集中皆从略，这是因为过去所重者在文，而不重所傳之人。至于"公"与"郡公"、"沾裳"与"沾衣"、"明月照鏡"与"珠为桂鏡"、"园陵"与"貞陵"，孰是孰伪？直可模棱視之。

2. 唐"張燕公集"中載有所撰之馮君衡墓志銘，今原石已于一九五四年由西安市东郊高楼村附近出土。茲根据明嘉靖丁酉伍氏龙池草堂本燕公集（即四部丛刊本）以原石校其异同如下：

集文	石文
其适越者	其适南越者
馮祖思	馮祖恩
远居避(僻之訛)地	远居偏地
子智玳	子智垔
終抗梁寘之行	終抗梁寡之行
少养于高氏	以将軍小，养于高氏
孟軻儒艺裔，成名此母	孟軻儒艺，成名此母
八十有七	八十七
粵以八月	粵八月
新閥	新域
盖殊常之礼	盖殊常之礼也
百年匪悽	百身匪悽

合所校勘，集有誤而石無誤，当据石以改集。

七　校补宋著长安志

宋代宋敏求之"长安志"卷第十一，关于万年县县境曰："唐四十五乡；霸桥东有大陵乡，元載祖墓在黄台乡，眞光中有霸城乡，余不傳。"畢沅据"水經注"及庾信，常袞、白居易等所撰墓志銘，增加：洪原、平原、龟川、上好、庆义等乡，并总結一句說："皆古乡名也。"如此，不特距四十五之数尚远，而且也不知乡的方位。現根据近年来西安市郊区出土及多年前出土之墓志銘，增补唐万年县乡名如下：

1. 滻川乡　此乡所葬，宦者为多。如唐右龙武将軍史思礼，于天宝三載十一月二十三日迁窆于万年县滻川乡白鹿原，叙文云："水帖灞岸，山接芷陽。風傳长乐之鐘，日下新丰之树。"这是描写葬地的風光。又故太原郡王夫人于大中八年五月一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滻川乡上傳村观台里。此皆葬于滻水以东白鹿原之西半部，又名郭家滩；可見郭家滩之西半部为滻川乡也。再沙州刺史李思貞墓志銘，出土于今市东郊滻水西之高楼村，志則曰：神龙元年迁窆于雍州万年县滻川乡务政里长乐原；此地西距省城約七八里，可見滻水东西皆为滻川乡地。

2. 崇道乡　陪戎副尉高木卢于开元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于京兆府崇道乡齐礼里白鹿原之右；又銀青光祿大夫监察御史唐思礼夫人王氏于咸通四年葬崇道乡，而思礼墓在滻川乡，夫妇之墓，相距必近，此志出土地亦在郭家滩，由此可知滻川、崇道二乡相毗連也。此外屬于滻川乡者，尚有郑村里（会昌元年刘士环墓志銘），屬于崇道乡者，尚有帜道里（大中十五年南安郡夫人仇氏墓志銘）、夏里（大和八年郑王經墓志銘）、蛇村里（咸通十四年吉州长史郭克全墓志銘）。又貞元六年楊万荣墓志銘出土于市东郊韓森寨东南，而志則曰："葬于崇道乡东原"，是滻水以西亦有崇道乡地，不过滻川乡在北，崇道乡在南耳。

3. 洪固乡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宾客守涇州长史兼侍御史王季初于乾符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迁窆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固乡上傳村之北原。此志之出土地亦屬郭家滩，既云上傳村之北原，則洪固乡与滻川乡毗連亦可知。似乎洪固乡地在白鹿原之东南部，所以白鹿原（即郭家滩）在当时为三乡交界地。

4. 宁安乡　楊夫人隴西郡君李雅，于乾符四年十月十七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宁安乡通安里，其墓志系出土于市东南郊三兆鎮繆家村，又朝議郎楊崇夫人甘氏于乾符三年葬于京兆府万年县宁安乡曲池坊；曲池者，曲江池也。是今之曲江池三兆鎮一带，均为当时宁安乡地。

5. 长乐乡　右骁衛大将軍雁門县开国公薛莫及其夫人于开元十六年合葬于长乐乡龙首原，即今市区东郊韓森寨东北之地，距唐城最近，距今省城亦不远，可見滻川乡之北即为长乐乡，唯不知滻水之东尚有其地否？所以叙文中有云："西临京闕，恨近日而长陰。东俯滻河，观逝川而增悼。"其位置可以見矣。又同地出土之葉賀特勤夫人薛突利施匐阿施墓志銘，亦曰：迁厝于万年县长乐乡之原。

6. 义丰乡　宜都公主于貞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迁葬于万年县义丰乡銅人原，其墓志銘出土地在今霸桥以东紅庆村东北約三里，蓋万年县之最东地也。

7. 崇义乡　内庄宅使行内侍省内侍刘遵礼于咸通九年十一月八日窆于万年县崇义乡滻川西原。又太原王氏故笄女于大中三年葬万年县崇义乡南姚村南。二志均于韓森寨东南出土，其位置可按而知，在滻川乡之西，而切近于京城者也。

8. 高平乡　太府寺主簿楊迪，于太和七年葬于万年县高平乡高望里，此志出土于風栖原。据唐柳河东集，柳氏先塋在風栖原之洪固乡，則是風栖原有高平、洪固两乡地，今尚有高望堡为証，可知風栖原上，西部为高平乡，东部为洪固乡。

9. 云門乡　内侍省内府局令刘奇秀夫人駱氏，于元和三年十月十三日葬于万年县云門乡，但此志出土尚早，不知此乡位于何所。然而刘奇秀墓志銘乃于一九五四年由白鹿原出土，云門乡或与白鹿原不远，或者就在白鹿原之东，須待再有此乡之志出土証明。

10. 义善乡　殿中少监唐昭女瑞蓋，以开元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葬于万年县义善乡之原，此志亦出土較早，未能知此乡位于何所，俟再有此乡之志出土証明。

宋著长安志卷十二，关于长安县县境曰："唐五十九乡，有潤陰乡見于下，余不傳。"畢沅据李玉远、張賁然所撰神道碑，增加孝悌，永平二乡，亦总結一句曰："則皆唐乡名也"。茲亦根据最近出土及多年出土之墓志銘，增加乡名如下：

1. 龙首乡　市西郊土門村出土之兴元元从朝議郎內侍省奚官局令祁宪眞墓志銘，乃以大和五年十一月二日迁窆于长安县龙首乡祁村里。又宋敏求于长安县境关于一地，曾提到临皋驛，曰："临皋驛在县西北一十里开远門外"。大中元年內侍省令史堵穎墓志銘，有权殯于长安县龙首乡小严村，而小严村即开远門外临皋驛西等語。是临皋驛亦屬龙首乡也。

2. 永平乡　会稽賀从章于开成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归葬于长安县永平乡灵安里，而此志出土地在今市西郊賀家村（三桥鎮南），全乡之面积虽不可知，而位置之大要可以見矣。

3. 龙門乡　內侍省掖庭局令楊玄明于咸通五年二月十五日归窆于长安县龙門乡石井村。（此系多年前出土物，未能知其出土于今之何所，仅能証明唐时长安县有此乡名耳。俟将来或有出土墓志銘，与此乡名同者再为証明所在地。）

4. 万春乡　太中大夫行神都总监王緒太夫人郭氏，于神功元年十月二十二日迁葬于乾封县万春乡杜永村。据旧唐書地理志，乾封元年，析长安置乾封县，长安三年，廢，复并入长安（此乡所在地未詳）。

5. 义陽乡　奉义郎行洪州高安县令护軍崔府君夫人独孤氏，于天宝二年十一月权安厝于长安县义陽乡义陽原（此乡所在地亦未詳）。

6. 永寿乡　武部常选韦琼，于天宝十四載五月十三日卜葬于长安县永寿乡畢原。其志文有云："南險太乙，北帶皇城，地势起于龙蛇，山形开于宅兆。"此乡地势，約在省城西南之畢原上，第未知在畢原之某一点。

（上接39頁） 工运是比康、雍时代声势更大，發生地区更广了，以致官府不得不預为防备，事前出示彈压了。而"永禁叫歇"永远沒有禁得了亦于此可得証明。

現在我把原文抄录在下面，希望能引起更进一步的探討。

• • •

特授江南苏松常等处太湖理民府分府加十級紀录一次□

修路便民，环叩給示曉諭事。据职員徐学巽、金宜榛呈称：切有　宪治二十九都十圖，地系山前山后經由大道，岭之下每遇大雨，山水驟發，将路冲坍周圍五十余丈，而沿途山澗深有五六丈，行走者設有失足墜入深澗，性命堪虞。职等目击情形，若不及时修□，将来为害不浅。是以职等捐資，現在擇吉兴工，所需黃石，該地俱有，即可随时拾取，倘有不敷，曹塢民願捐助不取价值。而匠工每工給錢一百四十文，惟恐有人高抬工价，遇事生波，为亟联名环叩，伏乞俯鑒輿情，恩賜傳諭地保，督匠兴修，并賜給示曉諭，閤山均沾厚澤；上呈等情到府，据此。查修路便民，实屬义举，除傳諭地保彈压外，合行出示曉諭。为此仰該处居民匠工人等知悉：所有虾蟆岭下冲坍澗路，現据职員徐学巽、金宜榛呈称捐資兴修，該工匠人等务各努力踊躍，如有不法匪徒，从中高抬工价，遇事生波，許即指名稟　府，以憑严拿究办。該处地保早晚彈压，亦不得借端多事，察出并□究革不貸，各宜凛遵毋違。嘉庆二十四年八月　日

調查閩南古代窑址小記

陈 万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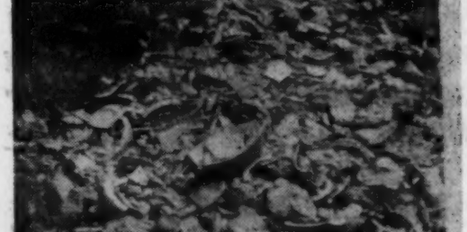
自从泉州东門外發現了古代窑址，过了两年以后，終于在一九五六年冬季才决定前往調查。由上饒入閩，在福州稍作停留，然后南下泉漳。同行的，有馮先銘李知炳二同志，福建省文管会井派謝之瑞同志偕行。今将調查所經井获得的一些材料，分段述叙于次：

（一）晋江（泉州）

泉州东門外的碗窑乡，由于泉州成立了市以后，屬于晋江县第四区，因而应該說是晋江县的碗窑乡，但是就一般習慣說，总是称为泉州东門外，而不用晋江县第四区。

出泉州东門沿着公路往东北約十里，改走小道又六里余，就到达了目的地。

碗窑乡有一条溪澗，斜着自西往东流的一个方位，因此在溪北的一个村是碗窑村，溪南的名后路村。溪水經过碗窑乡后約八里到达海美港，会洛陽江出海。碗窑乡西北南三面环山形成一个小盆地。古代燒窑所遺留下来的碎片，就分布在那个村的山坡上。由于此处碎片以及匣缽殘件之类为数極多，所以居民就利用廢物堆砌墻基。



圖一 晋江碗窑村碎瓷片处

圖二 晋江瓷灶鎮現在燒制的菜甕之类粗陶

就南北两处比較来說，北面山坡上的碎片較集中（圖一），而南面之露出在表面上的不甚多。可是据当地人民說，在松根深处却有很多的碎片，因而要做詳細的分析記录，只是表面上的搜集材料，还是不够的。

至于这一次所得到的碎片，可以大别为以下几种：

（1）白釉 一、素白釉带灰色器物中大型的有板沿大洗殘片，洗里起圈綫，寬底。板沿下有似菊瓣样的划紋，中心有支燒小方塊六塊，器物外的施釉到达五分之三处，胎白灰，頗細潔。二、墩子式的有盖碗，碗身及盖上均划有双層蓮华瓣，器內有釉，胎細結。有似爐形的器物殘片，亦划刻着双層蓮华瓣，胎骨較厚。另有碗心划篦形紋的似为一种較粗的器物（圖三）。

（2）影青釉 淺形洗子色較淡，洗里有两朵蓮华的印紋，毛边，有一种粗率之感。有盖盒的一种色較水青，盖边有直道紋，盖中央印花卉，發現于后路村的遺址（圖四）。

（3）青釉 深灰青色，有碗、洗之类，碗里有圈垫的燒痕，露胎处呈醬褐色，胎灰。另有一种色釉深綠，此种作品或者就是已往一般古董商去泉州收購的所謂土龙泉吧！

根据以上見到的材料来說，可以确定为宋代的制作。至于在一九五三年前后所获得的碎片中，如带青带黄的所謂玻璃釉的几件殘壺殘碗，也确屬是唐代的作品，不过此种碎片，在这一次調查中，未曾撿得，因此是否为碗窑乡所燒造，还是古代墓葬中的物品，尚須等待进一步的調查。

其次需要談的在泉州城外另一处地方，直到現在还燒造些瓮罐之类的粗貨，那就是晋江县志上所記述的瓷灶。我想在那里訪問一下有無古代窑址所殘留下来的碎片，結果我的希望井沒有落空。

出泉州西門过浮桥，經公路往西南約二〇余里，轉入小道不过二三里路，就到了瓷灶鎮。全鎮現在从事于制陶手工業的人类是四七六人，养活人口估計二千人左右，占全鎮人口百分之三十。全年产值約三〇万元，現在生产瓦筒、大水管、（南安石壁水庫用）菜碗，（用以装盐菜，銷南洋、新加坡及菲律濱等处）以及銷售于菲律濱之琉璃栏干等等器物（圖二）。鎮的周圍都有小山环抱。有一条溪流叫瓷灶溪，蜿蜒曲折，貫穿全鎮。在俗称为許山、

宫仔山、蜘蛛山及堀庵山等四处都發現許多碎瓷片及匣鉢等殘片。碎片的分类，約有以下各种：

（1）撇口式碗，釉作茶青色，器身外面的釉仅达器物的边緣，以下就沒有了，也有达到二分之一处。圈足，底部不高，有寬边，这种造形似为此处最标准的作品。

（2）青釉小碟，有带黃色的，平底無釉。碟里印花似石榴花，頗别致。

（3）也撿到雕刻蓮华瓣爐形的器物殘片以及碗的外面划刻蓮华瓣的，但不甚多（圖五）。

（4）碗里有篦形紋，亦有碗里印"福"、"祿"等字样及花紋，似仿龙泉制作。

（5）黑釉小碗及有长嘴、长柄的殘片不少，并在壺肩上見有雕龙的碎片。

就以上所获得的材料来看該处所燒的瓷器，自宋至明以青釉为主，黑釉为輔。从清代一直到今天还是繼續燒造常用粗陶，远銷新加坡、菲律濱各地，尤其是裝盛盐菜的菜碗，为华侨所乐用。乾隆年刊晋江县志物产条瓷器項下有"出瓷灶乡，取地土，开窑燒大小鉢子缸瓮之屬，甚饒足，并过洋。"云云，所謂并过洋，就是除了自用外，还运銷海外的意思，那就証明此种粗貨的远銷国外，是由来已久的事了。

（二）德化

从泉州去的公路，經过一个永春县就是德化，所以早上动身，午飯过后就到了。德化是一个山城，抗战前年产瓷器五万余担，嗣經衰落，解放后逐漸恢复，現已超越了以往的数字。全县产瓷石及釉石的矿山以戴云山为主脉，从西北方向着东南。燒瓷地点据当地人的調查从明到清末不下有数十处。此番調查目的不在于明清，而在于寻覓明以前的碎瓷片。已往文献的記載，总是說德化瓷器起于明代，而傳世的成品，却也沒有早于明代的，本人怀疑此說。因为从生产發展方面看，决不会于突然产生有宣德款、成化款等等温潤似玉样的白瓷，而在此以前，却沒有燒造白瓷的蹤迹，这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果然，我与同往調查的同志，竟發現了堆集宋及元代碎瓷片的地方多处。茲将所得材料分别簡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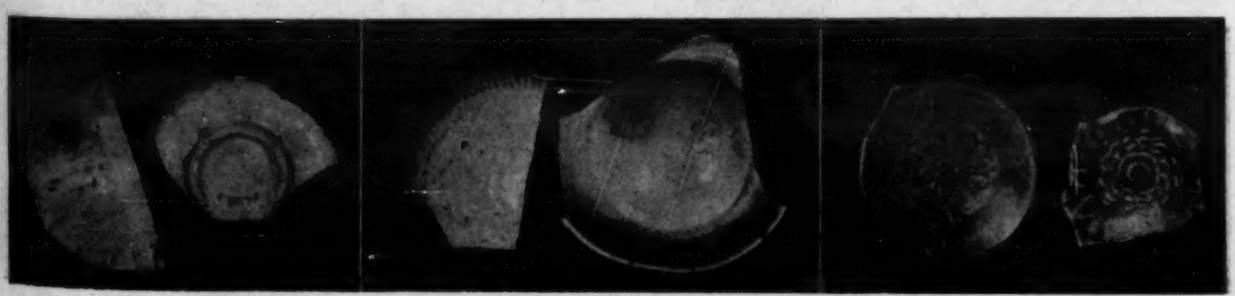
圖六 屈斗宫古树下撿拾碎片情况

（1）新厂 离城約一里余，即在城东的山坡上，現为新人瓷厂所在地。在建厂平地时發現很多碎瓷片及匣鉢，据說搬走了或是掩沒了不少，此刻还多遺留。撿閱結果，全系影青作風的白釉碎片。器物的殘片以寻常之扁形影青匣为独多，匣盖外側花紋大都刻划細綫紋，盖面花紋簡朴而綫条亦細，白釉微带黃。

（2）屈斗宫 从新厂山坡往西南公路边有一小庙名屈斗宫，在公路的后側山坡有很多大可两人圍的古树，碎瓷片即在此处發現，甚至树根下面碎片也堆积極厚（圖六）。碎片的特点有一种形似銅鑼洗的白釉洗，挂釉及底部。底足以中型大的洗子說，高約〇·八厘米，底稍凹陷，是淺挖的結果。洗有大中小三个形式，中型的直徑約一六厘米，胎厚約〇·四厘米，胎土白而坚潔，釉汁白凈中亦略带黃（圖七）。有一种淺碗，外刻細綫紋的蓮华瓣，釉不到底，是复燒的。其次白釉而比較稍灰的，有圈足矮、寬平底的一种小碗，釉不到底，毛边，器物全形非常玲瓏。白釉之外还有一种極象影青的碎片。殘器是淺碗，器底一如小碗的制作，碗的外面有作極細紋纏枝草花，亦極簡朴可爱。白釉中通体微带水青色，但是决非一般影青的积釉可比，所以此种既不同于純白釉，也不能归入影青类，这也是屈斗宫發現宋代德化瓷片的独特处（圖十）。由屈斗宫往东南不远小山上，亦多此种碎片。

除了以上所發現的宋代碎片外，我也到过以下两处：

（1）后所 从新厂往北下坡，沿蓬溪往东，



圖三 碗窑乡蓮化瓣紋器物殘片　　圖四 碗窑乡影青双蓮淺洗及盒盖殘片　　圖五 晋江瓷灶鎮印花紋殘片

此处沿溪水碓頗多。溪水冲击水車，有节奏地轉着車輪石舂，这是研磨瓷土的地方。約三里过灞桥，轉而折西北有土窑多处，此处土窑都作饅头式，一个一个的联續起来，形式看起来有点异样，其实仍旧是阶級窑。傳說后所是明代巨匠何朝宗燒窑的所在，地势極偏窄，不是一个大窑場。

（2）十排格　就是从遶溪的溪桥往南沿山坡处，从引导人的閑談中知道此处碎瓷片亦多，但是蔓草極深，未及細細檢查，只就地面上撿到一点非宋代的碎片。

此外傳說中的古代窑址很多，散在山中，路远的有二三十里，因之不及一一調查。

（三）同安

同安汀溪水庫修建时發現碎瓷片，一九五六年春天曾經福建省文管会派謝之瑞同志到現場勘察过，以工程已进行不及清理，因此有絕大部分可供研究的材料，不幸的都被压在工程里面去了。

公共汽車到同安后雇三輪車約十六里就到了汀溪水庫所在地。当年發現碎片的地方有：（一）壩头山（水壩所在），（二）汀溪山（三）指指部后山三处。（一）与（二）处相距極近，后山約隔二、三里。此次調查所見及的就是（一）与（二）处，也即是現在拦洪壩的左側。碎片的堆积層，从壩的下面直到壩的頂部，数量之多，实在惊人（圖十一）。所謂第三处是指壩的上部往右，从人工湖的沿湖西起，直到西南部的山坡上都是。除此以外据当地人說在壩的西北方面，还有好些地方燒过窑的，可見当年窑場面积之广。至此次所撿拾到的碎片，可以分别說明如下：

（1）青釉　有种种深淺不同的色澤，普通的碗，胎都很厚，最厚的竟达〇·九厘米。碗里凹印双魚，極草率，这是与龙泉的双魚洗不同处。还有印着屈前肢的小鹿，此外也有簡单的花紋（圖八）。碗的外面，大多有直綫的篦形紋，碗里外側有淺刻草花紋，花草間有用竹竿或竹篦所划成的条綫样的联續細点，此种制作在日本人所著的陶瓷器書籍中有的称为由宋代汝窑工人南渡后在南方中国所燒造的划花器物，給它取了一个珠光青瓷的名称。（陶器講座第十二卷第一三八頁有插圖及文字）也有說是浙江省德清后窑的作品。（小山富士夫的中国青磁史稿第三〇九及三一〇頁文字及插圖第一九）（圖九）此次却在同安發見，实出意外。

圖七　德化屈斗宮發現白釉洗盌残片

（2）黃釉　实为青釉未經燒成的作品。它的制作同于青釉，大圈足，挂釉达圈足，有的只有二分之一。

（3）灰白釉　有平底無釉而略現折腰形的洗子，洗中央有像波紋样的划花，簡单而活潑，可以想見划花时一种迅速操作的情景。还有一种小底足撇口盌，釉虽带灰，可是極細潤，胎亦坚潔，盌里同样有簡朴的篦形紋。此外另有圈形紋間以篦形似波浪的划刻，这是同安的特点。

以上几种式样在以往虽有鑒器，都不加以注意，同时此种作品的發見也并不多，想系当时外銷之瓷，因此流傳在国內的反而少見了。

（四）調查后的感想

1. 晋江盌窑乡在县志上有此地名而并不称道它的燒盌；瓷灶有此地名并且还記載了它的燒瓷。就碎片的年代說，也可以証明盌窑乡的碎片沒有了明，而瓷灶的燒造直到現今还是繼續着的。因此元代周达观所著"眞腊風土記"中所謂"泉州青瓷器"，是否有瓷灶的部分出品在內是一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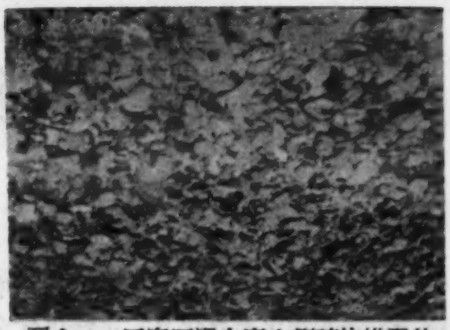
圖八　同安發現的印有双魚及小鹿的碎片

圖九　同安汀溪水庫篦形紋及細点划紋碎片

2. 根据乾隆刊本晋江县志輿地都里条下似乎燒窑的地名还有好几处，如后窑頂（城外三都統圖一）、窑前、窑后（九都統圖一）等地，因之"泉州青瓷器"或許还有在其他地方燒造而尚未發現的在內，这又是不能不注意的一点。

3. 元代的对外市場，泉州最为繁盛，为此凡在泉州附近外县所燒造的窑貨，如同安、南安以至永春、仙游等地，很有可能集中在泉州出口，同样地也就有把来自各处所生产的窑貨一概說成"泉州青瓷器"的可能，尤其是这次發現同安汀溪水庫的青瓷，更有可能为当时对外行銷的"泉州青瓷器"之一，自然不仅在晋江所燒造的才称为"泉州青瓷器"了。

4. 就已發現的泉州及同安古代窑址碎片看来，完整物品之在国內傳世的很少，可以想見当年的制成品似乎都是用于外銷。本来外銷瓷器的来源有：（1）景德鎮的定貨；（2）景德鎮的素坯运到广州加彩的，——那恐怕是最晚的一种外銷貨。舍此以外就是（3）閩南以及广东潮州方面所燒造的物品。此事說来話长，不再在这篇短文內叙述，此刻所要先行提及一点的就是晋江、同安等处在当年所燒造的，恐系外銷用品居多，自用的仅占少数部分，这在以后假定能有参观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館（据聞藏有中国外銷瓷器六十余柜）及馬来亚联邦博物館的机会时，可能会見到閩南及潮州方面一甚至竟是晋江同安等处一所燒制的成品。最近据荷兰莱登（Leiden）人民美术博物館的报告說，在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島（Celebs）南部出土了一个白瓷盒，有細綫样的花紋，就照片来看确实是德化的白釉器。但是此种瓷器在国內極不易見，反而發現在国外，这足以为当时此种物品行銷外国（或当时华侨所带去）之証。



圖十一　同安汀溪水庫左側碎片堆聚处

5. 关于向来文献上所称建窑問題，如景德鎮陶录、朱琰陶說、寂团叟陶雅、梁同書古銅瓷器考以及中国陶瓷史等所談的，大别之有紫建、烏泥建及白建之三种。其地点則初在建安，后迁建陽，亦有說建窑在德化的。近人又有主張黑建在現今水吉县境內，白建則专指德化，而对于建窑二字的含义，如屬广义的說法則指福建瓷窑的总称亦無不可，不过不应把德化窑与建窑混为一談云云。我此次調查晋江之碗窑乡于白釉之外有影青及青釉器，瓷灶則青釉外，又有黑釉，德化亦有影青，同安則全系青釉。是福建在以往所燒制的不只簡单的白釉与黑釉，还有影青及青釉。同时某一地窑，亦不見得专燒一种釉色。可見以往的文献的闕漏与舛誤很多，希望研究者勿专憑文献，拘泥旧說，尽量于实际的調查工作，与以更正或修改，实在是此后研究古代陶瓷者責任。

此外以往对于福建窑专指水吉为黑建，德化为白建，我人已指为不当；就是仅仅滿足于此次調查的結果，如發現了黑白两种釉色以外的影青器青釉器以及宋代已有德化瓷、同安实为一个極大窑場等等以外，对于福建窑的全貌，还是了解得不够的。因为就目前所得到的材料，已經知道福清与宁德两处都因建造水庫而發現了古代窑址，它的作品除青釉外，黑釉的一似水吉。此外光澤、仙游、永春、安溪各地均多碎瓷片發現，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展开一个比較广泛的深入調查，庶几对于福建窑有一个全面的观察。

圖十　德化屈斗宮發現类似影青的一种白釉有細綫紋淺碗及盒蓋的残片。

关于富陽窑瓷器的备忘录

蔣　玄　佁

"中国偉大的發明——瓷器"一書中，說到历代燒造瓷器的地区有富陽县。可惜古代文献上对于浙江富陽燒造瓷器的地点沒有記录。"中国青瓷史略"說："富陽窑遺址尚未發現，它的时期可能是在西汉，这是很少人注意到的在浙江所燒造的極早期的青釉器之一。"

关于富陽瓷器的發現約在一九三四年，当时并未引人注意，亦無人保存。它的發現地点約有三区（可能还有其它地点）。

第一地点是浦陽江口戴村一带，根据出土数量不多，形式質地簡陋粗糙来看，可能是墓葬中的殉葬物。

第二地点是在錢塘江之北，杭州至富陽的公路开筑时發現。由于这一發現，当时曾有人在富陽县城后面到鷄籠山沿江一带的山区又找到了一些殉葬品。

第三地区是亭山下的白龙庵。

从浦陽江口沿錢塘上游而行，到魚山、里山、灵桥。如过了江，可到大岭山下的鷄籠山；如不过江，可到大源鎮。大源鎮口的大路旁有几座大古坟，根据县志，說是孙权的祖坟。坟墓有否破坏，無从知道。近年来墓上作为晒草紙及牧牛之用，坟場漸漸踏为平地。在这一古墓的对面，即为亭山山麓，这一山麓地区，在二十年前有一个姓王的于若干古墓中得到了鉄刀、有花紋的大墓磚及几十件瓷器，当年杭州喜雨台的第一批富陽瓷器的出現，就是这一批古墓遺物。

从大源到場口的二十里途中，其間經过一个小丘起伏的平原，在香山山麓，曾發現过一件青石的石器殘片（我曾把它發表在"旅行杂志"二十五卷第二期）及不可名状的陶炻器殘片。这一带，在以前可能有很多的古墓，但大部分被無意中破坏了。

实际上这一带山地就是亭山的山麓。这一山麓的深处有个古庙，当地人称为白龙庵。庵的前面有十余座堡垒状的大丘，形如联珠，在地形上看，是有計划的筑成联珠状的布置。

大丘高可一丈五六尺，一部分已被掘發，在断崖上可以看到有隧道状的水沟，大可四尺左右，用天然大石叠筑而成。离大丘略远則縮小为二尺左右。上盖天然大石，工程相当大。这种近似隧道的水沟，似与各联珠状的大丘互相連貫，用途仅能作为排水之用。

据說，这些大丘被掘时，曾發現了瓷器，数量相当多，由于太粗糙，当时不值錢，因而破坏不多，約掘了六、七座。当年杭州喜雨台第二次富陽瓷器的發現，就是这些大丘中的遺物。这些大丘，是古墓还是古堡，無法說明。

以上三区發現的古瓷，一般講是同一类型。大部分是盞的形状，極淺，比現在的盘要深一些，徑二、三寸不等，高不及一寸，胎質黃（淺）白色，杂有砂質，釉暗青色，較薄，下部無釉，制作極粗。有些盞的底部由于制作不精，往往成为一个孔。底上一个洞，显然不是用器。

这种古瓷的胎坯，質地粗劣，色帶黃白（与蔣玄佁編：中国瓷器的發明中所列第三系統瓷器的質地近似）。紹兴晋瓷型瓷器的胎坯質地是帶青灰色，显然有不同之处。若以釉来說，一般講来，多是松灰釉，就是薄一些。这些古瓷可能另有一个窑区燒造，但是不是富陽窑，目前很难肯定，正如余姚窑碎片其中也有極早的类型，不单是秘色窑。

当年旅途訪問，目的在史前遺址，因而只是看一看遺址和实物就算了，沒有深入研究。現在既然可假定为汉初的瓷器，那就值得研究了，故将三区情况列出，或可为文物普查工作者做个备忘录。富陽有沒有窑，也不难調查明白的。

中国古代文物流落在收藏者与玩好者手中的很多，希望将在普查遺址中找到的标准标本，在"文物参考資料"上印出一点原色版，那末，看到这种标本的人，就可将易被毁灭的那些遺物收集起来，不至散失。因为窑基中的只有殘器，而完整的都是墓葬中遺物，多少無法鑒定窑口的古代瓷器，就是这样被人忽視而毁坏散失了！

燕下都遺址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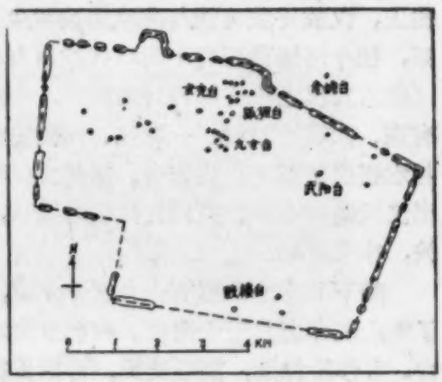
謝錫益

燕下都遺址位于河北省易县城东南五里北易水与中易水之間，在河北平原的西北角上，西北經紫荊关可抵涞源，北通渾源、大同，西趋代州，南可往曲陽、邯鄲等地。从地理位置言，在战国时，当为燕国的一个重要軍事据点。这里含有丰富的物質文化遺存，过去由于傅振倫先生等的調查發掘，給我們提供了不少資料。今年二月，我們利用三天时間，对燕下都遺址进行了一次了解，(参加者有北京历史博物館李錫經、文化部文物局陈滋德、謝元璐、刘啓益，西陵保管所李树田五位同志）茲將所見簡記如后。

据以前勘查，燕下都有城圈存在（注一），有人并标出殘余痕跡的遺留（注二，插圖一）。我們这次所見如下：

西面　循城角村向北直至辛庄以西（再北未去），沿途皆有断續城垣可寻，保存尚好，一般高度似在4—5米以上。我們观察了离城角村最近的一段。該处城垣由版筑而成（圖一），高約6—7米（目測），厚（底下部分）約为6米，夯土層次明显，每層厚約14—23厘米，夯痕較乱而不規則，發現圓形杵窩，直徑有大至7.5厘米者。夯土中夾杂有少量东周时期陶片。

南面　由燕子村西至城角村，尚存城垣遺迹三处。我們观察了最东头的一处。該处城垣长172米，版筑成，夯土層次明显，每層厚11—27厘米，發現平夯。此处夯土土質夾沙甚多，与在城角村北所观察之夯土土質有别（注三）。城垣外散布东周及其以后之陶片不少，而以东周陶片为最多。我們采集的有殘陶紡輪、圓形陶片、鬲檔及石器等。据以前报告云："軍管村及城角村南曾發現有新石器时代石器"（注四），但我們从地表遺物及附近地理环境上考察，此处似無新石器时代遺址存在的可能。前人的报告上均說，南城垣由燕子村东折渡中易水而南，因时間关系，我們未涉河南行，故未知其詳。



燕下都故址略圖

东面及北面　东面在練台庄南有土崗二处，其南端除在东于坻村西在农民窖內發現夯土，或可推定为城垣遺迹外，地面少遺留。北面在西斗城西犹存四处，西斗城三面尚有痕迹，东斗城北还余一段，往东略呈弯曲之处，已成緩慢之土崗，再东已夷为耕地，除在磚瓦窑取土場內看出夯土外，地上痕迹已难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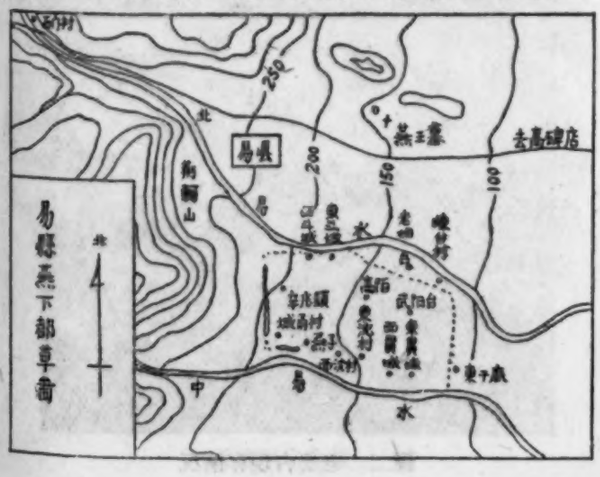
关于城圈我們大致了解如此。該城圈之被确定为燕国时物，是因为：

> "所謂燕下都故城之遺址者，乃考之史書，再得之傳聞，又附会之以齐整而不連續之土堰所成立之說也……。就余所見，足以証其为城墻之唯一事实乃其本身之含品。蓋此土堰純为黃土，而其中曾見有繩紋瓦片之碎屑，况黃土与此碎屑之混合又極形均勻，毫無層次之可言，显系人造品非天然遺物也明矣"(注五)。

我們以为：从以上情况确定为人工城垣是可以的，但全部城垣是否都屬于燕时遺物，还待研究。

水經注易水篇：

> "易水又东逕武陽城南。蓋易自寬中历武夫关东出，是兼武水之称。故燕之下都，擅武陽之名。左得濡水枝津故瀆。武陽大城东南小城，即故安县之故城也。汉文帝封丞相申屠嘉



为侯国，城东西二里，南北一里半。高誘云：易水逕故安城西城外，东流，即斯水也。誘是涿人，事經明証。”

“濡水又东逕武陽城西北旧塌。濡水枝流，南入城，逕柏冢西……，其水之故瀆南出，屈而东轉，又分为二瀆，一水逕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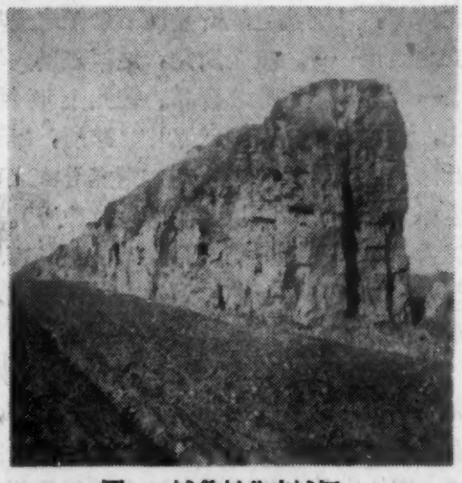
由上，汉故安城可能与燕武陽城發生某些相連关系，犹今洛陽發現有不同时代城垣有相連关系然（注六）。汉之故安，晋时名固安，今燕下都遺址南有东、西貫城二村，一称东、西固安村，其地望略与水經注所講之汉故安合。据县文化科反映：該地出汉代遺物不少。或此二村名之遺留，与汉故安有关，亦未可知。

燕下都遺址內原有土台五十多座，据县文化科了解，現存者只三十余座。我們重点地观察了老姆台。台作阶梯形，頂端突出，台南显露三層，从頂端到第二層都有版筑發現，層次分明，每層厚13—17厘米（不能代表全部）。在頂端夯土中，有东周陶片及布紋瓦。第二層西面土坑中暴露井圈（？）一，凡三节，上下連結。台上为耕地，并挖有紅薯窖四十余个。北董村农民倘紅玉談：他曾开窖二个，一在第三層西南角，深約一丈七、八尺，由窖口向下一丈一、二尺为夯土，以下为活土，除黃土外，未見杂物。一在第三層东南角，深亦一丈七、八尺，由窖口至窖底全为夯土，挖出大量瓦碴。在窖中向左右掏洞时，常遇活土，向下倒塌。据他們的經驗，窖必須打在台子边緣上，因为边緣土硬，向里土軟，容易塌毀（現在窖絕大多數在边緣）。我們認为倘老乡的話頗值注意，它可能反映了一部分老姆台內部結构的眞实情况。台上散布陶片甚多，在我們采集的标本中，除一鬲足外，余均为东周及其以后遺物。我們怀疑：老姆台为人工筑成，时代或不早于燕。我們还看了武陽台。台为燕下都遺址內最大者，頂部平坦，是其特点。台南北边緣，由頂到底，都有版筑遺留，發現圓形杵窩，直徑略与老姆台同。夯土中夹有少量东周陶片。台上散布有东周陶片，并有較晚遺物，采集饕餮紋瓦当一枚。

燕下都遺址內农民口傳有“銅幫鉄底运粮河”，相傳由人工修成，用大石鋪底，以黃土垒岸，層層夯实，避免冲刷。水經注易水篇：“濡水枝流南入城”，“其水之故瀆南出，屈而东轉，又分为二瀆”，疑与农民之口傳有关。关于河的开鑿年代，現尚缺乏科学論断。但台子絕大多数在河道二側，或二者有某些关系亦未可知。河道現已淤塞，我們曾在东斗城东城垣折角处及百福村东，見到淤沙河道痕迹，中并杂有东周陶片。

燕下都遺址內陶片散布范圍很广。老乡說：最多的是城垣南部和城址中間，而以东、西貫城一帶最为丰富。我們所見，亦大抵如此。在东貫城北約三百米处，因农民取土，暴露灰層一段，厚不及一米，有灰坑一，檢視陶片，为东周遺物。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此次在燕下都遺址內所見遺物（包括易县文化館藏数百件器物），除了几件石器（文化館藏）因不明出土層位及在老姆台、东于垴村所拾之二鬲足时代待考外，皆为东周及其以后之遺物（其中东周最多，汉代次之），早于东周之物似極罕見。

关于燕下都的营建年代，傅振倫先生曾引了四种說法（注七），并以“燕昭創之于前，子丹踵之于后”为可靠。但所引之第一說（史記燕世家集解引世本說：“桓侯徙临易，宋衷曰：今河間易县也”），疑非指今之易县而言。今之易县，汉为故安，晋曰固安，隋以后始置易州。汉易县为今雄县地，屬涿郡，后汉屬河間国。宋衷后汉时人，所謂“今河間易县也”，当即指今雄县言。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二：



圖一　城角村北之城垣

圖二　老姆台現存情况

廢易县"在今县（指雄县——笔者注）北三十五里，本燕故邑也。春秋鲁庄公时，燕桓侯徙于临易，即此"，亦可資証明。

綜合以上所見，可归納为以下几点：

（一）燕下都遺址內現尙有城垣遺迹可寻，但全部城垣是否都屬于燕时遺留，不無可疑之处；

（二）老姆台为人工筑成，其时代或不早于燕；

（三）燕下都遺址范圍內所暴露遺物，除極其个别外，似皆为东周及其以后存留，早于东周之物似極少見。

（四）燕桓侯徙都之临易，或指今雄县北之廢易县，与今燕下都所在之易县似非一地。

以上，为我們了解燕下都遺址內情况之大概。因时間匆匆，尙不能認識其眞实面貌之万一。以上意見，亦極不成熟，只提出来供参考。

另外，易县城西約十五里之北門店村北一里，有小型遺址一（为县文化科所發現），原来似有城墻，遺址的东南与西南折角处及北面处，犹有土堰遺留。从土堰痕迹推測，原有城墻面积約为：东西×南北=130×260平方米。內有东周及其以后陶片，而以东周陶片为多。此土堰之时代虽不能判定，但为一东周遺址無疑。老乡云：此处时有大量銅鏃發現。我們在县文化館看了石門农民交来的銅箭鏃，它确是战国时的遺物。石門店的位置适在荣荆关通易城大道的出山口上，在地势上是控制易县通荣荆关、云、代等处的咽喉。此遺址与燕下都可能有很重要的关系。

圖三　磚(正面)

圖四　磚(反面)

陶片上文字

陶壺上文字

殘陶盆沿之划紋

陶盘內之魚紋

（燕下都出土文物拓片均为易县文化館藏品）

（注一）傅振倫"燕下都發掘品的整理与研究"，考古通訊1955年第4期。

（注二）关野雄"中国考古学研究"，1956。据原作者云：此圖轉引自燕下都考古团之实測圖，但我們未見，故从关野雄書中引出。

（注三）城角、軍营、燕子三村皆濆中易水，疑此处夯土中夹沙与濆河取材有关。但据城角村干部孙同志云：离城角村南五里有龙弯头村，有中易水故河道一，但何时改道，不詳。

（注四）同（注一）頁20。

（注五）王庆昌"易县燕墟研究初步"，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彙报第一卷第三期，1930年。

（注六）据考古研究所最近工作結果。

（注七）同（注一）頁24。

殘陶盆腹內壁之划紋

陶鼎蓋上之划紋

圈足陶壺上之划紋

饕餮紋半瓦当

山字形饒陶范

殘 瓦 片

饕餮紋半瓦当

云山紋半瓦当

圈足壺上之划紋

陶壺上之鋪首

殘瓦片

陶器上之划紋

博物館書画儲藏柜的新設計

成恩元

本文所指書画，以中国民族形式的書画为主。

文中所談的書画儲藏柜是专为博物館設計的。私人方面，大收藏家或可采用这种設計，对于一般私人的少量收藏是不適合的。

去年六月間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曾在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規划草案中提出在一九六七年以前写出关于博物館藏品保存(和鑒定)的技术的专書。这是一件偉大的工作，它所包括的內容和范圍相当广泛。对于博物館工作者来說，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鑒于过去六年来国內有关博物館专業的刊物上，关于这一类——藏品保存方面——的文章，特别是適合我国文物的具体情况，探討如何發揚和改进祖国在这方面旧有的优良的研究性文章，刊載的極少，笔者現选擇其中的一点，加以初步研究，作为向这个方向努力的尝試，希望能够引起这一工作者的注意。

一、中国書画装池的特点

我国的書画，不独在艺术作風上构成一种特殊的風格，而且在装池形式上，也构成了一种特有的民族形式。一般西方的繪画(書法方面，当作艺术部門中主体之一的看法，只有在中国日本朝鮮等国如此。在装璜保护不論大，中，小，长方，正方，或横或直，装框或不装框，框子的質料或木或金屬，框子上的装飾或雕刻或無雕刻，总的說起来，都屬于同一类型，即片頁型。另一种是卷置型。西方的画片，虽然在儲藏上也有卷置的，但这一种卷法，与中国書画的卷軸处理方式实际上全不相同。西洋画的"装池"，(如果这两个字可以用在西洋画上的話)大体上只有上述这两大类。这与中国画比較起来，內容相差的很大。

中国書画的装池形式，是世界上書画史中最丰富多采的一章。我們的祖先，在这方面創造了極为卓越的成績。在处理書画艺术上所創造成各种优美的形式，加深的烘托出我們艺术家的成就；同时也构成了我們特有的民族形式艺术的一部份。在这方面，傳統的書画装池形式，有下列各类：

(一)条幅——或称"单条"、"軸"(古代的"軸"，包括較广，一切条幅、大小中堂、手卷等，都包括在內)。一般所指的条幅是比較窄的一种立式書画。它的寬度，大約在70公分以下。高度或长或短，不拘定式。最窄的条幅有窄至30公分左右或更窄的。实际上这种条幅已接近于手卷形式或楹联、屏条等的格式，不过它的长度不及手卷，用法是直观而不是横看。另一方面它与楹联、屏条不同的地方是单条只限于单只，与楹联的成对，屏条的成四，成六，成八，以至二十余条不同。

(二)中堂——或称"堂幅"，包括大、中、小号堂幅。立式寬度大約在70公分以上，150公分以下。高度不拘定式。

(三)横幅——或称"横軸"，"横披"。寬度在条幅中堂之間，不同处只在条幅中堂屬于立式，横幅屬横式。

(四)屏条，通景——屏条(有的人把"条幅"也包括在內)与通景都是条幅的發展。屏条通常多为四幅，多者有六，八，十，十二，以至二十以上者。通景与屏条相似，其不同处在內容上屏条各自独立；通景則虽分裱若干条，但画景內容相連貫，屬于一个主体。

(五)手卷——条幅悬之于壁，手卷則舒之于案。但手卷长度可無限發展，这一点是它和横幅，条幅的最大不同处。一般手卷，寬度約在33公分左右，但亦有更小或更大的。

(六)楹联——通称"对联"，楹联上下两联为一副。就其形式而言，也屬于条幅的發展。

(七)册頁——通常高度在30公分左右，或正方或长方，或裝裱成册，或成散頁，形式較多。

(八)斗方——斗方与册頁相似，册頁裝裱成册，斗方通常为散頁。斗方的原始形状，可能都屬于正方，但到后来也有长方形的，不尽是正方。(其他不規則形状書画裱件，也附屬于斗方項內)

(九)扇面——包括折扇、团扇及其他形式的扇面。已裱装的扇面，通常却屬于长方形格式。

(十)笺条杂类——画笺、版画以及其他不屬于上列各类的画件，形式却無定格。

由于上述各种書画形式的不同，装池方式因而也隨之各异，同时在儲藏上也就要求更丰富更适合的設备。单純地模仿外国或西方的繪画儲藏技术是

不能滿足我們民族形式的特定的要求的。

二　旧式的書画儲藏設备

旧式的書画儲藏，除去随意放置的方式以外，大致可分为两类（包括私人和公家）：一类是个别的小型保护設备，一类是集合的大型儲藏柜。个别的小型儲藏，通常是采用一种布套保护方式。不管是卷形的軸类書画，或成套的册頁、斗方、扇面等，都依照其形式的大小，加上特制的布（包括各种絲織物）套，以資保护。在布套上一般附有捆扎用的条带，比較講究的制成布鈕，以便扣稳。另一种方式是裝以特制的木匣。匣的大小，依照書画的大小用紫檀木、紅豆木、楠木、樟木、桐木以及較好的木料制成。最講究的儲藏設备是布套和木匣的联合应用，即在木匣中再加以布套。一般私人收藏家广泛地采用这三种方式保护書画。博物館也有采用这种方法的。集合式的大型儲藏館，主要的是博物館或古物保管所等大机关所采用的設备。有大量書画的私人收藏家也偶尔采用。这种儲藏柜，通常所見的形式多半是横列式分層的柜子。更簡单的則只裝于大木箱中，和收儲其他什物沒有什么分别。笔者在成都几个博物館中所見的儲藏設备，不外上述各种方式。

这种旧式的儲藏設备，在私人的少量的收藏上，以及对書画的保存上都有他一定的优点（在这一点上，我們应尽量吸收并加以發揚和改进），但在大量的，公家如博物館这样規模的收藏上，便显出了若干缺点。首先是不能够系統地集中，即使勉强集中起来，也不能够整齐划一，这一缺点特别是在木匣，布套的儲藏方法上最为显著。因为木匣、布套都是依照書画形式大小制成，在規格上極不一致，因而也就無法整齐划一地集中起来。其次是提取不便。这一点是旧日横列抽屜式的大型儲藏柜的最大缺点。这种集合式大型儲藏柜，虽然也可以收到集中的效果，但因为是横列抽屜式，当書画集中横置抽屜中后，在儲藏柜外，無法使提取者对某一書的位置所在一望而知。旧日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館所采用的書画儲藏柜即屬这一类型。在每一次提取时，都感到極不方便。虽然在每一格抽屜外面都标明了抽屜中的書画內容，但因抽屜內不分格的关系，所以仍不能很快地找到所提取的东西。至于旧式的深桶形儲藏柜的不方便，就更不必說了。

上述两种缺点，說明了旧式書画儲藏設备的不够科学化、系統化的地方。对于这一缺点，我們必須加以改进，同时对于它的优点則加以吸收和發揚，这样才能够提高我們的工作效率，使博物館的保管工作更向前推进一步。

三　新式的書画儲藏柜

針对上述旧式書画儲藏柜的缺点，我覺着我們的新式書画儲藏柜应当依据下列各原則設計：一、便于集中管理；二、便于儲放、檢查和提取；三、系統化。当然，在防虫、防潮方面也不应当有所忽視。

根据上述原則，作者所設計的書画儲藏柜是一种縱列式的分格儲藏柜。縱列是这一种儲藏柜的主要特征。同时，在吸收优良傳統方面来講，也可以說这一种儲藏柜是若干旧式木匣的联合体。在保存、防虫、防潮等应用上，它有旧式木匣的一切好处。它的最大的优点是縱列放置，可使提取者对書画的內容，一目了然，同时，因为是集合体，所以也符合"便于集中管理"的要求。依据書画形式，以及儲藏室的具体要求，这一种縱列式柜，可以制成各种大小类型不同的儲藏柜，使書画的保存和管理，簡明、方便、集中和系統化。它的設計及簡单說明，分列于下：

（一）条幅儲藏柜

条幅儲藏柜是专門为保管单条書画用的。有的屏条和通景的寬度也接近单条，但大多数和楹联相似，所以屏条和通景仍以归入楹联式儲藏柜較为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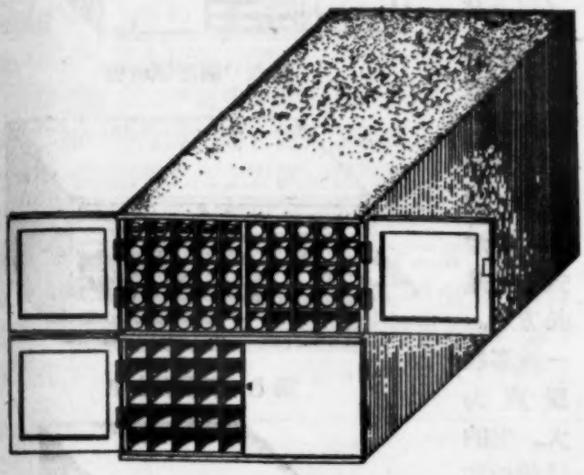
单条儲藏柜（見圖一）的深度以一般条幅最寬的寬度再加三至五公分計算（这里另加三至五公分是为了放置樟脑，石炭酸球等防腐物的面积而加的），設計为85公分，（包括儲藏柜的前后夹板厚度，以下所列尺度均同）。每柜設五横列，每一横列为十孔，每孔寬高各8公分，柜的全寬为94公分（包括边板及夹層厚度，夹層厚一公分。全高48公分（包括底盖厚度），全柜可儲藏条幅五十幅。

儲藏柜的柜門設計为双开式，暗鎖。单扇門及上举推入式門都不及双开式者方便和坚固。

为了便于檢取書画，儲藏于縱列式儲藏柜中的書画，都应在画軸的右端貼上簡单的說明签。签上記登記号及書画时代名称。例如儲藏时依編号（登

圖一　条幅儲藏柜

記号）次序，由左上角第一列开始，直至最后一列（第五列）右下角止。储藏柜外，可在右扇門上中央及上角貼一藏品名称号碼总表。储藏柜打开之后，所有藏品的內容即全部呈現于眼前。



圖二　中堂儲藏柜

条幅儲藏柜較楹联柜深大，制双層柜似較笨重，移动不便。只制单層柜即可适用。若儲藏品过多，不足应用时，可增加单層柜的数量以解决。（当然，对于儲藏設备面积寬大的博物館，制成双層柜亦無不可。）

書画横幅，一般都比較窄，有时和手卷、楹联的寬度差不多。但也有較寬和条幅式中堂相当的。就大多数的情况而論，以归入条幅式儲藏柜較合适。如果有寬如大中堂一类的横幅，不妨再制一种中堂式儲藏柜。

（二）中堂儲藏柜

中堂儲藏柜的形式构制和条幅儲藏柜相同，只在深度上增加一些尺度。（見圖二）

中堂本来可以依照大小分为三种：小中堂，中号中堂，特号大中堂。为了簡化起見，中堂儲藏柜只設計了两种。把小中堂和中号中堂（一般所称的"大中堂"）合并为一。寬度以105公分以下为度。超过这个数字的中堂，都归入特号大中堂柜中。

中堂儲藏柜的总深度为115公分。

其他規格尺度都与条幅儲藏柜相同。

圖二所示为双層式儲藏柜（单層柜减半即得）。

（三）特号大中堂儲藏柜

中堂寬度在105公分以上者归入特号大中堂。这一类書画数量上比較少，但每一个博物館总免不了有一些这样大的中堂書画。对于这一类書画的儲藏柜不能完全采用縱列式，作者采用了分格的横列式柜（見圖三）其原理与縱列者相似，但在提取書画时，可以不需用很长的空間面积。如果是縱列放置，則提取时，由縱列一端抽取，势必需同样画长的面积，才能够取出。这在一般有限的儲藏室空間上講，是非常不經济的。如果是横列式，在提取时，由側面取出，完全可以不必再需要过长的空間。与前者相較，显然方便得多。

但和一般横列式柜不同，作者主張横列分格（以每一層为单位）。这和縱列分格意义一样，只是前者由横的一方面看，后者由縱的一方面看。分格的目的，仍是为了更系統化，更清楚，更便于提取。在横列分格式柜外，需要貼上分格中由左至右順序的品名編号表，使提取者在未开柜之前，即可一望而知标本的所在地。

特号大中堂因为数量較少，每列放置可以不必过多，以五格較妥，每柜五層，全柜儲藏二十五幅。不敷用时，可增制单位柜。

特号大中堂柜由于从側面提取，書画軸不能外露，所以在軸端不需粘貼品名編号表，但需写在書画軸的右側尽处（即書画背后右側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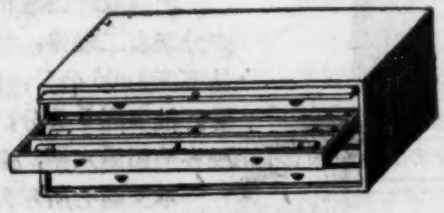
由于这种儲藏柜特长，所以柜門也不适于双开式而必須采用上举推入式才比較方便。

除过长度和格数的减少外，其他規格与条幅儲藏柜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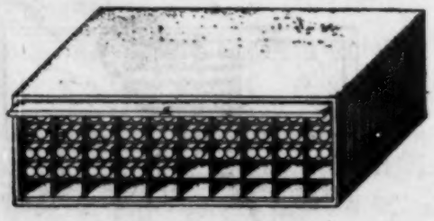
（四）楹联儲藏柜

楹联、屏条、通景、手卷的特点都是寬度（高）較窄的。前三者形式更为接近。楹联成对，屏条和通景多幅（都为双数）。在儲藏柜規格上，宜归于一类。手卷多为单独成件，宜仿照楹联柜另列一型（只减少其每孔的寬度即可。如求簡便，利用楹联柜儲藏，亦無不可）。

楹联因为是成对的，所以在儲藏柜設計上（見圖四），每格的寬度加至14公分，使每孔都能容納一对。同时又因为楹联較窄，在深度上减为60公分。每柜仍分五層，横列，每列十孔，全柜可藏楹联五十



圖三　特号大中堂儲藏柜



圖四　楹联儲藏柜

副。

楹联柜深度浅，与其他儲藏柜相較，重量輕巧，所以除过装儲五十副的单層儲藏柜外，还可以制双層柜（上下連二柜）。一般博物館在楹联，屏条，通景方面的收藏量，都比較多，若以双層柜为单位，在适用上也不会感覚过大。二者亦可配合应用。

楹联柜除每格的寬度及全柜的深度外，其他規格与单条儲藏柜相同。

（五）册頁斗方儲藏柜

册頁、斗方，形式与書画軸卷全异（斗方裱装成軸者，附于条幅之后），因而儲藏柜的設計也是完全不同。但在求其簡便、系統化、适用上講，这一原則是貫通的。

册頁斗方儲藏柜的設計，采取淺抽屜式，分大小两种，而以小抽屜柜为主。（見圖五）。

小型儲藏柜分两列，每列十層，每層高度为4公分，以儲放厚度平均1.5公分的册頁两册为限。每層寬50公分，深70公分，每層面积大約平均可存放小型长条式册頁三册（两列共六册）成方形大型长条式册頁二册（两列共四册）。全柜（下層大型柜除外）两列十六層，大致可儲小型册頁48本或大型册頁32本。册頁如屬散片（未装訂成册者），大致可儲放六百余張。

每層抽屜外，設凹形扣手二，以便啓閉。两扣手間可粘貼儲藏品标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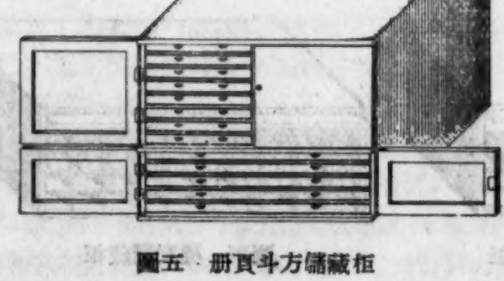
大型册頁斗方儲藏柜的寬度为小型柜的二倍。附列于小型柜的下層，共五層。其他規格都与小型者同。

（六）扇面儲藏柜

扇面儲藏柜外形与册頁斗方柜大体相同，但其內部迥异。

一般博物館所收藏的扇面，就其形式而論，不外三类：

第一类：裱装成散頁或成册的折扇和团扇扇面，这一类是主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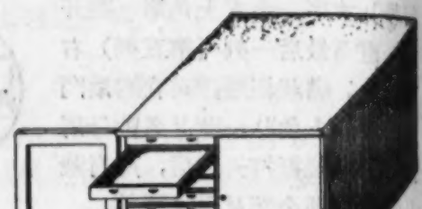


圖五　册頁斗方儲藏柜

第二类：折扇的成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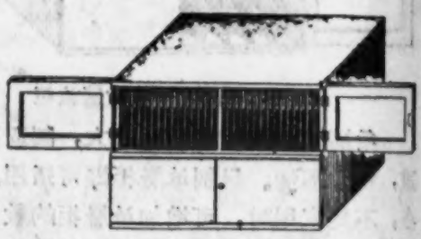
第三类：团扇（以及其他形式的扇）的成扇件。

已裱装的扇面，在形式上都是长方形。一般都較册頁为大。它的儲藏柜和册頁斗方者大体相似，采用淺抽屜式（見圖六）。每列十層，每層高5公分，其高度大的可容双折散頁二十五張左右（二十五張便于計算，較为合适）。儲藏柜深度为65公分，中間分隔为二，左右两格各存二十五張，共五十張。两列合計，每層可儲藏扇面一百張。全柜十層容納量为扇面（双折者）一千張。若为单層散頁，約可儲放二千張左右。



圖六　扇面儲藏柜

圖七　折扇联合柜



圖八　立置式团扇儲藏柜

折扇、团扇的成扇件，因数量通常較少，二者的儲藏柜可合并訂制，也可以附于某一裱装扇面儲藏柜的最后几層內。

折扇成件的儲藏柜也采用了分層淺抽屜式。假定儲藏品較多，需要单独制柜时，其寬度当为87公分，共十層，每層分隔为縱列二十格。每格寬3公分，抽屜高4公分，全高共53公分。每格以儲藏成扇一柄为度，全柜可存折扇二百柄。每格除放置成扇外，在后面余空中可放置樟腦或石炭酸球等防虫剂。

团扇成件儲藏柜与裱装扇柜面略似。抽屜內部亦分左右二縱格，每格寬30公分深46公分，双排总寬度为66公分，每格縱置团扇一柄，可重疊三層。抽屜高5公分，全柜十層，高63公分，每層抽屜容納团扇六柄，全柜共可容納六十柄。

本文圖七所示为折扇团扇成件联合柜。柜分两

列，折扇团扇，一左一右，柜全高67公分，深50公分，折扇因本身高度較低（4公分）設計为十三層。团扇抽屜較深（5公分）設計为十層。折扇每層十五格每格寬4公分（其中左首二格寬5公分，以备儲放較大的扇子），每格儲放折扇一柄。折扇部全高66公分。团扇部設計与前段所述相同。全柜共可儲藏折扇150件，团扇約60余件。折扇团扇，二者并列，应用上比較方便。

团扇除上述平置式儲藏柜外，亦可設計为立置式柜。这一种立置式柜，因为是以每一件团扇为单位，并可在扇格夹板上左側貼置品名号碼标籤，所以在应用上，也有其优点（比較更系統化）。本文圖八即按这一儲藏法設計。柜分上下二層（也可制成单層柜），寬度94公分，双層全高66公分（单層高34公分），深度44公分。每層縱列三十格，每格寬2公分，儲团扇一柄。全柜可儲团扇六十柄，（立置式团扇柜的設計，曾蒙任二北先生提供宝貴意見，笔者在此附致謝意）

本文所設計的参考圖，为作者对我国博物館儲藏民族形式書画的保管方面提出的初步建議，缺点和不足的地方很多，希望在今后实踐中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附記：关于書画儲藏柜的木材問題，文中沒有詳細談到。对于这一問題，不独需从木材的好坏上考虑，而且需从来源和經济上詳加研究。因此作者准备以后另写专文时，再加討論。

此外对于另制专用木柜是否經济，也有人提出問題。我想，如果能够提高博物館工作的效率，能够使祖国珍貴的文化遺产得到更妥善的保护，就是符合了增产节約的原則。因之，关于这一点，我想不必再引証經典著作中的理論依据，也够明显的了。

国·外·簡·訊

朝鮮第一次發現一批原始人用的石犁鏵

朝鮮考古工作者最近在黃海北道鳳山郡智塔里第一次在朝鮮發現了一批原始人用的石犁鏵。这种用青石板制成的石犁鏵长約三十公分，寬約十五至二十公分，厚約二公分；这次一共發掘出三十个。

据参加这次發掘工作者的朝鮮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說，这种石犁鏵同中国內蒙古出土的石犁鏵很相似。另外，这次發掘出的石鐮刀同中国殷墟出土的很相似。

这些古物是在智塔里附近的一座被称为"唐土城"或"古唐城"的土城廢址中出土的。在朝鮮战爭期間这里曾經發現过一些古石器和陶器。今年四、五月間，朝朝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在这里掘出了一百多件石器、陶器和数千件石器、陶器的碎片。在最近这次發掘中，在离地面一公尺多深的地方發現了两处原始人穴居遺址，里面有石槍、石鏃、石斧、石磨、石槌、砥石、石魚网墜、石犁鏵、石鐮刀等石器和带有櫛紋、波紋的缸、罐、瓶等陶器。在这个原始文化遺迹的上面还發現了一座古代的有十二个礎石的建筑物遺址，另外还發現了鉄箭头，釣魚鈎，青銅指环以及带有中国西晋年号"太康四年"字样的汉系磚和五銖錢。朝鮮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員說，这次出土的文物对研究原始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轉載自9月8日新华社今日新聞）

非洲刚果發現古文化遺物

美国"紐約时报"最近刊載一条消息說，在非洲比屬刚果的伊尚果地方最近發掘出了史前期文化遺物，从这些遺物可以看出，八、九千年前在那里生活过的人已經懂得十进位算法和用乘法計算簡单的数目。

在伊尚果發掘出来的史前遺物有：一塊完整的和許多破碎的人类顎骨，顎骨上的牙齿同"北京人"的一样大，此外还有一些头盖骨碎片和不完整的四肢骨，許多屬于中石器时代的原始手工制品，如耙土器和鑽孔工具等，还有两百多个带有齿状物或倒鈎的魚杈，最有趣的發現是一个长約四吋、直徑不到一吋的圓柱形的动物骨头，这塊骨头被認为是一种最原始的算盘或者乘法表。

据說，伊尚果不同地層中的不同遺物可以清楚地說明中石器时代原始人的进化情况。从遺物上面的火山灰烬看来，"伊尚果人"是在大約七千年前烏干达西部的卡特韦火山爆發时被毀灭的。現在比利时地質学家海因澤兰正在对伊尚果作进一步研究。

（轉載自8月7日新华社新聞稿）

再論有关地志博物館当前的中心任务問題

陈　生

一九五七年第七期文物参考資料刊登了几篇有关地志博物館的文章。几乎每篇都談到了一九五七年第三期文物参考資料上我写的“有关地志博物館的两个問題”一文。并且提出了不同意見。我反复地閱讀了这几篇文章。得到很多啓發，也了解了有些地方的具体情况。应該承認，强調“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为中心任务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籠統而机械地說要一律把它首先摆出来是不很恰当的。因为我們絕不能机械地認为首先搞好这一部分，就应該把已有的陈列撤陈，或者即刻停止現在正在进行的其他工作。而是应該使已有的陈列繼續陈列，但是不要再投入更多的力量，正在进行的陈列应該繼續进行，但是必須同时以一定人力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的工作。至于几个部分基础相差不多，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的基础稍差，則仍应首先搞好这一部分的陈列。因此，在目前要求以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为中心任务，是与首先可以摆出那一部分并不矛盾的。前者是“重点”，后者是“因地因館制宜”。保証重点和和因地因館制宜是应該密切結合的。問題在于，究竟是在服从保証重点的前提下因地因館制宜制呢？还是只强調因地因館制宜，而把重点工作放在次要地位呢？标志着这一分歧的具体表現就是力量分配問題。正是在这方面，与实际情况对照起来我对同志們的有些意見还是不敢完全苟同的，願与同志們做进一步的討論。

首先，我認为和平同志“对因地因館制宜方針的一点体会”这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因地因館制宜”并不是也不应該是地志博物館的事業方針。它只能是貫徹方針的方法。因为方針是要有具体內容的。而“因地因館制宜”却沒有任何具体內容。它只是要求我們应該从实际出發，結合具体情况，更好地具体貫徹既定事業方針。这正是适合于一切工作范圍的馬克思主义基本原則。如果我們錯誤地把它本身即理解为方針，其結果就是取消了方針而听任自流了。同时，和平同志說：“自一九五六年初中央文化部在召开的全国文化局长会議上提出地志博物館的因地因館制宜方針后，同年又在全国博物館工作会議上做了肯定。”这也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据我所知，在文化局长会議和全国博物館工作会議上虽然提到了“因地制宜，因館制宜”，但并不是做为方針来提出的。几年来，对于地志博物館的具体方針，一直在强調必須密切結合国家的政治斗爭和經济建設，举办具有現实意义的陈列和展覽。这在历年文物事業年度方針任务中，写得很清楚。至于举办甚么具体的陈列和展覽，采取那些具体的办法，当然需要因地因館制宜。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因地因館制宜。对于既定的方針和基本原則，是不能因地因館制宜而加以改变的。正是为了貫徹上述方針，所以王治秋局长在全国地志博物館工作經驗交流会上的發言才。“建議各地志博物館首先将社会主义建設部份陈列出来。”一九五七年度文物事業的方針任务下达时又明确肯定了这一点。因为这样是最适应上述方針要求的。

不可否認，在貫徹一个方針时，总会遇到各种不同程度的困难和障碍，特别是思想障碍。因此，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我們是否从思想上認識到它的重要性。和平和譚維四同志列举了許多理由証明：“要求不同地区的地志博物館强求一律必須首先摆出某一部份来是不适当的。”我却認为有些理由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不同的地区并不是确定先摆那一部份的决定因素。和平同志認为中原、沿海和少数民族地区都各有其不同的条件，因而也为各种不同內容的陈列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应該根据这些条件来决定先摆那一部份陈列。我認为这种說法是不够全面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特点和条件是客观事实，但是如果以此为据作为反对要求一律先搞“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的理由就不充分了。因为和平同志只看到了各地区的不同条件，却忽視了各地区之間的共同条件。这就是全国各地区在建国以来都經历了天翻地复的变化过程。都进行了空前未有的大規模社会主义建設。在这一点上，全国各地是毫無区别的。正是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建設的發展，为我們各地区的地志博物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的陈列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不是显而易見的事实嗎？既然全国各地博物館都具有这个有利条件，也就为要求全国地志博物館一律先搞“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的陈列提供了可能性。我認为和平

同志所指的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只是决定各館应該因地因館制宜，在各部份陈列的內容比重上和表現特点上应該有所不同，不能强求一律。而决定当前的中心任务，却应該服从于当前的政治要求和它們所具备的共同条件。所謂政治要求，就是必須密切結合国家的政治斗爭和經济建設。这也是必須强求一律的。

为了說明各館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的可能性，我們不妨对全国地志博物館的情况，做一簡单的分析。目前我国一共有二十七个地志性博物館。其中只有河南、浙江、黑龙江三个館是旧館改变为地志館的。其他館都是解放后才新籌备的。如果說旧有基础应該首先充份發揮作用，那么，这三个旧館都已經根据旧有基础和条件举办了陈列和展覽。其中黑龙江館三个部份都已初步摆出来了。其他两个館在目前开始首先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的陈列也并不存在着与旧基础之間的矛盾。至于有些新館虽然过去从文管会或其他单位接收了一些不系統的历史文物或其他标本，但并不是甚么固有的基础和条件。而是后来逐漸丰富起来的。有的同志却偏偏要强調这些基础和条件。当然这是今天的客观实际，也应該从实际出發，因地因館制宜；孰不知这些基础和条件的形成，除了客观原因以外，正是由于主观上重点不明确，抱着有什么摆什么或者是舍难求易的观点所發展的結果。因为在开始时，各个新籌备的館，基本上都是需要白手起家的。如果当时重点明确，始終不懈地全力以赴，結合各个时期中心任务及时和有計划地进行搜集工作，为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而努力。是絕不会毫無所获的。这样，它們今天的客观实际将不会是現有的基础和条件，必然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的基础和条件。黑龙江館是个旧館，他們三个部份都搞出来了，虽然陈列質量也許还不能尽如人意，但是却說明了，只要眞正予以重視，"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是完全可能搞出来的。条件是需要創造的，而不是可以等待形成的。事实証明过去所以沒有为这一部份打好基础，并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肯不肯做的問題。現在和将来也同样是如此。这种情况是必須加以改变的。据我所知，有些館到目前为止，还根本沒有把主要力量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的方面来。固然体現工作重点，孰主孰次不完全在于首先可以摆出那一部分陈列。但是体現重点的根本問題就是力量分配問題。据說有一个博物館全館几十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却只有几个人。他們在理論上也承認应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为重点，但是在实践上却与他們所承認的理論完全背道而馳的。在力量分配时根本沒有保証重点。这种情况如果听任下去，再过几年仍然是不会搞好的。为了迅速地改变这种情况，我們不能只是强調了今天的客观实际，而更重要的是要强調改变不重視"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的思想，在保証中心任务的前提下，因地因館制宜，从而認眞地貫徹中央的既定方針。

我們認为一些同志不重視"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除了由于客观基础所形成的不自覺地"重古輕今"以外，主要是对这一部份陈列的政治意义認識不足。沒有从政治观点出發，只从个人爱好出發。甚至有些同志思想上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不正确的思想。有人不願意搞"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認为它沒有专門学問，是費力不討好。他們热衷于自然或历史之部，是因为有畏难情緒，或者是为了个人偏好。在这里必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的全部內容，正是極其丰富生动而深刻地表現了創造性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結合的历史过程。这正是最大的学問。也有人缺乏政治責任心，只滿足于已有陈列，怕麻煩，甚致以毫無教育意义的展品进行陈列以迎合部份落后群众的趣味，但是忘了博物館是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宣傳教育机关。这些思想是我們应該注意糾正的。

至于和平同志認为"社建之部由于內容广泛，在征集，陈列上，普遍感到有很多困难。"这的确也是事实，任何工作都不会完全一帆風順。特别是在这方面我們还缺乏經驗，有时感到無从下手，这正是需要我們在工作中摸索和积累經驗，逐步加以解决的。我們絕不能因此而产生畏难情緒，問題还在于我們的主观努力。事实上，其他两个部份又何尝十分容易？建国已經八年了，很多有关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材料已經不容易搜集了。如果今天畏难而不抓紧搜集，实际上困难依然存在，迴避困难并不等于克服了困难，而且这些困难絕不会日漸减少，而是随着时間的飞逝会与日俱增的。可以想見，明天的困难在有些方面还会更多于今天。

最后附带要談到的是和平和譚維四同志一致認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才能适应密切結合国家政治斗爭和經济建設的要求。""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的确，乍看起来，"只有"二字似乎頗有語病。如果仔細分析一下，我看还是可以的。我不同意譚維四同志認为我的說法"实际上就否認了自然之部和历史之部陈列的作用，或者說至少是貶低了它們的作用。"我的体会是地志博物館三个部份的陈列各有其不同的作用，彼此是不能相互代替的。强調某一部分本身所应起的作用，絲毫也不

否認或貶低其他部份的作用。譬如像和平同志指出的历史之部“在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中宣傳我国悠久而优秀的历史文化，以繼承旧有的文化而發展社会主义的文化”的作用，不正是只有历史之部才可能适应这个要求嗎？显然这种提法也不会否認或貶低其他部份的作用。我們說密切結合国家的政治斗爭和經济建設，是指着直接反映和推动国家的政治斗爭和經济建設而言的。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說它是最具有現实意义的。就以最近的反右斗爭为例吧。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右派分子猖狂向我們进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企圖抹煞我們建国八年来的建設成績。如果我們各省市地志博物館都已經陈列了足以表現我們社会主义建設成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無疑地将成为粉碎右派分子讕言的有力武器。而“自然之部”和“历史之部”是不可能起到这个作用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們說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才能适应这种要求”有甚么不对呢？当然，三部分之間是有机联系的。它們之間虽然各有其不同作用的区别，但是总的說来对人民进行教育的作用是一致的。既然起了教育人民的作用，也就有了現实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說，我用“只有”二字就不确切了。但是这个現实意义和我所指的現实意义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因为我們所指的是及时而直接反映国家的政治斗爭和經济建設的現实意义。綜上所述，既然我們地志博物館的当前方針是必須密切結合国家政治斗爭和經济建設，举办具有現实意义的陈列和展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又最能适应这种要求，我們就完全有理由說，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部”应該是当前地志博物館的中心任务，

以上是我对当前地志博物館的中心任务問題的一些体会，可能是錯誤的，希望同志們指正。

談确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两个問題

朱　江

把文物分期分批的普查鑒定，置于国家法律保护之列。这無疑是最有效的和最好的保护文物办法之一。这是一件新的工作，过去沒有經驗，档案資料也缺乏，必須从头摸索起。我們在这工作进行中就碰到两个問題：

第一是文物分等級的問題。第一等是屬于全国性的文物报請中央保护的；第二等是由省来保护的；第三等是由市或县来保护的。在江苏省公布的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五位先生写信提意見：“宗澤与韓世忠同为抗金名将，何以把鎮江京峴山的宗澤墓列为二等，而把苏州灵岩山韓世忠的墓列为一等？”

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目录草稿發往各市（县）征詢意見后，常州市唐玉虬先生提出意見，認为把明抗倭名将唐荆川墓列为二等，邓廷楨、关天塔墓列为一等，似有不妥。

这个問題，就是在确定文物保护单位的等級时，沒有深刻研究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价值和紀念价值两方面。因为有許多文物单位不一定有文物价值而有紀念价值，如揚州的史可法衣冠墓和紀念他的祠堂；而另一些文物单位不一定有紀念价值，而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如南京附近的六朝陵墓石刻，此外，有些文物单位既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又有重大的紀念意义。牽涉到历史人物評价問題，更是一件錯綜复杂的事情。

对这个問題，有人主張繼續照原定的方法分等級，也有人主張根据文物单位的两个方面来确定，具有全省性和全国意义的文物，統一納入省級文物保护单位，一般文物，則列入市（县）級文物保护单位內。至于把一些有很高文物价值和重大紀念价值的文物单位报請中央列入国家保护之列的，必須慎重提选；既不能把具有全国意义的文物降低到地方水平，也不应把一般文物，强爭入国家保护之列。实际上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文物，除个别的中央設立专門保管所来保护以外(如敦煌莫高窟)，其余的文物还不是具体交由地方保护。

我贊同后一种办法，这样既明确了評定原則，又可以避免許多糾紛。

第二是要不要把許多名胜古迹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問題，一直是討論拟定文物保护单位时的爭論焦点。事实上江苏省已把这类性質的东西，納入文物保护单位之列了。如南京莫愁湖的胜棋楼，相傳是朱元璋和徐达下棋的地方；揚州的廿四桥，早已不是杜牧詩中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的那种景物了，且“廿四桥”还有两种不同的說法，一說是現在的这座桥处，一說是指二十四个桥而言，至今尚未有定論。个人愚見，把这类东西强納入文物之列，是沒有实际意义的，可划入市（县）园林管理处的工作范圍。

我对"因地、因館制宜方針"的認識

巨　成

今年"文参"第七期刊登了和平同志的"对因地、因館制宜方針的一点体会"一文，当我讀完之后，总覺得有个問題沒有解决，这不在于列举材料本身，也不在論述的方法，而是作为因地、因館制宜这样一个方針我認为是不妥当的。我覚得有提出研究的必要。

我認为因地、因館制宜是不能作为一个方針来提出的，其主要的根据是：首先从理論上看，我們知道馬列主义教导我們一切从时間、地点、条件出發。这不仅是辯証唯物主义的反映論，而且也是一个方法論。这就是說，当我們进行任何工作时，不仅开始要以当时的时間、地点、条件为基础，来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解决問題的方法，而且在实际执行中又必須根据时間、地点、条件变化随时修正自己的办法，这叫"从实际出發"、"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这一基本原理，不仅对我們博物館事業来說，而且对其它一切工作都是必須严格遵守的原則。但是如果把从时間、地点、条件出發当成方針的話，那就不对了。毛主席說："我們是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主义叫我們看問題不要从抽象定义出發，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發，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針、政策、办法来。"（着重点是笔者加的）。毛主席又說："按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針，这是一切共产党員必須牢牢記住的最根本的工作方法。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發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們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方針，这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訓。"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其一，方針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为了正确反映客观，就必須占有材料之后經过分析才能找出，其二，正确的方針不仅来自客观实际情况，而且在执行中还必須加以檢驗，并要与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相結合。根据以上两点認識，再来分析一下因地、因館制宜方針，所謂因地、因館制宜具体的說，就是要我們在博物館事業承認存在决定方針，要我們主观符合客观。这只不过是一个思維对存在的关系問題，而这个問題是并不需要經过分析就可以明白的，同样也無需檢驗，無需补充，因为你不顧及客观条件你就会碰壁。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即因地、因館制宜是不能作为一个方針的。

其次我們再从实际工作中考察一下，如果执行这样的方針势必产生以下問題：

1. 这样一个方針并沒有反映出博物館事業的性質和特点，因而不能正确地指导我們工作。我認为"因地、因館制宜"的方針同样适用于其它事業，試問工厂为什么不能因地、因厂制宜呢？合作社为什么不可以因地、因社制宜呢？一个学校为什么不可以因地、因校制宜呢？……如果說有特点的話，只能說是一个"館"字之别。但是我們拋开合作社、工厂、学校外，用圖書館、文化館豈不是一样嗎？那么因地、因館制宜如果是一个方針的話，那也太一般化了。另外据了解，这一方針是仅仅适用于地志博物館的，那么也会給人这样的一个影响：似乎其它性質博物館（如紀念性、专門性的）就不能或不应当因地、因館制宜了。

2. 这一方針它反映不出我們博物館事業当前状况和它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現时期对博物館事業的具体要求。据我看来，只要主观与客观的存在，只要博物事業存在和發展，这一因地，因館制宜的"方針"就永远适用，这固然是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但它不能积極鼓舞我們前进。

3. 强調这一方針，就会在实际上必然导致这样的結果：博物館事業不是在执行一个統一的方針，而将会出現許許多多的方針，因而也就是必然是各行其事，各搞一套。我覚得在方針問題上是不能"百花齐放"的。这是一个原則問題，我們必須坚持。同样沒有原則的灵活性，我們也要坚决反对。

4. 采取这样的方針，不仅容易使我們对博物館事業放松領导，而且也难于領导。因为这一方針（因地、因館制宜）它只强調照顧地方特点，而沒有給博物館事業找出一个大家都必須遵循的指針和一般要求，因此在衡量和鑒定博物館工作时就沒有一个統一的标准，也难于檢查督促和發現問題，提出改进办法。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看出把因地、因館制宜做为方針，不但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将会产生許多不良結果。

至于和平同志在他的文章末段說到："因地、因館制宜的方針是有生命力的，是合乎地志博物館的

我对地志博物館陈列工作中几个具体問題的意見

春　生

今年三、四月間，我去东北几省各博物館学習，在与同志們接触中，有些同志提出了在博物館的陈列中实物与模型在陈列中的地位；布景箱的設計是眞的景子好(指自然环境而言)，还是事情眞实即可；在陈列中要不要宣傳先进人物和先进技术；在某些部分应不应該陈列各項事業發展远景等几个問題，在这里我想談談个人的看法。

关于实物与模型在陈列中的地位問題。又涉及到两个問題，一个是实物与模型在陈列中各自的地位，一个是实物与模型在陈列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关于前一个問題，我們首先应認識到实物是博物館陈列的基础，在各部分的陈列品中，它应該在整个陈列中占主要与显著的地位，因为只有实物才有眞实的意义，才能使人有眞切的感受，能为科学工作者提供出最眞实可靠的材料。关于模型它只是陈列中的一种輔助材料，其作用有：1. 来弥补陈列品中的实物不足，并可以通过它来进行科学复原工作。如王天木同志根据后汉書張衡傳、历史文献及考古材料所复原的張衡地震仪在陈列中就起很重要的作用。2. 可以节省陈列用地。如一个巨型的渦輪水力發电机，它的体积不是一两間房子所能容納的，但如我們将它縮制成为一定比例的模型，同样可以反映出它的眞实面貌；3. 可以在小的体积中表現出复杂的构造，如我們在沈陽东北工業陈列館所看鞍鋼七号炼鉄爐的电动模型开动时，就可以清楚的看其全部送料、冶炼、出鋼等自动化的生产过程；4. 从价格上来說模型比实物要經济得多。上述种种作用，都是实物本身不能代替的。但是在这里还应該說明，模型終归是模型，不是实物，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使用，我們不应該因为有模型，就放松对实物的征集。

第二，关于布景箱的处置問題。是眞的景子好呢？还是只要是事情眞实就可以，不一定要眞实的景子呢？我認为首先要看这个布景箱在陈列中要表現些什么，說明些什么，然后才能决定。譬如我們要用布景箱来介紹韶山村毛主席故居，就必須将眞实的景象表現出来，絕不应該失实；否則就不可能反映出韶山村的眞实面貌，反而歪曲了眞象。但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則不一定强求这样的眞实，而只要表現其代表性即可。例如我們要布置出这样一个布景箱，要表現出国民党与日伪时期对森林野蛮落后的采伐和今天人民的森林工業对森林的科学合理的采伐；只要把前后的眞实采伐情况如实的反映出来就可以，至于那衬托的森林背景，就不必苛求与某一地区一样——也就是說可以不受某些具体地点条件的約束。

第三，关于在陈列中应不应該宣傳先进人物和先进技术的問題。我的回答是应該，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人类的历史，是生产者的历史，生产的發展与提高，与生产技术革新是分不开的（当然还有其他条件）。所以我們在說明历史与成就时，应該将历史事件与典型先进人物联系起来。如我們在談到基本建設事業时，就不得不連想到劳动模范苏长友等人的貢献；在介紹祖国森林工業的成长与發展时，就不由得要想起創造"安全伐木法"、"四季輕鋸法"、"流水作業"等經驗和培养近千伐木手的全国著名的伐木工人馬永順。但是在介紹这些先进人物与先进技术时，必須說明他們的成就与党、与集体之間的关系，防止个人突出。同时在博物館的整个陈列中，先进人物和先进技术的介紹与整个陈列应有一定比例。如果过多了，就会将博物館变成为介紹先进人物与先进技术的展覽会。

关于陈列中，要不要陈列各項事業發展的远景。我們应該肯定这样做是必要的。現在国內許多博物館已經在这样做，不过經驗还不多，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發揮宣傳教育观众的效果。这样做不仅使观众在博物館中看到过去的历史和現在的成就，而且可以展望到将来，因而更加激發观众为爭取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的劳动热情。

發展規律的，認眞貫徹，一定可以發揮各館的积極性与創造性，縮短筹备时間，早日开放陈列，以滿足广大群众对文化生活的多方面的需要，配合党进行文化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我以为还是值得考虑。

最后，我与和平同志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和平同志說："希望有实际工作經驗的同志，在这方面能有更多重要的闡述"，而我則希望有实际工作經驗的同志，在这方面能給我以批評与指正。

开罗回教艺术博物館

埃及政府自公元一八八〇年便开始从各个古老的清眞寺里收集各种艺术品和紀念物，并把它們集中地保存在开罗城东部的厄尔·哈琴清眞寺（The Mosque of el-Hakim）的廻廊里。这些藏品后来陈設在一个特为建筑在这个寺院內的小型"阿剌伯艺术博物館"中，（The Museum of Arabart），这座博物館是由一位精于建筑术的营造师罕斯·貝（Herz Bry）所設計营建的。所有这些藏品，在搬运到巴別尔一卡尔克广場（Babal-Khulq Square）現在的博物館之前，都一直保存在厄尔·哈琴清眞寺里，后者是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正式开放的。

公元一九五二年"阿剌伯艺术博物館"改名为"回教艺术博物館"（The Museum ofIs lamic Art），因为回教艺术，并不是阿剌伯国家所能包括得尽的，还有其它一些国家，如土耳其、波斯；在这些国家里，回教艺术也都是占有統治地位的。藏品的制作年代，包括自公元七世紀回教兴起，以迄十九世紀末的各个时期。

当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在回教統治时期，風行于埃及的艺术和文化的典型制作品。回教艺术博物館之所以被視为学术研究的中心，是因为通过那些展品上刻写的历史記录，可以使人們談到統治过埃及的各个王朝的历史，并鑒別出各类不同的回教艺术，了解它在其他的回教国家中的發展与演变。确实，回教艺术博物館已广泛地搜集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各种各样的回教艺术品，其中有些是举世罕有的珍品。

博物館在开罗附近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考古發掘工作，"阿尔—佛斯他特"古城（The old city-of "al-Fustat"）的部分遺迹已被發現。經追蹤清理后，它的巷衖和一些房屋建筑，都已历历在目。一所建于圖楞利得时期的（Tulunid period）墻面用司得苟泥（Stucco）修飾美观的房屋已被發掘出来，法提馬王朝时期（Fatimid period）遺存的一座浴室，也在它的近邻处被揭露出来。浴室的墻壁上面尙飾有美丽的彩色圖案画，这些壁画，至今犹是回教艺术中無与倫比的美术杰作。

諸如此类的考古發掘工作，已为博物館供献了难以数計的各种时期的艺术遺存。这些藏品和經博物館收購或来自捐贈的文物，通过博物館的陈列展覽，把它們各种类别的装飾艺术，都予以說明和解釋，如陶器、玻璃器、木制物品、織物、石器、金屬工艺品等。

从那个时候以来，回教艺术博物館的藏品便迅速大量地增多起来。其中若干藏品是世界上無可比拟的和最完备的，如塗釉的玻璃灯、埃及的陶器、滤清水壺、木制工艺品、織物以及各种石刻物品。

有些藏品已被列入世界上最宝貴的財富中，如藏品中的波斯美术品、土耳其的陶瓷器和1945年以后經博物館收購的金屬工艺品。这些貴重的金屬工艺品，原是拉尔夫·哈拉利先生（Mr. Ralph. Harari）私人珍藏的。不久以前，于1949年間又收購了阿利·依布拉希博士（Dr.Ali, Ibrahim）的大部分的美艺品后，博物館收藏的各种地毯和毛毡，在数量上也都有了相当的增加。

当我們了解到这个博物館在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剛开放的时候，它的藏品登录数量不过只有七千零二十八件，迨一九五四年其藏品登录的总数即已激增至六万件，我們便能覚察出它的藏品搜集工作，已有了很大的發展。

博物館共拥有二十三个展覽室，各种文物的陈列是依照以下两种方式布置的：

1. 按文物的不同風格和式样分別陈列：第二、三、四、五、二十、二十二室展覽的是烏馬雅得（Umayyad）、阿拔斯（Abbasid）和圖楞利得、法提馬、曼魯克（Mamluk），土耳其（Turkish）和波斯（Persiam）的各式各样的艺术品。

2. 按年代順序分类陈列：第六、七、八、九、十展覽室陈列的是木制工艺品，九、十一室为金屬工艺品，十二室为軍器陈列室；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为陶瓷器展覽室；十七室展覽的是各种織物，該室的內部尙有专供研究制造陶瓷器的陈設，十八为各种石刻和大理石雕刻物的展覽室；十九室是各种艺术出版物和原稿、版本的陈列室；二十一室則为玻璃品的展覽室。

博物館因为受地方的限制，各种地毯和毛毡都只好展覽在各室的墻壁上。

由于考虑到陈列品可能有时需要从这一室搬动

到另一个展覽室去，因此在每件陈列品上都有用紅色或白色和黑色写下号碼，它和藏品的登录时所編的号数是一致的。

博物館还設有販卖部(Sale Room)，里面陈設有博物館自开罗城周圍發掘来的各种不同时期的回教艺术品。这些展覽品是专为供給参观者們选購的，顧主可以从这里取得一張包括有簡短的文字叙述和这件物品的价格的收据，这不但使买主能够很方便地取得他所选購的物件，并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紀念品。

在販卖部的末端左边便是博物館的圖書館，它所收藏的回教艺术圖書在埃及差不多可以算是最完备的。这个圖書館是归博物館所有的，它是专为館內的职員們进行学習和研究而备置的。虽然如此，博物館方面也还是欢迎所有对回教艺术的研究發生兴趣的人們，并給予他們进入圖書館和利用一切圖書的种种便利。

博物館已出版了許多有关学术上的著述。一部"回教艺术博物館的美术藏品" (Collections of tue Museum of Islamic Art)的新丛書已开始編写，它将把館內的藏品分类依次編成专集陆續出版。这部丛書的第一集，是"土耳其的祈禱地毯"，(TurhishPruyer Rugs) 已于1953年刊印。——何修龄摘譯自开罗"回教艺术博物館"一書。

略談說明員兼陈列品保管員的好处

沈树芳

目前各地博物館在群众工作方面的一个共同的問題，是說明員兼管陈列品保管員好，还是說明員担任講解，陈列品由专职保管員看守的問題。

目前全国性的几个大博物館說明員都是不兼职的，地方性的博物館則差不多都是說明員兼陈列品保管員，有的还兼清潔工作。我們浙江博物館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有說明員以来，一直是說明員兼管陈列品的保管和清潔工作的。根据几年来的經驗，我們体会到这样作有很多好处。

首先是可以节省人力減少开支。我館經常陈列的有浙江的地質、矿产等八个部分，陈列面积一六八一平方米，各部分陈列因房屋关系分成很多小間，保管上相当不便。但是我們的說明員兼保管員只有八名，如果不兼职的話，至少要十五名。如果各博物館都这样做，可为国家节約很多的資金。

其次，可以解决陈列室保管員学習不能提高的困难。有些看守人員，因为在看守工作中不容易学習提高而不安心工作。如果看守員兼任說明員时，則大家都可在自己分工的范圍內进行学習業务。对說明員的学習，我們的意見是，开始时規定每人学習一部分（或一个陈列室）陈列內容的說明，以后学習其他部分。在地志博物館中不必要求每位說明員学会三部分的陈列內容，能掌握一部的陈列說明就好。能作全面講解的大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就可以了。目前对講解員要求具有中等学校水平，在他們具有一般知識后，应該讓每人选擇一門（如动物，植物、矿物、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等）作較进一步的学習，要求水平提高到大学程度。每一部分陈列內容最好都有一、二人进行深入的学習，以为专業性观众的講解創造条件。

說明員和保管員兼职，工作上可以輪流調剂，減少枯燥、疲劳，提高工作兴趣和效率。陈列室的保管員就是說明員，对于观众在参观中途發生的疑問，可以随时解答和主动上去講解。

文物工作報導

北京市　故宮博物院展出周作民先生家屬捐献的文物

周作民先生在生前收藏文物甚多，病故后其家屬遵照他的遺囑将所藏書画、瓷器、銅器、銀器、木雕和象牙、犀牛角雕刻等文物一千四百零五件捐献国家。

在捐献的繪画中有不少佳品，如明代著名画家沈周的"听泉圖"卷，陈道复的"墨花圖"卷，王子元的"芝兰圖"卷；清代袁江的"竹苞松茂圖"軸，幅高約九尺，长达两丈余；边寿民的"蘆雁圖"軸，董其昌的"仿米山水"卷，世祖（福临）的"鍾馗圖"軸，揚晋的"牧犢圖"等优秀作品。

在法書中有宋人"法書合卷"，明代祝世祿的"書詩"軸，清代杜首昌的"自書詩"軸等。玉器有汉代玉璧，瓷器中有唐、宋、明、清名窑制品，銀器中有整套的銀杯等等。

为了使这批文物与广大群众見面，故宮博物院精选了三百余件，于七月二十三日在皇極殿公开展覽。

（田文秀）

上海市　上海市文物整理倉庫發現义和团运动的旗帜

上海市文物整理倉庫最近在該市长乐路旧貨摊上發現一面义和团反帝运动的旗帜，在国內这是第一次的發現。

这面旗子长250、寬136公分，正黃地，藏青色四足五爪龙，尾五出，龙身是用白粗綫分出鱗甲，紅嘴白牙，白眼圈，黑眼睛，右上角一紅珠，

义和团运动的旗子

和1955年1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的十面义和团旗帜（見本刊1956年第一期"文参"）中的两面龙珠长方旗相同。

（孙桂恩）

河北省　丰潤县披霞山小学內發現古文字撞身一段

丰潤县师范学校陈老师游披霞山时，在披霞山小学內發現古文字幢身一段，我們听到消息到該地調查时曾誤認为朝鮮文，其实不是。今提出請大家研究。

幢身为不等边八角形，高九十六公分，大面寬

古文字幢身拓本

二十六公分，小面寬十二公分，大面有文字六行、小面三行，每行均为十六字。除这种古文字外还刻有汉文："□佛頂尊胜陀罗尼曰"等字。

据了解此地为明天啓年重修之眞武庙，殿內有碑可考。同时还發現八角石簷两塊、石葫蘆形瓶一对，幢身来源村中無人知道，只知建庙时就有此幢。据五十二岁紀林祥老师說，原来此幢在眞武庙大殿前，两石瓶左右摆列，在解放后建学校时才将幢身移到殿左配房前，至于幢身何时創建也無年代可考。（馮秉其）

山西省　晉陽县寨墻發現金元时代鉄質器物

晉陽县城东六十里內是一带重山峻岭，其中一座高約一千五百公尺的山峰名叫寨墻。一九五六年夏季水磨头村李向华老先生在寨墻巔上农田沿边發現塌出的一批鉄質武器和生产工具，当即收集妥善保管。今年三月中旬，山西省文管会派人前往勘查。这些鉄質器物中，武器有矛、刀、挠鈎、狼牙錘、鏃鞭、鏢头，刑具有手銬、鉄鐐，生产工具有鋤头、斧、鑱、鐮刀、鉋刀、墨斗、胶鍋，其他工具和用具有杈、鈎、熨斗、六耳大鉄鍋等。和这些东西一起出土的还有宋、金、元代的瓷器和貨幣。以上文物已由李向华老先生全部交給政府保管。

（戴尊德）

內蒙古自治区　內蒙准格尔族羊市塔区破壞壁画古墓一座

內蒙伊克昭盟准格尔族西南部羊市塔区內大西沟村西約一公里，有一小沟，当地老乡叫它寡妇沟。在沟的东坡上，有一片砂土地。一九五六年四月春耕时，老乡發現地下有磚，当即挖洞进去，發現人骨架一付，并将其旁發現的陶罐和馬鐙等物拿回家去，还看到磚墻上有几幅画。

这一消息傳出，經村干部前往查看后，逐級报告到盟政府。

一年以后，我往該族調查文物时，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前往查看，所得情况如下。

这座古墓是圓形单室磚券墓。东北方有小門，寬达46厘米，高1米，长60厘米，門外为封門磚。墓頂現高3米。墓的內部基本上是圓形，但也可以約略看出分为七个角。每角上有一磚柱，是用三行磚側立筑成。柱的頂部有一横磚斜放。柱高1.20米，每两个磚柱之間的寬度約为1.15米。在它的下部中間，每隔一面有用磚砌成长方形的窗。磚柱上、窗的上部和左右两方，都是先抹白灰，后施紅彩。窗上無抹灰痕迹。在沒有窗的一面上，全是先抹白灰，后画壁画，壁画的残片，就發現在这一面下部的灰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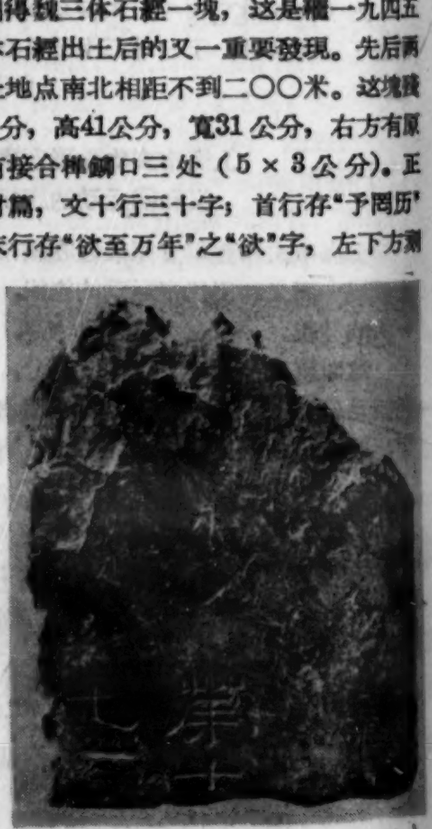
从这些頽落下来的壁画残片看，有的画着一面旗，黑色的旗杆和黃色的长旄，还能看得清楚。有的画着山茶花，其大小与眞实的山茶花相同。用墨笔勾画輪廓，用紅彩画花瓣，画得很流利，很精彩。据老乡說，原来有一面画着一个女人，头戴風帽，一手持弓，一手拉馬，人高約40厘米，可惜已完全毀坏。磚壁的北側下部，砌着一塊刻有一盞腊灯的磚。腊的高度与現在白腊相仿，上面有塗紅彩火焰形状。人骨架已紊乱。据老乡說，当初的方向是头西北而脚东南。磚是繩紋。若仅由这种磚来推断，在我区只有北魏时代的墓磚是繩紋的。

这座壁画墓非常宝貴。破坏时老乡只拿走了陶罐和馬鐙，并未損坏这些壁画。直到秋雨过后，壁画才頽落下来，逐漸粉碎。当地各級政府，在發現后如能急速逐級上报，也許还可以設法搶救一部分，可惜他們以为無关紧要，致使壁画遭到損失。

（汪宇平）

陝西省　魏三体石經在长安出土

今年六月陝西省农業厅在西安市青年路西段挖下水道时，掘得魏三体石經一塊，这是繼一九四五年康誥篇三体石經出土后的又一重要發現。先后两塊石經的出土地点南北相距不到二〇〇米。这塊残石經厚16.5公分，高41公分，寬31公分，右方有原斫痕，左方有接合榫鉚口三处（5×3公分）。正面刻尚書梓材篇，文十行三十字；首行存"予罔历"之"罔"字，末行存"欲至万年"之"欲"字，左下方刻"第十七石（残）"四大字，右边有"始二年三"直書小字。背面刻春秋公元年二年残文十行五十字，起首行"無冰"二字，止末行"邾人"之"邾"字。



石經正面

历来出土的魏石經均是上段，

石經背面

独这次發現了石經的基部。它不仅补充了魏石經的体制，并依此可复原石經的全貌，其上所刻“第十七石”字样也可推知魏石經之石数。“始二年三”可推定魏正始二年三月是刊經的时間。

这塊石經現已运回陝西省博物館保管。（田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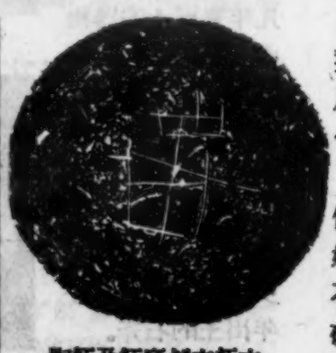
青海省　青海省文管会在都兰調查古文化遺址、古城、古墓多处

五——六月省文管会配合省文化局組織的“海西及柴达木盆地文化工作小組”重点的調查了海西州都兰县部分文物。

在太吉乃乡的諸木洪戈壁滩上發現古代文化遺址一处，是三个較大的堆积，灰層中有陶片和牛、羊、馬等骨胳，陶片的質地都較特殊，还有垒成的土塊墻。察汗烏苏的銀得兒和香日德附近的考肖圖都有古城和古墓，古城已傾頹，只显出輪廓，墓在古城內西南隅，墓塚高約十余公尺。香日德鎮的香日德河东岸，有古城一座，面积約五万多平方公尺。在都兰一区希里沟乡也有古城發現。此外还征集到出土的鉄鏵、石磨盘等。（青海省文管会）

安徽省　安庆市發現划文陶器

一九五六年五月安庆市东郊發現古文化遺址一处。遺址南面紧靠长江，西边是棋盘山。在遺址中散布各种不同的印紋陶片、鬲足、陶网墜、陶豆足及角状陶器殘柄等。这个角状殘柄是灰陶，与一九五六年考古学报第二期“江西清江新石器时代遺址”陶器柄相同。另外發現紅褐色完整的小陶杯一件、高9.3、口徑5.3、底徑5厘米。大腹，平底，壁薄，有板有流，完全是用手工制成的。在流的中間和杯身里外均有指紋，器底有極細划文。此种帶划文的陶器在安徽还是首次發現。可惜这个遺址已被燒磚取土破坏。（白冠西）



陶杯及杯底划文拓本

浙江省　庆元县曹岭鎮發現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队宣傳标語

今年三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会在派員調查龙泉、庆元二县的部份古窑址时，在庆元县曹岭鎮的曹岭宿店及曹岭邮电支局內發現了三幅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宣傳标語，标語全用毛笔直写在刷石灰的墻上，內容有：

“欢迎六一四九七八师士兵們，暴动起来，組織抗日反帝同盟軍！原十九路軍士兵們，闔变失敗，蔣介石把你們不当人的去屠杀活埋，你們記得嗎！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队”

“□，“六一四九七八师的弟兄們，你們在上海抗日，就是犧牲也是光荣□，現在替蔣介石来进攻苏□紅軍，屠杀自己的同胞，□願意……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队”

“打倒卖国……，反对国民党……”

宣傳标語一

宣傳标語二

前二幅保存較完好，后幅因石灰脫落，破坏較严重，字迹已

不全。

一九三四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瘋狂地进攻我国东北、华北地区时，蔣介石反动派反而發动了对我中央根据地的五次"圍剿"。为了挽救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决定北上抗日，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民主政府組織了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粟裕同志等率領第七、十軍团于一九三四年經福建、浙江直入宁、沪、杭敌人心脏区牵制敌"东路追剿部队"，讓紅軍主力北上。据訪問，曹岭鎖的宣傳标語就是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队經閩入浙北上时所写的，紅軍曾在此住过两天，在这一带的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上的标語，希望有关部門重視，妥善保护。（姚仲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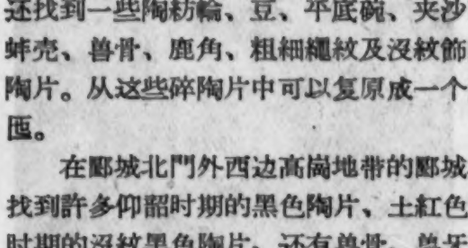
河南省　郾城發現多处古文化遺址

漯河一中考古研究小組，从去年到現在利用假期或下乡訪問学生的机会，在郾城县發現了多处古遺址。

在郾城西北三十里台王村的凌云台遺址是一个周圍一里多大，高一丈五尺多的土台，曾先后在这里找到偏刃石斧、石鑿、残三棱石鏃，黑色陶片、籃紋黑色陶片，这里可能是一个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混合遺址。另外在遺址西北發現一窖螺蠣壳，还找到一些陶紡輪、豆、平底碗、夹沙鬲足、鼎足、蚌壳、兽骨、鹿角、粗細繩紋及沒紋飾的商周时代陶片。从这些碎陶片中可以复原成一个圓盘和一个匜。

在郾城北門外西边高崗地带的郾城北关遺址中找到許多仰韶时期的黑色陶片、土紅色陶片和龙山时期的沒紋黑色陶片，还有兽骨、兽牙、蚌壳、接近化石的骨器，此外还有商代繩紋陶片、鬲足、豆腿、鼎足（土紅色夹砂質，并且都是长方形的，与其他遺址中不同）和繩紋大板瓦、母子扣磚等。在發現的文物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中空的半截黑色陶环，长約1寸3分，粗2分，断面中間有針头大的小孔。据談，陶环中空还是第一次發現。

另外在郾城东南二十五里的邓襄寨發現一处上層是商代陶片下層是龙山时期陶片的混合遺址。在郾城南三里桥澧河南岸發現了商代繩紋陶片及豆、碗、鬲足、兽骨等古代遺物。在郾城西南二十多里的板桥村南發現了商代的繩紋陶片及豆腿等。又在城东南三十五里的古召陵地方找到了两个銅制的鏟形貨幣，据說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貨幣。（王　灌）



召陵發現的鏟形古幣拓本

南陽市积極收集汉代石刻画象

南陽的汉代石刻，过去常被用来造桥、鋪路、盖房，使这些宝貴的文物流散各地，遭到破坏。近几年来，通过發掘、修路、补桥等建設工程，已先后搜集到七十四石，但仍有一大部分散置在附近涵洞、桥梁之下，被水冲刷剝蝕。如：城东七孔桥上，画面向外，可以窺見的就有四十六石。估計画面向內的当有很多。历年来經水侵蝕，部分画面已經泯灭，市文化科、館在省文化局的支持下，会同市建設科正积極籌备翻修七孔桥，并爭取在今年雨季前将桥下画象石搶救出来，加以妥善保护。

（刘兴长）

貴州省　貴州省在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中清理古墓多座

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貴州省博物館籌备处派陈默溪、袁有眞等四位同志赴平壩进行保护文物宣傳，同时結合清理古墓，工作在三月二十五日結束，計清理了平壩县平庄乡、夏云乡等地古墓十一座（磚室墓三座、石室墓三座、土坑墓五座），出土有釉陶、銅、鉄、金、銀、木、石、瑪瑙、琥珀、琉璃、漆器等器物及五銖錢共三百多件，这批出土器物中的釉陶珠、釉陶水注、銅鐎斗、鉄剪、金釵、銀釵、銅釵、木劍、石硯、五銖錢等。在貴州几年来出土的器物中还是第一次發現。根据这些墓葬形制与器物等看来，估計是东汉和六朝两个时代的墓。另外，在平庄乡还征集到当地早年出土的石斧。

（方为范）

平壩古墓出土銅釜与鉄四脚

平壩古墓出土的釉陶水注

讀者·作者·編者

"月湖琴盒"正誤

"文物参考資料"今年第七期文物工作报导栏載有李鑒昭先生关于江陰县發現古銅制"月湖琴盒"的报导。

按上述出土物并非琴盒，李先生称为琴盒，蓋因誤認末一"制"字为"琴"字。此物系清通州丁月湖所設計多种多样的芸香爐之一。"月湖制"即謂丁月湖所制，在南通有文献可以考証的。

丁月湖名溶，清江苏省南通石港場人，（石港現屬南通县）生于一八二九年，卒于一八七九年，能書能画。他繼旧制芸香爐形質粗陋，因而設計一种爐样鏤空花紋篆字。先后設計有百种，各各不同。爐样与鏤空花紋篆字后輯印为印香圖譜一册，或称香印篆册，一称印香爐式圖。書开始写于一八七六年，成于一八七八年，刻成于一八八〇年或略后。現在南通市旧書店間或还可以收購到。

丁月湖所設計的芸香爐成品，在南通市内流傳的不多，据說石港也少見。似乎过去不曾有收藏家。他家里据說只保存一件，今經市人民委員会文化科購作市博物館藏品，市人民政协历史文物研究小組也收到組員捐贈的一件。

芸香爐的用处，在于供焚芸香，屬于書斋文房的一种清玩用具。丁月湖設計的爐式包括方、圓、长、扁、多角、曲綫、物状、圖案等等。每一爐式都經題名，多半采取吉祥語句。例如江陰所發現的一式，見圖譜八十六，外盖題"大富貴亦寿考"。內面印香篆模的香篆，則題"吉祥如意"四字。李先生在报导中沒有提到爐的各个附件，可見所發現的只是一种"吉祥如意"式爐的殘存部份，或許只殘存了盖和上層或中層。李先生报导，以一字誤認，逕称为"琴盒"，并联想到琴迹，依常情推測，如此小琴小盒，事实上也不会有的。

江苏　管勁丞

向讀者致歉

由于我們审稿时的粗枝大叶，在本刊今年第七期83頁上錯誤地發表了李鑒昭同志把月湖"制"香盒誤作月湖"琴"盒的报导一則。該期出版后，接到北京何其耀等四位同志，济南杜明甫、上海徐家珍、天津欧陽蟾园、福州馬端、江苏初学、管勁丞、重庆周尊生、無錫張覚教等同志先后来函指出这一錯誤并提出辨正。对于讀者这种爱护本刊的热忱我們衷心表示感謝。除在第八期上已将何其耀同志来信摘要登出外，現在再将管勁丞同志一文摘要發表。因为篇幅关系，其他同志的来信未能一一發表，特致歉意。今后仍希望讀者、作者对本刊更加强监督。

編　者

要注意引証材料的眞实性

本刊一九五七年第五期發表楊有潤同志"談广州小北宋墓的爭論"一文的后面有这样一段話："有些同志說'桥形幣'是貨幣，……在四川成都天迴鎮附近大灣古墓及跳登河三磚厂工地古墓，一墓中曾出四、五十个以上的这种东西，集中出于人骨架的腰部，与山字紋銅鏡、鉄質錯金帶鈎伴出，这就很难解釋它为銅飾。"（見該期66頁）这里不談楊同志引証上述出土情况为的是說明什么，但引証的跳登河三磚厂的情况与事实有些出入。我們是曾在跳登河三磚厂一次拿回四、五十个所謂"桥形幣"的，但那些"桥形幣"是由泥工采集而轉送給我們的。不說它所出土的墓葬情况如何，恐怕还沒有人知道它的方位呢。这很可能是彙报者（包括我自己在內）說錯，或者是楊同志听錯。不管是屬于那个方面的，作为一个科学的考古工作者，在引証材料的时候，不可不愼重些。

四川　洪劍民

关于阿拉尔屬那一省的解答

"文参"一九五七年第二期第八十三頁"文物工作报导栏"李遇春同志写的"阿拉尔發現木乃伊"一文中，关于阿拉尔屬那一省，作者沒作肯定。根据青海省人民委員会一九五七年一月出版的青海省地圖，阿拉尔位置在柴达木盆地西北隅，屬海西蒙、藏、哈薩克族自治州。特提供参考。

讀者　赵生琛

来函照登

編輯同志：

我写的一文，已在你刊第八期登載了，現在要求編輯部对該文加一补正說明：

"这篇文章主要根据朱瑜、丁琦二位先生的材料，加以整理、归納而作成的"。

上海　張开友

文物圖片出版消息

承德名胜古迹

52开　12張　（彩色）　定价0.6元

承德位于河北省（前热河省）的北面，海拔在一千米以上，山川幽美，林木葱蘢，彩云变幻，暑夏清凉，二百多年前就为清代帝王玄燁（康熙）选为夏日避暑之所，并在此修建规模宏大，結构精美的行宫——避暑山庄与壮丽的喇嘛寺庙。这些建筑在設計上融合了江南园林秀丽的風格和北方雄偉簡朴的形式，在整个布局上构成了一个非常雅靜、淳朴、豪迈而又奇特的大建筑群，較金碧輝煌的皇宫建筑又别是一种風味，是中国园林建筑艺术的輝煌成就。

这套圖片介紹了避暑山庄的水心榭和普陀宗乘之庙，須弥福寿之庙、普宁寺、普乐寺等主要建筑物，以及周圍幽美的風景名胜。（即将出版）

云岡石窟

52开　12張　定价0.3元

云岡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武州山，开鑿于北魏时期，自东到西，毗連开鑿大小洞窟二十一个，綿連达二里，规模非常壮丽。

云岡石窟內容以雕刻佛象、佛傳为主，圍繞佛象更雕飾了各式各样的建筑物与复杂的圖案花紋，組成了許多絢丽灿烂的画面，刻工的精巧与內容的丰富，实为我国佛教雕刻艺术的宝庫。

这套圖片所介紹的是云岡石窟的一部分精美雕刻，还有彩色版的云岡石窟外景，以及中外驰名的露天大佛象。

（已出版）

太原名胜古迹

52开　12張　定价0.4元

本集画片主要介紹太原著名的名胜——晋祠。晋祠在太原市西南，殿宇中规模最大的是聖母殿，系宋代創建，殿中有44个宫女塑像，服装鮮艳，姿态优美生动。聖母殿前的魚沼飞梁，是我国桥梁建筑中鮮有的形式。聖母殿前的献殿是金代所建。此外还有古柏、难老泉、水鏡台、文昌宫等都是明、清两代的建筑。金人台上的金人有两个还是宋代的遺物。

除晋祠外还介紹了太原天龙山的大佛、太原永祚寺的双塔以及崇善寺的佛像等。（已出版）

陶　屋

52开　12張　定价0.24元

本圖片系选擇几年来在全国各地發現的汉墓中出土的各式精美的陶屋編成，能表現出在汉朝时候我国的建筑艺术就已达到了極高的水平。（已出版）

文物出版社出版

文物参考资料

（月　刊）

第九期　（总85号）

1957年9月27日

编　輯　者　文物参考資料編輯委員会
北京东四头条4号
电話4局1440

出　版　者　文　物　出　版　社
北京东四头条4号

总发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預　訂　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　售　处　各地新华書店

定价每册0.50元

預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1.50元
半年六期	3.00元
全年十二期	6.00元

平邮在內挂号費另加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彩色頁文物出版社
印刷厂制版印刷

本刊第8期实际出版日期8月28日　邮局送出日期8月29日　印数：8,000　本刊代号2—27

北京市邮局新聞稿件另寄整付許可証第22号